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上海舞

Shanghai Dancing



〔澳〕布赖恩·卡斯特罗　著　王光林　邹囡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所有这一切使小说产生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力度，一种元现实主义的紧凑性 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更大谜团的一部分，只有将所有这些拼凑起来，这个设计才会浮现……从而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是小说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

——泽维尔·庞斯

在《上海舞》中，卡斯特罗使用了一种精心雕琢、充满感性的散文和图谱、摄影、文件和信函来探讨一个瞬息万变的多语世界。该小说获得了澳大利亚一系列声誉很高的文学大奖。有人认为，该小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又是一本跨越了各种文学形式的书籍，讲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

——亚马逊网站书评

如果想在布赖恩·卡斯特罗的新作《上海舞》中区分真与假、写实与虚构，那一定是在浪费时间，破坏阅读经历。作者说这是一部"自传性小说"，但是他的真实意图就是反对定义，颠覆限制性归类。

——《亚洲书评》

《上海舞》的伟大主要就在其丰富的肌理。当一本书有许多内容需要奉献的时候，你不可能指望它一下子全部展现出来。在作者的经历中也包含着社会和历史等各种复杂成分，不可能轻易得到商榷，因此，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需要缄默、用典，或某种机警。《上海舞》在处理这些复杂成分时采用了一种十分浪漫的方式，它以家族史的形式出现，而记忆和回忆则穿插其间。

——艾弗·印迪克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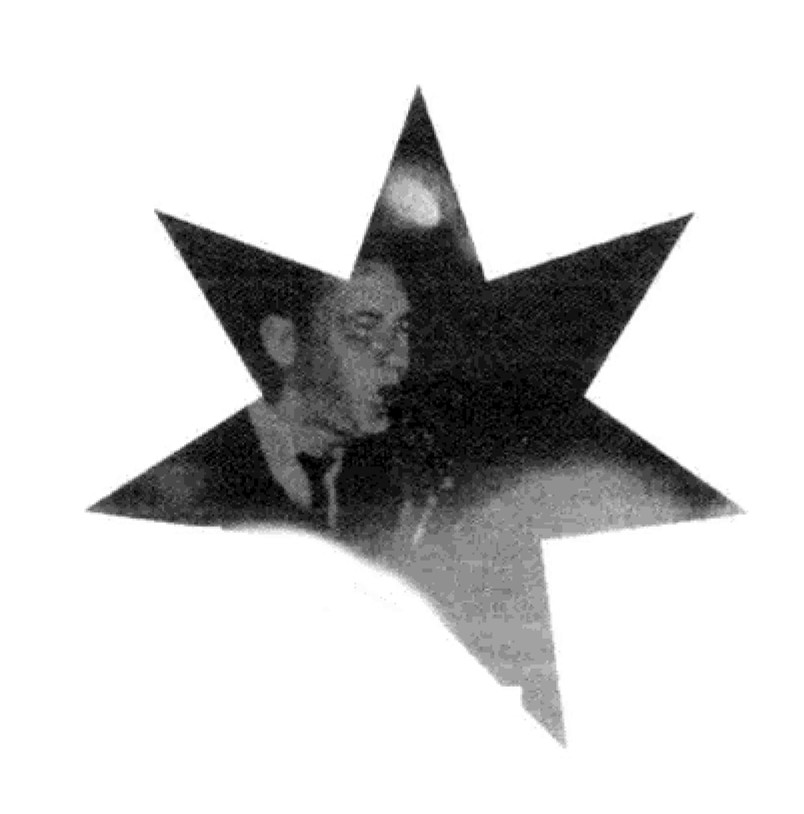






定价：3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上海舞

Shanghai Dancing

〔澳〕布赖恩·卡斯特罗 著 王光林 邹囡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舞/(澳)卡斯特罗(Castro,B)著;王光林,邹囡囡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0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Shanghai Dancing
ISBN 978-7-5327-5186-0

Ⅰ.上… Ⅱ.①卡…②王…③邹…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5998 号

Brian Castro
Shanghai Dancing

图字:09-2008-373 号

上海舞
(澳)布赖恩·卡斯特罗 著 王光林 邹囡囡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261,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5186-0/I·2958
定价:35.00 元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

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 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 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 (Peter Carey) 著，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 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 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 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年获奖；

《井》(The Well, 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 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 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 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

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

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　薇　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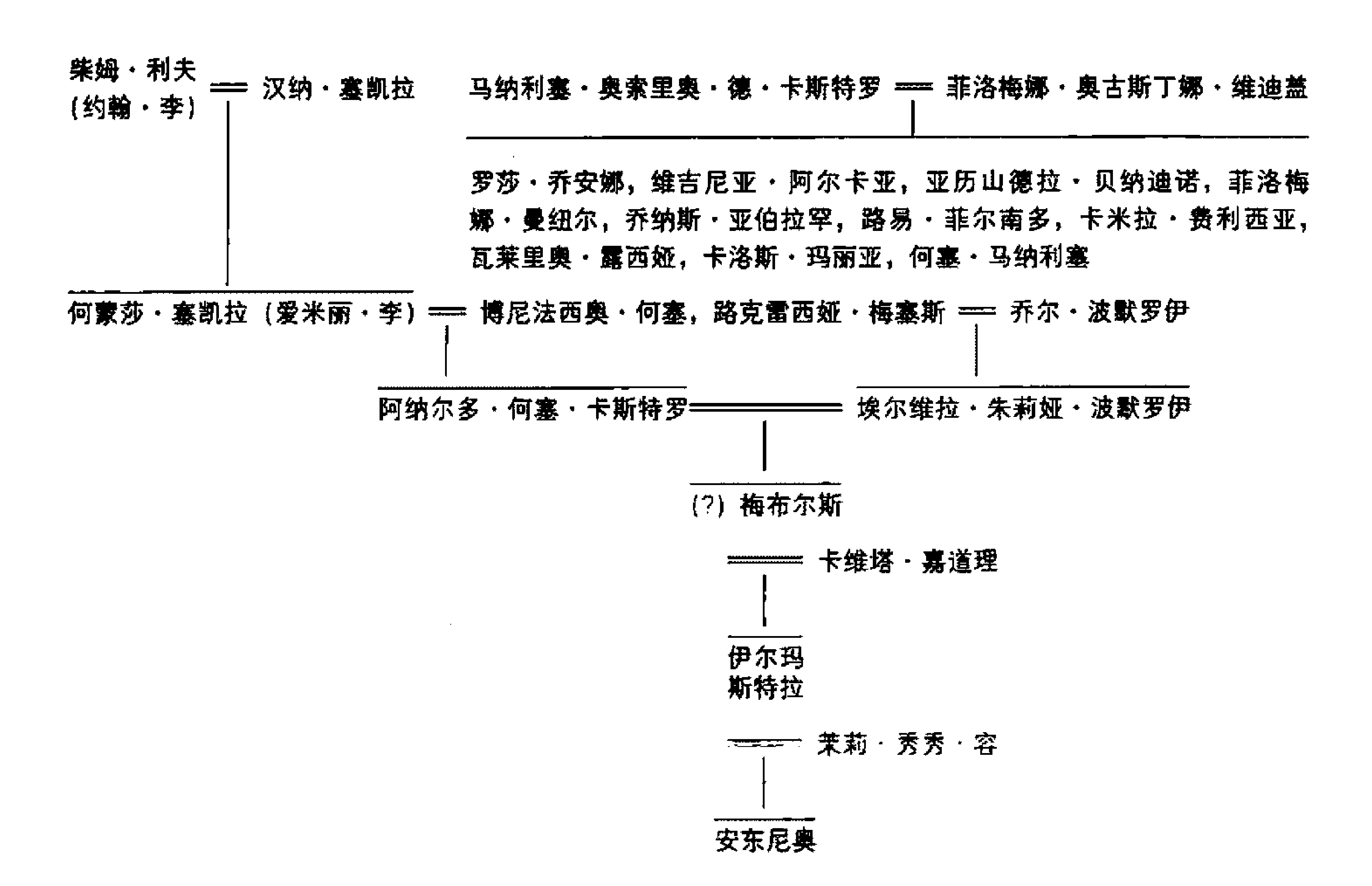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Shanghai Danc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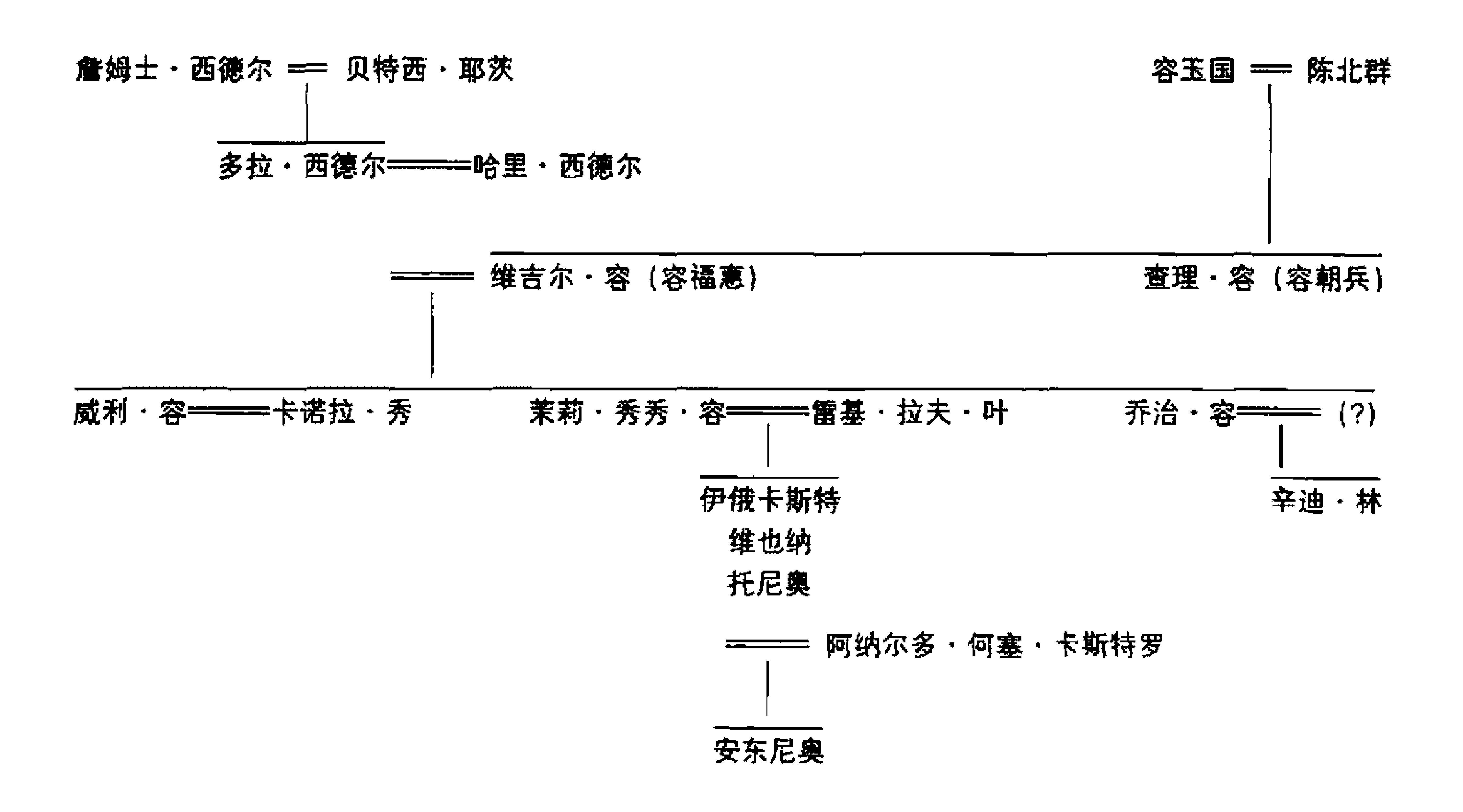
Brian Castro

卡斯特罗家族



柴姆·利夫
(约翰·李)
汉纳·塞凯拉
马纳利塞·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
菲洛梅娜·奥古斯丁娜·维迪盖
罗莎·乔安娜，维吉尼亚·阿尔卡亚，亚历山德拉·贝纳迪诺，菲洛梅娜·曼纽尔，乔纳斯·亚伯拉罕，路易·菲尔南多，卡米拉·费利西亚，瓦莱里奥·露西娅，卡洛斯·玛丽亚，何塞·马纳利塞
何蒙莎·塞凯拉（爱米丽·李）
博尼法西奥·何塞，路克雷西娅·梅塞斯
乔尔·波默罗伊
阿纳尔多·何塞·卡斯特罗
埃尔维拉·朱莉娅·波默罗伊
(?) 梅布尔斯
卡维塔·嘉道理
伊尔玛
斯特拉
茉莉·秀秀·容
安东尼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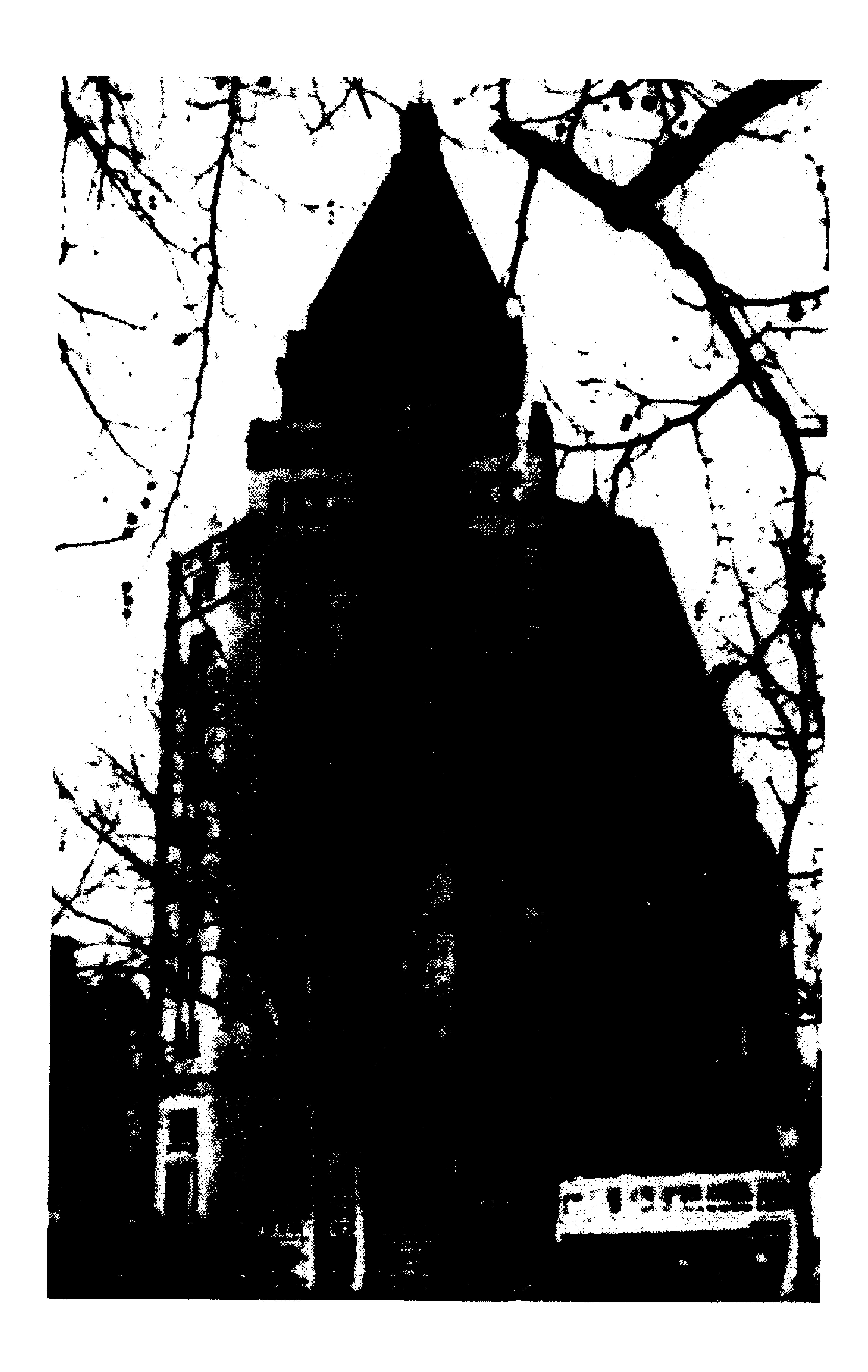
容氏家族



詹姆士·西德尔
贝特西·耶茨
容玉国
陈北群
多拉·西德尔
哈里·西德尔
维吉尔·容（容福惠）
查理·容（容朝兵）
威利·容
卡诺拉·秀
茉莉·秀秀·容
雷基·拉夫·叶
乔治·容
(?)
伊俄卡斯特
维也纳
托尼奥
辛迪·林
阿纳尔多·何塞·卡斯特罗
安东尼奥

我们摄影是为了将拍摄对象从我们的脑海中驱走。

——卡夫卡



一如太初，一旦赋予了声音……歌手就会表现出自己的音区……一旦赋予了声音，新生儿就会咒骂冒汗似的铁盘子，阴湿腐烂的茅屋，旅伴的一副副病容，作呕、吐痰、屈身、弯腰，浪花满嘴，一串串泡沫飞溅在海水上，大海在咆哮，似滂沱大雨在翻腾，海风吹得嫩芽失去了其鲜嫩的光泽，仿佛魔鬼的尾巴升向了天空……一旦赋予了声音，它就会再现出燃烧的空气，熊熊燃烧，烟雾缭绕的烟囱仿佛加农炮一般瞄向了肮脏的天空，将人类的丑行重新喷回到上帝的脸上。……一旦赋予了声音，它就会说它走错了路，堕入到了地狱之中，从那一刻起，它就命中注定要不断跨界，游走于冥冥迷宫之中，经常要亵渎一座坟墓，败坏一个名声，破坏一座纪念馆。因此，不要忽视医生的责任，是他们用残忍的试验手段和所谓的仁慈将之催生，然后再将它头朝下挂在其粉红色的羊皮拖鞋跟上，排出肺内的水……因为一旦赋予了声音，婴儿就会咳嗽、叫骂、尖叫，扑嗒①！扑嗒！扑嗒！伴随着锅炉的呼哧声。

我最初的语言已经完全成型。我召唤起了妓女。

① Puta，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里，含有妓女的意思。发出“扑嗒”声也就谐音召妓。——译注

开往中国的慢船

冬天降临上海。

找到番茄的希望是没了，不过你还是在找。这是某种治疗。不，不是番茄，而是寻找本身。

有时候，一想起过去，想起那没有经历过的生活，那闪现在眼前的一片乌黑，你就感到喘不过气来。记忆犹如黄色的奶油，碎得一片一片的。这里面有原胆汁酸，原硫酸铁，氰化钾，我们还是少点专门术语吧。至少现在不要太专业。它曝光时间太长。仍然在黑暗中。你记得过去在上海，人们习惯于用薄纸包裹番茄，就像本故事，就像历史，一切都包在一张薄纸里，有文字，有记忆，也有谎言。

说到跳舞，那又是一回事了。你对此得有无限的耐心。时间与定时，优雅与欲望，像潮汐一样来回摆动，直到有什么给冲上岸来。总是有东西给冲上岸来。

上海舞。一切还没开始。没有凄凉情景的突然显现，头上也没有闪烁摇曳的煤气火焰。

我想弄明白这一切，但是我所拥有的只是一沓照片，包在玻璃纸里。本来我的皮夹里应该放的是信用卡，但是现在这些起皱剥落的照片却粘在了皮夹的透明塑料纸上。

上海舞。听上去既像是上层社会生活，又像是下层社会生活，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我父亲只提过一次，不过不是对我。他提的时候我才 7 岁。当时我正躲在俱乐部的桌子底下，而他则跳着茶舞。他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女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她们脚上穿的长统丝袜，那皮鞋的高跟细得惊人，足可以刺死人。有时候，她们会拖我坐在她们那富有节奏的膝盖上。我很早就了解了女人。

上海舞。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天夜晚，我睡在自家的卧室里，这时一阵脚步声将我惊醒。一根绳头轻轻地敲在玻璃上。一个小偷爬到了窗台上，气喘吁吁，好像肺里有病。我转过头来，父亲出现了，他用警棍敲了一下，夜盗者跌到了十层楼下。我听到了一声沉闷的轰响，就好像有一次我将西瓜丢到了厨房地板上的声音一样。我父亲来到我床前，告诉我没事了。不过不是西瓜。为那事他曾经痛打过我一顿。

小偷的尸体给裹在一张毯子里。他下坠的时候给楼下饭店上的可口可乐广告牌挡了一下，要是他给挂在广告牌上就好了。要知道这样一种商品本来是可以救他的命的。他的光芒一闪而过。我发现他有一缕头发给楔在了霓虹灯管上。我用透明胶带将其粘在一本练习簿里，主要是想凭借自己的客观印象来打动自己，而实际上这开始了一段痛苦的见习期。

没过多久，我被送走了。

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十年。我的头脑一直不正常。时光流逝。然后我产生了回到中国的欲望，回到那些沉沉浮浮的城市，任由记忆的潮汐不时将其展现。我想追寻那些日益消逝的空白。

有一天，天下着雨，我带着小狗，离开小屋，沿着山间的崎岖小路漫步，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于是，我打好包裹，永远地走出了我的婚姻和我的生活。我心平气和，达到了他们所说的上帝般的宁静。我的内心再也没有了荒野的焦虑。我就是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往前行。我头戴帽子，固定好路线，好似一名圣徒在进行朝觐。

上海舞。我骨子里的东西。

我过了四十年后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这片脏兮兮的水域，两边分别是飞地和岛屿。那天正下着小雨，他们将我转到香港的港口，登上"上海号"船，转航驶向上海，驶向其船籍港。

三天的行程十分疲劳，天天做噩梦。我待在船舱潮湿的洗手间里，倚靠着毛巾架，两眼盯着冰冷的衣服，到了夜晚，我身上盖着粗糙的中国棉被，浑身发冷。到了第三天，我起来看到了一只海鸥大清早就在觅食，尖叫着寻找鱼饵。就这样从珠三角来到了黄浦江。我的祖先多年前就是这样来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硬币……一个欧洲水手来碰运气，结果成了一个杰出的上海人。

船在水中往后退了退。一艘拖船将其往边上推了推。

外滩两边，灯光闪烁，薄雾飘浮，冬天的树分开了叉。炭黑色的天空飘浮在一个个建筑起吊架之间。上海简短地陈述着自己的代码，开始为夜色降临做准备。一束束灯光咳嗽，感染，消亡。一股潮湿的水味堆积在寒冷的空气之中。走在那些高楼之下，我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疯狂的开始，伴随着的是和我心态一样的另一种心态，一个疯狂的影子，说起话来不合时宜，神经错乱。一条驳船向水的上游缓缓驶去，光线逐渐变暗，驳船一会儿看上去大，一会儿看上去小。一幢幢摇摇欲坠的房子像动物一样蹲伏在夜晚的烟雾中，一只乌鸦在铁灰色的天空中折来折去。一些矮小的房子浮现在墓地边。不，不是这儿。远处传来了有轨电车的吱吱尖叫。一艘陈旧的蒸汽船发出痛苦的呻吟，向河的上游慢慢驶去。不，我父亲不会同意在这儿死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此时，夜幕说降就降，于是我猛然跑了起来，想离开这一切。我先是穿过片片温暖的空气，然后又穿过热气腾腾的晚饭所散发出来的味道，穿过工厂残渣和塞满了铅条的街道，来到了河边。我听到了刺耳的警笛声，噼噼啪啪的火

焰声，对一个古老的中国城市产生了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我品尝着锈色，感到自己是如此残忍地给固定在这儿，如此孤独地在小路上徘徊，就连整个世界都在我的喉咙里裂开了。我别无他法，只能走进那座迷宫口里，发狂似地喘着气。

我自己款待自己，喝了四杯马提尼酒，然后才感觉好些。

上海舞。从一根古老的线轴上抛一根线：得到的是方向的迷失和稳定性的消除。

要想捕捉到我父亲很难。他曾经在这家饭店住过……和平饭店，这是现在的叫法。仿佛有人会相信似的。没人能天天这样生活在豪华奢侈之中，除非到游客去不了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那儿，你会看到他们笑来笑去，穿着拖鞋在钢丝之间跳舞，驱除身上的痛苦。和平，和平。他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了解他们，就像我了解自己的心脏一样。

但是在我父亲的年代，这家饭店叫华懋饭店。那时他真是超富，胸袋里总是放着一只哈瓦那雪茄盒，他每次都要租上三个月的屋顶公寓，因为在屋顶他可以透过观剧镜观看他的船，然后在真皮封面的笔记本上记下日夜缓缓驶过的船只。“日日夜夜”。这是他的曲调。穿过苏州河，他可以看到他公司里的蒸汽船，木制的，主帆上有斜桁，他的锡克族船长在甲板上转悠着，擦着铜管。这是他的领域，是蜜糖堆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他的小工用血和汗在给仓库地板上蜡，用一堆一堆的稻米在擦拭楼梯扶手的弯斜部分；他知道什么时候走合法程序。接下来是他的儿子，再接下来又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一代人总是要摧毁点什么。你还甭不信。

就这样，我父亲看着外面的黄浦江和苏州河，这是 1932 年的某个中午。他泡在温水里，冲洗着自己的生殖器，并因疼痛而不自觉地退

缩，然后，他穿上奶白色的西装，系好领带，准备去饭店吃早中饭。他筹划着下一个季节搭乘总统号轮船去温哥华，也许再去一下北美五大湖区，然后从日本回家。他拿起烛台式电话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扬手招了一辆汽车，一路前往法国总会，到了法国总会，他见到了若昂、梅梅、卡利尼奥·德·席尔瓦，还有两名法国女孩，他们一起打网球，并游了一个多小时的泳。三点钟他来到美国总会吃顿午餐，打儿圈保龄球。球道上打过蜡，十分锃亮，球过之后传出咣当的声音，雪茄的烟气如云雾缭绕。打完球后来到阅览室，用报纸盖上脸，睡个午觉，在台球完美的撞击声中，调整着自己的呼吸，直到六点，伙计将他唤醒，给他刮了刮胡子，让他享受点按摩，然后回到华懋饭店，换件衣服，参加沙逊家举办的茶舞会，这是鸡尾酒会前开始的一种随意的慢步华尔兹，通常在斑驳的阳台上，给未来的生意确定一下日程。到了九点，饮料给送到了船上，他们一面吃着北京烤鸭，一面开着玩笑，整个水面上都洋溢着他们的笑话。梅梅由于肝硬化，将香槟酒放到了气窗上。但是到了十点，随着歌舞表演开始，死神也开始传递，先是大使，然后是逸园跑狗场，也许是兰桂坊餐厅，接下来是人力车夫，再回到后街地下酒吧，上等人，中等人，没有等级的人，每种人都塞给舞女一块钱，跟她一起跳个舞。这时你就会听到餐厅领班诱人的声音：你自己选择吧；那个大眼睛的，她的名字叫小鸟，她可想你了。就这样，他在她身上随意挥霍了十沓票子。第二天一大早，他一溜小跑回到华懋饭店，浑身散发着香水和女人的味道，他从内衣店里订了一盒真丝内衣和一束玫瑰送到霞飞路。然后一切又重新开始。中午；观剧镜；所有这一切活儿。上海舞。

但是许多年后却是我在听着他的各种焦虑，听着他那扣人心弦的叙述，讲他丢失了一切，流落到大街上，然后突然之间，他穿着借来的西装，口袋里塞满了赛马票根，一下子掉进了悉尼的下水道里，给淹死了，而我则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弯着腰伏在一只桶上，挤着牛奶，当时



天刚破晓，泛出点白。他们跑来告诉了我，我的朋友们，他们的手放在口袋里，像牲畜一样倚靠在栏杆上，眼睛望着别处。于是我骑上摩托车，在一阵暴风雨中，赶了回去，同时扯着嗓子大声吼了起来，说不出什么缘由，那么长的黑暗山路。

料理完我父亲的后事，我记住了悉尼。天很热，我不堪记忆重负，累极了。我躺在草上，仰望着港湾大桥的桥塔。

等我醒来时，一缕午后的阳光轻轻洒在我的肋骨上。疯狂的午后阳光。正如万物的开始总是被当作礼物或片刻的癫狂送给我们，因此，吃了一半、拿上去油腻腻的肯德基炸鸡犹如天赐食粮，重重地落在我张开的嘴边。抬眼看去，巨大的钢铁桥梁咆哮着，卡嗒卡嗒，好像要打翻这个世界。火车上有人看到我站在桥塔下，嘴巴张开着。

海港里漂浮着游艇和垃圾。旧歌剧那刺耳的尖叫声响彻水面，传到了快要淹死的酒鬼的脏耳朵里。一块真丝在靠近墙边没人要的破桌子上飘拂，伸手就可拿到。像个软木板浮标。我用手指摸了一下，想捉住里面隐藏的东西，品尝痛苦的时间灰尘……早期的定居，漫长的旅程，海

难，还有荒废的生活。这是什么？

在我的手上，一本航运日志。破家具塞满了料车，而我还不得不在其中过夜。廉价旅馆不用搞什么仪式就抛弃了他们的废墟。几天前，两个下巴长得像干贝似的殡仪工来找我，他们微笑时露出一嘴假牙，一副苦酸相，他们给烟熏黑的小型厢式货车溅起泥浆。我一直在红色的记忆折痕中打着盹，下面则是轰隆的钢铁，现在，这个打了褶的家伙掉到了我的视野中心。我伸出头去，这家伙退缩了一下，仿佛探测到了动作。一个女人一边笑，一边不停地跳着。她的红裙子正是我用颤抖的手触摸过的，我的床很硬，上面钉满了钉子。我尝试着想再次爬起来。这离他死的地方更近了。人们经过这儿，好像没有注意到我被抛弃的样子。

要记住，爱就是痛苦。在他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盒维纳斯牌绘图铅笔，一些照片，一本笔记本中的内页，外面裹了层油腻的真丝和看上去像中国书法的东西。还有一个象牙或骨头制作的吸管。

再就是一张地图。



我是在写字台抽屉里发现这张地图的。桌子边上是柚木橱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作的色彩较淡的檀香盒子，两边印有“苦艾酒”的字样。在他的梳妆台上，一面破碎的镜子前，放着他的发刷。在一个角落里，他的袖口一闪一烁。药柜里则是一台日本风扇，一些舞会别针，还有一把尺。这些便笺簿。抬眼望过去，还有一束光在渐渐变暗，行将消失，这是琥珀的光泽，还有变味了的啤酒。剩下的全都在这儿了：小便，破玻璃，喊

叫……还有一间滴滴哒哒、闪着荧光、内脏部分已被抽走的尸体解剖室。已经没有他的地方，他剩下的只有过去，另一个俗丽的夜总会，你走进走出。怎么说呢，事情就是如此：先从基础做起，然后再找外面的舞伴，从齐步行进，到甩着膀子单转，然后就是恰恰恰。

但是现在我已到了上海。我在和平饭店的大堂里，为了昔日的美好时光喝了点酒。我甚至连照相机也没有带，没有捕捉到他在角落里的阴魂，将下半晌喝马提尼酒的漂亮凶手重新曝光。我出去散了会儿步，我的心潮起伏，沉浸在记忆之中。现在家没有了。但是，不知怎的，往前走，我感到我可以呼吸，可以在无情的可能之溪中畅游。上海舞，他想表达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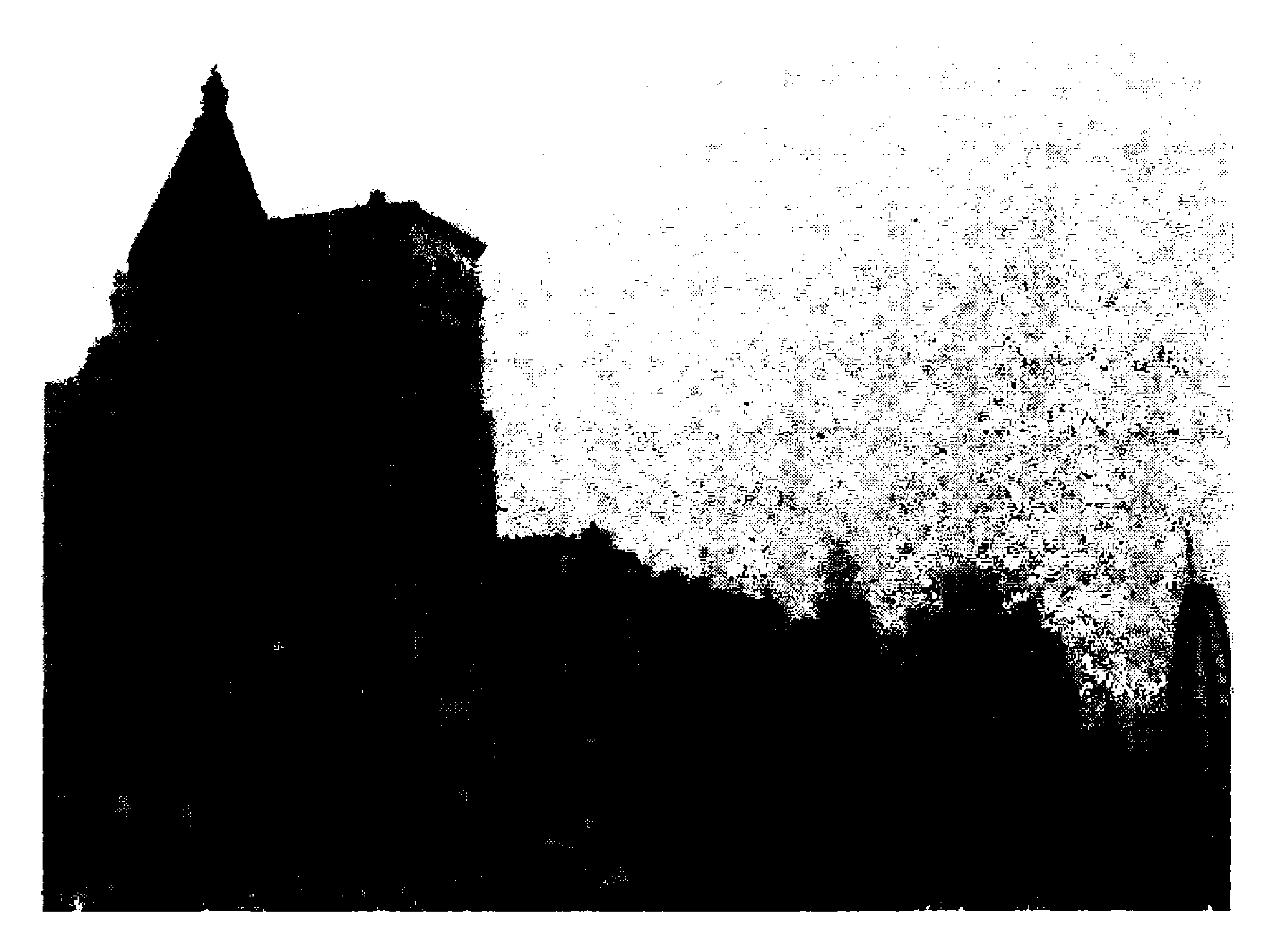
听着，亚瑟·泰特姆[①]，爵士钢琴演奏家，那年来到了上海。虽然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但是他们全都模仿他。他在外滩2号俱乐部里演奏钢琴，现在这个俱乐部已经变成了肯德基炸鸡店。他什么都演奏，几乎就没有休息过，演奏的曲目如“可爱的洛林”，“我会过去的”，“判若两人”，“朱迪”，“一心一意”，“重新再来”，“可怜的蝴蝶”。真的是节奏自由。肖邦有可能做到……左手控制着三分之二的键盘，右手飞来飞去，自由，独立，冲动，起伏。它将我带回了过去。亚瑟·泰特姆。你站在护柱旁不可能看到他，因为等我父亲雇佣摄影师来拍照的时候，他消失了。亚瑟事先提醒过他。

我不能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站在这儿，小伙子。

他说这是因为他一只眼睛是瞎的。这令他感到不安。没有打招呼就走开了，边跳边舞地离开了。

这种事情一直发生。我没有看到照相机，它也没有看到我，他说。

① 原名亚瑟·泰特姆二世(1909—1956)，美国爵士摇摆音乐家，钢琴演奏家，虽然双目失明，且因尿毒症而英年早逝，但却是无可争议的钢琴权威。



卡门说照相机早，电影太慢了。

吴凯鸣，或卡门·吴。她说她的名字含有凯旋欢呼的意思。这里也有其自己的音域。精明的上海人，不停地打着手机，安排她的事务。无论是什么，她都能找到解释。她说如果你不让左手看到右手在做什么，那你就可以创造奇迹。这点提醒了我。我准备出门，沿南京路散会步。我随身带着父亲的照片，想重新编一个故事。找回那些丢失的碎片。我不太喜欢东方主义。我上错了电车。拒绝问路，拒绝恐慌。他们会知道的，我对自己说，他们，我前面的溪流，会将我带到正确的路上。我努力不要走失。微笑。有人回笑。你好英国人！他们说。有的人语调很快，口齿不清，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讲的是俄语或蒙古语。我且把他们当成俄语或蒙古语。每一条街都叫作路。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它们。自行车和汽车横冲直闯。我走着走着，突然感到失去了方向。这一次，致命的事故是不可避免了。这一次我会穿错方向，给车撞倒，然后再被自行车

多次碾压，使我最终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根面条。就在这时，一位面庞佼好的女子走了过来，她沉着冷静，目不斜视，结果，一批自行车彼此撞了起来，他们互相谩骂，这些骑车的人，他们不是冲着她，她已经成功地走到了路的对面，他们连说带比，大声喊叫，推着车子，很快，整个场面就像是澳式足球结束时的一片混乱，到处是围巾，到处是唾沫，警察一边吹着哨子，一边看着人群，那眼神仿佛在说，如果你们不停下来，脑后就得吃子弹。事情渐渐停止了，但是我发现我已经穿过了街道，正跟着那位女士后面，说道：对不起，我迷路了。

她笑了起来。她拿过我的地图。摆正方向。我的照片落了出来。她脖子上挂着一台尼康301相机。我就是这样遇见卡门的。她收集照片。

——很有意思，她说，仔细看着这些照片。

——是吗？我说。来杯饮料？

——不远处传来一声爆炸。大概是煤气总管吧。

1932年，日本人侵略了上海北郊闸北，我父亲当时就在那儿，戴着头盔，当志愿兵，发誓要将日本人打回去。起先，他将此看作一场游戏……他是一名神枪手，在上海乡村俱乐部的交叉步枪射击中连赢三个冠军……现在他的子弹射向苏州河对岸，看着对方倒下，但是他当时处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看不见他后来看见的东西。就这样，他选择了射击，而不是打网球，同时他也感到了孤独，残忍和脆弱。埃尔维拉·波默罗伊很想他，随着硝烟在城市上空飘浮，她也在不同的旅馆里等着他，她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一只放着香槟酒的桶横在她的椅子和床之间，滴着水，等他回来了，他会说，亲爱的，亲吻着她，远处炮火的声音渐渐沉闷，而她的心跳则怦怦直响。是啊，是啊……但是他疲倦了，内心感受到了挫折，因为这跟杀人，跟刺痛，跟飞近的子弹的喧嚣毕竟还不一样。

我约卡门出来。吃饭的时候发现她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她说她感兴趣的不是记录真实，而是打破现实的规则。我告诉她我追求的正好相反。我告诉她我的心灵深受煎熬，有种东西在使劲咬着我，我需要某种事实的标记好倚靠。一两件遗物。这是事情的终结。外面的风告诉我，它刮起的尘土正像旋风一样飘到街灯上。

我从没感受到对父辈应该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许是热爱；不多，不少。但是他一定经历过什么……悲伤，爱恋，或者酗酒。

也许是钱，卡门说，她两眼看着我。

她看到我没有按照她期待的样子回复她，于是她采取了不同的手法。

你心中在闹鬼，她满含渴望地说道。这就像是过慢曝光过程创造的幽灵般的效果。你的心灵敞开的时间太长了。

她身穿黑衣。一件短的丝绸衬衫。我想碰她。

上海舞。我问，你听说过吗?

当然。

事情渐渐平息下来。闸北出现了僵局。中国19路军撤退。于是父亲爬上汽艇，挂上英国国旗，驶向东海，结果激怒了海岸炮兵。他在船上一顿饭吃三道菜，给日本人敬酒，他们发射了一道警告炮弹，在天空嘶嘶作响，一直射向远处的海里。

到了星期天，他就会拉一辆黄包车来到跑马场，进行豪赌，而埃尔维拉则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他。到了月末，他的船就会回来，那时，他设法运输一些急需的货物来赚钱，诸如可卡因，酒精，鸦片，枪支，等等，这些都是半合法的。他一方面留着埃尔维拉，另一方面则追逐着一些英国女人，她们打了褶的斜纹软呢裙子和一本正经的样子给他提供了挑战。他用一套灵巧而复杂的步伐来编织他的风流韵事。

卡门和我又约过几次。我们之间总是隔着点什么，但我说不出来。在西藏中路，我们发现了几个昔日的舞厅，并且发现我们俩在一起跳舞时节奏非常合拍，虽然伴奏的音乐比较糟糕。

后来，在喝白兰地的时候，卡门告诉我她什么都会。她曾经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想一去不回，但是现在她出现了。她又回来了。

我理解。

一座城市在吸引着你。你用左手制定规则，你用右手找到了不同的节奏。自由节奏：偷来的时间。

她吐了一口烟圈。

这么说，你在这儿有没有完成的事情要做，她说。

我安排第二天晚上在波特曼香格里拉大酒店请她吃晚饭。我坐在大堂边的酒吧旁，喝着马提尼酒，等待着半甜的温暖，像航空燃料一样将我载回来。我穿着一件酸奶色亚麻布做的双排扣西服，看着无轨电车在布满高架电线的树丛之间穿梭来回。我等了两个多小时。她没有出现。我想到了我的父亲。他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说如果你想脚踩几条船，那么你就得跟一个女孩约会，然后你忘了你还约了一个人，这样一来，当一个人在街角落等你的时候，另一个人就会在另一个街角落冲你发火。然后你和第三个女孩沿着大街走着，而这个女孩还很漂亮……尽管你的心其实并不在她身上，因为你知道她永远也不会当真，一个美丽的女人永远不如她的话来得真实，如此一来，你就会发现其他两个女孩哪一个更关心你，然后你就知道哪一个是适合你的。

我正遭受着他的罪孽。

我沿着老静安寺路走着，突然，我看到卡门正和另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饭店。我站在一个透风的建筑阴影里，感到了背叛，同时又奇怪地觉得自己自由了。油桶正在燃烧，灰尘飘浮，落在了我的肩膀上。这时有个人将手放到火苗上取暖，他肩膀宽大，穿着一件硕大的外套，看上去像我父亲。我拣起一根警棍似的木头。

我气喘吁吁地在南京路上奔波，碰到了我的第一个妓女。她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人，但我想她是来自内地少数民族的一个女孩。她的头发发亮，眼睛碧蓝，虽然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但我一下子喜欢上了她的微笑。我们回到南京路边上的一个小房子内。屋内点着一盏40瓦的灯泡。我向她倾诉我的哀伤，而她也向我敞露了她的痛苦。她十分清楚我们彼此编造出来的虚构、幻想和希望。她给了我一张她的照片。瞧，这就是，我的父亲。

事态发生了变化。战争局势变糟。日本人打了进来。我父亲的车在遭受了第一次攻击之后给遗弃在了大街上。孩子们纷纷爬了上去。他告诉我，在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想把所有这一切都甩掉。他抛开一切。走回了家。这不是他的战争。

孩子们嬉戏着。他们打开车门，爬进爬出，转着车轮。路的不远处有一具还在动的躯体，而离躯体几码远的地方则有一个头颅。一幅经常看到的画面。一根藤条，一根就像让人感到受到蜇伤或打到背上疼痛的藤条，在一个行将死去的女人的阴道里抖动着。这就是战争，大家都看得见，又都看不见。他开始酗酒，驱除这些映像，留意不宣而至的残忍时刻。后来他开始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在这种危机的阴影下，他开始向表妹埃尔维拉求婚。

她的父亲很生气，拽下沙发上的罩子，将它们塞到他的嘴里。你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波默罗伊先生嫉妒地大声骂了起来，仿佛在那些疯狂的年代，有谁在乎似的。后来他的果园着火了。有人说这些都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革命者干的，他们扇起了现代中国的火种。他站在阳台上，向那些消防队员求助。通货膨胀，纸币是没用了，他们要的是黄金。黄金！他用埃尔维拉的真丝袜子包裹了几个手镯扔了下去。于是这些消防队员打开水龙头，但是水压很低，像小便一样淌着。风变了。

俱乐部开始关门。空空的椅子上堆满了灰尘。人们开始离开上海。

仆人们开始洗劫被遗弃的衣橱，将香水倒在自己的头发上，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麝香味。父亲留了下来，结果赚了一笔。

回到和平饭店，我就进了浴缸，就在他的房间里，就跟他六十年前一样。痒的边上有点痛，我想起了诱钩上钓到的一条鱼，一根神经给钩在了藤壶上。他一定受了不少罪。他用水银和硫磺进行针刺，结果痛得他狂叫。他一点也没想跟埃尔维拉睡觉，觉得这只是男人的一种病。

埃尔维拉欲壑难填，一个晚上要叫他十几次，累得一身汗。她用起可卡因来就像用牙粉一样，嘴唇上好像得了鹅口疮似的。

到了早上，他就会看着自己的船驶向严峻的水域。

上海舞：无名氏。(海军俚语?)梅毒。

早上，他们给我送了一封信，他们说信是前一天晚上到的。是卡门送来的信。照片明信片背后写着：昨天忘了。今晚来。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了想，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我在希尔顿等着，她一个人来了，身着一件短裙，穿过短裙，我可以看到她吊带袜散发出的微微诱惑，透过她的衬衫，我可以看到她黑色的乳晕。

你的父亲，她说……

他怎么了?

他的照片一定比我在大街上给你拣到的要多。

我不知道她想干吗。我已厌倦了照片，我说。照片散发出一股味道……死亡的味道，黑暗的博物馆里散发出的银灰色灰尘。它们已经没

有任何意义，我不想再追寻下去了。一张照片揭示不了什么；我写的每一个字都要侵蚀掉点什么；每一个故事都要毒死一个膨胀起来的灵魂。我迷路了。厌倦了上海。我想回家。

我正在尝试一种新的技术，她说。翻拍。摄影可能有其时代特征，不是弄点什么技术就能够搞定的。比如，你无法操控……灵感。灵感发自内心……很明显。你冒的风险是它会招致自身的报复。

你的意思是有人会为其付出代价？

差不多。这可能不是你所要的那种曝光。

她拿起她的东西，亲了亲我，然后走了。我想她去盥洗室了。我等啊等，一个小时之后，五杯酒在我的胃里翻滚，我叫了一部出租车，回到了饭店。

卡门已经到了我房间。和平饭店里的法式房间，背靠在莱俪书桌上，过去，我父亲的观剧望远镜就放在这张书桌上。此刻，她正借着一盏强烈的蓝灯，研究她已经排列到书桌上的那些照片；我父亲的那些照片和她的一些照片混在一起。她正穿着一双芭蕾舞鞋，真丝宽带缠绕在她的脚踝上。我从她身后向她靠去，双手摸着她的双腿。她一开始好像没有意识到，后来她开始发出愉悦的叫声。

你父亲的照片每一张背后都写有巴黎的地铁车站，她说。在紫外线下你会看得更清楚。

五个堂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白痴。

埃尔维拉的父亲是一个高个子，穿着一件衣领上翻的西装和真丝蝴蝶领结。他散开性斜视，有人说这给了他能力像读小说一样去快速阅读账本；他看借方账本的时候常常是满眼血丝。他有上海最大的豪宅，一连串孟莎顶平地别墅和门房，二十一英亩果园，一群到处乱窜的猎犬。他娶了一位皮肤白皙的女孩，名叫卢克莱西亚，卢克莱西亚在生完孩子之后一个月就去世了。

埃尔维拉离开后的那一天，果园大多被焚，狗在狂吠，想唤醒死者。城市在颤抖。有人说，日本人已经侵占了国际租界。第五纵队。读读各种报道吧。

杜洛克猪、塞奎拉河[1]、奥特尤尔门[2]，卡门说，你就不能看看吗？

她闭上眼睛，好像在背书。我从她脚上解下丝带。

夜晚乘地铁，喀嚓喀嚓地疾驶在铁轨上，他的手上都是水，而她则陶醉在通往终点站的黑暗轨道上。到了春天，他们回来，宣布他们结婚了。他们乘船去纽约度蜜月之后两天，她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

上海舞……卡门说，点了一根香烟。是的，现在我能看到了。

你能看到什么，卡门？

你。

卡门说她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这点我很担心。她说到处都是秘密警察。每看到有人穿着便衣盯着她看，我就怀疑是公安局的。她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挽着我的手，走路很难，经常要跟人肩碰肩，有时候碰得还挺重。人们好像都不在乎，也没人抱怨。拥挤的商店里出售着廉价的商品，她拉着我的手，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背上。接下来她舔我的耳朵。我觉得这举动太冒险。我们走遍了上海，她帽檐朝后戴着一顶解放军的军帽，拍摄着公共建筑的室内装饰。这种举动同样危险。我们走到我父亲在静安寺路，即现在的南京西路上的一座房子，现在那儿已经空掉了，地上只剩下一个大坑，还有一大堆脚手架。卡门拍了张照片。两位满脸

---

① 塞奎拉河，一条流经西班牙东南部的中型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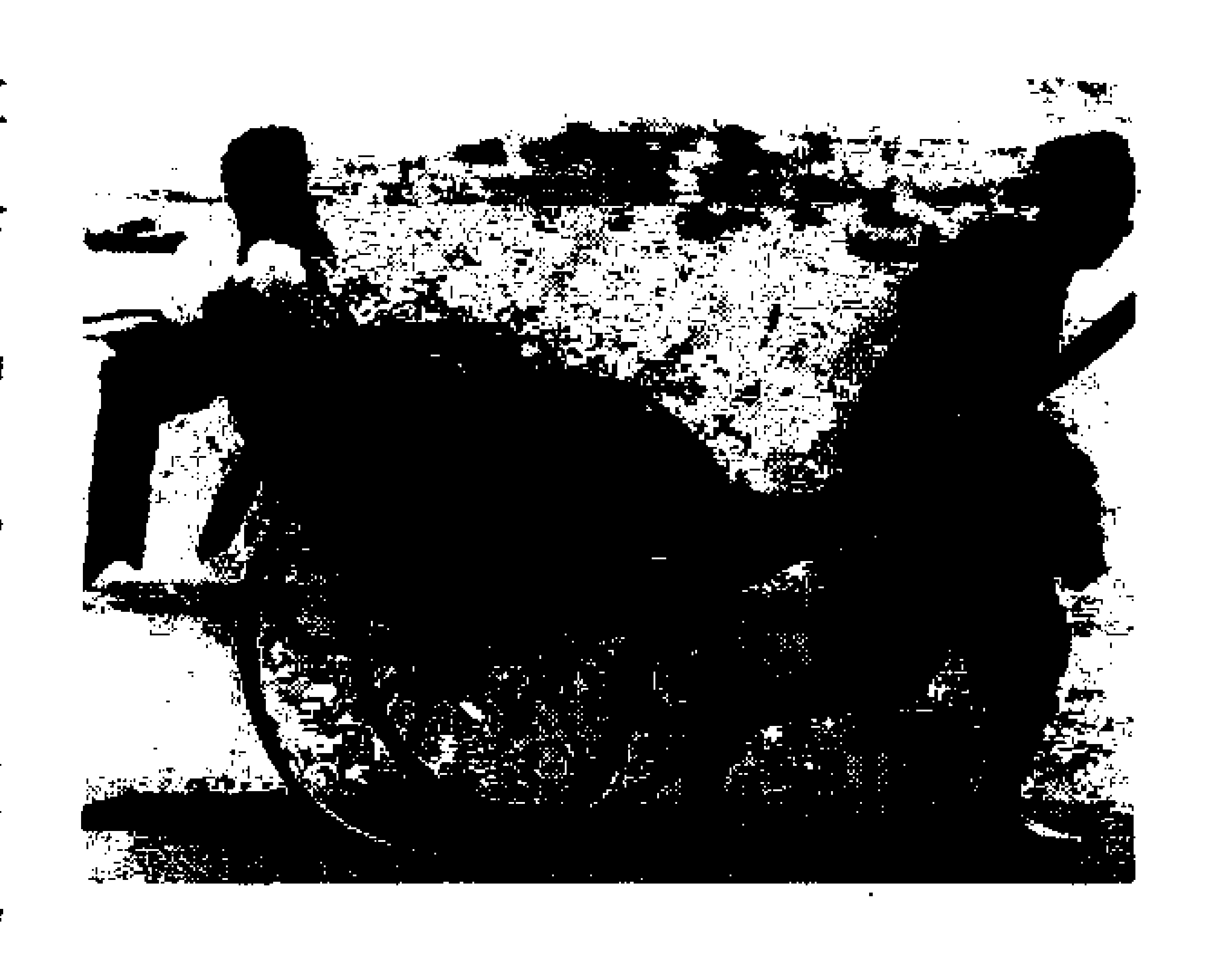
② 奥特尤尔门，巴黎城外的一条道路，曾是巴黎护城墙的城门。

笑容的年轻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拉开风衣的拉练。你要明代的烟灰缸吗？跑马场上的跑道已经没了，池塘已经给水泥浇灌上了。在辣斐德路①和马斯南路②交叉路口，有一个停车场。在即将被改变成一个卡拉OK酒吧的垃圾废墟上，我看到了一个西班牙壁炉。壁炉孤苦伶仃地待在堆满了铁棒和黑泥的泥坑之中。这里，过去曾经是罗马柱、铁艺楼梯、马赛克和喷泉的聚集地，他和埃尔维拉过去经常徜徉在棕榈树和灰泥外墙之中，聊着佛罗里达。卡门拍了一张这条街的照片。

他们结婚应该没几个月，卡门说，她两腿交叉，夜总会的丧钟还没敲起来呢。

我们来到索菲特酒店里的酒吧。

我能看到它，她说。埃尔维拉服用可卡因来消解早上出现的疼痛和呕吐。隆冬，这是上海最糟糕的一个冬天，她穿着短裙在打网球，证明她的腿依然高贵。真是妙极了，大雪！她大声叫着，将网球抛向空中，然后挥舞网拍，向球使劲地抽去。之后，她突然垮了下来。法国总会外面是零下2度。她被人力车送回了家，但是他不在场。是他的至交罗伯·林付的钱让人力车夫送她的。埃尔维拉憔悴不堪，躺在搁脚凳那儿，你几乎看不到她。说真的，你真看不出她怀孕了。你父亲在小镇的另一侧，坐着他的高级轿车，停在卡沙诺瓦咖啡馆外，看着所有的女孩从旁经过。夜幕降临。女孩们都在人力车里，地面上的聚光灯照亮了她们的眼睛。



---

① 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
② 马斯南路，今思南路。

卡门正躺在床上，读着她的照相机指南。我来到阳台，爬上旅馆屋顶。看着铁花和阳台周围的装置。我想很容易沿绳子滑下别人的阳台，然后彻底松手，一切就都会印在我的视网膜里。

有一次，我父亲放下一根麦克风软线，吊在我们家的墙下，记录情侣做爱时说的话。他说他们说的话大多无聊。我检查着窗户，看是否有窃听器。

在屋顶上，我看着船定期来往于河中，听着交警吹着哨子，看着大批人群穿梭于外滩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没有船沉没，没有警察射杀违规者，既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强人所难之事，但我站在阳台上，还是无法从内心的焦虑中解脱出来。

我回到房间，看到卡门几乎是一丝不挂，还在读着她的指南，做着快门速度的笔记。

她说着话，但是头也没抬，继续做着笔记。

我们可以用慢镜头来再现往事，她说，这样事情可以倒退到一个不同的时间……模模糊糊的汽车和人在一条几乎空旷的大街上闪烁；有轨电车公然反抗起了普通时间，仿佛光年疯狂停滞。在早期摄影过程中，他们常常将人框在照片中。曝光的时间太长，他们不得不装得像死了一样，好完整地活过来。曝光要半个小时。这比现在的人们拍三十卷花的时间还要长。

我从她手上拿过指南，用长袜挽着她的手臂来到床角。别动。有东西正出现在我的视网膜后面的玻璃板上。

上海舞。一种经历。一种生命礼仪。

埃尔维拉挣扎了好几天。最后，他们决定催产，他们将她的双腿绑在床边的马镫上，然后一起等待，别无他法。婴儿健康地出来了，虽然早产，但生存下去的意愿很强。

我父亲过来，看了一眼他的儿子，然后看到他的妻子快死了。他根这个在婴儿床里搏动的小东西，知道在隔壁房间里，埃尔维拉已经凋谢，她的身体躺在床单下面，几乎不能动弹。一个温和的下午，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藤卷帘在早春的微风拂煦下轻轻抖动，而她的身体则一动也不动了。



那天早上，我去上海马戏城的时候给一辆自行车撞了。撞得不算怎么厉害，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自行车，就重重地摔到了地上。骑车人扶我起来后就消失了。五分钟之后，我碰巧将手放到我还以为是出汗的脖子上，结果发现脖子流血了，而且血还在流。我的手帕都浸湿了。我询问去最近的医院的方向。后来我一定是瘫在人行道上了。

几个小时之后我在一家医院里苏醒了。我在一个病房里，病房里还有三十个其他的病人，各有各的毛病，有人呻吟，有人贼叫，还有的人盯着我看，好像我可以拯救他们。他们挥动着便盆，满脸笑容。全家人都在进进出出，有的喂饭，有的洗刷，有的则责骂。我的头给包了起来。我摸了摸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一块给血浸透了的手帕。我被劫了。我丢了钱，没了护照，没有出去的理由，只有可怕的头痛。

上海：动词．下药或让人失去知觉，然后登上一条需要人手的船。

怀旧也有可能遭人下药。我应该放弃这项追求。

很快，一位不苟言笑，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实验外套的医生走了过来，告诉我说我可以走了，他递给我一只塑料购物袋。在购物袋里我发现了我的皮夹，里面装着我所有的钱，身份证明和照片。卡门跑过来紧紧地拥抱着我，并亲了我一下。她一直在楼下排着队，那队有一条街区那么长。她得先帮我付医药费，好让我好起来。

你没有出现在马戏场，我就急了，她说。后来有个人告诉我有一个喝醉了酒的外国人给撞了。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意识到是你。我一直在拍这幢建筑。这是一家战前的医院。

卡门说起这，她的专业用语，她甚至让她的举动也专业了起来。她说话很快，有种美国腔调。她没有看我的眼睛。她的声音低沉，仿佛是在讲电影布景。

我需要睡觉，我说。

这个孩子有点问题。他的眼神游离，无法聚焦。他躺在他的小床里，转动着他的脑袋，三位奶妈在照料着他。我父亲从巴黎请来的专家看着这严重的伤残，摇了摇头。他们推荐了一家医院。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暗示着，他们耸了耸肩膀，拉了拉领带，做出一副仁慈的样子。

我父亲没有服输。他在这个孩子及其懒洋洋的笑脸上看到了跟他一样的意志，他遍寻医生。为了验证埃尔维拉父亲的语言，他决定揽下这一不幸，来证明他自己的意志。

但是，当他爬上华懋饭店的楼顶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船正在燃烧下沉，他的朋友和伙伴正在逃生。无头尸体流出黑色的血，淌进了下水道；从日出到日落，天空中都浸染着黄褐色的斑点。日本人入侵的前几天，他离开了，将孩子委托给了一家机构。

当他战后回来，看到街道上又穿梭着那么多的人，他知道他的上海完了。在用来行刑逼供、现正在发臭的精神病院地下室，他看到了惯犯

骸骨的笑灵。至少有一则故事讲到他们在吃人肉。他必须将孩子带回香港。谣言甚嚣尘上。几乎没人看到孩子，当然，想将他藏起来也十分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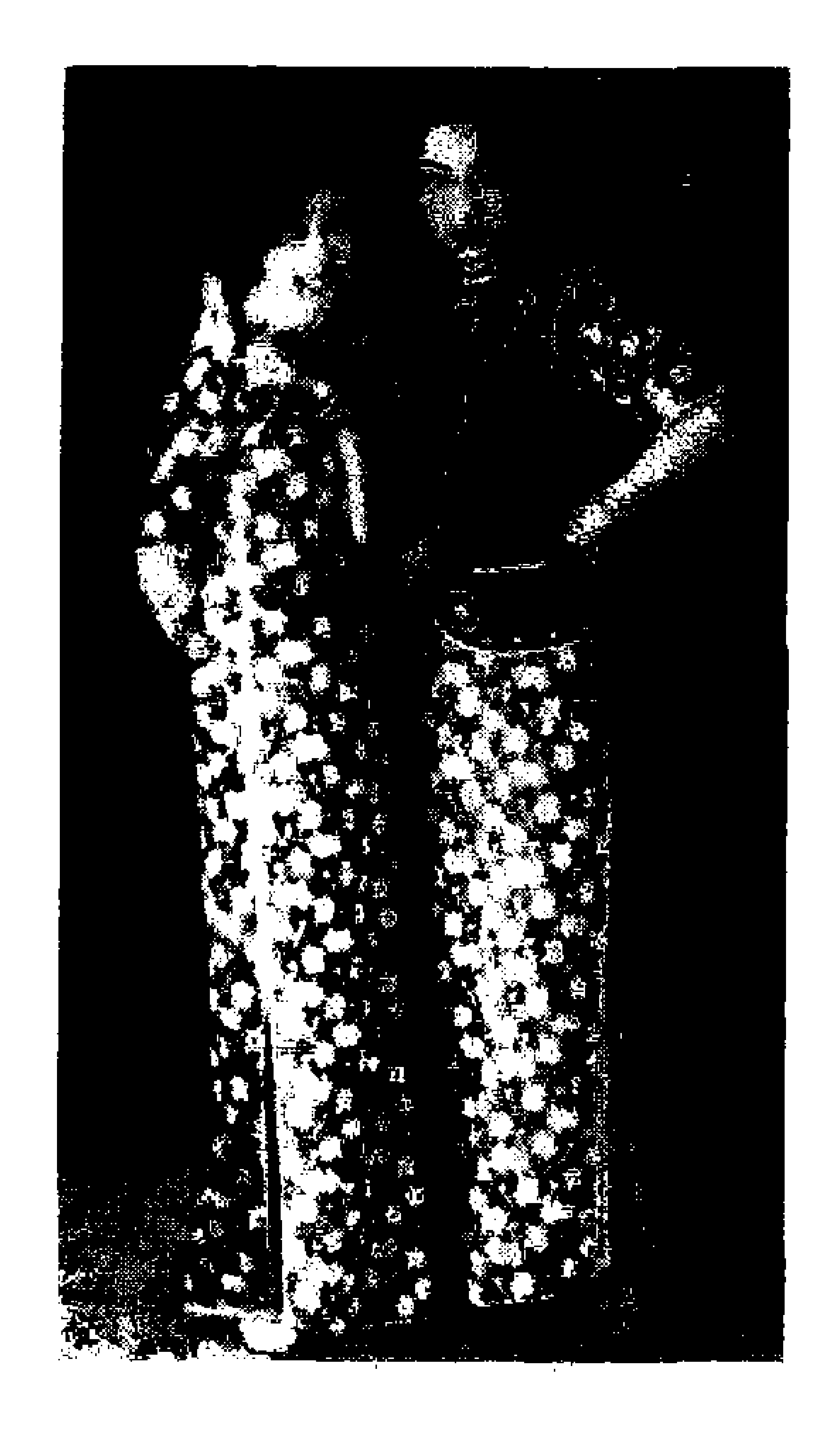
在回饭店的路上，他倚靠在人力车上，感到他在人群中看到了埃尔维拉，感到他听到了她的声音，扯着嗓子在叫：烧！烧！让他们全都烧死！

她的诅咒。他的良心的诅咒。该死的她。

他在香港安顿了下来，做点小买卖，但是不太成功，他又结婚了。



我一定是在那个时候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是个寡妇，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感到我们很幸福。我的同母异父姐姐伊俄卡斯特和维也纳已经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命里注定要有麻烦。



我们养了一条阿尔萨斯狗。自我记事时候起，我父亲就带狗到房顶上去遛，我是一直不让去的，但是一旦我能爬楼，我就经常去那儿。楼梯平台上住了一个小矮子。他的头发很长，有一簇大胡子。他身上有一股大蒜味，还有一股发霉的毯子和腐烂的山地鞋的味道。有时候他吓我，他拼命地转着眼珠，但是之后他会放声大笑，拍着小狗，小狗就会舔他的脸。他来回摆动着头，引得小狗也学他。我母亲每天晚上会送饭上去，当然，他们也很好奇，他们给他带去他需要的东西，我父亲的旧衣服，旧鞋子，还有啤酒，所以说他并不需要什么。我们叫他梅布尔斯。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他只有颚裂、小矮子驼背和伸到膝盖的猿人似的臂膀。



平坦的屋顶上一片宁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经常去那儿，不过有一个陈旧的记忆告诉我，有一天，梅布尔斯和我站在那儿，对着花圃撒尿，我们彼此笑着，分享着我们一起发出的声音。

上学的时候，我就会从我们学校的屋顶看他，学校离那儿并不太远，我看着他边打手势，边来回踱着步子，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有一天，我看到他从屋顶上放下一根绳子，并将绳子围在自己的腰上。然后从屋顶吊下来，像猴子一样沿着房子两边来回吊着秋千，并窥视着窗内。大一点的孩子也看到了他，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就拿弹弓射他，但总打不着他，他优雅地旋转

着，让他们射不到。

上海：名词.（澳新语言）一只弹弓。

卡门将她的东西从她租的两室户中搬出，然后搬进我在饭店的房间。

让我们想想未来，她说。

那天晚上，我的心几乎蹦了出来。我的心疯狂地跳了有一分半钟，然后好像停了下来，所有的钟都在滴答滴答地响着，我从和平饭店的屋顶掉了下来，双手紧握，这样就不会给可口可乐广告牌砸到。我惊醒了。卡门已经醒了。她正盯着我看。

我一直在看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在喃喃地说着我今天印出来的照片，说你如何看穿了它们。我……我明白了，你说。你的呼吸很快。十分困难。你的同父异母姐姐睡在同一个房间，你说。

我还说了什么？

就这些。

是吗，应该还有，我说。有人在窗户那儿偷看。他吊在绳子上打秋千。我父亲正拿着一根棍子站在阴影里。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次，小狗在地毯上撒尿，他就用棍抽打它。

这是一次意外，卡门说，她用一根涂过了的指甲从烟盒里抽出一根香烟。

也许梅布尔斯就是我的同父异母兄弟，我说。

他没有将绳子围在自己的腰上，卡门吐了一口烟圈。

他有过一次机会，我说。他不在乎。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拿他开玩笑，他一丝不挂地躺在那儿。关键是我父亲很少回家，通常情况下都是我拉下窗帘……此外还有台风警报……但是我很好奇，看着他看着他们。

你的快门比较慢，她说。

然后她转向我，用手摸着我的脸。我不想睡觉。我们跳舞去吧。我是说真正的舞；慢步舞。我知道一个地方。

卡门，我的阿里阿德涅①。还会有别人。再后来，永远是中国。中国在我的脑海里。

* * * *

上海，初冬时分，他的心几乎不跳了。卡门在浴缸里晕倒了。昏厥之前她说她想咬一口新鲜的番茄。但是天正在下雨，于是他说他无法在雨中去找番茄。

但是等他确信她没事了，他还是顶着雨出去了，他想这是上海，一个孕育着各种可能性的城市。他在温暖的大堂里犹豫了一会。他们正在演奏“开往中国的慢船”②。他竖起领子，跨了出去。他还不知道上海舞是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知道上海舞已经开始了，而且是重新开始。

① 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中国王弥诺斯的女儿，曾给情人忒修斯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迷宫。

② “开往中国的慢船”源自20世纪40年代的一首流行爵士音乐，由美国百老汇著名音乐家弗兰克·罗瑟(1910—1969)所作。

枕边书

古代日本人习惯在枕边记日记，记下随想，这是一种自由联想，叫作“随笔”。

到了夜晚，他们像耗子一样驰骋于语言内外。这边是上帝说话。那边则是魔鬼发言。处在两者之间的则是游牧部落；他们穿梭于后桅之间。我梦游。不停地说话。有一次，在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里，我站在勃鲁盖尔的巴别塔之前，开始胡言乱语，把其他的观众都吓跑了。我不停地从汉语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否则我无法入睡。

他们使用寺庙里的钳子把我赶出去。看到这儿的标记了吗，还有这儿。我的神圣的东西方。这就是他们经过高电压，穿过金亭和银亭的地方，还有书法，蓝天，宝塔，空袭警报等，这些我都记不清了。

许多年来，这种寺庙里的声音已经把我吞噬；传出声音的这些房间既无法动，也没有光，这些房间目的就是为了惩戒和安全，这些声音一旦从黑暗中被释放出来，就会传播邪恶。他们就是这样来对待嘀咕者，口吃者和劝告者的，将他们锁在小房间里，直到他们摆脱邪恶，说出正常的话来。这是为他们自己好。现在，我有一种疯狂而原始的直觉，想留意一下我听到的一切；恳求，乞求，善意的奉承，让他们呼吸，来释放他们。

警告。我知道我身上的一切都给偷走了。他，一个魔鬼般的替身，

一个不停地在编织的蜘蛛。他想以空抗空，但是到了最后，他本性毕现，他轻而易举地忙着。看着他的爪子。这张爪子毫不费力地一张一合。去；来。一天结束，安全地锁好门之后，我开始翻我的辞典。

梅毒：娘胎里带来的梅毒(？麻疹之祸)。

我十分怀疑我父亲留下的一切都已留在了这片黑暗的阴影里。这就是我崩溃的开始；我兄弟留下的阴魂，梅毒的折磨。

此乃阿纳尔多·何塞·卡斯特罗在霞飞路927号留下的最后遗嘱。兹撤回我此前做出的一切遗嘱和意向，并就此宣布此乃我的最后遗嘱：我将我的一切不动产和个人财产遗赠给西摩路[1]200号犹太教堂倍开尔路[2]694号圣母教堂，如果我有子嗣，那么我的财产中有一半在我的子嗣中均分，余者则捐赠给上述机构……

制作咖喱：两包辣椒粉；两把红辣椒；锤击，然后加上大蒜，姜黄，莳萝……

痔疮者的安慰：先暖一下涂薄荷膏的手指。

① 西摩路，今陕西北路

② 倍开尔路，今惠民路。

突然冒出的尼日利亚人

我迅速翻阅着我父亲的其余文件。

我在找一份最近的遗嘱，但是我只找到旧的遗嘱，中文写就的一些片段。我知道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中文。他没有画过树和鸟的素描。他是欧洲人，一个现代主义者，一个改革主义者。他很现实。他是帝国，是大商场。他在做生意。他就是西方，而我的母亲则是东方。不管怎么说，他讨厌诗歌。他说诗歌令他不快。

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熟悉的是狭小的房间，肮脏的楼梯间，后巷，哀伤的音乐，油炸大蒜的味道和夏雨的温暖，尤其是艰难的一天只有在黏糊糊的空气中，坐在狭窄的过道里，听着别人的故事，才能得到打发。他们一边打牌一边吸烟。我听着一连串的谈话。他们将我带到了人行道旁一个肮脏的舞台上，刹那间，舞台亮了，就像是从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塑料雨篷下冒出来的一样，雨篷将水喷洒到下水道里躺着、既黑又肿的尸体上。他们向我讲述他们认识的人的消失。好像给催了眠似的，我听着，到了故事的最后，我自己的消失也给揭示了出来。这就是我的童年。一个充满耗子和暴乱的年幼时代。

我回到了香港。过了几个月我才听到卡门的消息。她终止了怀孕，用我的名字和伪造的结婚证拿到了护照，离开了中国。她说她要到巴黎去学习时装摄影。我逼着自己吃点东西。我母亲过去常说这有助于消除

绝望。我想起了卡门杏仁似的脸和杏仁似的眼睛，她的姿势，直直的，像个芭蕾舞女。她已经具备了一名模特所具备的款款细步。他们在巴黎用不着教她多少。她最终总会出现在照相机镜头前。我们拥抱的时候，她总有一些头发会塞到我的嘴里。我记不清她头发的味道了。她已经消失了。我呢？我不吃了。

我父亲说他活着只是为了吃。决不绝望。

我觉得他是在说谎。他们家族大部分人都喜欢说谎。但是你却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会时不时地碰到真话。一个热情的野兽，真实。头像牛，角很尖。我母亲家族这边喜欢说真话。他们决不说他们自己。他们人很迟钝，赚钱之后就攒起来。但是在我父亲这边却是满嘴的编造。不会讲故事的人呢就写信。

1924 年 6 月 16 日

亲爱的阿纳尔多：

今天在苦岑岭逮到了六只野猪，每只都有三点长牙。有一只咬坏了我的靴子。但是它在奔跑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它的牙掉了！真的。也许它老了，所以牙就脱落了。我抓住它的尾巴，将它摔进沟壑。还不算坏，对吗？我带一些肉回上海给你。我知道你。你活着就是为了吃。

爱你的堂兄　阿尔弗雷德

当我父亲的堂兄从苦岑岭上下来回上海的时候，他感到有东西在追随着他。他做了个手势，让轿夫停了下来。有人跟在后面，他说。他们摇了摇头。是的，我告诉你们。后面有个人在水边。轿夫不愿停下来。阿尔弗雷德从轿子上跳了下来。往回跑了几步。有一个人蹲在岸边，他的脸在水里。阿尔弗雷德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没事吧？怎么了？你能站

起来吗？把手给我。这个人抬起头。没有脸。没有手指。一个圆形红洞就成了嘴，他就是用这来吸水。阿尔弗雷德掉头就跑。

在苦苓岭，麻风病人像野猪一样到处乱窜。一些英国传教士给他们看病。作为回报，传教士可以购买土地。但是，尽管有人看病，麻风病人还是在急剧增加。他们死在树林里，死在沼泽地里，消失在银色的迷雾之中，沉在树叶下面，他们的肢体成了野猪的主食。

我又成了一个孩子，给各种故事所吞没。我没有做梦；我看着坐在对面窗口的女人。我看着她梳理着她的长发，她将长发轻轻地往后一捋，绕过耳朵，露出了她漂亮的脸庞，当她闭上眼睛时，我就想象着她的故事。可惜，只为故事生存的人并没有从他们的眼睛中得到知音。他们看到的故事都是不连贯的。故事里套故事再套故事。他们如此着迷，别人只好避开。也许我收集故事的癖好已经将我变成了一个麻风病人。

我在香港一家廉价的房间里。这个地方叫重庆大厦，但是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大厦，只是一个充满了塔楼和房间的居住小区，一个火陷阱似的迷宫，一个充满了地下商场和廉价食品店的迷宫，在电梯口，有人拿着枪指着你来查你的护照。更有甚者，我的水池里还有一个巨大的老鼠夹子。我来到管理室，问是否有老鼠。

你看到了吗？接待人员问。他像我一样感到吃惊。

在灯光昏暗的过道里，男人们在忙碌着。中国人说尼日利亚人是这儿的掮客。尼日利亚人身着银色西装，脚穿名牌鞋子，走起路来弹性很强，无论你要什么，比如兑换货币啦，钻石啦，药品啦，等等，他们都可以协商。他们都不用真名。他们有的叫阿莱克，有的叫奥伯龙，有的叫埃弗兰。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其辛酸的故事。阿尔热农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前，他带着一百美元来了。他们在移民局想拉他，调查他的历史，让他等了两个小时。但愿他们知道，伙计：他的致命的疾

病，他的国家充满了蝗虫、干旱、水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我要死了。忘却时间。你，我的伙计，会好起来的。你要手表吗？或秒表？

后来，阿尔热农跟我讲起了药品生意，谋杀，欺骗，中国蛇头。

尼日利亚人总是在过道里谈话。声音低沉。上周二，两个广东人往楼下拽一只铝制箱子。有东西泄漏了出来。这跟尼日利亚人没有关系。他们不想做那种蠢事。在香港，尸体是很难处置的。不像是在丛林。甚至不像是在澳大利亚。尼日利亚人像灌了糖一样的声音。在我门下盘旋。我点了一根香烟。七年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吸烟。我不想去利物浦。但是利物浦却是我下一个故事的来源。我承担不起费用。阿尔热农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买一张真正便宜的机票。它要转几趟飞机。没人，这不是搬运工。不，不是药品。没有非法的东西。这只是给一个上次没赶上的人打的折扣。你甚至都不必是他。

我说我宁愿是别人。

好吧，伙计，不管你说什么。

在利物浦或许有尼日利亚人。我在那儿可以听到他们温柔的声音；就好像从遥远的体育场里传来的鼓声。阿尔热农说尼日利亚充满了破败的体育场。

阿尔热农将我引见给奥伯龙。

嘿，伙计，我们都知道你的外婆。她是个很好的女人。

我有两张我的英国外婆多拉·西德尔的照片。一张是她的全身彩色照片，躺在棺材里，周围全是鲜花，上面是一块玻璃盖，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凹陷，因此，她的脸看上去已经呈现出她日后将要变成的那具骷髅。她九十九岁了。在玻璃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摄影师。他穿着一件黑色西装，戴着一条黄色领带。他是谁？我查看着棺材周围所有的人。我们家没人缺席，不过我本人没有出现在我外婆的葬礼上。我核对着我的日记。她在香港去世的那天，我在巴黎，陪着一个年轻的老师，她只

有躺在吊床上才能达到高潮。她住在一套带有装甲板玻璃门的公寓里，外面，一座罐笼似的电梯轰隆隆地爬上爬下。伴随着电梯和吊床的节奏，我想捕捉出背景音乐。这时一个卖花的送来了红玫瑰，他既没有按门铃，也没有敲门，甚至都没有看一眼，就将花放在门外。到了晚上，大概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吧，也许是一个变态者，乘着黑夜爬了上来，然后又下去，接着又回来了，手上拿着相机，闪光灯拍下了我们一丝不挂，抿着土耳其咖啡的形象。

我手上另一张多拉·西德尔的照片是她二十五六岁时拍的黑白照。她打扮出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圆形胸脯，戴着金丝边眼镜，眼睛坚定地看着照相机外。镜头外是她即将登上利物浦港的船，去中国传教。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靠近喉咙的地方有一个胸针。

奥伯龙告诉我，我将和一个名叫温特伯勒的先生一起走，这就是一切。温特伯勒先生想回利物浦的家。在希思罗机场，我得帮他翻译一些文件，并帮他签字。

我沿汉口路走着，想寻找裁缝。这些天来我旅行时随身只带着一套三件套的西服。我看上去开始像我父亲了。我出生时，他四十四岁。今天我也四十四岁了。我收到的唯一一份贺卡来自上海，上面用口红潦草地写着：非常非常地爱。

我父亲的裁缝叫哈里·李，他还是一名珠宝商，他一边给我量身材，一边冲着我笑。澳大利亚，他说，都一样。我去过一次。地方很大，人很少。每天五点钟人们就都回家了。车子开得很快。大家都在同一时间回家。每天。除草。每人都一样。

人们期待着回家。在墓地上再铺一层草。我选了一件真丝马甲；一条大英博物馆的领带。温特伯勒，我自言自语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名字。

非洲。哈里说。他们到我另一家店。他们买秒表。一次买 12 只，15 只。我没问。关我什么事？付现金。也许是奥运会运动员。但是烟

抽得不少。不好。



我乘着一辆巴士来到九龙城，发现这个地方过去叫九龙城寨。过去，这是一个肮脏的街区，充满了再安居建筑、隧道和小巷，像座迷宫似的。它有其自己的法律，电是偷来的，人也没有身份证明。有人白天就没有看到过光亮。经常失火，人也消失了。我母亲的兄弟乔治在这里住了十三年。他身高六英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像一位好莱坞明星，但是他说的是广东话，不大会讲英语。他是人们很少谈及的亲戚。乔治·荣。鸦片。我有一张他的照片，开心地笑着，手放在口袋里。Desaparecido：失踪者中的一员。

我记得他曾经来过一次。他佝偻着，十分瘦小，肋骨都要从他的衬衫里伸出来了。他来向我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姐姐，要钱。鸦片就像写作一样。你需要钱来维持这一习惯。乔治舅舅不停地说这将是最后一次。确实，这是最后的一次。

九龙城寨已经不存在了。从其废墟上升起了高大但却不好看的建筑。我沿着一条弄堂往前走着，一位收纸板的瞎眼老太太告诉我鸦片已经结束了。只有老人抽它。她祈祷不要下雨。她将纸板拉平，这玩意儿值钱着呢。药，她说。每个人都要药。那也值钱。它们不是救你的命就是要你的命。等我要死了，我就躺在这张纸板上。这样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纸板四周一折，我就可以升天了。她笑了笑，但喉咙里都是痰。

这肯定是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我要说的，我对威利舅舅说。这不值钱。

威利是乔治的兄弟。他是我母亲的弟弟。他这种故事听得太多了，

他看上去好像想吐。我的舅舅威利拥有六幢这种啤酒似的大楼，有些房子涂成了荧光绿和粉红色，使这个地方看上去明亮了很多。这比平常要压抑些。我们来瞧瞧：一幢楼里有四十套单间公寓，每户每月五千元。威利舅舅不住这儿。他安排在这儿见我是因为他需要有人陪他去收几家难收的房租。每幢楼每个月二十万。只要将一只手放进口袋里就行了，他说。我想到了他弟弟的照片。威利舅舅穿着暗绿色的西装，戴着帽子帅多了。他的一只眼睛几乎瞎了，虹膜已经没有了色彩。他在外面戴上了一层眼罩，只是这遮盖不了多少……有点像无花果树的叶子，充满了恐惧。他会告诉你在一次议会冲突中，他给人用剃刀刮了一下。我偷偷看了一眼这个移植过的下体护身，这个眼罩，这个豹纹遮羞布，看到那儿有一只激光打印的眼睛。是的，视力没了。一个笑话，他说，眼睛追随着你。但是我想这是某种转移昆虫注意力的举动。一种警告。他一直在留心着周围。他看到了我在观察。每年这些楼里会有一两百万美国人。他戴那顶帽子太大了，最后我发现这是一顶给修改过了的钢盔。有时候他们会扔砖头下来。他敲了一家门。没人回答。威利舅舅身高大约一百九十厘米，体重约九十九公斤。他那件像花一样的真丝马甲经不住肚皮的压力已经冒了出来。他一脚踩在了走廊里的猫屎上。此刻他使劲地将猫屎往门上刮，结果刮得破门板都要碎了。

你知道，他喘着气说道，你乔治舅舅发生了什么吗？

我耸了耸肩膀。

想想看。每人都在往瓶子里藏东西，他说，基督徒的方式。我们的父母经历了疾病、战争、仇外、大屠杀。乔治把这一切都藏了起来。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很敏感。喜欢阅读奥斯卡·王尔德，和漂亮的女人睡觉；还纳妾。是啊，为什么不呢？后来，乔治再也藏不住了，各种各样的唠叨、闲话、背后中伤，各种各样的谣言……接下来事情爆发，就像洪水一样，再也回不去了。

突然，门开了，一个穿着黑色汗衫的黑人男子低头冲我们笑着。他

一定有两米多高，因为他一只手放在门顶上，并将他的额头靠在那儿，牙齿里塞着一根牙签，像温度计一样摇摆着。

威利先生！很高兴看到你。

不要叫我威利先生。你是付房租，还是得等你出门后我再来，换把锁，将电视拿走作为部分房租？威利舅舅笑着说道。

那个人的脸消失在门后，他从短裤里抽出一卷票子，数出几张。

乔治不是受这种事情诱惑就是受那种事情诱惑。威利说，随手将钱放进胸口的口袋里。

我瞥见他的腋下有一个白色的手枪皮套，看上去像一部手机，但我不敢肯定。这也可能是瓦特尔 P38 德制手枪的枪柄。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你知道。

房客低头看着他离去，将牙签从牙的一边挪到另一边，然后回去，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这些人没礼貌，我告诉你。看到他手上的钻石了吗？这比我给卡诺拉的钻石还大。我告诉你，不要离婚。不要丢钱，要活在罪孽之中。

我们走下楼梯。威利舅舅从屁股的口袋那儿拿出一个小的喷雾罐。他数了数门牌，往后走了几步，然后将红漆喷在其中的一个门楣上。

现在他们知道我来过了。他们全都将门上的数字拿掉。

喷漆干吗？

这就是逾越节。他们现在就在里面。我能够听到他们的呼吸。明天我们将他们的东西倒到外边，换把新的门锁。

你对逾越节理解错了。那些喷上红色的被拯救了。

不知道。涂鸦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像拯救。此外，你们家族也是犹太人。好了，我想让你见个人。

我们乘电梯下去，来到车库。威利的宝马车在启动。车里是一位漂亮的欧亚混血女。或者说至少这是我透过有色玻璃能够看到的。我打开后门，感到了冷飕飕的空调和巴黎香水味。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很

明显，她一直躺在车后座上，因为此刻她正在整理头发，裙子和银色的丝袜。她戴着一个镶有钻石的金脚链。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

我想让你见见你的表妹辛迪·林。她是乔治的女儿。你在她出生之前就去了澳大利亚。

回到香港薄扶林区的住宅，威利舅舅拿了一把银色小刀，削下一层柠檬皮，将其配到马提尼酒中。落地窗外，巨大的船只来往于房子和硫磺岛之间。威利舅舅的暗绿色贝尔直升机将一片动叶片骤降到红土网球场上方。我舅舅指着一艘集装箱船。容胡线。过去他叫威利·容非尔德，后来改名威尔弗雷德·温顿。他曾经以为他可以在英国成功，但是人们都奇怪地看着他，给他最贵的饭店，最差的桌子，于是他又乘下一艘船回来。现在香港回归已经接近，他变得非常中国人，腰有点弯，一直很忙。辛迪·林靠在窗口坐立不安。狗在狂吠。我坐在那儿，尝着第一口马提尼酒，感觉模糊，浪漫，我尽力不去看我的表妹。她正踢掉一只高跟鞋，用一只穿着丝袜的脚尖擦着她的小腿。

有一天，如果你这样回来，我们就去粉岭的别墅。威利舅舅说。乔治过去曾经住在那儿。你知道，他理应去演电影。看上去像……威利捻了一下手指……查尔登·海斯顿①。

伯特·兰卡斯特②，辛迪说。

他向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穿过复合式娱乐区，来到大理石铺成的天井。罗威纳狗迈开大步，希望有人抚摸它，它的口水都流到我刚买的LEE牌牛仔裤上了。

跟你讲点乔治的事情。你知道他淹死在扬子江里吗？

是的。

---

① 查尔登·海斯顿(1924—2008)，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② 伯特·兰卡斯特(1913—1994)，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愚蠢的冒险。想带游客乘木筏溯河而下，开创他的公司。你知道，那是条变幻无常的河。世界上最大的急流。我不会支持他的。让他驾驶他的萨尔萨筏吧。

是巴尔萨[1]筏。

什么？

辛迪摇了摇头，头发披到了她的眼上。

他妈的。

威利从口袋里抽出一根香烟。

不用，谢谢，我说。我想远离他们。

有谁知道我给乔治香烟的时候他会说什么吗？他会说：等等。总是等等，仿佛大家都可以消磨时间。然后他就会躺下来，点上那只该死的烟斗，喷吐，打盹，那将是你整个下午聊天的内容。也许是整个星期的内容。那种时间你是不能开木筏公司的。

不管如何，我舅舅说，乔治五岁的时候，他沿着上海的外滩散步，那是一个下午……我们全都住在四川北路，靠近浸信会，离外滩还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在那儿干什么。他在那儿碰到了一个欧洲人。我猜他是一个牧师，因为乔治……还有我们大家……都不会相信欧洲人，除非他看上去像一个英国牧师。他把乔治带到一个房间。后来夜晚降临，他还没有回家，他的奶妈找不到他，于是就报了警。几个轿夫经过一个码头的时候发现一只米袋里有东西在动。他们割开米袋子时，发现乔治在里边。不知是谁想将孩子和米袋一起扔到水里去，没想到退潮了。

威利将没有点着的香烟弹向栏杆。他眺望着远处的海湾。

这件事让他深受打击。上帝，不是鸦片。他到死都没告诉别人，只告诉了我，但我不相信他的故事。他身上总有股反牧师的劲儿。所以，

---

① 巴尔萨，一种杉木。

你知道扬子江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

嘿，伙计们，辛迪从厨房的窗口那儿叫着。还要饮料吗?

你知道点逾越节，威利一边说，一边任性地拧去茶花的嫩苗，乔治是老大。但他却自杀了。也没等一下天使。

辛迪拿来冰镇起霜的杯子。我想你迟早会发现真相的，她笑着对我说，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在想，这个家族是有人讲真话的，我并没指望这么卖力地去得到这个真话。

我进入出租车，威利舅舅改变了再次请我的想法。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他充满感情地说道，身体倚靠在出租车顶上。你知道，你们家和我们家一直处得不好，尽管你母亲是我的姐姐。

我们家的人都不亲近。

而且，他又加了一句，不要写乔治。他走了，让他安息吧。他取下眼罩，让司机开车。

我取出我父亲的地图。

当我回到重庆大厦的时候，我发现奥伯龙已经在我的房间里。

你他妈的怎么进来的?

别着急，伙计，我把你的票子拿来了。

他从市场上买了一只活鸡，就在我的水池里杀了起来，弄得里面都是鸡毛。

今晚我还要给你烧一只鸡。你从没尝过这种鸡。

我将手指蘸到血里，乘他不看的时候，将血涂在我的门柱上。那天夜晚，尼日利亚人和他们的女朋友都来了。这些都是漂亮的女孩，她们说我是魔鬼附身，这些魔鬼窃取了我身上的大量天赋。她们说，温特伯勒先生会拯救我。他是谁?我反复问道，他们只是打太极，或是将食指

指向我的嘴唇，仿佛随着我先前的好奇，魔鬼已经逃离。我亲了亲她们的手，一边喝酒，一边就在走廊里跳起舞来。她们跟我讲起了利物浦的故事，并讲起了那儿的黑人社区。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的英国外婆。想象着她有多白，这种白不仅反映在她的照片里，穿着薄纱，而且是躺在棺材里，边上还有一位神秘的黑人摄影师，戴着黄色的领结，倚靠在她的跟前。

溯河北上

在这过程中，我新婚的外婆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失去了她的丈夫，或许也找到了一位新的丈夫。

她站在码头上，确信她的手袋还在她身前。

她听说在中国，一切没有被钉死的东西都会被偷。她脚下的木板来回摇晃着。她变得轻松起来，仿佛她已被抢过，码头上令她耳聋的噪音使她有理由相信她的升华。她看到的只是面黄肌瘦的苦力，他们生活在煤尘和铜灯的迷雾中，一边拖着缆绳，或拉着船帆和绞盘，一边迸发出歌声，一种持久而勉强的假唱。他们盯着她的外衣，而她则透过迷雾般的场面茫然地看着这些浑身是汗的血肉，看着他们的后背，或躯体，看着他们湿漉漉的身体，穿着衣服的她内心感到了一丝不安。她知道她会死在这儿，中国。一朵开放的鲜花，在其心中则躺着令人灰心而痛苦的衰败。她想用手指去刺它。当然，她会死在这儿。否则一切都是失败。这是1910年1月。

说到失败，她在等着他。她会独自一人在一条颠簸的船上待两个月，她会等他。然后她又会想起利物浦。当然，第一天的晚上，天下着小雨，十分潮湿，她走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当时，她并没有好奇得要命。爱尔兰海峡刮来的风鞭笞着，从她的衣服上刮出了肥皂的味道。屠户说她该走了。这些见面意义重大。屠户使劲敲打着这些碎片，他脸上

那簇姜色绒毛不停地晃动着。看到他你就会感到饿，刀下的恰到好处，穿过骨头，将动物分成美食家口中的肉片。多数人挨饿，而他的秘密乐趣就在这张桌上。水手们还是全部廉价买进，他们拨弄着他们利物浦的纽扣，扒出童奴身上的不义之财或偷盗来的银器。一天晚上，关上门选好珍品之后，屠户铺上他的亚麻布桌布，并拿出了一瓶啤酒。她想象着那蝴蝶猪肉就是从她自己的身上给砍下来的。是的，哈里说，他满嘴软骨，明天晚上在那儿见面，讨论……用泻药将它冲下来……浸信会去中国的使命，他转动着手上的叉，重点强调了中国。一滴滴泡沫优雅地驶离他的胡子，奔向煤气灯。

他跟她名字相同，但却与她没有关系。他很有野心，但却有点粗俗，她能看到这点。每天早上，她得从码头顶的多克路乘高架火车赶往康华利斯大街，劝洗衣房的那些女人皈依基督教，中国使命听上去要比赶高架火车好多了；这些女人提起她们的裙子表示欢迎，但是至少她们得喂养孩子；在这儿要比她们住的发臭的院子好多了，那儿聚集着一些欧亚混血儿，黑白混血儿，还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统的混血儿，他们成天游荡在默西码头周围；这比周五晚上她从醉鬼那儿得到的辱骂也要好多了，每周五晚上，她都要和皮特大街上的唱诗班一起唱歌，在那儿，她注意到了那些奸笑的中国佬，给鸦片害得无精打采。

她对说过的话记得很少。一个下雨的晚上，大家都湿淋淋的。也许这是一个布道。她记得灵魂、身体和心智，仿佛心智是最后一分钟加上去的。当心。鞋子上都是水。没有准备。从前没几个人去。快点翻过去吧，男人说过。快点翻过她们……她们就会变成终身信徒。她的眼睛咕噜噜转，发现了背后哈里的眼睛，正透过厚厚的雾一般的眼镜在凝视。他没有笑。他身上有股讨厌的精神，他用火一样的舌头舔了舔嘴唇。后来，在小雨中，他送她回家，一句话没有。

就这样过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对她说，你爱我吗，多拉？他的镜片中反射出一片光泽。

她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是基督教的爱吗？她立刻想到了她即将去世的母亲和微薄的遗产。他不站柜台的时候与众不同。手指出血了。从一袋袋肉中去盗取骨头和膀胱，为他的女房东那满脸脏兮兮的孩子制作粗糙的玩具。

我之所以这么问，他说，是因为如果我们一起去中国……需要的并不是激情。

这是上帝安排的，她想。如果没有上帝，那就什么也没有。热情。内心充满精神。每一天，每一个呼吸，每一次弹跳，每一个单词，是的，她说，生平第一次他的眼神眯成了一条缝，她欢喜地叹了口气，既感到好奇，又充满了报答。中国。她说，她感到这个词在她的舌头周围转动。中国。她只需要说出这个词，就知道她已宣告她过去的生活结束。

* * * *

国泰航班下午十点起飞，没人像温特伯勒先生那样坐在我边上。在我的想象中，温特伯勒先生应该是尼日利亚人或加纳人，或许还有灰白的头发，精心修剪的指甲和戴着戒指的手指，他吩咐菲律宾伙计给他上威士忌，并轻轻地咳嗽着，吐在洁白的手帕上。他的谈话也十分完美，他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法语，那发音跟锉刀似的，教我如何写作。要记笔记，他会说。要抓好机遇。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位戴着假发的广东老妇人，她好像脑后还有一只眼睛一样，从后面取下她的假发，脱掉拖鞋，开始打鼾，而这时飞机还没有达到它的飞行高度。我像一名双杠新手，双手撑着椅背，轻轻地越过她，向机尾的洗手间走去。我的甥女米克琳娜·安东尼亚就在这次航班上。她是乘务长，将嫁给一个飞行员。她沿着过道装腔作势地走了过来，在紧急出口处张开臂膀拥抱着我，并在我的嘴唇边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我们看到彼此感到很惊讶，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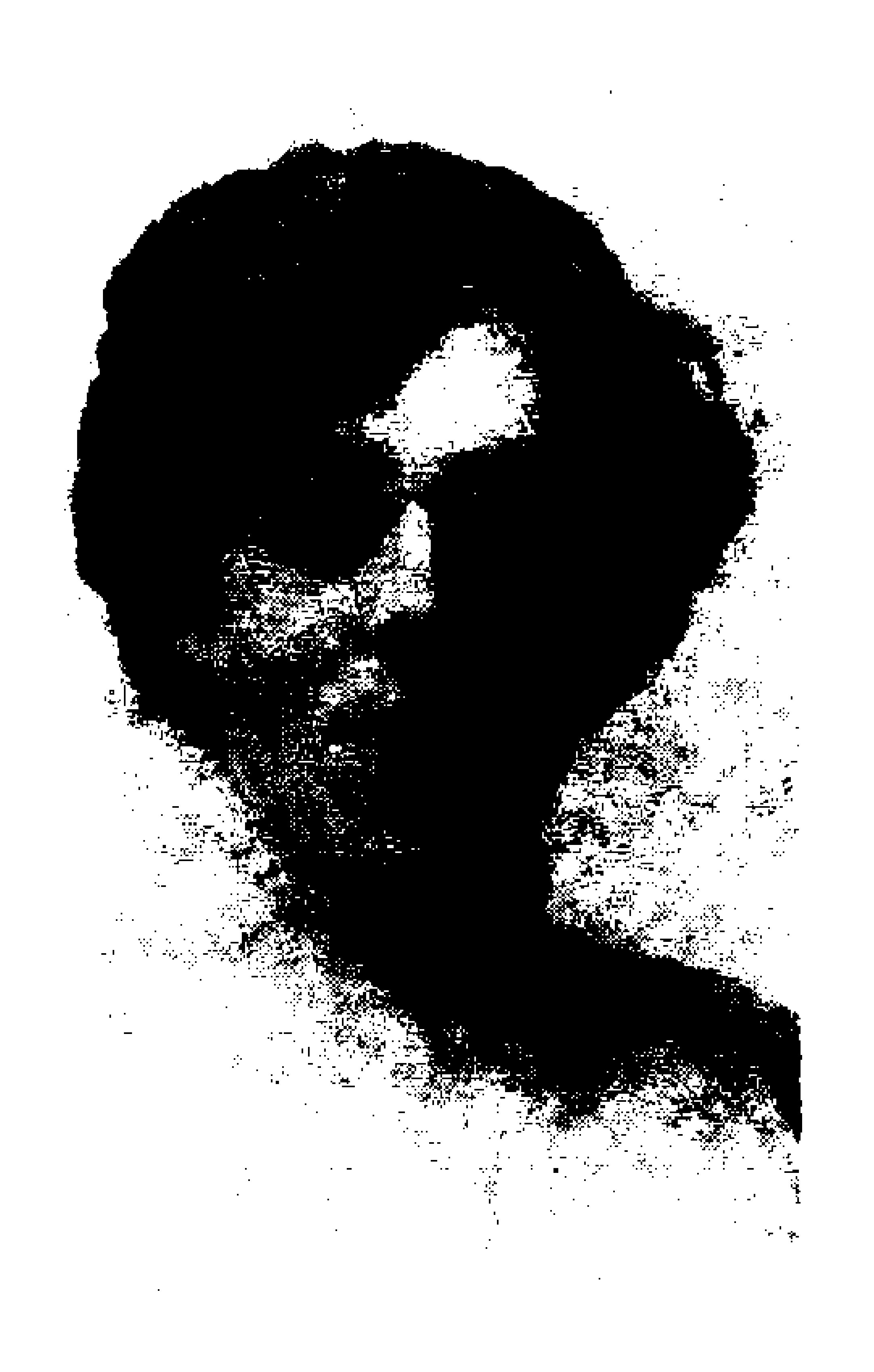
揉着她的臂膀，掩盖我的尴尬。她人很瘦，为人冷淡，她不笑的时候，眼睛里流露出哀伤的神情。我感到了她上臂上的细小伤疤，记得我父亲有一次卷起一张报纸，浸上煤油，点上火，来熏害虫，结果有一小块火掉到了她的童车里。

舷窗外边是一个永久的黄昏；一份巨大的没有用的红色祈祷，是活人送给上帝的；这是一种缺乏激情的美，是一种伟大无所居所的衡量标准。

*　*　*　*

1910年，我外婆站在上海码头上，等着她的丈夫，中国就是这样呈现在我的外婆面前的。她丈夫已经乘船先她而去进行准备。现在，哈里·西德尔在哪儿？

我只有这张多拉年轻时的照片，她穿着白色的薄纱，戴着蕾丝手套和金丝边眼镜，看上去活像她日后成为的教师。此时此刻，面对着照相机镜头，她一点也不知道，大批的孩子会夹道乡村大街上，看看她衣服上的东西；无论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跟着，有时候还会有人摸她；不到一年，就会有人撕扯她这身衣服，用扯下的布条将她绑在鞭笞柱上，她的内衣给撕破了，她向上帝祈祷。哈里·西德尔在哪儿？他一定在拍照片。



我外婆从不愿意主动讲述她在中国的遭遇。等我开始有意识地记事的时候，她已经很老，耳朵听不见，眼睛也有了白内障，几乎瞎了，没人知道如何去除她的白内障。她只讲述现在，讲述她的学生（她是九龙

一家女校即将离职的女校长），讲述哈罗德·麦克米兰（她给他写过好几封信，但只收到一封回信）。中国已经在她的谈话中消失，好像在英语里它就没有存在过。她只讲白内障、失明、视力和丧失的机会。

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得拼贴起来，我先来到利物浦的基督教青年会，在这儿，一个名叫卡博的先生从干燥的房间里抽出一些历史记录给我看，并指出西德尔一家是1910年离开的；然后他又指出了一个涂痕，看上去像是擦痕，而且擦得很厉害，条目的左手角落上留下了一个小洞，表明这是一次令人失望并且并不成功的使命。名誉上的一个污点。薄纱上的一滴眼泪。卡博先生出了口气，摇了摇头。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大蒜、葡萄酒和卷烟的混合味。外面，利物浦在下着小雨。

她发现离开很容易。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发现这也很容易，眉也不皱，两手一擦，轻装出发。什么都好折叠，包括记忆。你多想想她，在冬日的上海，她和哈里挤在狄思威路[1]的住所……一座两层楼的法式砖房，没什么暖气，只有一只炕，同时兼作炉子……她从窗口可以看到外边光秃秃的树，还有来回奔波的人力车夫，时不时地还会有一顶遮盖严密的轿子经过，坐在里面的是裹着小脚的新娘去参加婚礼。邪恶，真是邪恶，她说，这些异教风俗。但是他们婚礼的晚上在干吗呢？她和哈里？

几个月后，他们开始了真正的旅行，你外婆很高兴跟你讲述这段故事，每到星期二，她都在早上九点三十分准时来到你母亲的家，一边敲着门，一边大声叫道，“是外婆！”这是一种口令，因为她耳背，已经经不起问询了，同时也是为了吓跑小狗。没人用你父亲笨拙地安装的猫眼，上面还盖着克鲁什深嗅盐瓶上的金属瓶盖，这样别人就看不到里面。外婆将你坐到她的膝盖上，唱起了童谣“骑着木马去班伯里”，并表演起了“五只小猪”，然后她会大声吼叫：“无舵驶向扬子江！”这时

① 狄思威路，今溧阳路。

你就会鼓掌，因为这是另一档节目的序曲。但是她不吐不快的是无情。你听到过薄弱部位的传说吗？外婆的薄弱部位在哪？

到过中国的人都没有讲起过他们的目的地，讲起他们的到达和安顿。总还有别的地方，中国之外的旅程，而中国却吸收了所有的旅程，大脑变成了海绵，无所释放，只有惊奇，而且沉浸在一种凝滞的宿命之中。一个人迟早会觉得在中国待得太久，变得浑浊，像汉口的扬子江一样变黄，那儿的平静误导了西德尔一家，于是他们登上了侉子船，一艘有四个舱位形如房屋的平底船，船上有主帆，还有一只呼哧呼哧在大喘气的蒸汽机，溯河而上，向千里之外的重庆挺进。

你坐在你外婆绑了一层又一层的膝盖上(是痛风？还是风湿？或静脉曲张?)，感到像膏药一样的叙述吐露出了其古怪的语言，怀疑和反常的战栗，讲起他们在溯河而上，驶向目的地的时候，英勇的哈里躺在她的边上，研究中国。

调速轮通宵抽动，遮盖掉了搔痒的声音，到了早上，几千个小虫子显现了，她说，暂时冬眠在那儿，好像死了一样。他们发现这些虫子的肚子里鼓鼓囊囊的，全是血，他们的头发上，耳朵上，米里，水饺里全是这些虫子。(其他地方也有，但是即使是到了今天，你还是一口咬定是昆虫，你梦想着你的其他拉丁家族的成员，当时，你家族里的那些男人正在上海的美容院里召唤漂亮的女孩去给他们挖耳屎，这些翩然而至的女孩，其手指就像雕刻出的竹耙子一样，弯成一条曲线，可以达到最佳挠痒效果，她们倚靠在顾客胡子拉碴的脸上，她们娇小坚挺、柔软光滑的胸脯拼命挤压，想捞取额外的小费。是的，那真是快乐无比，你父亲过去经常说。当然，他的父亲已经让他领先了一步，因为你父亲一直在提醒你，英国人，就像你的外婆多拉，已经陷入自我否定之中，忘记了如何区分更加微妙的快乐感觉。)

但是传教士们打定主意去坚强应对。他们直到抱怨得到满足才去睡觉。中国船员笑着应对这一细微的不快，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与生死搏

斗。说真的，水流上来的时候，绞盘在呻吟，尖叫，而船员们则爬到船外，沿着纤路使劲拉，而多拉原以为这只能由强健的挽马来完成，在甲板上的船员参与下，她看到三十个男人，借着傍晚的灯光，用力拖拉，他们船上的棘轮每转一圈，他们那充满节奏的身体就会消耗掉一些能量，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想开出一条辛苦的路来，并为此而加油。纤路上有一两个人撑不下去了，结果给拖走了，应该是死了。但这只是开始，因为侉子船吃水浅，在最靠近地面墙的地方，面对急流，船突然横转，就连舵手室上的一对烟囱也在发黄的夜晚闪出红光，在用绞车拉的过程中发过誓的船长此刻在半明半暗之中又失去了方位，他知道这些男人在暗淡的光线下会撑不住，船会突然离开，在突出的峭壁下打转，在吃水线下撞碎。他知道这里面的分量，了解这些可怜的男人。他们拐过第一道弯。到了这儿，船长向岸上抛了一根绳子，环绕在一根圆柱形的岩石上，而男人们则恢复力量，继续拖引。正是在这儿，哈里跳上了岸，表现出他的航海知识(这是上帝在耳边绕进绕出时，他在主日学校的写字台下痛苦地学到的)，在身后缠绕着竖起的绳索，爬上了长满苔藓的花岗岩顶。他的太太透过舷窗斜着眼看着。那些苦力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每天都这么干，生怕丢了命，少了四肢，现在他们发现一个红脸外国人蹦蹦跳跳，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有人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运动。其他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太胖了。他们欢呼着。他们吐唾沫。他们将缆绳安顿好，然后坐下抽烟，而蒸汽锅炉则还在工作。绳子在抖动，天上的星星在歌唱，下面的蜷虫在劈啪作响，世界就正常了一会儿。前面是鹅尾岩，接下来就是霍塘峡，所有湍流中最危险的。

你坐在你外婆颠簸的膝盖上。这个星期二就到此。她的话说得很慢，她累了，装满了记忆。母亲要你从外婆的膝盖上下来，你来到多拉有暗影的眼睛前，白内障似的命运和故事，她的嘴巴突然扭弯了，像你想象的扬子江一样。她放松了一下自己，走到门口，拿掉克鲁什深嗅盐

瓶上的瓶盖，偷偷向外看去。她会心神错乱吗？在她去世多年之后，你舅舅威利来收回你父亲的房子，他也会顽皮地去偷看一下，他的嘴是典型的唇裂。但是一只黄蜂在那儿筑了巢，他被叮了一下，眼睛部分失明。是右眼还是左眼？

* * * *

在希思罗机场，他们问我的名字，并送我到一个办公室，他们并没有说他们要什么，实际上什么也没说，他们查看了一下我的文件，接着又查看了我的行李，然后带我穿过一个通道，通道和停机坪平行，两边是一片片雾状玻璃，风猛烈地刮向扁平的行李车，我跟着行李车来到了由集装箱改成的飞机库，就在一架喷气式客机轰隆着起飞的时候，看到了一辆黑色灵车正好停在这儿。或许我就要目睹我自己的死亡了，我已经听到了灵魂消失时的嚎哭；接着就是躯体啪的一声入土的声音，葬礼场面很大，令人恐惧。他们拉开一扇门，将我带到边上一间办公室，签了一些文件；一张提货单；一张认可证。

有一具棺材；铝制的，十分寒冷，在黄昏映照的飞机库里已经结霜。细雨穿过巨大的门斜了进去，已经保养好的喷气机尾鳍将后面的黑暗一切为二。

你是来领科菲·温特伯勒先生的遗体，对吗？

灰色的头发，黄色的指甲，戴着戒指的手指将冰块丢进他的威士忌酒中，他们关上棺材盖的时候，他对着洁白的手帕轻轻地咳了一下。他的谈话在真丝和丝绒之间灵活移动，声音有点刺耳。

是的。

谢谢你。我们有一具棺材，你看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点混淆。

他递给我一个檀香盒子。盒子里有一个铝制容器，像一个咖啡保温壶。

灵车的轮胎是海绵的，嘎吱嘎吱地开走了，我则继续前行。我站在那儿，看着头顶上一个巨大的大型喷气式客机正在保养，于是我走到了飞机的前轮，躺在上面，抬头向上看，同时伸开双臂，直到有人冲着我大喊大叫。接下来我穿过一道门，来到背后机场混乱的工厂棚，斜坡和禁止外人进入的入口，确信没人跟在后面。我开始莫名其妙地跑了起来。我手上拿着包裹，一会儿轻松漫步，一会儿又撒腿飞跑。至少这是穿过海关的另一条通道，我的脚后跟藏着奥伯龙给我藏起来的大麻，笔记本里填满了温特伯勒先生的指导。我不时地在水坑上跳个舞，我闯过了生死关，什么也不用申报。

世界屋脊

我外婆给我讲故事，只是她说这些不是故事。就这样我开始学习英语。我当时五岁。外婆咳嗽的时候很少往嘴里塞药片，就是外面包有糖衣的那种药丸，来消解喉痛之类的毛病。她的嘴巴上面是红的。这是假牙架，不过你不知道这，你还以为这证明了她过去是一个喷火的龙。至少中国人就是这么叫她的。

我们在哪？对了，我们得经过瞿塘峡，他们在向我们射箭。

你能够看到哈里的黄脸上满是吐沫，充满了兴奋，不停地喊叫，哈！好！谈论中的威胁还没有摆脱，他将自己的太太安顿在船长室里（钢板做的，可以防弹），自己则躲进躲出。只有箭。愤怒的小昆虫更危险，他说，这时第一阵烟让他吃了一惊，而随后而来的一粒火枪弹打碎了他耳朵上方的木板。他赶紧下了船。

那天夜晚，他太兴奋了，也太疲劳了，结果睡不着。那些小虫子安静得惊人。他翻来覆去，最后，他来到了多拉的船舱。她围了条披肩。有时候，他想彻夜跟她聊些最肤浅的事情。他把上帝想象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存在，在《圣经》文本里跟他对着干，他挣扎着想理解，他的记忆很差，用词乏味。他是一名屠夫，他说，知道如何去杀一头猪或绑一只独眼羊，割穿它的喉咙。但是《圣经》中的人物……那些知道得比他少的木匠和牧者……总是有幸得到更大的图片。他想抚摩一下她的头发。

西德尔先生，多拉说，如果你想亲热，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停了下来，很快离开了她，并向她表示感谢，而她却被自己的笨拙搞糊涂了，很生气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她把自己的茶杯摔向船舱。

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她外面穿的是过时的衣服，但是里面却是模仿耶格伦敦的时装和最穷的爱尔兰近卫团喜欢的粗糙灰毛毯的组合，她穿的是：一件银色的山东绸晨衣，印度南苏克布灯笼裤，最好的轧光棉布配羽纱所做的紧身女胸衣，前面是一个长长的虚饰，两边是虚假的下摆，胸前形成一个优雅的V字形，边上绣有细薄布装饰的华冷西恩花边袖，腰间围的是上等细麻裤，后面有两个纽扣，袖口有网格花边，并配真丝领结，吊袜带一直吊到膝盖下，一双脚挤进她在上海买的很小的绸缎鞋，每件东西都紧得慌，也堵得慌，闻上去有股樟脑和熏衣草的味道。

哈里在船尾，想小便。夜色清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停在下面的舢板上的叫声是冲着他的。夜空的闪烁激起了他的兴趣，他自己出钱，划船来到岸上安抚他们。摇摇晃晃的防波堤上面是石阶，他顺着石阶爬了上去。然后他又爬了一些石阶。石阶好像没有止境似的。到了上面的高地，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建筑工地；他们在造一种铁路终点站，他们已经从驳船上拖了一个小型火车头。在油灯的闪耀中，他看到了咯吱作响的火车车厢，听到了叮当声和呜呜声……这是音乐吗？这一定是个集市。站台上拥挤着一堆堆的人，有买东西的，有卖东西的，有吃东西的，有喊叫的。他小心翼翼地走着。死蛇。是的，他们在杀蛇，将它们甩到轨道上。他走得更近一点。理发店。化装古怪的脸。摊位。一头是猫一样的声音，一个伤透了心的老人，不，他弓着背，在演奏着单弦琴；一位妇人的叫声，像某种歌剧；一张照片；一件护身符；蒸汽；各种旗帜。这就是集市。他们好像在炒鱿鱼。也许是蛇。但是不，这一定是一个剧团。他们在剪自己的辫子。他们在为彼此画脸。他能够辨认出一个红色的符号：铁路文工团。外国等于现代。富裕的中国人四处走动，内衣当外衣穿，有的只穿一般的长内衣裤，有的穿女式紧身内

衣，外加三件套，后面是镶褶边的腰垫，里边是中式睡袍。头上撑着把阳伞，戴着浅顶软呢帽，准备好了夜晚的散步，去检查机器，他们为他们的白色裤子和疯狂的发型感到骄傲，他们称此为现代性。

哈里兴奋不已。他急匆匆地返回，向多拉讲述了他看到的一切。他奔下台阶，跳过最后几个台阶，然后登上了防波堤边上的沙滩，脏水一直漫到他小腿肚子。

有些传教士就喜欢讲故事，有一天，外婆说道。

跟我讲一些吧，外婆。告诉我，求你了。

有许多人变疯了，你知道。

为什么？

中国使他们变疯的。

中国就在边境上。每天站在我家附近的桥上，我都可以看到蒸汽火车尖叫着驶进中国，那火车的轮子是红色的，红的像外婆的嘴巴，喷出火花和蒸汽。

一个月之后，哈里登上了重庆外面的山，盛夏中看着远处喜马拉雅山的巨幅照片。他给多拉切割了几块冰，因为多拉患疟疾给关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她这个夏天身体一直不舒服，一阵一阵的患痢疾，而且还发可怕的高烧，需要降温。哈里坐的是轿子，于是就将冰储存在他脚下的箱子里，冰水漏到了心存感激的轿夫的背上，与他的眼睛在同一水平线上的是辉煌的世界屋脊。壮观，他想。进步。他已经在脑子里想象出了一个冰箱。在水手用的贮物箱里放进粗麻布和稻草衬里。

突然，他摔了下来。他臀部着地，反弹了一下，仰面躺在地上，轿子散了，冰碎了，大量的尸体堆积在冰冷的斜坡上。这些苦力拔腿就逃，一哄而散，躺在两边的地上，哈里·西德尔看到了地方军阀的人，满族同情者，穿着宽的裤子和旧盔甲，向路上爬，箭和标枪随时可投入战斗。他蹲伏下来，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但却分不出哪是气体，哪是固

体，他看到军阀漂浮在雾中，巨幅照片缩小成令人头晕的虚张声势，勇敢果断的行为、冒险的举动、上好的武器、难以置信的场面、帝国的战无不胜、氧债，看到这些，他开了一枪，然后掉头就跑，后来他感到一阵心跳，看到箭从他背后穿透了他的肩膀，凭他多年的屠夫经验，知道他的眼睛就会变得模糊，血流就会变浓，死亡很快就会到来。只不过结局并非如此。他挣扎着滚下山去，再挣扎一会儿，他躺着一动不动了，他的胸口汩汩地流，颤动着，他从没经历过的一种痛苦正慢慢地在他身上弥漫，扩展到一块正在融化的雪中，他正慢慢地睡着，无法抵挡生活中的种种苦与乐；铿锵刺耳的铙钹、沉闷的鼓声、各个妖灵所出的响亮的中国喇叭；渐渐地他感到一股怒火，冲向他该死的无用之中。

外婆闭上眼睛。她摸着她的《圣经》，读着字典，翻着一页一页。我知道这是让我去读。她让我读是想提高我的英语。读读《圣经》，读读字典，她不断地训斥着；如果你想说什么，先将它写下来，然后再看是否值得去说。先从 A 开始。Adam（亚当）。上帝从泥土中捏出一样东西，将他取名亚当，并给他生命。

我的名字叫安东尼奥。

我对你充满信心，孩子。

她自己已经没有多少信仰，我听到他们教区的牧师说过，这是一个胖牧师，一直瞧不起新教徒，他一边搓着手，一边气势汹汹地吼着。但是，在看到皈依机会来临了之后，他手上拿着的圣饼在抖动，人也在匆忙地忏悔，每个星期，他都会抽出一个下午，去拜访多拉·西德尔。我的外婆已经拥有了世界上的所有时间。种种迹象表明，她将慢慢死去，记忆也将随之而去。在我后来的岁月里，我看到这一过程正渐渐成为事实，死亡就是一种放弃，一种忘却，后来，在一场风暴之中，冷雨浇到了脸上，充满悖论的是，当时，船正驶向童年的记忆之中，充满了五颜六色的连环画，辛巴德和大力水手。非常清晰。但是眼下，我却看到我

们家被文字摧毁了，仿佛整本整本的《圣经》和为混饭吃而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一点一点地被消化，使他们重新开始了愤恨和不满。但是我外婆却不同。她是一个不吝文字，拼命收藏文字的人，但是她的眼睛却瞎了，文字是否泛滥，再现是否不忠，是否会对文字使用者的描述产生令人不快的联想，这些她一点也不在乎。我坐在她的膝盖上，看着她静静地将眼泪挤出来，然后径直地看着那模糊的白内障，里面是充满了欺骗性的扬子江，尸体随江水旋转，最后给冲上了岸，覆盖在黄色的泥土之中。外婆的眼睛十分吓人。非常恐怖。留心你的用词，孩子。

多拉·西德尔在学校教书。如果有人问你她在干什么，这就是你能说的一切。她没有教宗教。她教英语字母。A：笔记者(amaneunsis)。她的眼睛已经开始变坏。D：门徒(Disciples)。幻想家拥有他们。G：中间人（Go-between)。去看看那个穿着内衣，坐在班级后面，并且不断微笑，仿佛什么也听不懂的年轻人是谁。V：维吉尔(Virgil)。他的名字叫维吉尔。夫人。一个罗马诗人。一位向导，还是一位性反常者。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他说他喜欢这个名字；在一个蜡烛的盒子上看到的这个名字。穿过地狱点明道路。

但是见鬼，基督教青年会的生活很舒服，哈里过去常说。他们有一个厨师负责采购和烧饭，有一个男仆打扫卫生，烫衣服，一个苦力擦洗地板，搬水，搬柴火，一个男洗衣工人，一个保姆铺床和带孩子，一个门卫和他一大家帮手。一群群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传教士、游客和出过海、撑过篙，或溯扬子江而上的游士。他们年轻，热情，务实。每到夏天，多拉就喜欢跟他们上山，乘着轿子，每到山坡陡峭的时候，她就会穿着短马裙，爬到她喜欢的苦力的背上。野餐。这位叫维吉尔什么的，他最多不超过十八岁，经常过来，呷口茶，说着很差的英语。清洁，维吉尔。清洁仅次于圣洁。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笑话。他总是十分完美，喜欢穿带金纽扣的高翼领西服。清洁。维吉尔。他有一个更粗鲁的兄弟叫查理。他在头发上抹上马卡发油，然后再用手搓搓，

将发油再抹到窗框上。维吉尔。在其下面，则是一直困扰着她的一种敏感。难道说这是中国式的礼貌，一切都要估量一下，然后将她处于不利的位置之中？他来的时候，她一直在清扫，就连床下和沙发下也要扫一下，她说她很忙……而他则和苦力和保姆一起喝茶，嗑瓜子，将瓜子吐到窗外，看谁吐得远。他们想吐到灌木栅栏上。砰。多拉听到了他们，于是就待在房间里。这个维吉尔像个恶魔。和厨子一起在厨房周围逛来逛去，一副脸色发黄，眼泪汪汪的样子，他们杀鸡或杀猪的时候，他对它们的内脏总是十分好奇，长长的手指在腹腔上摆弄来摆弄去，去油的时候揉弄着猪的腰子和肝，剪掉还在喷血的血管，他的手臂上都是血。生活是一个谜团，一会儿是像暴风雨一样咆哮的人物，一会儿又是迟钝的问题……砰。前后矛盾。有时候，他会一下子失踪好几个星期。就是这张照片……

他正站在火车头前。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装扮？

你外公出生证明[1]，也就是基督世纪前；后来我们给他搞了一套西服和一根领带。瞧，在内陆的那些使命中，我们确实也做了些好事。

---

① 双关话。原文是 BC，既可以指出生证明，也可以指基督世纪前，或公元前。

台风警报

超级想象论。各种约会指南。风暴天气。

据《纽伦堡历史记事》记载，公元1002年至1024年间的某个圣诞夜，在科尔毕克镇马格德堡主教教区，爆发了舞蹈病①。

半夜，跳狐步舞的人群从小教堂中拥了出来，一边笑，一边唱，一边旋转，一边跳舞。他们沿着小路快速摆动着身体，来到了墓地，散在各个墓之间。雾很浓。人们旋转，来回摆动，集体表现出对神权的反对。他们脱掉衣服，倒在了石碑上，精疲力竭，歇斯底里。后来发生的事情没有记载下来。现代医学对这种舞蹈病的解释是他们当时麦角中毒，这是他们吃了含有麦角菌的粮食之后，体内出现的一种毒素。医学解释说这些人要一直跳到死。但是没有得到记载的是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性交，他们的射精，还有他们的惊呼。没有得到记载的是他们正向再现的中心朝圣，想找回创造的中心。没有记载的是还有一个生存的转机候机室，一个安静的地方，贯穿着层层时间，在这里，从一种状态翻译到另一种状态完全靠癫狂、惊慌和绝望所创造出来的文字的联觉。

英国没有台风。爱尔兰海峡有风暴，传统上一直很猛烈，但是从未达到台风意义上的气旋；它们没有表现出一个寂静而且有点发热的中心，它们悬在死海上，一会儿发黄，一会清澈，真是一种风暴悖论。欧洲北部也许会有暴风雪，一阵一阵狂号，雨夹着雪猛烈地冲击着沿海城

镇，雨雪里还夹着刚被掏过内脏的鱼血，冻成了冰块，同时随风暴而来的没准还有严厉的加尔文教，在这漫长而耐心祈祷的夜晚，加尔文教将生活挤成了苍白无力、备受压抑的灯光。但是这里没有类似于中国南海沿岸那儿的台风。一场台风会吹倒房屋，然后缓慢地安顿几天，就像我们九龙壁的波尼·潘小姐，坐在院子里，撅着个嘴，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跟着我练习英语，折磨着我的时态："昨天我将赢你，今天你已经赢过我了？"我八岁了。透过她闪亮的裙子，我看着外面的台阶，等待着下一轮熟悉的风暴，湿漉漉的石头味道，还有她那副玩破了的扑克牌，她内心夹杂着不满和中世纪的疯狂，将纸牌弹向我。虽然我父亲喜欢潘小姐，但我们家并不欢迎她。

英国没有台风，我在想。四十年后，我站在利物浦外我外婆的墓地前，用温特伯勒先生的亲戚敬献的束束鲜花和玻璃纸擦着我黑得发亮的皮鞋，现在，他们正在撒着他的骨灰，而我则想着我们家族的隐性基因，这一点已经体现在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身上了。他们告诉我，外婆在香港办女校的时候，先是雇温特伯勒先生做清洁工，后来又雇他做体育老师，现在他已经安息到了她上面，他们安息的城市正是他的女校长出生的地方，也是他的先人许多年前在船上辛苦劳动，将她带到中国的地方。英国没有台风。我离开香港时，我听到他的侄孙奥伯龙说过，他的漂亮的女儿们告诉我是魔鬼缠身，这些魔鬼会偷走我的思想。

请保佑我，温特伯勒先生，因为我前面的路还很长。

利物浦只有小雨，我一边参加着葬礼，一边想着温特伯勒先生对我的好处，两位面无笑容的亲戚戴着太阳镜，将剩余的骨灰撒在小路上，他们谢谢我安全地将他护送到这里。他们爬进汽车，也不让我搭一下，于是我拨开我外婆墓上的杂草，坟顶的造型犹如天使，我清掉上面的鸟

---

① 舞蹈病，又称风湿性舞蹈病。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常常隐匿起病，但有明确的病期，以无意识、无目的、非重复的动作为特征并且消退后不留神经性后遗症。

屎，小心翼翼，尽量不要惊扰温特伯勒先生。我喜欢打扫。我生下来就是个清洁工。我在潮湿的草地上跳了一个快步舞曲，衬衫下还塞着我母亲给我的四十英镑，嘴里衔着一根草茎，眼睛盯着警车最后一次在墓地转悠，然后躲进当地一家酒吧要了杯酒，顺便询问是否有船可以带我回去。我舅舅给了我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一家已经拯救了我。回来吧，他在电话里说道，回来吧。

台风。台风的中心死一般寂静，我感到呼吸困难，给带回到了东方。

节奏自由

在伦敦，你手头拮据。

你没用多少时间就将温特伯勒先生安顿在了利物浦。

你跟贫困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但是此刻不是思想或文字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肚皮温饱的问题，这样肚子可以感觉到信心，而不是空气、痉挛和空洞的宇宙。

你很节俭，甚至想切掉你的声音，将其切割成碎片，不用标点符号，这样，即使自尊的语法也飞出窗外。

大多数凌晨你都在公园的小路上，设法在警察面前谋生。

你觉得你的贫困给树木带来了福音，他们说。

你抽空抬了抬头，寻找栗子。

中国有句说法：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

只有一心专注于吃饭的人才知道饥饿的痛苦。他们理应知道。

你偷偷溜去看电影。

观看跳越剪辑。

勾起了别人的记忆。

你走进属于你姨妈的中国餐馆寻找工作，感到可怜但却没失信心。

老太太不在，但是她的孙子听了你的故事。

他站在那儿，抽着烟，他身着阿玛尼的皮夹克，脚穿高缇耶皮鞋，摆弄着电脑，电脑上展示出如何谈下伦敦的各条街道，记下每个外卖和

顾客的地址，然后通过问讯调查和优惠券，捕获他们的年龄，职业，或许还有他们的收入，用不了多久，他就得到了一个清单，可以卖给税务局，或黑社会，或三合会，或《读者文摘》，然后他就会从这份工作转到房地产中，就像他的舅舅威利，拥有许多公寓，还有一艘集装箱货运公司，最后，他问你是否有车，然后连看也没看就说：

很可惜。因为我是一名送货男孩，无论是什么工作，男孩都真的需要有辆汽车，听说过有谁不会开车的吗?

时间就是金钱。一英寸时间就是一盎司黄金。栗子。我靠栗子为生。

他已经看出，你干这份工作，说这些谚语，你的年纪太大了。

他很抱歉你落到这步田地。

百鸟嬉春[1]。

他耸了耸肩膀，你离开了。

不知怎的，你没有驾照，没有夜班工作许可，却夜间驾驶着微型出租车，躲避着珍宝大熊猫，而且酗酒。

你携带着一排清洁剂。

时不时地一些廉价的情侣坐在车后面接着吻，你随着做爱的节奏，开着车在现在已经熟悉的街道上绕来绕去，直到他们让你停下来，或一帮光头仔打破风挡玻璃，这时，你扔下车赶紧就逃，省得再去惹当局。

后来，你母亲在澳大利亚不知怎的听说你身无分文，于是你的同父异母姐姐就在男士寄宿公寓用了个破电话机给你打了个电话，是她说服你母亲给你送了两千美元，因为这还不算一笔大的数目。你的同父异母姐姐说这些天她有些迷信，因此，也许对你来说一百元更好些，这有点夸张。

于是你在寒冷而空旷的伦敦广场上来回转悠，等待另一家餐馆开

---

① 摇滚歌曲名。

张，看他们需不需要人洗碗，一道令人难受的光穿透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纳尔逊塑像上空的乌云，你在想你从未乞讨，也没更多的奢望，运气依然是运气，现在有了水果就吃，省得烂了以后再去压榨。

你父亲的方式他父亲的方式也是那些先走之人的方式，他们知道舒适的生活取决于一种浮动费率制：今天在这，明天就到天堂。

就像你熟悉的城市。

就像你胸中积聚的上海。

在上海，时间总是被抢，或放缓或加快。

在上海，你父亲说了一句有名的话：过去的唯一用处就是能从中找到未来。

被偷走的时间。

他向你展示如何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标点如何会带来音乐的天赋，将你带出困境。

30 年代，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这些穷困潦倒的文人漫步在上海街头，来自明斯克、身无分文的教授，书读的太多，连狗食都不会卖，他们在人行道上排成四方，书写他们的生活，而别的人则在上面玩小孩子的跳房子游戏。

于是你吹了个口哨，用粉笔在人行道上做上标记，时不时地会有硬币像下雨一样掉下来，有点时代倒错的感觉。

来自天上的硬币……

建筑

最常见的记忆系统就是建筑，虽然也有例外。

弗朗西斯·雅茨[1]，《记忆之术》

威利舅舅给我在尤斯顿的寄宿家庭打了个电话。

回来吧，回来吧，他说，像个教皇一样。他正准备去美国动手术。他没有时间，但是却突然想到我们可以帮他看家。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吗？

如果有人帮你，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那么你知道你就得回报。所以不要老是感谢。让恩惠成为未来计划的一部分。我很怀疑。为什么我舅舅要我住他的黄金别墅？他可以雇十几个助手、安保和辅警来保护他的财产。他给我送来了他的磁卡钥匙和报警信号码。住进/住出的日期。还有租金登记簿和我要收集的财产清单。

在从伦敦起飞的飞机上，我感到压抑。可能是缺氧吧。到了香港的启德机场，真是人山人海，我路都走不稳，一切都在摇摆，诈骗者，兑换商，出租车长队像蛇一样蠕动着。我一直沐浴在瞬息的洞见之中：人生皆平凡，生命多苦难，我成天碰到的都是些亲戚，不是带我到医院，就是带我到墓地，或者过一种毁灭激情的生活，最终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斯特拉在郊区所选择的一样，将打折的卫生纸放进走廊的碗橱里，开着保时捷缓缓地穿过城市拥挤的交通，一脸冷漠，

惹人羡，遭人恨。深夜，她开着车子轰隆隆地驶入车库里刺耳的混凝土地面，或和另一个情人去另一个肮脏的天堂之路，途中穿过灯红酒绿的垃圾巷，幸运的是，车子转错弯时，她并没有挨打。

天空中光线强烈，污染密布，一副病态，跟地狱差不多，一幢幢房子看上去也像橡胶似的。我紧紧抓住扶手，豪斯曼②的一首诗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什么时候死亡，消除我父亲犯下的过错？家族两边都有不好的血脉。我倚靠一堵矮墙上，擦破了小腿。没人来帮我，一个女人想推着一辆手推车从我身上经过。

* * * *

我在威利舅舅的家里苏醒了，黄金别墅，这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豪宅，正好俯瞰着香港。过去这是我外公的房子。我从山上的饭店里要了三道菜，将账记到了我舅舅的名下。恢复自我，我很好。我寻找着过去的记录。在图书馆里我找到了大量的医学书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率先使用整形手术。在此之前，既没有需求，也没有面部创伤去证明其合理性。在我舅舅的屋里，我看到了一本论述这些早期技术的书，里面穿插了很多照片：这些前后快照记下了那些扭曲的脸，像洞穴一样的眼窝和失去的下巴。我记得有一个人嘴唇有点问题，他们说嘴唇是最难修复的。为了不让嘴唇看上去古怪，用于嘴唇上的皮得从身体的其他部位移植。他们首先尝试了肠子，很紧，紧得嘴巴看上去像香肠。口风不紧船舰沉。他们渐渐地改进了这一过程。最匹配的部分来自括约肌。

我舅舅威利在遭房客泼酸之后也做过类似的手术。但是我觉得第一

① 弗朗西斯·雅茨(1899—1981)，英国文化史家。

②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1859—1936)，英国诗人和古典文学学者。

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手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他这抠门的嘴唇让他变得十分谨慎，也花了他不少钱。我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了许多整容手术的书，这个书房一直锁着，但是用他给我的磁卡钥匙，我可以轻易将它打开，我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等着某种内部报警系统将我耳膜击穿。我在设法打开门锁的时候已经在前门给击过一次，当时，我站在那儿，惊奇地看着舅舅给我留在壁橱里的泰亭哲香槟，忘了解除系统。

当然，威利舅舅多次挨偷。他和我婶婶卡诺拉离婚之前，就有小偷夜间光顾，当时，他们两人在各自的房间里已经醒了，五个蒙面人一起登堂入室。他们将威利和卡诺拉捆绑起来，将房间洗劫一空。事后，卡诺拉变得无法控制。她公开指控他为了保险而有意安排。她去电台，给报纸写专栏。她说他从未给她办过一场体面的婚礼；她想要的是唱诗班和游艇，而他们所做的就是飞到拉斯维加斯，而他就坐在那儿，跟女服务员眉目传情。他是一个吝啬鬼，一个大屁股的通奸鬼。她变得出口粗俗。甩掉威利就像下棋一样，她说，出手前需要动很多脑筋。制作人学会了及时按下红按钮，但是有段时间，她很受听众欢迎。有人甚至打电话，说她不去渔人码头了，因为空气中的硫酸盐更好了。她的精神病医师买来了秒表。威利舅舅说起了她酸味很浓的刻薄语言，很快，我让酸给搞糊涂了。

现在一切都换掉了。手段十分狡诈。涂上金粉，而非镀金；玻璃点缀，而非钻石。房子闪闪发光，像个便宜的妓院。但是如果你仔细观看，你会看到财富，看到原来设计的辉煌：悬桁房像一把扇子舒展在水上；铺满石块的楼梯上空是镂空式天花板，嵌入了灯光，走道上空是华盖，石板地面，内嵌式的书架，还有壁炉。所有的装饰都很轻柔，但不是这儿的东西太大，就是那儿的东西加了密，其价值无法估量。柚木箱，象牙台灯，还有那些古书，其价值只有那些深受尊敬的小个子老头才能理解，他们留着山羊胡子，头戴土耳其毡帽，两腿交叉，坐在殡仪

馆后面，那些殡仪馆闻上去就像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羊皮图书馆。

我在分配给我的房间里找到了十足的朴素：一张床一把椅子连写字台，一扇面对山坡的窗户，一本老字典，还有一台更老的奥利维蒂打字机。钥匙用起来马马虎虎。书架上的那些文件不值钱，很薄，也没水印，就是学童们放假前不情愿买的那种。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有一本厚厚的租赁账本，在交钱晚和困难户边上打着星号。我把它放在边上。我不想在奢侈中承受焦虑的压力。然后我意识到，奢侈和焦虑总是孪生在一起的，就好像黄金别墅总是将好客和恐惧联系在一起一样。威利舅舅常常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帮我的情人吴凯鸣拿到了香港的护照。

有一架管风琴，厌倦的时候我就在上面练习巴赫，它的假管给固定在石墙上。接着奥利维蒂打字机的键盘卡住了。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我喋喋不休地唠叨着，就在自我不再在文字之汤里吵闹的时候，黄金出现了。这种省音包含着家族的特点和对位音。但是积聚的同时也有玄学的一面。

你不想做包打听，但是有些事情你却无法不注意。一张一张的书法，有王羲之的草体；有饱满的行体、笔触后拖、下笔很快；有俞和的印章和隶书，有林纾的方块体，一横一竖都很饱满；还有吴琚的行书。威利拿这些纸做晚宴聚会的桌垫。他的美国合伙人就喜欢这种噱头：重新发现的文本；难以渗透的象形文字；丢人的墓石。

但是中国的书法就像是一把利剑，它必须完美，没有其他选择。

你记得在什么地方读到，1957 年情人节那天，百花运动开始，市立图书馆遭到洗劫。有人看到，一个残废的乞丐正艰难地爬上百老汇大厦[①]的屋顶，这是上海最高的建筑之一。这个乞丐站在屋顶上，浑身是汗，像肥皂泡似的，只见他一边喊着脏话，一边打开好几只纸箱，撕破

① 今上海大厦。

古本书籍，将其点上火，然后再像抛熊熊燃烧的降落伞一样将这些文本抛向了大街。他在绳子上打了个结，然后像猴子一样爬上烟囱，无数张的脸仰着，人们既感到好奇，又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你记得你舅舅威利经常跨越边境，为外公容先生纺织公司里的非法移民安排工作。梅布尔斯也许就得救了。

但是也许我读取得太多了。



这是我外公的唯一一张照片。风华正茂，勤奋好学，他将右手放在一本打开的书上。(他的双手总是十分清洁，有股石炭酸皂的味道。)这是 1924 年，他的无名指上戴了一个金戒指。他紧紧地盯着中国中部的某个东西。

他的眼镜背后毫无表情。我认出那本书就是我在我舅舅的书架上发现的那本。是皮克雷尔写的《面部手术》。

天已下雨。你开始打字，但是你已经想离开。

黎凡特人

黎凡特人：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家和岛屿居民；地中海上的强烈东风；逃债人

我要告诉你这件事，你父亲去世前一个星期说道。他们来自加利西亚王国，在萨拉戈萨的老丝绸市场做丝绸生意。他们靠着信仰每个月要去一次……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的原因……书的重要性给包裹在布里……你只要这就可以踏上这种生活的旅程。要知道生意，你父亲说起这两眼发亮，嘴巴发歪，咳出一块黏痰来。

你祖父？

比他早。

曾祖父？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烦了。

在读了一些材料之后，你将这个家族的传说定格到了15世纪。你父亲讲起来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但是他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回不去了。你告诉他1412年犹太人得佩戴红色的耻辱徽章；他们不能被称为先生或太太，也不能穿漂亮的衣服。最糟糕事的还没出现呢。但是你父亲不读书。他承认他读过的唯一一本书就是大仲马的《铁面人》。他一面读，一面撕。一天，在从九龙到香港岛的轮渡中，他读完了这本书，然后将封面扔到了船外。

你为什么要撕书?

读完了。

但这是一本好书。

那更好扔了。

为什么?

傻爱成金。只有一本书。

你父亲爱上了轮椅，但是只要他想，他依然可以轻快地走路。使用这种支撑大概是基因在作用。他说你跟他讲述的大屠杀故事使他的心绪漂移。

这么说所有这一切都写下来了？他问道。

是的。

你擦了擦他的皮鞋，将他推到商店，然后回来了。他说悉尼的山太多，所以大家腿都瘸了。

注意到手杖了吗?

没有。

我们乘火车吧。

将他弄上火车很困难。月台很大，轮椅给卡住了，而且他还有二百磅的重量呢。

你就不能走几步，让我把轮椅弄上去?

不行。想想造假。人们会盯着我看，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会帮我。碰我。我不需要同情。

在格格响的车厢里，你父亲坐在他的轮椅上，盯着年轻女人的腿。

在上海她们的腿比这些漂亮多了。你为什么不跟你老父亲说话？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真难堪，声音不要那么大。

但是这些女孩的脸蛋更漂亮。头发，上帝啊，瞧瞧头发。乳白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模特儿。每个人都是个模特！请允许我赞美你，年轻的女士。你为一位老人带来了如此的快乐。我没那么危险，危险已经消除了。这是我的儿子……难以想象他为我做了什么。迫害。屠杀。

你等在环线上，直到高峰过去。后来在回家的路上，你父亲睡着了。他可是个重量级。殡仪员这么说道。

他们过去叫黎维，你父亲说。他这是第二次进医院了。

我的曾祖父？

是的，那边家族。黎维，意思是轻微或轻。我的祖母……她名叫塞凯拉……腰间总是围个布口袋。她的戒指，几颗宝石，那种类型的东西。

以防什么？抢劫？

战争。迫害。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会知道。捡起就跑。捡起就跑，她过去经常念叨。你得轻装出行。她会用那只袋子敲你的脑袋，差点没把你打昏。

但这是英国。

他们到处走动。他们经阿姆斯特丹来到英国。他们很穷。他们不知道迪斯雷利①，也不知道蒙塔菲瑞②。

你父亲抽时间来看你。他呻吟着爬上三段楼梯，手上拿着一只炸鸡，一瓶西班牙红酒，去敲你的门，结果你却不在。他想聊聊过去。但是你却看什么女孩去了；犹太女孩，总是犹太女孩，她们的头发染得很

① 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曾任首相(1868和1874—1880)。
② 蒙塔菲瑞(1784—1885)，犹太人，英国著名慈善家、银行家。

漂亮，你心情烦闷，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海滩上，手上拿着香槟酒杯，海面湿热，海水发的都是热光，天空黄黄的，令人昏昏欲睡，渗土后面冒出了植被，传来了昆虫的呼噜声，在这儿，你可以到处看到无知的周末客埋下的排泄物，他们跟你一样盯着那些比基尼女郎，什么吕维卡，托布莎，齐塔之类的，穿着时髦的黑色比基尼，乳头上涂了油，懒懒地舒展着前胸，都是些非常好的犹太女孩，能让她们家族翻个底朝天，这时，你像精神分析学家一样看了一下你的手表，然后说了一声他妈的，其实你忘了，你就跟你父亲一样，和一个女孩在什么地方，就跟他一样，忘记了一切，爬上车后面的山坡，当然回家的时候连个字条也不留，而是将西班牙红酒立在奶瓶槽上，这是他留给你的最后的东西，因为下一次你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手握念珠，进了太平间……没有炸鸡……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利夫，我父亲说。

你能想象，你外婆出生的时候，你的曾祖跟林肯郡波士顿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署办事员说了些什么吗？利夫[1]。你会拼吗？你是办事员，这是登记署吗？艾米丽·哈丽雅特·列夫。办事员将其写成了李。请不要见怪，先生，我将它写成了李，艾米·李。这样拼写容易些。

老柴姆耸了耸肩膀，他的烟斗发出了嘶嘶响声，他透过丢了纽扣的纽口抓了抓自己的肚脐，裂缝那儿，灰色的绒毛从他穿的油兮兮的马甲上冒了出来。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对他那么客气，没有丝毫讥讽的腔调。好吧。这只是一点写作，但是柴姆已经开始制作计划。

圣母马利亚，天主之母，我父亲说，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总是为女性祈祷。瓜达露佩圣母[2]。阿维拉的圣女

---

① 这里作者在玩文字游戏，利夫(leave，离开)和列夫(Leve)谐音。
② 据说1531年，圣母以一个印第安女子的形象显现给一位名叫若翰迪亚哥的印第安人。墨西哥瓜达露佩圣母的显现，带来强大的效应。此后，皈依的人数大增。

大德兰[1]。露德的圣·伯尔纳德[2]。利马圣罗莎[3]。圣女小德兰[4]。这就是我喜欢天主教的原因。但是老柴姆·利夫不会拼；甚至连他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是一名海员，他不必皈依，因为经常在外奔波。在出生证上画了个X，他的手就像铁铲，因长期跟水手和绳索打交道，显得十分粗糙。他们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汉娜·塞凯拉三十二岁。孩子多病。万福母后！仁慈的母亲。你知道那个袋子里还有什么？

什么？

不要说什么。说对不起。

不，我是说袋子里是什么？

《摩西五经》

但是他读不懂。

不是英语。他为什么非得读英语呢？他陷在泥水里，一直没到膝盖，就在靠近威瑟姆河的地方——也叫荷兰地带——他们不想要的沼泽地带——挖排水沟，建码头，慢慢地他开始积攒马车乡绅掷给他的钱币，因为他们从来不付通行税，到了夜晚，他们借助于灯火，种植胡萝卜和大蒜，有时候，他会在河里下渔网，而汉娜则补渔网，准备离开，一直准备离开，他的生活有一半花在了海上。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能驾驭一艘船，看准风向，靠星星航行，而你，孩子，一旦你走出你这么喜欢的这些大城市，你也能做到，偶尔看看这些星星并非坏事，它可以拯救你成天看书所损坏的视力，像我的堂兄阿尔弗雷德，每次请女人出去都要尿裤子。不，我的外公是一个男子汉。后来他寻到了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在用一个巨大的钻孔造枪，你得用带子将它绑到平底船上，开火

---

① 圣女大德兰(1515—1582)，加尔默罗修会再创者。
② 圣·伯尔纳德(1844—1879年)，法国修女。
③ 美洲保护神。
④ 圣女小德兰(1873—1897)，法国修女。

的时候，一次可以杀死三十或四十只鸭子，最后他跟猎场管理员达成了交易——你可以买枪，也可以余生看着我做这事。三英镑是很便宜的。作为奖励，我将离开英国，他说。

上海：最后，我们全家都到了上海，我父亲说道，他从床边的水瓶里给自己倒了杯水。他的运气已经糟的不能再糟了。

在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柴姆已经从一个西班牙系的犹太人那儿听说过上海，于是他就和他家一起去了。不用三思。在船上好好享受一下，过一个有名无实的假日。修补船帆。他们到了之后，他开始雇佣苦力。他没想到运气这么好，这些苦力这么便宜。建仓库。他的女儿艾米丽后来嫁给了博尼法西奥，我的父亲。

列夫家真的富起来了，我说。

只有跟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

我想所有的钱就是这么来的。

不要那么傻。柴姆已经五十多了。你得需要一生的时间才能赚到那种钱。另外，这是在上海。你赚了钱，然后你又丢了钱。他有一样令他喜爱的东西。

芒果。

你的反应真是迟钝。那是家族的另一个故事。

还有什么？

一个漂亮的女儿。艾米丽与众不同。她听上去像中国人的名字让她有了份异国情调。爱米·李。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她皮肤很漂亮，一双眼睛绿绿的，头发是红色的。她真是美艳绝伦。

你是说她没有隐性基因。

瞧，不要自以为是。尤其是你。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前景重现。那就是我，穿着苏格兰服装，我的右边是我的祖母，菲洛梅娜·维迪加尔，我的左边是我的外公柴姆·列夫。他的边上是我的堂兄，阿尔弗雷德。

我们收养了他。他的家人全都去世了，我的家人大多也都去世了。我是由祖父母养大的。在那个年代，人们死得比较早，不是由于猩红热就是由于西班牙苍蝇①。



你是说西班牙流感。

不，那是后来的事情。我记得那天我们拍了照片。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布莱里奥②已经驾机穿越了英吉利海峡……我们觉得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大都快死了，所以只能靠成就和故事来支撑。我们希望有一天，人类也能靠这种手段达到天空。

那么艾米丽·李怎么会赚那么多的钱呢?

她嫁得聪明。码头跟货运联姻。凭她的长相，她可以选任何人。我外祖父母的皮肤都是乳白色的。白得中国人将他们称为白鬼。但是我们家庭的另一边则是混血。等到哪一天你真的不去想它的时候，……天哪!……突然之间，家里冒出了一个黑鬼。你可以看到你的姐姐斯特拉就继承了那些特点。在巴西，没人担心那些事情。

巴西?

你父亲正在打盹。也许他的脑子里在写歌词，曳步舞调，创作音乐，他的终结记录。他穿着翼形盖饰男皮鞋，躺在医院的床上。他想去跳舞。跳舞，你可以进人，也可以离开，还可以即兴写下遗嘱。外边，

---

① 西班牙苍蝇，西方使用已有千年历史的老牌催情药。

② 布莱里奥(1872—1936)，法国早期著名飞行家和飞机设计师。

护士们正在窃笑。

我想吃芒果，他说。

这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没办法用箱子从马尼拉托运，这是他父亲过去的做法，也是他祖父的做法，或许也是他曾祖的做法。家里到处都是芒果。芒果和探戈。

夜都那么深了，你让我到哪儿去弄芒果，而且还在这?

你一向就没有理解我。在外边，我可能看上去软弱纤瘦，但是在里边我依然可以打掉你的牙齿。这就是我的想法。

有时候，老人会在没人看他的时候下床，穿着睡衣，来到赌马厅。

千万不要忘了弥补损失，他说。

精彩的遗言。

你父亲又昏迷了。你从他手上取下念珠，将它们放到他床下的航空包里。医院的臭味。隔壁床铺的一个男人冲你晃着水壶。然后他停了下来。在你父亲的袖珍手册里，你发现了你拍摄的照片，于是飞快地将它们放进口袋。隔壁床上的男人喉咙里发出了咯咯声。你告诉护士：那儿有个人要水。他大概要死了。是的，我们知道，护士说。我们都要死了。难道就没人跟他?但是护士看着你，好像你不应该告诉她如何做好本职工作。也许他的胃有问题，或者喉癌，还有，你戴的徽章错了。将军队带回家。在你的手上有种普鲁斯特般的东西：一个哮喘故事，融化的时刻，一首跟你有关，而且只跟你有关的歌曲。在悉尼，每到下午，灯光会变得十分残忍。

护士使劲看着你。她看到的是一个怪人。每个人死得都很孤独。但是死者不知道这点，还为生意到处旋转，只有你悲伤塞在瓶子里，扯着嗓子在这儿大叫。你的同父异母姐姐很快就到了。我敢打赌，如果你还在这儿，那么就会为遗嘱问题争吵。

打赌还没开始你就输了。冬风吹进病房。你看到他们像秃鹰似的进入过道，四处寻觅着，他们拉了拉外套和披肩。

你连你随身携带的书法纸都没拿走。

该在宗教审判之前离开了。

丢掉幻想，自由走动。

随后传来了声音：

黎凡特人！

遽变

在这场遽变中，我的叔叔梅梅和我推测着我们家在这场宗教裁判中的作用。

在古希腊语中，遽变意味着转向，命运的突然转变，转好或转坏。也许还可指逍遥派，那种一边走，一边聊的哲学学派，产生新的思想，转变事情的方向，然后再回到自己身上。卡斯特罗家族总是在一边走，一边聊，而且事情也总是在发生转变，有时候变好，但是大多变坏①。他们从不待在一个地方。这种状况一直追溯到艾萨克·德·卡斯特罗。他也是一个步行者，聊天者，适应者和转变者。

1626年，艾萨克出生在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累西腓。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那是西班牙宗教裁判的年代。

我十岁，戴着角质架眼镜，穿着鲨鱼皮衣，正听我叔叔梅梅说话，他是我父亲的堂弟。我们坐在阳台上，阴冷潮湿，香港正经历着最冷的冬天。悬铃树叶散落在印花砖上。梅梅叔叔患了三十年的肝硬化，一直说要死，这一次看来真的有可能了。他得卖掉这个地方。他们在喝着红酒。我父亲就坐在玻璃门内的钢琴旁。他能够闻到一笔交易。倘若他开始……又怎么办呢？

他们将他们称为皈依者，梅梅说道，就是成为天主教徒的人。在葡萄牙殖民地，要想日子过得好些，就得选对宗教。

1643年，累西腓若是这样呢：碎浪，讲西班牙语的行政区域从老城奥林达及北一直向南和西延伸，山上的图皮族印第安人看上去憔悴，遭到猎杀，山中冒出烟雾。宁静的棕榈树，翡翠绿水，潮湿的海滨地区，还有远处微微发光的暗礁，海风中的海市蜃楼，椰贩子用手护住眼睛，抵挡耀眼的阳光，盯着海港那儿的荷兰军舰在培训岸上的炮兵。抵抗战士浑身盔甲，沿着卡皮贝里比河两岸，脚踩粪便和泥泞，咯吱咯吱地进入了城市。猪发出了长声尖叫。孩子们尖叫。锣鼓在敲。荷兰人入侵以来，已经打了十三年的游击战。从嘉模堂区到拿骚桥，女人们合着爆炸声，掀起她们的裙子，露出她们的乳房，表示抗议，她们呜呜哀鸣，跺着木屐。霰弹飞溅，男人咆哮。在边道上，医生们正用水蛭治疗发烧病人，用树脂治疗受伤病人。面有菜色的牧师正在脱着衣服，手上拿着标枪前行。小偷们守着拥挤的人群两侧，使劲拉扯着鼻环，耳环，脐环。路障向上。一群荷兰卫兵正端起步枪对准闹事的群众……

在靠近圣佩德罗教堂的露台广场，艾萨克·德·卡斯特罗正在和美丽的伊莎贝拉·博瓦·比塔跳舞。他从一个古老的奴隶礼仪中创造了一个新舞，跳起来十分吃力，这种舞步要像一头弓着腰，发着呼哧声的公牛，一个在无烟燃烧的火山，一场屠杀。这是一种传递，一种斗篷的传递，一种内心魔性的驯服。伊莎贝拉跺着脚，裙子飞扬，艾萨克的头发挡在自己的眼睛前，他们的脚跟合在一起，给古老的旧石器带来了火花。但是伊莎贝拉不是在为他跳舞，也不是在为正在观看的男人跳舞，而是在为汇聚在这儿的黑人女人跳舞，她们还知道另一种舞步：滑步，抵抗的怒火。人群大声鼓励，荷兰的炮弹爆炸，灼热的星星溅得广场到

---

① 1888年，夏尔科提出了"逍遥自动症"和"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理论。——作者原注。夏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学家，以其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闻名。西格蒙·弗洛伊德是他的一个学生。

处都是。山上的图皮人看着，患有结核的肺里吸进了古老的烟火，渐渐地，城市变得眩晕，旋转，沉寂。山下，葡萄牙游击队开始撤退，河边的人群开始回家，大家都在议论，有必要再找一天打击荷兰人，不打无准备之仗。

只有米格尔·纳瓦罗，一个卡波克洛斯人，对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黑人和印第安人的血感到快疯了，嫉妒和生气得七窍生烟。

如果有些礼仪含有侮辱性的东西怎么办。推推搡搡挤向前。后来，由于卫兵已经爬上了路障，抽打那些滞留不走的人，因此，两人同意第二天日落的时候见面，就在礁岩对面卡皮贝里比河边空旷的海滩上。

伊莎贝拉·博瓦·比塔绝望地回了家，她热爱的那个男人已经从舞蹈家变成了无赖，他们的结果总是如此，最终不是死亡就是为了荣誉而遭到伤残或关进监狱。荣誉。她不知道为什么荣誉会这么重要。

如果到了第二天，米格尔·纳瓦罗和艾萨克·德·卡斯特罗在河口的海滩上见面怎么办……卡波克洛斯人满脑子都是巴西的民族主义，而犹太人则会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荷兰人——至少在荷兰没有宗教法庭……海浪撞击着礁岩，不断盘旋，越来越强，形成深绿色，然后是黑色，最后才喷出泥泞似的泡沫。艾萨克摘掉斗篷，感觉到后背上的凉风，他将斗篷交给他的弟弟邦法，他黑色的皮肤和宽阔的胸脯跟艾萨克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在柔软的沙滩上找了一个较高的位置，听到了身后山里传来的伏都教的鼓声。他的心直跳。他们抽出弯刀，彼此敬了个礼。

我父亲为我倒了一小杯红酒。你需要血，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说。会发生什么呢。设想一下……

设想一下，穿过暗礁，穿过酒一样暗的海和血红色的海洋，在蛋糕般葡萄牙法庭的地下墓室里，拉毛水泥做的地下墓穴，蛋糕一样的葡萄

牙法庭，布拉干萨前公爵约翰四世疯狂地进行造反，想彻底消除葡萄牙境内的所有西班牙人和巴西境内的荷兰人。设想一下，他戴着戒指的手伸出貂皮袍的袖子，轻轻敲一下他的助手的驼背肩膀。强化减少，他说。我怀疑这些皈依者是这些造反的策划者，和荷兰人一起，培植了私兵势力，干些秘密勾当。如果我们要解放奥林达，我们首先得消灭内部的叛徒。

Diminuição，我叔叔梅梅说，是一种放松；部分免除处罚……但是只有在上帝的眼里。这听上去容易。他将脚放到长软椅上。但实际恰好相反。

十足的书生，我父亲吃吃地笑着，双手演奏着"这并不容易"，他像贝西伯爵[1]一样用右手指尖弹奏着音符。他打开钢琴的前盖，给湿气重的琴弦调音。双层巴士嘎吱嘎吱地爬上山坡，排出蓝色的废气和令人痛苦的发动机的味道。我想到了拖拉机，想到了羊毛剪理捆装场和集水沟，正是从这些集水沟里，那些袋鼠蹦蹦跳跳冒出来，像钢琴槌一样波浪起伏。澳大利亚。这就是他们要送我去的地方。雨下得更大了。假如在记事本上做些计算，我父亲说道，假如……

假如国王约翰四世不是因为助手的荒唐和匆忙而推迟关闭暴风雨来袭的窗户，假如我们跟荷兰人交换一些俘虏，国王说道。我们需要争取一些时间来和英国结盟……不要忘了将我的女儿送到查理那儿。他在法令上撒沙子。放掉超额部分。于是，就在那一刻，在累西腓的海滩上，艾萨克·德·卡斯特罗从第一次的打击中就感觉到米格尔·纳瓦罗比他强多了，他用剑头将沙子弹到他身后的风中。纳瓦罗眨了一下眼睛，结

① 贝西伯爵(1904—1984)，美国音乐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爵士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果就遭到了致命一击。

你最好跑掉，艾萨克的堂弟说道。向南跑，跑到荷兰人追不到你的地方。

假如这不是他不得不怕的荷兰人。

他们在巴希亚外一家糖料种植园里抓到他正在打蛇，于是将他带回累西腓。他们将他投入监狱。真的，还不算太糟；还不能算是地牢。他们一周换一次稻草，并允许伊莎贝拉一周探一次监。可怜的伊莎贝拉·博瓦·比塔，尽管她的名字跟这个地方有很大关联，但是她依然生活在臭烘烘的礁湖旁一个破旧的房子里。

更糟的是，假如她怀了孩子。

艾萨克在监狱里变得十分憔悴。在那里，透过地板上的一个洞，他恢复了他的信仰，日夜聆听着地牢里的一个老头背诵犹太法典。他感到了石头带来的颤动，晃动着自己的身体，他闭上眼睛，看到了红海。通过地板上的洞口，犹太牧师为他们证了婚。第二天，他们将艾萨克·德·卡斯特罗押到一条驶往里斯本的小吨位轻快帆船上。

他们用链条锁着他，将他带到葡萄牙法庭，身穿白衣的宗教法官仔细打量着他，力劝他忏悔，不是因为谋杀了卡波克洛斯人，不，后者无足轻重，而是因为犹太性，是这种犹太性驱使他去谋杀和造反。造反?艾萨克·德·卡斯特罗并不反对荷兰人，目击者说，事实上，他有数千名同胞正在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保卫领土、保卫家庭，保卫更加辉煌的路西塔尼亚血脉，它流出来的是种暗红色，就像最为昂贵的波特酒一样。事实上，他当时正在跳着孔雀舞。跳舞？是啊，这本身就是一种造反！对，就像我们所说的。他正在举行一个秘密犹太仪式，在这种仪式后，他们会将男孩的血洒到正派市民的门上，恐吓他们去支付房租。

总检查官唐·曼努埃尔发红的眼睛盯着艾萨克光滑的前臂，艾萨克此前见识过这种类型，他们将各种繁文缛节藏在法衣背后，只知道审问，或飞快地瞄一眼别人脱裤子，好奇地巡视着走廊，虔诚地绞扭双

手，将这种荒淫的检查解释为是对信仰的一种忠诚，是对灵魂的一种健康研究。唉，他见过这种类型，他知道，对于待在孤独的房间里，无声无息，充满了哀伤的灵魂来说，残忍只能是一种令人伤感的伴随物。

过来吧，你跟他们不同。跟真正的教堂和解吧。

年轻人一声不吭。

你可以选择。和解或给绑在柱子上给烧死，让我提醒你一句，这意味着可以部分免除你的罪刑……但这只是在上帝的眼里。

检查官的胡子上喷满了口水，并且因为语调激烈，不断颤抖。在他动脉硬化般的想象中，他看到他的女儿躺在那些强健的大腿之间，遭到了强暴；看到他的那些睡美人遭侮辱时的狂喜，她们就在这种接连不断的耻辱画面中醒来，而她们的父亲还像吸食了毒品一样酣睡着，在她们上空盘旋；看到她们的嘴唇在温柔地亲吻着……她们不用教就将这种吻送给了他，哦，这些女儿！掀起她们的裙子，展示，噢，邪恶啊！她们的皱褶潮湿、兴奋，闪着银色光泽，哦，上帝啊！难道犹太人就是用这种淫荡的跳舞符咒来镇住每一个人吗？这种想象就像洪水一样终结了他的理想世界？他在跟其松软的灵魂进行斗争，在跟其耀眼的白色法衣进行斗争。宗教裁决难道不是为了上帝更加伟大的荣耀而对这个国家进行的小心净化？他很想认识那些反基督者。他只想听到他好色的闪族敌人的痛苦呻吟和尖叫。

假如这构成了上帝的声音。

艾萨克一言不语。据说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自我流亡到了圣埃斯皮里图。在那儿她变得十分憔悴。内心还保存着被告发明的那个秘密舞步。

秘密一词给了检查官一种肉体上的颤抖。

说吧。你还得考虑一下妻子和孩子。

我没什么好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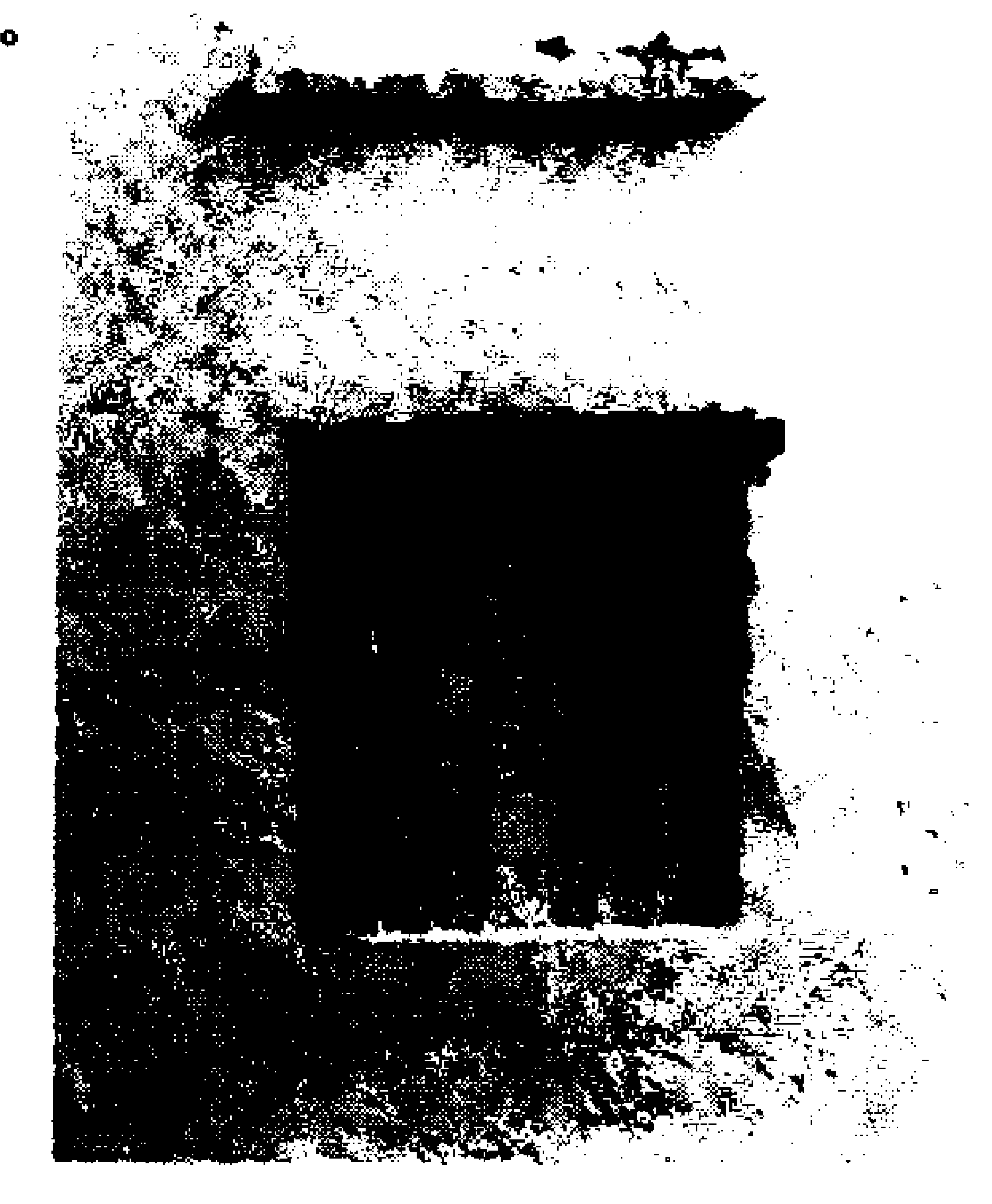
好吧，好吧，好吧。那么开火，愿上帝拯救你的灵魂。

他们直到12月才把他带向火刑柱。风正不停地回应着一个不同寻常、顽强抵抗的秋天。就在他们将他绑在一根粗梁上时，一阵怒号的大风平地刮起，将树枝吹倒在被行刑者的脚上，于是无法点火。从早上就开始为减刑而奔波的人群很快就变得不满起来，他们拖着脚步离开了。他们知道，除非在犯人后面构筑一道防火墙，防止大火在全城燃烧，否则火刑那个冬天就无法执行。他们是对的。卫兵们很快松开犯人的绳子，将他带走了。但是唐·曼努埃尔以及贵族们并不开心。头发灰白的惩罚者坐立不安。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法庭里搞一个火刑，来消除我们的怀疑，让我们的贵族欣喜一下？一种室内场面。

要是1647年12月6日，艾萨克·德·卡斯特罗在法庭开庭前给烧死了呢。国王负责。这是一种有趣的减刑。能够听到的只有咆哮的火苗，劈啪作响的木头和微微爆炸的脆肉，其味道徘徊在院子里，走廊上，和舞蹈的秘密一起给带走了。

我父亲还在演奏，淹没了我头脑里的各种声音。这些声音是我的遗产。你这地方需要些光线，我父亲对我叔叔梅梅说道。敲掉一些墙。这地方像座监狱似的。顺便说一下，我确实需要一笔贷款，送我儿子出国。十来间房子你只要用一间就够了。

儿一间地下室。



再描绘一下：在大海那边，一个很小的婴儿卷曲着手指，开始哭泣。在圣埃斯皮里图，伊莎贝拉·德·卡斯特罗幼小的孩子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无声地哭泣着，而他的母亲那天早上已经盯着他看了一百次。是的，她的眼睛没有欺骗她，尽管最后几个

月她还想否认这点。她用一块小的蕾丝手帕轻轻地擦着他的脸，看到阳光和阴暗同时照在他的皱纹和皱褶上。没错。

描绘一下。想象。假如。如果她孩子的皮肤是黑色的怎么办?

骚乱

派对客总是称之为解放。派对客会告诉你中国从未有过革命……革命总有赢家和输家，循环往复。你外婆称之为战争，战争总是带来最不计后果的精神聚会和整个一代的失败者。

就这样，我的中国外公维吉尔·容出场了，他身板挺直，个头很高，迈开大步，三件套西服外又穿了件十分古怪的女式灯笼裤。他这些衣服是从哪儿来的呢？

那是1912年。

想象一下即将成为一个共和政体的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关键词。为了实现现代性，你还得西化。你剪掉辫子；穿燕尾服……裤子外边再穿灯笼裤。这不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人热衷的吗？维吉尔·容在一篇报纸上写道。1911年，在重庆，这成为最新的时尚。

既然家庭两边都有同父异母姐妹，因此，你在听双方的故事时总是十分谨慎，就好像是为了掩盖客观前提。然而，这些同父异母姐妹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同。

你的同父异母姐妹斯特拉就说过，你外公是一个变态者。他迷恋女人的内衣，喜欢足部按摩，你知道。

足部按摩？

是啊。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抚摩和闻裹脚。他一次也没有见过女人。他们互诉衷肠的时候是坐在一个屏风后面。



斯特拉说起话来带股印第安腔调，她摇晃着脑袋，表明她说的是真的。

但是后来，斯特拉……她穿着高跟鞋的时候差不多有一百六十二厘米，有一次，她将门开着，穿着高跟鞋，一丝不挂，两脚叉开，双手放在胸前，背对着你，通过穿衣镜，你瞥见了一簇黑毛，这令你始料不及，颇感惊慌，你一连想了好多天……斯特拉白天在香港的永备公司工作，晚上在九龙的美丽华酒店唱感伤恋歌……斯特拉拼命挤进裙裥豁开的中国旗袍，和韩战中出来度假的美国水手跳舞……你应该了解斯特拉，她只是在脑子里想着性……她应该最没有权力指控任何人变态。

那么我们来看看维也纳，来自中国容姓家族的一个同父异母姐妹。这么说吧，维也纳说，他穿着长袍成天晃悠，什么也不干。财产很多。有钱人。后来，他碰见了一个叫孙中山的人，人很精明。很精明，我跟你说，胡子修剪过，也穿长袍，他想解放中国。现在，外公告诉我一个大秘密。他是军阀的儿子！还有这个家伙，孙中山，他想统一中国，他需要合伙。

合作？

不是。他们开大公司，你知道。于是外公成了一个大人物，只是他当时还不是外公，因为他还是一副花花公子打扮，穿着燕尾服，那种事情。外婆嫁给了英国人，只有她爱维吉尔。她不谈他，但是每个人都知道。重庆是个小城市。非常有趣。维吉尔的父亲安排人谋杀英国丈夫，但是没有成功。

谋杀没有成功?

是的，这么说你学会英语语法了。寄宿学校的大人物。但是你对故事一窍不通。

我想哈里去世了。

没有，孩子。他没有。现在我们产生了三角恋爱。

发生什么了?

但是维也纳跑出了她豪宅的门。她嫁过一次，有五个孩子，现在她在恋爱，但她告诉你她根本不喜欢男人。

* * * *

哈里·西德尔没有死，依然躺在重庆边上那个寒冷而潮湿的山坡上，他身上的冰开始融化。他的轿夫回来打劫他，但是他们看到他在蠕动，听到他在呻吟，他们刺了他一下，然后争论着该怎么办。最后他们同意将他带回来，求他奖赏，但是等来到了第一个村子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到了村子，当地的草药医生护理着伤口，清洗好伤口后再用滚热的树脂和切好的特种草根把伤口堵住，然后，为了给他注入些阴气，就用芦苇管喂了他些燕窝羹，为了凉血，又把菊苣、薏苡、马齿苋和绿豆搅在牛奶里喂他。哈里没有好转，但也没有死。话说出去了，三天后，他们将他带过来。在基督教青年会，有一个加拿大医生，他清洗了伤口，拔出木头碎片，割去坏死的组织，敷上硝酸盐和铋。哈里一会儿昏迷，一会儿苏醒，多拉护理着他恢复了健康。维吉尔跑腿，洗毛巾，煮开水，三个星期之后，哈里停止咯血，看上去睡觉也更好了，并且张开了眼睛。她用床单和毯子把他包好，好驱走他的高烧；她一天给他换三次敷料，防止生坏疽。她像把孩子包在蚕茧里一样包裹着他，生怕他遭到冷风吹，实际上，冷风已经从山上铲起了尘土，扫到门下，进入了窗户缝。他根本就一声不吭。他对周围没有任何反应，只用调羹吃着猪肝和

蛇羹，一边吃，一边滴，维吉尔说他理应吃这些，因为他的猫受虐待时他就给它们吃这些。多拉每天都给哈里读字典，而哈里则茫然地看着她。甚至连口型都不做一个。哈里又变成了孩子，嘴唇上流露出淡淡的微笑，眼睛盯着中景，寻找着他眼镜丢失前曾经看到过的形状。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了，只是欢快地看着维吉尔放老鼠夹子。

外婆？

我们眼睛瞎了。我们眼睛都瞎了。瞎眼的想法遍及每一个人。

外婆！我割破了自己。

我在拉着铅笔做的箭头，铅笔上附了一把锋利的刀片，回拉的时候割破了我的食指。刀尖卡在我父亲放工具的木头箱子里：一些旧的螺丝起子，保险丝，拔钉锤，造型像铸铁管。我伤疤还在，天一冷，写起字来就疼。那是我日后生涯的第一个标志和提醒。这是一桩血染的交易。我外婆清洗了伤口，并用一块真丝将它包裹了起来，然后将我的手臂竖起，让它止血。我的手指指向天空，风吹而来，布条飘动，发出呼呼叫声。

到了月底，1911年的革命已经开足马力。在一次共和会议上，维吉尔·容背叛了他的父亲，军阀及其扈从退到山上。这注定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圆石子路上，狗尿冻成了白色。基督教青年会的供水管给堵塞了，唧筒柄变硬，一动不动，他们只好派一个人下到永远也不会冻的井下，在他腰上围了一根绳子，让他劈砍冰和淤泥，两个小时后他上来了，跟死了一样，他的下巴发蓝，浑身颤抖，身上全是幼蚊和污水。他找到了问题：去年夏天，哈里安装的新马桶管子给接到井里了，而不是河里。没人知道原因。工人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种马桶。他们大概还以为这是喷泉或洗手盆呢。所有这些金色的杠杆、铜管和装置都有一种神秘，或许还有种宗教含义。说到底，厨师是在他自己的卧室里烧饭，让厨房保持一尘不染，他看到多拉跪在床下打扫。这就是虔诚，这就是白

鬼崇拜的地方。厨师暗中监视着她的情夫，教军阀的儿子如何说写英语。他看着他们，并告诉所有想听的人他们坐得有多近，他们是否触摸了对方。

风吹尘起，尘土盘旋，很快，事情清楚了，实际上，这是其中的一个军阀在山上积聚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次袭击。他们第二天下了山。外婆正在擦洗地板。她从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她说我太年轻，不该听这些事情。你得等才能找出事情真相，她说。等到风暴结束。

识骨寻踪

帕萨(Pasah)（希伯莱文）：忽视，宽恕；一瘸一拐地跳舞。

1651年3月10日，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四岁。

他和他母亲伊莎贝拉住在小岛上一个牧人小屋里，这个小岛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岸。她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她的皮肤上留下了疤痕，头发也失去了光泽。人人都说他们过的是一种节俭而艰难的生活，与岛上的其他居民没什么两样，不过伊莎贝拉编织纺布的天赋要远远高于其他的寡妇，退潮的时候，她看到她们在收集浮木。这个孩子也与众不同，哪怕是他黑色的皮肤和鬈曲的头发。从一开始，母子俩就与众不同，宗教奇怪，礼仪罕见。

小伊斯雷尔还很年幼，记忆和自我意识突然之间将时间前推，他开始了一些秘密举动……寻找东西……在洞里，在藏身地，在洞穴里，在木头箱子里，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骨头……想反复考验一下记忆，看是否能将它们退回到时间里，从而可以断然地说，在变化着的世界里，它们依然不变。石头和骨头是持久的。他可以让自己变小，甚至比他实际的样子还要小，小到可以一下子消失，一连几天看不见，而他可以看到很多，眺望着夜晚，一双眼睛像美洲虎一样开阔。他的母亲教他认字。她天天拿出一本书，教他认字。到了树林里，他会将事物跟文字对应起来。如果一件事找不到对应的单词，那么他就会将其藏起来，

这个无词之物就成了一个秘密，一种神圣的礼仪，只有一个不在场的上帝在看着，他的眼睛比美洲虎的还要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了一种古老的恐惧：空虚、灭绝。他的头脑里进行着激烈的对话，争辩和宣布事物的完美性。于是上帝出现了……上帝加剧了怀疑，于是，经过多少天的沉默之后，他会用最甜蜜的嗓音跟他说话，逻辑也非常清晰。

这种神圣的幻觉可能就是精神分裂的一种标志。

但是1651年，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脑子里听到的真的是一个坚定持久的叙述者的声音，关注的只是向前运动。这不是病理学。小伊斯雷尔爬上海边的岩石，寻找灰岩坑和螃蟹，有时候，他会眺望远处的地平线，有一种想迫切离开的需求。太多的东西已经藏起来了：别针、药盒、铅丸、鱼钩、羊腿等。他们呼唤他，大声尖叫，还在散发光泽，还很新，刚刚埋掉。

后来有一天，他母亲没有起床，到了中午，她叫他过去，亲吻了他。到了晚上，她再也不能动了，岛上的寡妇们聚集在她周围，吩咐渔民把她安葬掉。伊莎贝拉·博瓦·比塔·德·卡斯特罗死于天花。他把东西都放到她的寿衣里，他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此刻，时间静止不动了。村民们快速而含糊地念了些伏都教和犹太教祷词。海上刮来了一阵新鲜的风，带来了海难和风暴的故事。

一位老人收留了他，让他放养山羊，等他长大了，可以上弓了，就教他如何猎取野鸡和野猪，就这样，无论他走到哪儿，他都带着弓和满荷的箭袋，从没挨过饿，不过他拒绝吃猪肉。他的狩猎和钓鱼之旅很快将他带到了大陆，靠近维多利亚港的地方。他坐在这里，看着他们吃力地装船、卸船，船是圆的，帆是横的。他看着巴尔卡小帆船顺着潮水飞奔，而卡拉维尔帆船斜挂大三角帆迎风而上，劈波斩浪，令他惊羡不已。十年过去了，他还在看着它们，还在放养着山羊，并向一个永远也不会死的疯狂房东交纳什一税。但是伊斯雷尔会读书了。每周两次，房东都会从这个举止文雅、讲一口高贵的葡萄牙文的孩子身上获得乐趣。

就这样，孩子得到的是图书，房东得到的是充足的睡眠。这正是出逃的机会。

他签约上了船。他们说黑人顶多只能做一名水兵。他们想阻止他，但是他偷偷上了船，很快就发现了他的用武之地，一个黑人小男孩，祖先来自非洲，头发焦黑，很庆幸这儿没有歧视。感激；黑人，他们在他内心拼搏，一起一伏，就像一艘船向着非洲倾斜，在那片大陆上，他可以触摸，也可以不触摸，可以上下，顺从或抵抗，可以扮演，也可以不扮演他的角色，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在那儿，在心脏的舱位里，晃动着肮脏的绝望逻辑，在这里，在大脑的瞭望台上，迸发着对革命的渴望)，他听到了残忍的抽鞭声，灵魂在敲打着其虱子，那种痒是无法搔的。

这就是疲劳的结果。在一个风平浪静、平淡无奇的大海上，人们只能做这些。木匠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很适当，他说，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他对孩子说道，只会做十字架，你们现在所承受的负担……说完这些，他开始到处踢小伊斯雷尔，踢得他身体肿了起来，没人在乎这些，因为黑人的皮肤是不会给打伤的，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喝完了酒后，木匠有时会将手放到孩子的头上，跟他讲远东的故事，尤其是讲一个人几百年前漂洋过海，用虔诚驯服了一批岛民的故事。这个人赤着脚北上，木匠说(一个傻瓜，伊斯雷尔想)，他站在雪地里，讲述着大道理，尤其出众的是，他举例加以佐证，他使村民相信，有火焰路，也有温柔路，他让他们看他的脚印……从他过来的地方，既黑，又深，几乎难以寻找，这是他的灵魂光芒的一个标志，他吐露了这一信息，也卸下了他们为他的到来所负的责任。

一个狡诈的男人，伊斯雷尔说……机灵而不失纯真，孩子又加了一句，生怕木匠再踢他。

我的祖父和他同船，对这个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木匠说道，靠近葡萄牙湾，也就是上川岛的时候，我祖父用他亲手制作的水手用贮

物箱换取一双黄羊皮靴子，然后将它送给唐·弗朗切斯科，因为大家都这么叫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这位伟人一脸微笑，摇了摇头，拒绝了，并建议将这双靴子送给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国走私者，名叫孔子夫。唐·弗朗切斯科的建议一向被全体船员视作命令。我祖父没有这么做，而是把它们给了自己的儿子。我父亲然后将它们给了我。这种传递会产生邪恶的后果……

就在木匠的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上面传来了一声喊叫。他们走上甲板。光线开始变得怪异，黑云在海上盘旋，滚滚而来。当木匠斜着眼睛想更好地看一下乌云，当他要望远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一场可怕的风暴是难以避免了。乌云从海中汲水。突然，光线变得强烈起来。船开始十分吃力地穿过海浪，一会儿叹息，一会儿沙沙作响，一会儿又嘎吱嘎吱，发出碎裂声，在世界之底给折磨得恶心而痛苦，船骨吱吱作响，呻吟，没多久，他们开始倾斜，偏航，海水像子弹一样喷洒而来，他们的脸都遭到了冲洗，支索拉紧，然后突然绷断，削掉了一个人的头，于是伊斯雷尔的脸一下子给血雨温暖了一下，他顺着风紧紧地抓住疯狂摇摆的舵柄，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来到了船舵这儿，只有船长一个人，船长让他赶紧下去，稳住摇摆不定的船舵，因为木匠已经找不到了。抬头望去，伊斯雷尔看到桅顶和桁端顶起火了。蓝色的火苗从一边跳到另一边。那噪音真是难以忍受。下面更是糟糕。一只只桶重重地撞击着船体。两边似乎已经漏水，膨胀，然后缩小，上下起伏。裂缝的地方倾泻出黑炭。那味道真难闻。他下到舱底，水没膝盖，他用脚去摸索那个巨型舵栓，好将舵链锁住。他滑了一下，跌到了船底，就他所知，船可能已经到了风暴角外围的海底。他相信他正被船尾一个敞开的洞口往外吸，仅仅靠前臂上绑着的一根链条救了自己。一个世界漂走了：剑柄，白色的丝绸裙子，上过光搽过粉的假发，还在发出回声的吉他。他安静得出奇。噪音回落到了远处低沉的轰鸣；艳舞的节奏；他的母亲在读书；他走进沉落教堂，走向圣坛，一个木匠神父将他指了出

来。你只会制作你本人承受的十字架……他站了起来，回到船上，给漂了起来，吸着难闻的臭气。旋转的星星。一束狂热的光线照亮了花边状的油水。有人提着一盏灯下来了。你没事吧？没人。有声音，就这些。一切太容易了。名字？他问道。事物的名字。他感到窒息。无法将他的思绪转过来，还在感受着深海的冲击；他像世界一样旋转。他又沉了下去。

这一次是一个巨大的城市沿着一条河流伸展，烟雾弥漫，灰蒙蒙的。一种幻象。在一条给冰覆盖着的林阴大道上，轿子来回穿梭，运送跳舞的人。一个男人下了轿子，他穿着黑白相间的奇怪晚礼服，给轿夫付了点小费。他先是沿着人行道走，然后又沿着黑色的海边。冲着围戴穆斯林头巾的卫兵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进一条小巷，登上连着破院子的楼梯。他走进一间满是老鼠药的房间……他能感到这些老鼠在他柔软的皮鞋跟挤压下咯吱作响……将他的帽子放在一张灼伤了的桌子上。打开白色真丝围巾，放进帽子里。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只皮夹子。打开。解开一长条锡箔纸，呈现出一小段苍白的粉笔碎片，看上去像是一个象牙管，一块骨头。闻了闻。点着一根火柴，透过这根管子吸了一口烟。坐到还没整理过的床上，用手指挠了挠头发，从他的头里浮现出跟他一样的另一个人，接下来又是一个，直到火熄灭。

小伊斯雷尔开始吞咽轮船内部的水。他像一个布娃娃一样围着沸腾的大锅打转转。后来他听到了他母亲说：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开始。他将嘴巴鼓起，像一条鱼似的，从凹陷的骨头里吸气。

他母亲临死之前的吻。

他玩耍着，悬挂着，转过身来，轻松地趟着水。然后回来，发现了一个解缆钻，将它钻过一个锚链，挤进花键环，舵杆砰地一声往回又关上了。铁弯了，给控制住了。

奥斯：（拉丁文），骨头；嘴巴。

奥斯！他浮出水面，就像船倾斜了一样，他的腿被驾驶杆夹住了，

屁股错位。奥斯！他疼得昏过去了。干得不错！船长叫道，他将头伸出舱口，然后又消失了。奥斯！他叫道，三个小时之后，等到风暴消失，他们找到了他，奄奄一息，于是宣布这是人所能从事的最勇敢的事情。他们把船长室给了他。木匠做了一个木头夹板。他们给他波尔多红葡萄酒和牛肉干，经过一个星期的谵妄，他恢复了。但是他走起路来却是一瘸一拐了。他们将船驶入印度果阿。

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的名字已经从果阿传到了马六甲海峡，传到了澳门和菲律宾。一个黑人成了一名英雄，拯救了一艘船。等他全面恢复后，他又签了一条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从事贸易。每次出海要三年。他听到了更多有关知名牧师唐·弗朗切斯科的传说，后来又听到了他的追随者的殉难。他听到 1597 年 2 月 5 日的一天，他们二十六个人如何在日本长崎市西坂山的一个稻田里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一群西班牙牧师和他们的日本信徒。

他驶进澳门。水面一片宁静，水也很浅，周围群山升起，每一座山顶都有一个葡萄牙堡垒，他们的大炮经过水的锻炼。日本基督徒们依然在这一飞地上寻求避难。说实话，有时候，他看到他们穿着黑色和服，穿过玫瑰堂前的潮湿广场，偷偷地去做弥撒。他注意到种群众多，是一个多元文化，在这个多元文化中有葡萄牙人，菲律宾人，来自马六甲海峡的克里奥尔人，中国人，日本人……甚至英国人和德国人，令人惊奇的是，还有非洲人，他们于 1622 年打败了荷兰人，其勇气和忠诚因而也备受人们尊重。这是一个经受住了枪林弹雨的人群。这一地方使他非常着迷。但他是一个低下的水手，他在这个商业港口安顿下来的机会几乎特别渺茫。后来在一次短暂的访问中他谈上了恋爱，他爱上了一个叫孔苏埃洛·冈田·佩雷拉的混血女孩。无论他如何努力，他都无法将其忧郁的面容从他孤独的时刻中排除，在第二次旅程中，他发誓他要娶她。而她则写信给他说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有很多的钱，或者影响力。他再次意识到了他的肤色，内心想起他还没有绝望。

绝望。不想听其低沉的歌声都很困难，不想超越历史的平庸叙述，沉湎于其凄惨的旋律中也很困难。他在南湾前闲逛，溜进涨潮港，在温暖的雨水中坐在石墙上，吸吮着冰冷的瓦管排出的苦水，看着蝙蝠翅膀状船帆每日工作，在海峡来回行驶，于是下定决心征服自己。他租了一艘舢板，航行于岛屿周围芦苇丛生的平静水域，有时候他会来到一个眺望他处水域的地方，有时候他也会来到一个通向渔村的三角洲，他用木桩标出一个地方，雇了一些苦力，用泥土、稻草、牡蛎壳片和旧的骨头搅拌在一起，一种中国人认为经得起炮火的调合物，来造房子。有人告诉他，这样造起来的墙叫做夯土墙或龙环葡韵住宅，他感到精神振作，因为他一踏进他这个家，他就给裹在珍珠般的外壳里，这种珍珠般的磷光可以指挥着他驾船。中国人对这个地方退避三舍，声称这个家里有鬼魂。这样倒也可以防偷。他把这个地方叫做龙环葡韵住宅，并在墙内秘密藏了一些他设法存下来的硬币。然后他再次出海。

现在他三十岁了，腿瘸得厉害，很难再过船上生活。后来，有一天，在马六甲海峡的一家旅店，他了解到船上的木匠安东尼奥，是的，那个到处踢他的人，正在河边的济贫院里奄奄一息。伊斯雷尔利用他登岸的最后一天来到那儿，看到一个消瘦的老人像胎儿一样躺在那儿，语无伦次地嘟哝着一个交换而来的水手用贮物箱。一个小时前他刚从床上摔下来，脑边的伤口在出血。一玻璃瓶浑浊的小便放在床垫的下面，伊斯雷尔想，安东尼奥用他发黄的手指和长长的指甲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老人将它扫到一边，就在伊斯雷尔变换了一下位置，让液体转到另一张床下的时候，他注意到在木头柜子边的地板上有一只布袋子。他将它拿起来，安东尼奥小声地说了一句：这是你的。然后，老人一副惊骇的样子，喉咙里发出一声喀哒，然后停止了呼吸。一个披着黑色面纱的胖女人突然出现了，伸出手，将他的眼睛闭上。她冲着伊斯雷尔摇了摇头，一言没发，伊斯雷尔走到外面，站在河边，手上拿着那只布袋，没有打开。他感到某种奇怪的责任降落到了他身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突

然开始扯衬衫的袖子，直到袖子像缎带似的悬在手臂上。

回到船上，他打开紧紧地系在布袋口上的绳子。在布袋里，他发现了一双山羊皮做的靴子，穿得已经很薄，几乎做什么都没用。但是也许跳舞除外。进进出出。他的跛行似乎在起作用。

动乱

到黄金别墅的第三天，我开始出现幽闭恐怖症，于是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突然转弯下坡的时候，我看到威利舅舅孤独的小直升飞机垂下桨叶，像一只蜻蜓似的给关在网球场上。我链条没上锁。也许尼日利亚人会来，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偷走。我乘着燃油喷射飞机来到了澳门。

1639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野蛮基督徒；无鞋奇迹；这些拒绝叛教的顽固大鼻子。他们全都到澳门来了。有一幅画悬挂在大三巴牌坊上建造的圣物室里。到了机场，我乘坐了一辆由掮客开的中巴。他开价太高，但是他似乎喜欢我，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愿意把价钱降得那么低，几乎不要钱，而且只对我一人。当他发现我的名字时，他声称我们是堂兄弟。我第一眼看见你，他说，我知道我们就是一家人。在环岛那儿碰到塞车，他走了出来，拿出一把梳子，花了一些时间，在后视镜里自我欣赏。他对我家知道一些，但是话说回来，这是一个有名的家庭，总是有许多故事，在澳门有一项特殊才能，专门讲述失散家庭的故事。比如：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拦住你，说自从(一个特殊日期，某个时间，天气)后，他就没有见到你，当时你们一起在(某知名)饭店吃饭。当你说你不知道这事，而且1967年你确实不在澳门，他又换个策略。大概是另一年，另一家饭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你喝的是桑榭尔白葡萄酒，之后你还抽了雪茄，帕塔加斯雪茄，我知道你知道你的雪茄，因为

你没有撕掉标签带，既卖弄又谦卑，但是却小心地将它塞在手指间，这样就不会弄脏。之后你将我介绍给一个销魂的女子……我忘了她的名字……我想她是从多米尼加来的……当然我让你们俩彻夜跳舞，而我则回到破屋里，继续写我的回忆录……到了此刻，你就不得不点头表示同意。是的，你有可能在那儿，卷进这种廉价小说甚至廉价酒里采集来的疯狂能力之中。讲完了，你倒是想给他买一杯酒，但是你没有，因为他已经有了提议。也许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城市，让先生再次熟悉一下城市的乐趣？不，谢谢你。但是你瞧，分手之后，我就遭遇了一场很大的悲剧。我有两个女儿。我养不起两个，于是就将其中的一个放进了圣罗撒女校，另一个得自己赚房租。你瞧，生活充满了悲哀。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况，只有有感觉的人才能理解……于是你给了他一块钱，送他上了路。

我们当中，有谁不会编一个同样的故事？谁不会欣赏大胆所带来的信心？我知道他很清楚我知道这故事中没有一样是真的。真实不是诱惑，怀疑论者永远也不会知道谷物外的那种奇妙珍珠色泽，说穿了，就是这些牡蛎世界里的叙述漩涡，狭隘的麻醉般的逃亡和猪鼻子一样的回拱。就像一个好的雪茄，你深深吸入一口，偶尔吐儿下，就知道你随时可以解放，知道有人给你提供了一个让你鄙视的谎言，至少现在，你还可以控制它的燃烧。我已经唱得便宜了。

但是我的“堂兄弟”展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在大三巴牌坊边上的博物馆里。你瞧见了这幅画吗？他说，他手拿梳子冲着这幅画轻轻弹了一下，将一簇头发弹在了博物馆的玻璃上，这些就是长崎的殉难者。一共二十六个人；其中二十个是日本人，还有六个是拒绝叛教的外国人。他们被吊在十字架上，然后被标枪刺在上面。他不知道故事全部，但是他向我展示了他们的遗骨，非常整洁地排列在玻璃间里，成为遗骸的附加部分。这些耶稣会士为了将这些遗骨从日本运回来是吃尽了苦头，他说。对了……我给他付了双份巴士的费用，因为这包括一个必

要的(是的，必要是他用的字眼，不是强制或无价)指南，是他从当地一家图书馆里复印出来的……还要说一下，最近我没有将头抬出水面，我移民到澳大利亚的机会有多少？你瞧，我过去从事的是保安工作。你觉得他们需要善于用枪的人吗？等等。

在西坂山上，传教士们窃窃私语，双手放在袖子里，恳求，也许还流出了必要的眼泪，但是他们的请求落到了聋子的耳朵里，现在已经没用了，天使们已经冲浪到了积雨云上，嘴唇上吹着号角，基督徒们被吊到了十字架上，这是照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武士们说，最后死得像个男人，1597年2月5日，他们的左耳被割了下来，最后，到了黄昏，他们一个个被标枪刺死，风将小麦分开，血不停地迸溅。而观众们，其中有的人听到最小的殉难者被绑到十字架上大声喊叫的时候还觉得很兴奋，现在感受到的却只有空虚和傍晚的潮湿，这使他们感到沮丧，而在身后的沟壑里，肿胀的尸体上爬满了苍蝇，发紫的肠子闪出柔和的光泽，黄昏像水一样。

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非常善于用弩。1680年3月10日，他三十三岁生日，他在珠江口单枪匹马打败了满是中国海盗的帆船，立即在走私行业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噼啪！他听到了弩箭刺入他们的胸膛。他还有一门小炮，拴在弓上，里面装满了铁钉和碎玻璃。海盗首领想休战，并拿出一箱子金银制作的护身符。伊斯雷尔总是以更大的礼物来加以回敬，他提出送一双过去曾经要送给强大的圣人的黄色靴子。海盗首领更加谦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他大声尖叫着，他的战舰撤退了，他站在甲板上，晃动着他那双新靴子。我想要，伊斯雷尔也大声回叫着，进入日本！

一切得以安排。就在这一年，有人看到，中国的走私者中出现了一个黑人，这些走私客定期在日本的南端登陆。当地人把他当成了来自北

方的黑皮商人。他甚至在布了防的长崎郊外造了一座小房子。每隔一周，当帆船出发来往于日本和中国南海之间时，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都会给在澳门的孔苏埃洛·冈田·佩雷拉寄回一个小包裹。包裹里她总会发现一些奢侈的和服和一两颗珍珠。但是她的快乐之中总会夹杂着别的东西，因为每次包裹里都会不可避免地装一些令人吃惊的东西，并且还有仔细吩咐，让她存到龙环葡韵住宅里，将它放到夯土墙里一个秘密裂缝中。在不断收到这种礼品之后，尽管她还有些保留，但她最后还是决定嫁给他，并肯请他从日本回来。

1681年3月10日，伊斯雷尔娶了孔苏埃洛·佩雷拉，他们在龙环葡韵住宅里安了家。他们过了几年非常幸福的生活。他们是否有孩子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孔苏埃洛·佩雷拉·德·卡斯特罗成长为澳门最漂亮也最性感的女人，成为一名非凡的交际花。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那个年代比较时尚的做法是女性披一件长长的真丝围巾，从头包到脚。有一次，孔苏埃洛出现在总督化装舞会上，没有舞伴(因为不请黑人)，她只披一件十分透明的围巾。于是出现了一桩巨大丑闻，一场旋风，玷污了令人敬畏的教堂，但是由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因此，她只收到了一份警告和十篇玫瑰经，于是，连续几个炎热的夏天，她都穿着同样的装束在屋顶上背诵玫瑰经，那些夜晚漫步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伊斯雷尔变得越来越沮丧。他已不再是一名英雄。人们在他背后指指戳戳。令他感到恐惧的是，他开始重现了童年的妄想，觉得有必要重新将事情与名字对应起来，而且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对应越来越少。他发现树和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再也闪不出光芒，树根和树枝不再是天和地的镜子，而是紧紧地依附在一切能让它生存的臭泥上。树成了疯狂的欲望。星星再也不能反映人的生存，而是在天空中发出退化的微光，成为某种寒冷而遥远的现象，永远不可知，而且也没人关心。他所目睹的这些现象，让人拜服在地上，嘴角吐沫，跟虔诚和死亡没有关联，而是跟

风暴和袭击南中国海的闪电有关。当他闻到玫瑰的香味时，他再也不难过了。当他看到年轻人每到伤心的周六下午就聚集在大堂前格外潮湿的鹅卵石上跳舞，像斗牛士一样，他什么也感觉不到，甚至连边上小贩叫卖的胡桃味他也感觉不到，而在过去，这可是给他带来种亲密感，让他跟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人脑的形状；思想的核心；上帝设计的发展。他的命运字典已经丢了，时间再也无法控制了。没有了这些保障，可怕的世界一个个全都涌进了他的头脑。他看到奇异的风格、可怕的战争、偷偷摸摸的荒唐事、乱伦、畸形的人或物、腐朽与残忍等全都展示了出来，还闻到了掩盖在甜美背后的大屠杀带来的痛苦味道。由于这些幻象都存在他的脑海里，因此，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再也不说话了。语言变得迟钝，他开始掩藏自己，而不是掩藏他无法命名的物体。出现这样的世界他有责任。

他离开了孔苏埃洛。他感到了解脱，但是现在世界的大门向他关上了。他成了一名隐士，每天一瘸一拐地来往于他的家和他那艘光滑的蝙蝠翅膀状帆船之间，走私者、海盗和苦力们都说，像他这样的男人，如果有一件真皮和真丝做的充气玩意儿，并由水手抬到床上，那么他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

现在，伊斯雷尔的航船永久地停泊了下来，在这来回轻轻晃动的船舱里，伊斯雷尔带上床的是一本真皮和真丝包装的书。他觉得这种充气很有趣。他没有意识到，他本应该多写些自己。这是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人。他将书取名为《广元杂志》，或《世界杂谈》。每一个词，他母亲曾经跟说过，都有一个开始。他的嘴巴形成了一个字母，O，但嘴唇里没有发出一个声音。由于担心回到他身边的空虚会产生童年时的压抑，他删掉了所有的回忆和哀伤，回到自己的房子，推倒了夯土墙，挖出人的骨骼碎片。这些都是他从日本走私回来的：二十六名长崎殉难者的遗骨，他们拒绝说出一个叛教的词。他将这些遗骨交给主教，主教用拉丁文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并始终强调，将神圣的遗骨救出来的是一个不

说话的犹太人。

尽管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到死都再没有说话，他的命运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又拥戴他为英雄，甚至为活着的圣人。孔苏埃洛已经发胖，开始忏悔，并发誓一生进行祷告，但是他拒绝了她，他给她写了封信，说她最好进修道院，也就是说，如果修道院愿意吸纳一个曾经对飞地里每一个有影响的人都伸开大腿的混血女人。由于教会力量削弱，因此，有一个教会吸收了她，但是她还没接受就死了。当疯狂的戴冰玉[1]担任总督的时候，伊斯雷尔被任命为官方档案管理员。澳门已经成为一个急于看到自己名垂青史的社会。伊斯雷尔辛辛苦苦地恢复了圣安多尼堂区和风顺堂区的账目。他在地下室里造了一个特别的房间，收藏一些希奇古怪的东西，不过跟犹太有关的东西是要给他的上级严格查出，不许安放的。展示的主要物品就是一双黄色的靴子，他们说这双靴子过去属于圣方济各[2]。这是从一个被杀死的海盗那儿抢回来的，穿上脚，这双山羊皮鞋一点声音都没有，走过沙土和雪地也不留痕迹。

教会定下的严格规矩并不妨碍伊斯雷尔参加一些高级别的外交聚会，他面无表情地跟大家点头，一言不发。据说他只穿黑色衣服，给人一种印象，他比耶稣会还要耶稣会。他死得很安静，是在睡梦中，梦见了他跟上帝在打赌。

1874年9月，百年未遇的台风之后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烧掉了他所有的工作，没有留下他任何痕迹。

此后，澳门成为一沟死水，一个被遗忘的时光的贮藏器，但是有时候，在单调的黄昏和被污染的月亮之间的明暗对比中，还开着一条通往17世纪和20世纪的通道。伊斯雷尔已经瞥到了这点，并且忠实地记载了下来；它混合了文字的分量和真实的事件；它混合了夯土和忘却。

---

① 戴冰玉，第30任澳门总督(1706—1710)。

② 圣方济各(1506—1552)，西班牙传教士，他和罗耀拉一起创建了天主教耶稣会，后在日本、锡兰和东印度建立传教区，于1552年在路环岛附近的上川岛逝世。

禁忌标牌

长崎场面随另一个卡斯特罗的到来而结束。

每天早上，不仅仅是精进日，千代子都要从屋内壁炉旁的一个柜子里取出一块柳木牌，穿过花园，来到屋顶闸门，将木牌挂在柱子上。木头标牌提醒注意一些疾病，不留不速之客。她经常将这些悬挂出去，当地人开始认为她有种病态，很恐怖。无论谁走近她家，她都会发出大声尖叫。她是一个疯女人。很快他们就叫她恐怖。

但是每天晚上都有人偷她的牌子，于是她开始猜测小偷的身份。肯定是修二，他就住在隔壁的村子里，而且不止一次地表白了他对她的兴趣。他不相信她有病，他怀疑她正藏着一个逃犯。千代子曾经看过修二穿着稻草雨衣一动不动地蹲在黄昏里，看着她的灯光闪烁，数着烤炉的火苗冒出来的缕缕黑烟。尽管修二全神贯注，但他没有看到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正在小竹林里溜进溜出。他想，自从行刑之后，所有的基督徒都开始接纳皈依者，将他们安置在安全的家里，千代子知道有人在看她，但却一直不知道修二是如何的爱她。当然，他的脸红，他笨兮兮傻乎乎地盯着她红白相间的和服的样子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走进村子，听一个身着粗糙外衣的大胡子西班牙人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向她传输基督之火，他的发音这么糟糕，语调这么不靠谱，就连一只苍蝇也能飞过他那些烂牙。没准儿这还可以治病。回来后，她满脑子都是些无

用的木工活，并在记忆中给她的同道也做了个小十字架。修二的父亲将所有这些都告诉过他，现在他的脑子里融合了他父亲的记忆和他自己的记忆，他想看看外国船只靠岸后的结局。

每到夜晚，她都会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擦她的另一个偶像，她用原油摩擦着自己不耐烦的小肚子，小声祈祷，告诉她母亲她要离开长崎，到遥远的海岸去。她母亲风度像个圣人，点了点头，并给她准备了家里能够提供的一切。当局不会伤害老人的，他们不必放弃信仰；他们女儿的罪孽本身就是耻辱。经过一个月的精进，千代子的家庭将会免除他们的花园焦虑，也就是修二所说的外国影响，这个昆虫吃掉了他们的萝卜和卷心菜。那些不和谐的外国人和外国坏蛋通通被赶出去了，涡纹鹅卵石，被脚踩得磨损了的旗帜和踏破了的小路，他们骚扰这些有好几个月了，现在访客可以再次光顾了。

这是他们死得有意义的唯一途径。千代子跟她掩藏着的持骨人说道，他们一起花了几个夜晚，向下挖进泡沫般的泥土里，取出他们用布裹着的黄色细骨，放到他的渔船上。他说他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这种牺牲所感动，并且理解了其中的戏剧效果和诱惑。他称她为奥索里奥，他的小恐怖。后来，持骨人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下定决心再也不吐露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千代子为他的文雅和威严深深打动，隐隐感到了他精神上的断裂，一种心灵的突然转向，只见他的船张开风帆，飞速前行，但是就在这波浪起伏的水域，这声音也能传到她的耳朵里。

现在，修二看着这一对伤心人快步走向满是鹅卵石的海岸。他不怎么明白，但是他还是爱着她。一旦上了黑船，这艘高船首、高船尾的魔鬼之船就驶进了一场令人诧异的罕见冰暴之中，她跟穿着粗糙外衣、说话声音很低的同伴说，她要生一个儿子，他们会举办一个冗长的礼拜仪式，敬她酒，并对孩子是个黑人深表同情。她宣布已经给他取了名字：本雅明·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

到了菲律宾的萨马岛之后，母子二人会被带到一个帮助流亡船民的沿海城市。到了那儿，她可以用棕榈树叶给孩子扇扇子，驱除他的高烧，并且祈祷，如果他能够活下来，他不会因为信仰和黑色皮肤而遭到迫害。

城里有两座钟，他们绳子一拉钟就敲了起来。本雅明·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不会成为恐怖。他会成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长大后会说话非常单调，这种特性可以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故事作者，吉他教师和巴兰吉加最受人欢迎的人，现在，这个地方到处回荡着风铃声，纪念岛上遭到屠杀的居民①。

① 1901 年 9 月 28 日，巴兰吉加美军基地遭到萨马岛菲律宾居民的攻击，发生了大屠杀。

列岛

回到我舅舅的黄金别墅。

一切如旧。报警器没响。一个人敬畏房子就像一个人敬畏拿破仑的坟墓一样，敬畏的是坟墓的辉煌和坟墓的恐怖。华丽的装饰几乎破坏了玻璃和钢铁迷宫的效果，现在这房子看上去有点凡尔赛宫和五角大楼交叉的味道。当然，规模是要小多了，但是就香港的规模而言，黄金别墅在硫磺海峡一带可以说是气势宏伟，卓尔不群。我站在阳台上，面对着大海，但是看到还在辛苦工作的舢板舵工抬头看的样子，心里感觉不爽，他们打量着这个地方，那眼神里充满了讽刺，这就像我父亲所说，战争开始时，他们也是如此，炸弹落下来后，他们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因为无论如何，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在黄金别墅里，我全神贯注于收藏邮票、硬币和旧的外科杂志，我会没完没了地玩弄报警器和喷洒器，还有遥控拉门和窗帘，轻轻地开关灯光和隐藏的声音系统，这样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从天文馆转到全景立体声效果，从雕琢的中国寺庙到爱德华式的图书馆和沉落教堂。简而言之，我在黄金别墅里睡不着。它无法用创新来调节黑暗，甚至也无法用欢快和混乱来调节黑暗，而是虚假地表现出一副现实意义的样子，粉饰将来。一切都忘在里面了，但是一切也都收藏在里面。这是一个主题公园。

我没有找到更多的书法。我穿过楼上的餐厅，在右边的第三个门

口，发现了一个储藏室，里面全是古玩，其中有一个蓝色的陶瓷花瓶看上去有点熟悉。但就这些。于是，到了半夜，伴随着这座从不睡觉的城市，我坐到了屋顶的阳台上，看着往来的船只，灯光闪耀，像山一样隐隐出现，在海峡里来回慢慢移动，前往日本，菲律宾，还有更远的地方，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匿名状态无可争议地出现了，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没有形状的形状，一个隐藏的航海家。我在酒窖边一个恒温储藏室里找到了一个雪茄盒，这是威利舅舅的，我从雪茄盒里抽出了一根，点着了，然后来回缓慢地踱着步子，我在地砖上跳起了舞，听着我的脚步在光影中移动，一会儿白，一会儿黑，突然，海湾闪耀起了形状，也许是柳条箱，给冲到了岸上，还带着莽吉柿、椰色木和罗望子的香味。

*　*　*　*

1861 年，马尼拉湾。

马纳利塞·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游近一只柳条箱。这个年轻人一直在中科迪勒拉山下的沿海城镇漂游，离他动身的地方还有很长一段路，从萨马岛开始越岛作战。他已经去过了菲律宾列岛中的大部分地方，最后乘了一条运芒果的船来到了大海湾。他已经在大海里游过泳，一大早又在海水里洗过，现在盐都积在他的腋窝上，粘在他的头额上，长长的胡子上滴下了汗水，尝起来有股黄杨木、芒果和盐的味道。他那件白衬衫紧紧地粘在肩膀上，在白天的热量积聚下，衬衫松软了，贴到了他的背上，他的宽松裤子需要的是一根皮带，而不是磨破了的绳子，割到了他的腰。后来，年轻人从他为自己挖的小沙坑中站了起来，这个沙坑一直很冷，但是现在开始变热，抹去了箱子上的灰尘。他举起箱子，沿着沙丘向城市走去，他举的东西没有过去那么重。他还感到轻松，因为这个地方，马尼拉港已经向世界开放，而世界对他而言就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因为这超越了所有的想象力。不管如何，他的身体似乎

在这个思想里漂浮，从中传出了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指导过了的音乐状态。说真的，这个思想不断地浮现在他脑海里；节奏、切分、旋律。听力幻觉。除了西班牙人，每个人都拥有这些。据说西班牙人拥有一种进攻型的气质，使他们只讲政府和理性。他们从不听旨在保护世界的圣歌，他的意思是说收集纯然迷醉的东西，将其传递给完全为自由精神所消耗的人们。因此，很奇怪听到西班牙人说他的民族不太人性。

他的母亲说，他们家的人说话时总是唱歌。这个家族特点可以回溯到他的曾曾祖父，本雅明·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巴兰吉加市，听上去像风铃一样，只有一种音乐般的语言，当曼尼听到南方的甘美兰乐器时，他一下子就知道，正是这种音乐带来了鱼和水果。巴兰吉加的两座钟早、中、晚敲响。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在这个城市的语言中，没有时态，因此时间中也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是一种持续的梦幻和历史的融合，这就是现在，而且永远是……巴兰吉加。

有一天，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捡起了他叔叔给他设计和制作的一把小吉他，开始演奏，林烟环绕着他，并在他头上飘浮，光线穿透了遮篷。他兴奋异常。他演奏了一个旋律，和声伴奏，轻缓传递出和声和一种特殊的旋律，于是森林里充满了异国合唱和新奇的即兴创作。老人们给他取了个本地名字，使他与众不同，他们叫他卡塔利宁甘，在他加禄语里，这表示一个具备了了不起的天赋的人。

但是，这当然不是伊甸园；根本就不像，因为这里有贫穷、疾病和排泄物，需要清理到垃圾坑里烧掉，随着暴风的到来，船不能出海，就会出现要命的饥荒，泥泞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坐在小屋前，拥抱在一起，浑身颤抖，情绪低落，听着胃的折磨。但是尽管音乐放慢了，它没有终止，很快有人要他记下每首旋律第一次演奏时的曲调，他发现他做不到，因为总有人表现不同的看法，他们要不增加额外的音符，要不就是记得比他更清楚。他尝试着用一个来访的男修道士教他的办法去记下这些音符。响棒。男修道士说过。就像你，我这个小傻奴隶；他拍了拍

他的头，向他表示祝福。但是说实在的，你确实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是天性的一种反常？不是。是一种杂交。就像这些音符，他已经被别人划线分出来了。广袤世界中出现的这一类事情倒是给他的混乱带来了答案。他只能将自己看作一种即兴创作，一段华彩乐章。要想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位置，他就得理解牺牲和抵抗的性质。

于是他给自己的音乐定下了更高的信仰，总有一天，它会让他解放。他的粗糙符号没有意义。他真的需要秩序和理智。他得模仿西班牙人。他已经听说在马尼拉，他们送当地人去西班牙接受教育。在海湾的渔船上，他取出他叔叔给他制作的木吉他盒，从里面拿出一张张粗糙的符号，撒进水里。船驶上了沙堤，在摆脱了沙堤之后，他只能涉水上岸。他进城的时候能够感到脚底下的鹅卵石发烫，他的脖子上围着圣骨盒，骨干做成的护身符。一个浑身是汗的士兵，穿着拿破仑式的服装，在检查站口拦住了他。

——有什么申报的吗？

——没有。

——名字。

——曼尼。

——不要跟我玩精明，混血儿先生。我要你的全名。我不管多少。

——何塞·马纳利塞·奥索里奥·德·卡斯特罗。

他没说他的村名。

——你跟那帮私生子一样。

——他们叫我曼尼。

——我他妈的才不管他们怎么叫你呢。我叫你杂种。箱子里是什么？

——我的吉他。

——哈！杂音人士。弹点什么来听听。

——我不会。

——你偷来的。

——不是，是我叔叔的。

——你偷他的。

——不是，是他给我的。

——那么你就给我吧。

——不行。我倒是很想，但我做不到。

——那么我就从你这儿抢。打碎它，像这样，就像这样。

——谢谢。

音乐不会终止。这是他的一切，在西班牙人为埃密塔和马拉特一带的散步场所建造的拱廊里，他开始唱歌，并用两片破碎了的吉他板打着节拍。反响很好，出来举行斗牛士之人场式的群众将硬币扔进他的空箱子里。很快他就可以再买一把吉他，开始在酒吧里为喝醉了的士兵演奏。他模仿流浪者的歌曲，伤心、绝望的弗拉门戈歌曲，有一次，他听到吉卜赛乐队演唱过，激情十分自然地渗透进了歌曲。他不知道他的激情起源何处，源自 14 世纪西班牙犹太人的这种音乐节奏描述了一轮轮的帝国、探险、屠杀、宗教审查、革命和绝望。这是逃亡农民的高超舞曲。于是，他像乞丐一样从士兵那儿免费得到了啤酒和子弹，一天，他收到了总督办公室的一封答复，说他们送本地农民去西班牙接受教育，但不包括混血儿，这时，他发现他的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弹药，二十年的生活都荒废掉了。

这是反叛的时代。在西班牙接受过教育的人回来后开始写书。书有什么用？曼尼再次漂泊，在码头工作，在市场编写歌曲。他歌唱菲律宾的独立，这次也是唯一一次报酬不菲的短期表演使他火了……岷伦洛那些绚丽的国家大事，闻上去有股葡萄酒和香水的味道，使他想起了葬礼。那儿有美艳绝伦的女人，穿着泡泡袖的衣服，她们对他脖子上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说这是祖传的东西，是某个古代战争的遗物，当他戴着这个护身符来表演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的疯狂，只跳忧郁的华尔兹

舞，而且只弹第二把吉他，目的就是为了给周围这些身着浆硬的衬衫，假装能读懂音乐，但实际全都靠耳朵表演的人提供和谐，而且我还告诉你，他们的耳朵特别小，但是当我戴着这个吉祥的护身符，我可以演奏一切，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后面有空，我会给你看我的骨头。

这个伟大的世界并没有教他魅力。但是他的音乐才能无可质疑，他想再次攻克难题，将音符写下来；小小的黑头，连枷似的尾巴，也许这些就是音乐符号吧：细小的人类复制，犹太法典式的灵魂再现。

他参加了宣传运动[①]。有一天深夜，政府派了两个人来杀他，他很幸运地逃脱了，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他不是英雄。他用冰包裹伤口。人类的肉体犹如水果，他发现……冰太多它就会瘀伤；还不够，它不行了。1880 年他在马尼拉的电信局遇见了我的曾祖母菲洛梅娜·奥古斯廷·比西加尔。当时她正在接受宣传运动的请求，去宣传菲律宾化。他带着典型的冰冷强调，说他的腿上有个腐烂的伤口。她看了他一眼，将他带了进去。等到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曼尼就少了一条腿。他回去继续为共和主义工作，他按先前支持，后又出卖的一个革命领袖，将孩子取名为博尼法西奥。1897 年，他和西班牙人定了一个秘密协议，同意和他的同志们一起流亡，得到的回报是一百五十万比索。

曼尼又生了十一个孩子，他称他们为巴兰吉加门徒，教他们音乐，他们住在上海赛马场附近一套杂乱的两层楼房子里，彼此相安无事。我祖父博尼法西奥继承了房产，接下来是他的儿子阿纳尔多，也就是我的父亲。马纳利塞日子过得不错，他夏天进口芒果，冬天进口番茄。番茄都包裹在薄纸里，怕碰伤。他首先倡导冰冻。他们叫他为冰王。他从没学会如何写音乐，并且伤感地承认这个伟大的世界永远对他关闭了。相反，他梦到了巴兰吉加。

那是 1902 年。

---

① 1872 年，由受过海外教育的菲律宾流亡人士掀起的文学与文化运动。

有一天，他意识到他丢了护身符。护身符失踪一个星期后，我的曾祖父死于心肌梗塞。他刚听到一则毁灭性的新闻，在萨马，美国士兵为了报复遭到的伏击，屠杀了一万群众，血洗了整个巴兰吉加市。市内象征菲律宾起义的两只大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他的儿子博尼法西奥是从一个芒果市场上刚得到的信息。你最好告诉我实话，要不然我就打掉你的牙，曼尼说。他心脏病爆发前最有名的遗嘱。

就这样开始了几代儿子讲真话，父亲送了命的事情。

清洁

在清洁中我们学会了葬礼、婚礼和出生。

那天早上，乌云密布，军阀发动了进攻，当时，多拉·西德尔正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床下进行打扫。

子弹穿过了大楼。他们瞄准的是洗澡间，因为白色的瓷砖墙呈现在了山坡的狙击手面前。灰泥爆炸，瓷釉碎掉。呛人的粉尘充塞了大家避难的楼下房间。只有哈里推着轮椅来到阳台，举起手枪，痉挛般地进行回击，子弹打完后，嘴巴里还砰砰地。他打倒了三百个，但是后来有人提高了视力，校准距离，将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左眼，留在了他的头颅后。

他们进入大楼。将他们收为人质，以防共和军赶到。他们发现了床底的多拉。哈！还想藏，他们叫了起来，将她拽了出来。她比他们想象的要大些，而且在他们不经意的搂抱和粗手粗脚之中拼命挣扎，直到他们用绳子把她绑了起来，让她和别人一起来到了院子。她抬眼瞄去，看到哈里无眼地向上天诅咒。她无所畏惧，不停地谩骂，挣扎。他们更加大胆。他们在院子里生起了大篝火，将所有的家具都扔了进去。他们将她绑牢。军阀知道圣女贞德的故事，将一个女人绑在木桩上，扔到篝火中间，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上帝啊！她大声叫道，上帝啊，饶恕我吧，她用英语和汉语说道。也许就是这救了她的命。在经历了他第一

次笨拙的抽动之后，她的薄纱被撕破，眼镜碎裂，她乞求军阀放过她。她跟牛一样壮。

我的祖母没有讲起接下来两个小时发生了什么。通过迂回战术和审慎的问询，我设法将时间定格在早上十一点。下午一点，共和军赶到了。冲在骑兵队最前面的是维吉尔·容，他穿着华丽的卡其布军服，脚蹬长筒靴，肩披深红色的肩章，手挥马刀，这把刀他拿着太重了，因此，当他挥刀向空中砍去的时候，这把刀画了一个弧。于是他抽出一把左轮手枪，对着门廊就射，碰巧把哈里的另一只眼睛也带了出来。军阀的部队半个小时之前已经撤掉了。

我对外公容的记忆非常淡薄。他喜欢舞文，不喜欢刀剑，就是这么有力的一击，他的早年就完了，因此，在他回忆里，他似乎是一个冷酷的学者，一个第三者，一个幽灵，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谁也无法触摸或探索。他的回忆写在一个黑色的小本子上，是我在威利舅舅没有上锁的文件箱里发现的。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一个神学家。尽管他在英国学过医，尽管他对发泡药有着很强的医学兴趣，尽管他说他根据蒙古人的脸型再造了人的脸，但他对上帝的各种可能性进行了激烈的推测。在那些迷雾般的眼镜背后隐藏着一个疯狂的幻想。我只记得他很老的时候，穿着一件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绅士们还在穿的洁白长袍，坐在写字台前，工工整整地为他在香港太平山附近建的私立医院书写卫生条例，他的身边是一本《圣经》。

早上十一点至下午一点之间发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事情至今还是一个历史谜团。有些人，比如我父亲，就满怀恶意地坚持认为多拉·西德尔遭到了毒打和强暴，然后被扔进了军阀的手下在院子里点燃的大火。她很强壮，径直给弹了回来，面纱着了火。（我父亲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神话性似的意象。）当军阀的手下听到新的共和军的号角时，她已经跳进了井里。后来维吉尔骑马赶到，用马鞍将她拉了上来。这像是一部电影，但是你不能相信这种硝酸银制作的胶片。哈里·西德尔葬礼过去八

个月之后，电影胶片溶解成了丑闻，她嫁给了维吉尔。村民们说这也太快了。那一年，维吉尔通过了外国考试，排在英国奖学金的前列。一个月后，在上海新公寓里擦洗地板的时候，多拉分娩，产下一个儿子。儿子取名威利，纪念接生了当时上海人称之为“触走”婴儿的小个子厨师维·李。

外婆不善说谎。她是利物浦人，一神教派的信徒，脚穿带子束紧的黑靴子。她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在利物浦玩的游戏，这个游戏只要双手和节奏感。你把手放到桌上，捏紧拳头敲一下桌背，绕一下手在桌面上敲一下鼓，然后再绕回去敲一下桌背，嘴里同时唱着：

汤姆汤姆去睡觉，
汤姆汤姆去睡觉，
爸爸、妈妈、每个人

上床之后
要祈祷
爸爸、妈妈、每个人

你可以听出甲壳虫乐队是从哪儿得到了歌词。尽管我离默西河有百万英里之遥，但是我听这首歌感觉很好。

人们在床上还要干什么，外婆？
睡觉。想想英国。
砰砰哒哒
还有呢？
想想伟大的宫殿和豪华的房子。你长大后一定要看的真正的地方，

这样你才能记住它们，而不是像我一样梦想着它们。除了梦，什么也没有了。梦是最糟糕的事情。梦里永远没有好东西。

砰砰哒哒

我的记忆里充满了节奏，而不是建筑。我来回摇晃着。

现在我有点怀疑，她在离开利物浦之前一定有过什么类似的经历。沿着砖头砌就的港口住宅区散步，附近是潮湿肮脏装有楔形板的房子，屋顶像结网似的涂着粗灰泥，冒着煤烟；也许是站在欧亚饭店附近，啄着下唇上的伤口，或者是为洗衣店跑腿，塞着鼻子，逃避染色和旋转蒸汽的味道，也许，只是也许，她梦想过……中国水手，当时的逃犯，逃到她母亲的缝纫用品商店里推销小装饰品——古墓里挖出来的玉纽扣——他们也许吸引了她的眼球，这些不知从哪儿冒出的男人，私藏着光滑柔软的储备物，将哀婉变成了合法的招标，如此非法如此招标，他们没有一丝远见，挥霍了财富，到最后为了活命，他们什么都愿意干。她可能梦想到……汤姆汤姆去睡觉，梦想到也许可以伸伸四肢探探可能，伸出，失败，再伸出，脑子里依然还想象着那些从他们粗糙的手心落到柜台上的玉石……一时的交易和好奇价值远远高于它们的实际价格。砰砰哒哒。

然而，我的梦永远都给切割成记忆的碎片；碰上去很锋利，命运的跳越剪辑。

汤姆汤姆去睡觉……留声机播放着。

外婆……

什么？

你叫喊的时候扁桃腺发红。

上了年纪的女人不叫喊，亲爱的。
我深夜里听到了喊叫。
什么样的喊叫？

爸爸、妈妈、每个人

模拟

回家之旅。一些幻觉丧失，一些新的技艺得到。

外婆过去有一台发条留声机。

我对它特别着迷，不是因为它的木箱，或带有金丝细工花饰的黑色低音喇叭，也不是因为留声机的臂，它使我想起断裂的手腕，角度奇怪，而且发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个放针的小马口铁盒，放在留声机下面的箱子里；饰有浮雕的马口铁盒，她可以从中选根针，就像一个医生打开他皮下注射用的小银盒，选一根特别长特别可怕的针，挥洒着针内的液体，像雾一样，冷冰冰地落在我翘起来的屁股上。我外婆会将针拧进一个可以调节的臂膀里，很快，一首音乐就会进入我的血液，劈劈啪啪地转动着时间，就像扬子江一样。"夏日最后的玫瑰"。然后一种巨大的悲哀就会不时地传来，因为我的外婆越来越聋了，我意识到她在蜷缩和叹气时，就是想重新捕捉一种记忆，一种已经失效了的记忆。她的努力收到的效果越来越短，直到五官出现混乱，不知道过去过的是什么生活，发生过什么样的毁灭，她拼命地想通过戏剧性的表演和针的帮助强化这种遗忘，虽然她无法向我讲述这种遗忘，我却本能地知道，她已经选中我来接受遗忘的多样性和欺骗性。

1919年春天，维吉尔和多拉·容乘船去利物浦。等到船靠码头，维吉尔一踏上舷梯，他就注意到了城市的空虚。这是真的，整个一代人

都死在战争中了。多拉告诉他英国正开始慢慢衰败。这里确实平静，维吉尔自言自语道，他双手背在后面，沿着码头往前走着，他对各种各样的人都保持微笑，当搬运工和码头工人嘲笑他，嘲笑他的双排扣长礼服和大礼帽时，他回摆了一下脚后跟，点了点头，说道：很好。是的，确实很好。三角旗和国旗在风中啪啪作响。醉醺醺的利物浦人在放屁。

这还没有在广东沙面海关大楼那儿躲子弹那么糟，他们就是在那儿上的船，在那儿，他看到孩子们吃着防波堤下捉到的耗子，珠江鲑鱼，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军阀又回到广东了。中国会统一吗？麻烦总是不断，他还不妨利用这次短暂的假期，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和孩子，到利物浦去享受一下，他从他父亲那儿偷了很多金币，塞满了他的皮箱，想去学习外科和整形移植等先进技术。维吉尔·容手背在后面拍了拍，两眼凝视着默西河上的潮湿建筑和破云而出的束束阳光。一群凌乱的海鸥支撑着，滚动着，像风中的脏纸。沉思般的码头顶利物浦大厦向到达的客人展现出世界上最大的钟面，仿佛在提醒他们，这是英国时间，万物的衡量和万事的掌控都在格林威治这个秘密拱顶里。维吉尔抽出表袋，设置时间。非常精确。这就是多拉说过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得按照西方文明最伟大的民族的脉搏来自我调整。

那么，为什么这些毁容的人和无肢的雇佣文人坐在护柱上报道运输新闻呢？他啪地一声关上手表。抛过光的金表是从他父亲的一个久已去世的对手那儿取来的。他自己无法操控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想法。他不适应这种时间的缩水，他认为这种勒索是生命深层原则的非文明交换：悠闲地评论一场战斗；开心地将敌人的尸体抛向风中；自远古的早上开始就创作解开女人裹脚的诗歌。他和多拉站在行李边上，等待他们的马车。没人来接他们。他来回摇晃着。很好，他说，非常好。他一时兴起，娶了这个强壮的女人。好奇是编织地毯最好的线，有时候，这需要无限的牺牲。他看着她来回奔波，给搬运工下命令，她的金属边眼镜在潮湿的利物浦空气中全是雾，她穿着高竖领，挺胸向前，像船头雕饰似

的。但是现在，一大群强悍的女人，懒洋洋地躺卧在海员宗会里，碰着杜松子酒瓶。“嘿，伙计，你裤子里是那玩意儿吗？你给我一法寻我就为它服务。”她们到处都是。这么便宜，他很容易屈服于这些两脚肮脏、呼吸发臭、头发发霉的女人，她们从酒吧的窗框里戏弄着你。他满心反感。这摧毁了象征和旗帜，在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地毯上撕了一个大洞，溶解了多拉在他的大脑里反复而详细蚀刻的敬畏光环。在中国，出现在他面前的妓女是长着酒窝、十分端正的美人，移动着5世纪的舞步，像镜子照耀一样准确。但这不是有权有势的人衡量过的步子。码头在下面摇晃着。他看着婴儿床上的小威利，压抑住了一直想掐死孩子的欲望。从现在起，文明意味着错觉和犬儒主义。意味着重新调整。意味着激进的外科手术。

我外公再也没有穿满是口袋的狗毛皮夹克，这些对孩子来说既是真也是假。他再也没有穿旧时的长袍，上面的奇数纽扣象征着多产。他袖子里再也不存袖珍书了。他要培养不同的感情。自从他进入利物浦大学之后，他就感染了这种沉思的心境，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他喜欢上了学生舞台，并且很快获得了成功。



宝莎(Posa)：两个舞步之间的踌躇，于是统一和音乐会之间的对称溶解了，代之的是不同个体的不确定表现。

他因两件事出名，一是成了一名演员，二是成了一名强迫性的杀虫剂，整个学期他都在用特殊的乙醚喷雾剂为利物浦医院清除臭虫。

我一生当中只见过外公维吉尔两到三次，但是我可以清楚地回忆这些时刻。他在他的书房里，不喜欢孩子打扰，他微笑着向我挥挥手，让我离开，然后轻轻地把门关上。我吃了一惊，于是保留了一个意象。他像个学者，十分害羞，他们说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我无法忘记他穿的棕色的翼状盖饰男皮鞋，柔软，昂贵，走在白色的地砖上咯吱咯吱地响。他自我设计的外科工具在他背后的白色架子上闪闪发亮，阳光穿过他的烟色玻璃窗微微照了进来，光线落在白色的瓷釉和他做书签用的手术刀上，仿佛他要做一个深思熟虑的切除手术。我很怕他的房间，怕他读书的方式，他那独特的裁纸刀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暴力，我到现在也没办法把它跟读书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眼镜背后，他笑得会像魔鬼一样。据说他对什么都笑，仿佛通过这一微笑，生与死都可以愉快地摆正位置，消除过错和痛苦，但对那些敏感的人来说这种无情也可能产生恐怖。它诱使你笑回去，进入到幻想之中。他的房间及其所有装置都构成了专业性的剧院。现在我拿着他的手术刀，多少年后已经变钝了，我就这样切除那些记忆，就这样。

莲·容

在传统问题上，我外婆与外公截然不同。

重庆，冬天，山风刮来，呼呼而叫，撕扯着沿寺庙躺着、衣衫褴褛的乞丐身体，然后冲下山，片片冰茬割着人的脸和墙。

玄武季节。有能耐的人裹着棉袄和羊毛围巾，在冰冻的泥土上来回奔波。有钱的人关上厚重的门和窗户，脚下舒适地靠着火盆，给木炭扇火。其余的人则在临时搭起来的小屋里发着抖，无精打采地躺着，等待饥饿，而所有要死的人连喊的劲都没有了。外面，冒烟的海岸线盘卷成了一个黑色的毛毛虫，不停地工作，为了一口汤，上千个浑身湿透的苦力连在一起，传递着一千个摇晃着的桶，爬上一千段泥泞的台阶。这是一个台阶和咒骂的城市，顺风行驶的云彩形不成图像，淡薄的空气中响彻的是棺材铺里的榔头声，一种永不休止的风伴随着古弓锯发出长声尖叫。

在城市的另一边，我外公维吉尔·容披着斗篷，坐在精心掩蔽的柳条装置里，被带到了妓院。尽管按照新的共和国的约束，他已经娶了多拉·西德尔，但是他还得经手所有这些古代仪式。就这样，他继承了他父亲的职责，成了主检查官，一个莲花爱好者，足趾前辈，收藏品行家，脚病学权威，总而言之，他是一个脚迷。容家是出了名的唯美主义者，重庆也是出了名的美学城。不是香港那些鱼丸摊子，你可以到帘子

后面摸索一下，然后拿到一个独特的栗子，一个果冻樱桃，一个……反正这都是那些男人的语言和胆小的愉悦。共同的欲望。不，你应该知道你到重庆来就是为了莲花，你漫步在那些专业人家，穿着毡制拖鞋，享受你的时间，感到磨光发亮的坚硬地板包含着一种雅致，一种痛苦，一种愉悦，你在这儿徜徉，留心自己的速度，使自己的步子跟上梦幻般的诗歌节奏，直到你来到木制屏风设置的阳台这儿，用一只小榔头敲了一下钟，然后，瞬息之间，十几双绣花鞋从长长的真丝裤子下面伸了出来，你连脸都不看一下就做出了选择。哈，那才是优雅的享受！

他轻轻敲着椅面。再慢些！弹跳不够！到达时应该给人不慌不忙的感觉。让我们来看一下。享受一下景色；分开一些。外面的这种产业。各个民族的残忍之处。父辈们的残忍。他自己的父亲就屠杀过上千，当然不是用他自己的手，而是意识到正义的浪费和企业的效用。从大元帅到生意人，这种转变不算大。这个前军阀老的时候喜欢烧饭，用一把宽叶菜刀破记录地发送了那么多鸡头。

哈！你应该知道优秀有九等，维吉尔自言自语道。从粗糙的猴子上树到神圣的莲花，既不胖也不瘦。你看着这些人物穿着真丝裙子蹒蹒跚跚，走起路来这么纤细，一阵微风就能把她们吹倒。不过在重庆的冬天，她们从不出门。这就是她们的优雅之处；左摇右摆，蹒蹒跚跚，走着碎步……是的，柔软得令人吃惊，而且只出现一会儿，芭蕾舞女瞬时的脚尖旋转。她们的脚出生后就给裹了起来，浸在煮过的猴骨里。她们从不出门。这些女孩到哪儿去大多都是由别人带着的。但是如果你的运气好……从帘子的开口处偷偷地瞥一眼……你会看到她们在痛苦地跳着舞，就像行将死去的蜻蜓一样。有一些中国同事皈依了天主教之后，不得不吐露出这些脚的想法；行思；小脚癖。有时候，一切全在嗅觉里，腐烂的肉浸在薰衣草水里，说不出的一种甜味和酸味，最伟大的味道将你送到彼岸。但是对嗅觉不太好(或更难驾驭)的人来说，最好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加以验证，在其他的地方，用各种各样的背景。脚要摆出姿

势，供人观看：金莲藏在透明的屏风后面，让灯光照出一个侧影，这儿坐一个在秋千上，那儿留一个痕迹在雪地里。所有这一切抽动都彻底消失了。再也不会碰，也不会被碰，像脚底基因一样高贵。否则就跟你的宝贝一起消失。虽然我们有些粗俗的朋友说过，这些女孩的脚底奇痒，而且你一抓痒她就发亮。唉，老死在自己做的笼子里。永远没有快乐，唉，一个高贵的梦。维吉尔尖声尖气地说道，他说话结结巴巴，很清楚这一怪癖上所承担的沉重负荷，他挨个检查，看自己说的是单音节还是三个长音节，有时候，他那狗一样的舌头会一下子冒出三个长音节。小心，只说话，别管其他。掌握这一知识改善了我的会话和地位。

据说一个人的寿命跟其欲望的收缩成正比。脚底抽样是最优雅最道德的做法。但是金莲的出台手段却很少有人知道：脚趾要向下弯曲，那扭曲带来的痛苦；脓，腐烂，肌腱萎缩。

维吉尔又敲了一下地板，感到椅子的速度上来了。他的心在跳，跳得很快。他们终于来了。他慢慢的，安静而痛苦地下了马。他向各个方向瞄了一眼，就是没看前门。但是一切都给锁了起来，或给横木挡了起来。到处都贴着告示，红色的告示，宣布关闭这些臭名昭著的房子。根据新的文明共和国的指令。

但是……他对满脸困惑的苦力叫道……那可是一个高贵恋物的博物馆啊！在路的尽头，他清晰地看到他太太僵直的身影，带着一群乡下女人。她穿着长裙，留着刷子一样的辫子。孩子们躺在地上，盯着她的衬裙。

多拉·西德尔加入了反裹脚联盟，并于1914年被选为天足会的主席。她脚穿黑色缚带鞋，身穿形状怪异的黑色长裙。她诉说鸡眼。1923年，她说服孙中山开展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在农民中废止裹脚。一半的劳动力都无法工作，据说她跟他说，大脚意味着深的犁沟。

出了名之后，她又将注意力转向了鸦片。就连马克思也讲这事，她

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反讽，就在那一年，她被选进国际反鸦片协会。

这就是外婆布尔什维克的阶段。

亲爱的夫人：

我写英语是因为此乃根除忧郁的最佳语言，忧郁也无非是种平常的感情。有幸忧郁之人忽视了平常之本。现在我意识到，我没有考虑到自然万物，却被拖进了少数之中，围绕着他们一个可怕的世界已经诞生。友谊，唉，这么脆弱，如果我要去中国追求未来的发展，这些都不可靠，中国本身就充满了分裂、宗派、冲突和背叛。我怕我也会如此。这是文明赋予的恐怖，我已经湿了水，自已差点还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改变了我的整个生存性质。我深信你明白这种娱乐背后的危险，我只是一个行业的工匠，一个随时为你效劳的熟练工。

我常常想起你穿梭于世界之间的外交才能，你强有力的女性脚踵，我在你眼睛上重新调整过的皮肤，你鼻梁上的软骨，所有这一切都是东西方的折衷。我刻苦努力，为那些脸部畸变的人手术，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吗？在一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谁被灼伤谁在受苦？你那份纯洁和美丽不需要注意所有这一切恐怖。但是现在，你已经涉进了更深的水域。我当然无能为力。

就此作别，最后只想说我一直把你的真丝袜子贴近我的心口，放在我夹克衫内缝制的一个特别口袋里。

忠实于你的仆人

维吉尔·容

收藏

威利舅舅是一位收藏家。我第一次住在黄金别墅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点，因为那装饰品太巴洛克太华丽了，搞得我眼花缭乱。当然，那些忧郁症患者没有看到多少，知道的也就更少。但是渐渐地，影集一个房间，硬币收藏另一个房间，装订好的信函再放一间，它们开始在水晶面板门后显现，在毡面写字台的下面，在高天花板的图书馆里，你只要伸出手指，到高高的书架上去摸一下就可以拿到。出于某种微妙的关系，我才没有敢冒这个险，只是待在自己简朴的房间里，陪伴着《奥德汉姆斯词典》和奥利维蒂打字机，但是现在，这些微妙的收藏和我舅舅的粗俗举止之间反差太大，我也没什么好敬畏的了，我大着胆子开始了调查。这儿还需要来节课吗？也就是说一路与文明合作，提出这一荒唐之事？

收藏与回忆。两者似乎毫不相干。孤独之中，精神病爆发了，世界又回到了中国，回到那个阴云密布的一天，永恒不变。中国：维吉尔应召乘了一辆摇摇摆摆的德国双座飞机，福克，回到了南京。多拉现在有三个孩子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刚出生的女孩，他们住在上海霞飞路阴凉的公寓里，安全，不受暴军的袭击，仆人们则给她扇扇子，用毛巾包好的挫冰给她按摩。她有一阵因变形虫而闹痢疾，卧躺在那里。总司令在咆哮的停机坪那儿接见了他，带他乘着人造皮革豪华轿车来到了一家会所，很难过听到孙中山行将去世，给了他一份工作，就是做这个庞大而

笨拙的军队的外科主管。他不必接受。那天夜晚，蒋夫人穿着鲜绿色的缎纹衣服，劝他摸一下她的脚，让他想起了总司令那质朴的云母，这使他产生了兴趣和不安，通过这件事，军阀和儿子混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联盟。通过这件事他还想起了其他的事情：出事的时候他拼命赶回上海。更名，化装。夜晚，火车十字形地经过北方，无情的节奏，无止的节奏，令人晕厥的夏天，他在沉寂之中听到了颤抖着的心跳和火车头的嘶嘶，穿制服的男人迈开大步在车厢里来回走着，发出皮革和汗水的味道，从木帘的缝隙往外看，无情、无止的节奏噼啪作响，首先看到的是他的圆面孔，他的头映在玻璃里，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人头，跟着无情的节奏一条线排列起来，像西瓜一样从路基那儿滚过来，盲目的火车及其无法停止的节奏，窗帘遮闭的车厢，所有这些一起钻进了一切为二的夜晚，周围是正在喷洒的动脉。但是人们什么也没看到，维吉尔记得。不过，他记得最多的还是上海，那个危险，流动，多变的地方，夜晚下着雨，下午下着雨雪，雨伞、长袍、香气十足的小脚女人，风中掀起的旗袍。

小妾对他来说并不新奇；如果特别的好，有钱的人可以分享，小妾最终一定能得到一大笔钱，除非另外出现一个男性后代。当然，他们过去是大张旗鼓地宣布这种结合，敲着锣打着鼓，还有合仄押韵的声明。然而，可协调的世界和已交换的文化结束了另一笔交易之后，再沉默不语就感到奇怪了，这一举动的开场白就是基督教的罪孽。

光。福音主义之光，双重标准，低瓦数，给我外婆的记忆加了油。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虽然受了西方的教育，而且是班上的佼佼者，她说，但还是回到了几千年前的有效实践。没有一丝精神压抑的迹象，她在其《钦定版圣经》的衬页上写道，然而我们却出现了偏执狂型固着。她的同事回到了英国和加拿大，死在了精神病院。此外，维吉尔一天对她说道，中国式的婚礼不是法定婚礼。所有的约束都跟经济有关，小妾非常经济，为他地位的上升做好了准备。

就这样，我的外公也是一位收藏家。他从不记得她们的名字，只是按照老办法给她们排序。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我发现了给太太的其他信件。在我的幻想里，这是一个聪明的男人，从一个曲线跳到另一个曲线，而且，他早年注定就很贪婪，是那个时代最放纵的一个人，但到最后，他还是跟那些看法不同，但却更有势力的人分道扬镳了。为什么，这很难说。也许他已经看到了前面的事情。

于是多拉·西德尔读起了词典，扒找着正义和标准，维吉尔·容则变得内向，寻找着自己身上的螺旋形潮流。伟大的时刻都离二人远去。可以这么说，通过这种小的挫折，我的外婆和外公开始渐渐分道扬镳。

在容家

维吉儿留着腮须，不大喜欢孩子。我们叫他外公，或爷爷。他穿着拖鞋，我们过来的时候就待在他的房间里，把门关上。

哦，尽管他是军阀的儿子，他既不坚定，也不残忍。是他的兄弟，我们称其为查理，是他接管了军权，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得以晋升。

哦，外公一生大多在研究颚骨和脸，并致力于碎片的应用。

哦，他说话时充满了痛苦，似乎结巴，老是字句重复，希望驱掉它们，或将它们牢记于心。

哦，还有件事毁了他的公众生活。这就是他拒绝接受政治，认为政治荒唐。我们都在玩游戏，他说。

哦，我能看到太太执拗的眉毛遮蔽了他的脸，这是记忆和摹拟嫁接的结果，是他演员般对表情和姿势的快速掌握。

哦，南京经历之后他反应迟钝。他出现了一时的麻痹，有人会看见他站在运河边，或盯着山峦，一动不动，冻结在那儿，仿佛他想起了某个记忆痕迹，又无法前进，鼻孔里塞的都是些燃烧过的尸体脂肪。

哦，小的时候，他父亲小妾中的一个，他记不清是哪一个了，十分宠他，给他做衣服，为了他更加荣耀的角色。

哦，还有查理·容，[illegible]，[illegible]得汗流浃背，他那光泽的头发依然还留着理发师的滑石粉，他穿着便服，细条子。看到他沿着大街跑到渣打银行，将钱提出，全部汇到美国。看到有两个人拦住了他，一个人拿着

一支枪顶着他衣服下面。他们将他推进一条小巷，一把刀片顶着他的肋骨。这么快，就像外科医生的开刀，他最后的姿势就是努力擦掉支票本和债券上的血，他知道他下一步只能经鹅卵石到供水管那儿。

维吉尔说道：我得到了查理在香港的消息。我在吉米的厨房里，和以前的上海人混在一起，听共产党胜利的报道。侍者递给我一份电报。我已经在澳门买了一家有利可图的纺织厂和一家境况不佳的货运公司，查理不想经营它。这是我的第一想法。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另一个兄弟，兄弟加儿子，儿子加姐妹，一直跟着我，跟着我的沉寂，在他们的身上，我得多花些，就跟我的大儿子一样。这是中国的方式。然后我往回上了山，来到医院。那天下午我做的手术很厉害但却很成功，仿佛我的兄弟的死证明，犹豫不决有的时候也会产生坚定的效果。从那一刻起，我割破了过去的喉咙，逃离了政治。是的，就这些，滑石粉。查理总是有股滑石粉的味道。

哦，点点滴滴的生活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两种文化。他记得最多的是那些阴云密布的日子，它们保护了他免受群体事件的恐吓。他在重庆的支流附近看到的一群群黑鲸，还有水下的乌云让他头晕。他想，这点非常中国，但这点并没有给他力量。他紧紧抓住不放的唯一力量就是他得离开真实和想象世界的非凡能力，仅仅生存在研究之中。重庆：多雾，辣食，性。

哦，蒋给了他一套书写工具，放在一个雕琢精美的木头盒子里。

我永远有两支笔。一支是给我的：昂贵，点缀着种种欢爱和赞美，十分灿烂，它使我的花瓶金碧辉煌。我不用它。我甚至连碰都不碰一下，因为它有股死水的味道。但是另外一支给我弄脏了的则吸引我进入了英语和英国记忆。靠着这支笔，我记录了上百个我在利物浦医院修补的外国面孔，将没有脸形的哭号和烧焦的骨头改造成一种特殊的风度，脱离了公众视野的恐怖，每一张被烧过的脸，每一块芥子气伤疤后面，

都有一张亚洲面孔；这是最快给展现出来的面孔，是唯一可能改造的面孔，仿佛这个种族的表皮松解产生了最令人生畏、最令人憎恨的对立面。对于这些人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普遍化问题，而是必须面对未知、成为中国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自现在起，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帝国里的序言和补遗问题。脸和命运：一个你可以拯救，另一个你无法挽回。

但是我父亲那会在哪儿？他在干吗？

金子！金子！金子！

一个疯子跟一个天才只差一个楼层。

亚瑟·叔本华

这里就是金凤凰夜总会，坐落在北四川路的尽头，靠近亚波罗影戏院和西童公学女校。瞧这些为上海的夜晚而改变的女孩，穿着紧身衣服，上台阶时有时一次一个梯级，模仿裹脚。瞧这些女孩进入夜总会时是成串，出来时要么落单，要么跟着一个男人，或懒洋洋地靠在门边。瞧他，走在她们后面，一次一个梯级，爬上非常陡的楼梯，有时候，他会抓住一个女孩的脚踝，把她留在那儿，然后将食指塞进她的鞋子，搔她脚的痒。楼上则是夜总会里可怜的系列歌舞综艺表演：魔术师，兔子，还有跳踢踏舞者，背上留着胎块，大腿在摆动；然后是俄罗斯脱衣舞娘，那乳房像肉馅饺子似的，然后是终曲：已经到了早上，他们携带着身穿紧身长裙的女孩和她们清纯的脸亮相，一起唱歌，那副表情十分爱国，仿佛有一天，一个好日子，你们这些外国鬼子都将被油烹。

这就是我父亲喜欢的。这种尖叫也是他爱慕的。这是时刻跟他讲的都是真话，这点他打骨子里知道。就像他要死去的时候，他说没什么好遗憾的，他很幸运在中国，在上海开启和关闭了的很多人生篇章。他很舒服，四海为家，也很有天赋。他是外国人。他只住在高级公寓的顶楼。但是他把留下的钱挥霍一空。真的，每到星期六，他就骑着蒙古马

到赛马场，他的肘关节很有劲，而且人很重，但是别人总是让他赢两到三圈，因为他有相等的机会，而且赛马的赌注登记经纪人们还会给他一些回扣。看着那些皮肤白皙的女孩翘首看着，他感到他的两条大腿在疼痛。小马在下面波浪般起伏。有些下午他会站在学校的墙边，听孩子们在俄罗斯教师刺耳的声音下进行钢琴和小提琴练习。他可以重复一切。这是他的真正天赋。阿纳尔多是一个了不起的模仿者。当然，如果他闭起眼睛，屏住呼吸，所有他的世界就会撞在一起。在吗啡的作用下，一切都一样；可卡因也是如此。但是最微妙、最清晰的还是他对每件事结束后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的全程回忆——这些已经成了女儿生存儿子死亡的家庭电影。

1933年至1937年。埃尔维拉和他短暂而匆忙地参加一个社交宴会和正式宴请，并和一些老朋友做了些略伤大雅的举动，然后便举行了别人看来是最幸福的一个婚礼。但是他却有股说不清的忧愁，有点像失落，但却有个未来时。会过去的。没什么，只是一个恼人的怀旧而已。他干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去了法国总会，跟罗洛·嘉道理聊起了这事，嘉道理拥有槟榔橡胶，在法国供应米其林，罗洛的风流韵事比他吃的饭局还多，两个人走在一起，有时候，但是大家还是认为大多数时候，他认为跟每一个女人吃饭都是一种韵事……罗洛用圆润的嗓音给他提出了建议。他坐在休闲室的大窗户边上，排列起了空的香槟酒杯，有股熏衣草的味道。

我告诉你，阿纳尔多，婚姻，就像中国人说的，得咸一点，湿一点。如果别处受伤，你还是不舒服，感到疼痛，但是欲望都麻木了。娶了小妾吧，不行的话就找个情妇。但是不要去妓院。你得绷紧这根弦，就像车上的轮辐，一个顶着一个。你的情况很平常，相信我。

罗洛说出了他的所有建议，然后又加了金汤尼鸡尾酒，阿纳尔多只能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他的戒指碰击他的腊肠指，尽量不去看罗洛那只在不太黑的眼镜后面一动不动的假眼，同时很庆幸自己一切正常，他在

想象着罗洛的印度籍妻子卡维塔开着希斯巴诺-苏莎车到处兜风，车顶顶篷拉下，她的围巾在她身后飘拂，白边胎在潮湿的沥青路上嘶嘶作响，沿着宝山路，经过俄罗斯教堂和希望门，到了虹口娱乐场，拎起她真丝般细腰，后来有一个星期天，她将长腿搁在座椅上（他已经在她湿漉漉的黑发上撒上了金粉），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叫，穿过他的耳朵，听上去像是乌尔都语或泰米尔语。阿纳尔多陷入痛苦之中。爱情永远是痛。我有这个才能。卡维塔，亲爱的。他紧张地帮她整理了一下纱丽，背上汗黏黏的，他的戒指碰到了水晶边，结果一脸降 B 调似的那么严肃，他们一起喝金酒……他在模仿罗洛……整瓶整瓶的用潮湿的毛巾包着，储存在一只木头箱子里，里面都是他们冰厂送给他的冰块……得来点新鲜的东西，他们得等待冬天或下一班火车去哈尔滨，去寻找一些肯吃苦的苦力到远处的山上或冰冻的湖里给他们切割石板……卡维塔真是个老手，不断给他加金酒和冰，让他痛苦中还保留着些温馨。事情会紧张的，但也正是这时他听到了从生活中抖出的音符，每一个音符都像水晶一样，比他要大，但都可以复制。从小时候起，阿纳尔多就有这个天赋。声音不仅仅是世界上机器的摩擦声和震荡，而是被隔离后所产生的清纯，每一个声音都体现在乐谱及其重复设计中。第一次听说的时候他感到头痛……在他的母亲们居住的房屋外边等着乘轿子的父亲（轿夫在地上打牌），涂好脂抹好粉的女人夜晚唱着咏叹调；你的母亲在哪儿，你的妈咪？死了，你出生的时候你母亲就去世了，他父亲一边大声读着雨果，一边对他说道。每个女人都成了他的母亲，包括埃尔维拉，他的新婚妻子。他热烈地追求埃尔维拉。他叹了口气，不知道已经避开了他的种种神秘，卡维塔误认为他的哀伤是他感到快乐的时刻。所有的音符都错了。你抓不住的东西就成了一种侮辱，他说，呼吸着卡维塔身上的香气和淡淡的，但仍令人感到激动的金酒味道。阿纳尔多善于造事。为别人，为波梅鲁瓦先生的果园。

远处的轰炸震颤着上海。(那时)波梅鲁瓦先生正在观赏日落西山的景色，此时此刻，他猛地发觉自己的果园被美丽的夕阳所映照，呈现红红的（一片）……

《上海日报》

他昨天胜了三次，阿纳尔多告诉卡维塔。我给痔疮害得痛死了。你知道，如果你坐不下来，你就开始思考遗产的问题。如果我有儿子，我会把一切都给他，他说。

包括痔疮。

除了你从不知道你会生产出什么样的毒蛇。

我除了……

不，不，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可能生产出。你知道，新闻控制了一切。给了我儿子许多钱。无法给你，你知道。

埃尔维拉怎么样？

她在受罪。每一天都在受罪。我想让她避开脂粉。普通就是无痛，我告诉她。

回到华懋饭店房顶的阁楼上，他在前额擦了点曼秀雷敦。他坐到大钢琴前，这是他叫了二十名苦力，通过滑轮，从大街上吊到房顶的，就像古代埃及，他对前来参加庆祝聚会的朋友说道。他演奏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演奏得无可挑剔……开个玩笑。然后他开始了他最喜欢的一组歌曲：《那些傻事》，《世界在等待日出》和《巴黎的四月》。有人在敲门。这是楼下的家伙。怎么了，他无法睡觉？告诉他这是饭店，没人在这儿睡觉。告诉他这是上海，不，这家伙是个音乐家。他喜欢音乐。他来举办巡回音乐会。不是开玩笑？让他进来。你说你的名字叫鲁宾斯坦？我知道《火鸟》吗？我还不能说我听过它。我演奏的第一首音乐？不，听到楼下有人在弹。嘿，那一定是你。你在举办巡回音乐会？祝你

好运，这就是我能说的一切。

那可是真本事，第二个周末，卡维塔在赛马场边对自己说。各种事情吵得他心烦意乱。那可是天赋。只需要听到一次。从小时起就具有这种天赋。让他头疼。不，如果他有儿子，他既不会给他天赋，也不会给他回忆。他会给他金子，他说。金子，金子，金子。这不会受罪。你想知道点我的旁遮普小朋友？金子能浇灭火焰。各种火焰。你和罗洛之间就是这样吗？

她打了他一记耳光。大家都看见了。登在《大美晚报》的第二页，登在同一个版面的还有日本人侵的故事，天花的爆发和土匪的宠物丝带。就像自行车的轮辐，所有一切都陷入紧张之中。一个星期之后，她收到了第一组礼品包装盒，里面是精美的真丝衣服，罗洛受不了了，于是起诉离婚……除非……

除非他在上海滩最大的扑克赌局中赢过黑帮老大杜月笙和拥有几家有趣船厂码头的阿纳尔多·卡斯特罗。然后他才能容忍这件事，看在面子的分上，哦，上帝啊，想想他那黑黝黝的苔丝狄蒙娜很快就会让他戴绿帽子，为的是让他成为一个君主。至少这就是她跟他睡觉时这么暗示的，她说她会给他戴上金子的皇冠，她的舌头紧贴着她的上嘴唇，就像她喜欢在那儿留着金色粉尘一样。有时候罗洛都认为他的太太脑子有点不正常。

焦虑性歇斯底里

参观学校。术语定义。几个建筑笔记和一些闲言碎语。

鞋上的潮湿标志使我想起了失败的婚姻。它们留下了一个焦虑的痕迹。香港正在下雨，我也到了中年。

目标。目的。

克拉维迪亚·恩格尔。

谁?

一位教授。我认识她多年。她让我准备一份研讨论文。

克拉维迪亚在富丽华大酒店的大厅里跟我碰了头。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她穿了挤脚的小鞋，鞋带随时可能会断。她风度非凡，涂着黑色口红，辅音从喉咙深处冒出，她竟敢厚颜地给你送来平凡的异教徒。她那庞大的手提箱里携带了一箱子香烟，说起话来深思熟虑，简明扼要，像哈佛大学得奖人一样言辞凿凿。克拉维迪亚·恩格尔说她很想引诱我参加这个研讨会，然后又忍不住笑了起来。不要把我说的一切都当真，她说话像唱歌，带着浓重的德国-俄罗斯口音。外国人讲英语总有一套，让生活充满刺激。她很胖，但很迷人。她倒是适合威尔地的歌剧，如果她没那么敏感的话，这点非常聪明，操作起来完全像是在密码演练。你可能是在跟一个海豚打交道。

我的课需要你……做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转动着手指……就是戏

仿传记的作者。

我已经不写这类传记了，我感伤地说道。

这是真的。我已经写了太多失败的生活了。我已经变老了，成天拿着卷起来的报纸，哀悼失去的事件，凶险的狗，爱追问的学生。我不顾我的抗议，握着我的手，谈论着她的文化翻译理论和她应该支付给我的演讲费。从这儿我翻译了钞票。她举杯贴耳，一头泰坦式的头发落在脸上，一簇还在滴着金酒的头发一直在杯子里摇摆，我不得不把它撩出来。喝了半打马提尼酒后，我同意了，她摇摇晃晃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握着我的手，看上去好像要吻我的嘴唇，但是在最后一刻却滑进了另一个跑道，小声地嘀咕了一下巴黎。她的脚很轻，一个歌剧风格芭蕾舞女。然后她消失在香水和香烟的迷宫中。他们说她是某个伟大哲学家的真实后人。

这提醒了我……

我父亲走起路来不知道为何总是一瘸一拐。我最早的记忆：我一定是在童车里，因为世界走得很平稳，在石油的驱使下来来往往，就像城市的地平线握在我手中的钢笔里，随着我的钢笔的转动，一暗一亮。香港潮湿多雨，在中国老街中流淌了过去，人们拎着藤篮，来去匆匆，篮子里充满了蔬菜、钻水鸭、流着血的鱼头、水和金光闪闪的蛇。有一种语言，但已给舌犁过，在生姜罐中回响，我很快弄清楚，这是我那无畏的父亲带芒刺的声音，他故意在我面前大步行走，满嘴汉语和葡萄牙单词，谁都有可能成为多余。背后则是真丝的飘动。也许是我的母亲，但更有可能是我父亲最喜欢的女儿，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斯特拉，她那黑色的面庞和要命的美人痣使得她在媚登峰[1]上做了上千个迷人的内衣广告。斯特拉十分迷人。斯特拉的歌唱得也很好。后边还会更多地讲到她。

① 媚登峰，知名女性内衣公司。

当时我正看着我父亲的瘸腿，我在童车里，他带我去看他说是香港最好的建筑。这个建筑叫做嘉道理大楼，有三十层高，是香港大学的一部分，我想它现在还在那儿。它里面有古今语言系。三十年后我回到这儿和克拉维迪亚·恩格尔见面，封上一轮旧的记忆、语言学成果和可怕的发现。克拉维迪亚是关键人物。

眼下我父亲又是喊又是唾，动用一切他能够动用的形容词。东方最伟大的成就，他说。美好辉煌的！在我的童车里，我能看到的只有一幢普通的大楼，对称的双塔，直冲天空。这不是意义重复。有些东西可以是对称的但未必是双的，反之亦然。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外表和生产。双生是在生产过程中，一起带出来。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斯特拉是双生的。她和我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伊尔玛是同时被怀上的。但是一个就比另一个有优势。一个人在子宫里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是机会决定了这点，不是均衡。机会统治着世界。

为了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我父亲扯开了嗓子在说话。我看到一只鱼头在伤心地吸吮着一滴自己的血。然后我看到我父亲一瘸一拐地走着，好像要跳舞。他舞跳得很好。我有奖章可以证明这点。锡质奖章，奖励男女舞者，女的展现出优美的长腿。我从童车里跳了出来，从轰隆叫着的门口逃了出去。我们进入电梯，开始向天上升去。我父亲在说着话，我姐姐则穿戴打扮着。我们来到嘉道理大楼。这幢楼是罗洛·嘉道理为他死去的妻子卡维塔建造的。卡维塔是我父亲的情人。我推测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就是从这儿来的，这也是她们不喜欢我的原因！我有中国血统，我推着我自己的童车，她们则来自另一个世界。

父亲和卡维塔。在这个充满机遇和赌博的世界里，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她有一种本事，就是在迷失的时候能将舌头顶在上嘴唇上，并在洁白的牙齿上转动。父亲说她就是这样迷倒了许多男人。一个维纳斯陷阱。我的意思是说，你无法抵抗。清洁了牙齿，下去。我们突然之间又来到了底层。父亲气坏了。顶部的铜牌并不等于美丽的卡维塔。只

是建筑师亨利·王。这些家伙是干吗的？我父亲喊道。妄自尊大狂？只要是从个人偏好出发吃不准的他都使用这种语调。我父亲解释说楼是为罗洛的美丽太太卡维塔造的。她自杀了，我父亲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事像幽灵一样一直萦绕在罗洛的心里。就连死了，他也在嫉妒她，心想就是在梦中，她在到处漂泊的过程中，她还在吻着她那些男人。所以，根据地卜者的建议，他按照双墓的模样建造了这幢楼。看到顶上那些扇贝了吗？北印第安人的双墓形状。他的想法就是把她囚禁在这座墓里，这个古今语言系。她永远也出不来，因为卡维塔语言不行。她从没想去学点什么。不管怎么说吧，这幢墓/楼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他们叫它迷宫。

我们出来得很容易，斯特拉说。

是的，因为我们有天赋。一旦你迷路了，你就走边道，走对角线，然后，还没等你明白，你就在半夜里走了出来，如果有人，尤其是女人问你如何走出来，不要告诉她。

为什么？

这当然是因为卡维塔的幽灵。她是你的母亲。我们不想让她逃出来。

我父亲跟他女儿讲了很多。他跟我从来没有那么多话。无论什么时候，他想找我谈话，那都是他需要一个听众，一个第三者。这样他就可以向我展示他想说的话。我想提醒他过去或未来发生的事情，他的金笛，他的所有与众不同的世界。他的上嘴唇有一个伤疤，一演奏伤疤就会抖。

这使我想起……

焦虑性歇斯底里。我深受其害。睡觉也睡不着。不断变换着位置，一会儿一条腿伸出被子，一会儿是另一条腿。这样你变换着你的梦，但是你主要的还是进出于不同的世界，进行徒劳的反抗。这就是坐立不安

者，慢步行走者和夜行者的状况。就像是将一只龙虾藏在你的屁股后面。先走路再说话，你第一个记录在案的记忆就是嘉道理古今语言系的模糊双塔。由于用腿不当，我的两条腿开始疼痛，我请教了一位医生，一位伏都教人士，一位男巫士。是胫骨？一根骨头，但是也是一个古笛。

对我而言，它演奏的是“传盲”。我这么叫它。一种消极感受力。是死者因缘的痕迹。世界就在翻译之中。它那令人忧伤的幻想一会儿将你举起，一会又将你放下。各种声音在骨头中回荡。它让你失去视觉。一种神圣的黑内障。瞧我现在，眼镜背后什么也没有，只有先前死者的一个副本。绝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摔，静静地跌落在空虚之中。失明了，但是你能够听得到。传响：一个柔软光滑的声音，从身体的一个器官产生，再通过另一个器官发出。罪犯收容场所里发出的声音。我随身携带着这些回声，无法控制这动荡局面。

这使我想起了……

你当初的记忆：一个高大的建筑，随着世界的滑行，你也起来了，它将你举起，又将你扔下，在这里你第一次听到了“传盲”的音乐，你的腿痉挛地在抽动。

隐藏起来的东西

我五岁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恐惧。我怕光。

也许记忆本身就到了法定年龄。我藏在桌下，藏在床下，只有在黑暗封闭的空间里，我才能感到幸福。只有在黑暗封闭的空间里，配上一本书和一束微弱的灯光，我才能属于自己。仿佛世界和书本彼此互补。非常合适。我认识的那些人让我感到害怕，长大了之后我发现，和那些常年客待在一起十分累人，他们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而且还想窥探我的秘密。我宁愿外面大街上那些熙来攘往，不知姓名的流动人群。我讨厌仆人，讨厌亲戚，尤其讨厌在其朋友面前，我父亲逼着我们要行为端庄一点，无休无止的钢琴独奏，而且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和我还要相互比出高低。我是五岁时开始喝酒的，分手告别的时候我会把威士忌杯子喝干净，厨师不在的时候我会大口喝掉厨房里的啤酒。有时候，我会和我的狗一起分享。一切没有多大改变。我依然挂着 17 世纪日本的禁忌标牌，杯子里倒满淡淡的啤酒，将狗释放，随它跟哪个不受欢迎的呼唤者走，只有到了夜晚才专心写作。我穿上黑色的日本和服和日式厚底短袜。它让你自由地去应对残酷的过程。

我外婆穿着黑色的系带鞋和长长的没有形状的黑色衣服，使她看上去很僵硬，她身子略微前倾，那样子有点吓我。她比修女可怕多了，修女们戴着尖尖的面纱，讲着一口美国英语，她们看上去聪明活泼，思想进步，如果你能背出美国三十四任总统的名字，她们就会给你甜圈饼。

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很喜欢美国修女。他十分期待去参加学校的音乐会，因为他迷上了科琳修女，一天夜晚，我们在和香港儿童合唱团排练《老国王科尔》的时候，她的一簇淡褐色鬈发从面纱后面露了出来。他说美国的修女跟三十年代随船来到上海的美国妓女一样漂亮，而且比她们更迷人。《老国王科尔》每次排练他都到场。我演奏小提琴，作为三名提琴手中的一员，我得加把劲，因为我是在用我叔叔达里奥的斯特拉迪瓦里[①]提琴在演奏巴赫的变奏曲。这些事情都给藏起来了：斯特拉迪瓦里提琴、我的叔叔达里奥、学校女童、科琳修女、三个提琴手。我父亲会阻止演出，他会辅导我改正一些错的音符。他告诉科琳修女我是一个天才，接着又说她也是个天才。她很年轻，非常害羞。音乐会的晚上，他让她从小扁酒瓶里喝一大口威士忌。但是在整个演奏过程中，他得坐在罗斯修女边上，罗斯的名字用广东话来发音有点像老鼠。她老了，为人有点生硬粗暴，她的鼻孔里毛也长出来了。不管如何，老鼠修女跟我父亲说了点事，让他很烦恼，此后他再也没去过学校的音乐会，而是满足于在家里辅导我。我获得了所有的音乐奖项，当替换教师雷德曼夫人给我一把银色的小竖琴时，我问起了她的丈夫，令她大为震惊。我父亲告诉我雷德曼上尉过去在英国陆军服役，56 年发生暴乱的时候他们作为外国援军得睡在一起，他们为彼此的打鼾打了一仗。

我用一颗小的山核桃打中了他的鼻子，我父亲说。于是争吵终止了。

那可不太公平，阿纳尔多，我的外婆说道。这不像英国作风。

啊，我并不是英国人，多拉，我父亲会说。我确实狠狠教训了他一下。

---

① 由意大利著名弦乐器制造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制造的提琴。斯特拉迪瓦里与他的恩师阿玛蒂和他的同行师兄弟瓜尔耐利做制作的提琴被后世称为“三大名琴”。从那时至今，几乎所有世界著名弦乐演奏家都以能拥有一把大师的名琴为荣。

尽管他争辩了很多，但我父亲和外婆处得还是相当的好。也许是因为她只找周二来访，而他又不在家，我呢则在床下，知道她的视力越来越差，耳朵也不灵了。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仍然像名操练教官。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十分暴躁，而且还是什么乱七八糟协会的主席，这些都没有当我的面提起过。我父亲说多拉是名新教徒。也许这就是原因。他说我们不应该相信她说的话。

那年，我外公维吉尔去世时，我母亲黑纱戴了好几个月，将死亡带给了我们。我的一个同父异母姐姐将我拖到一边，对我说：你的外公穿着长袍和毡制拖鞋，提早退休了。他过的很幸福；他是一个整形外科医生，拥有一家服装厂和货运公司。人们不应该伤心。

有一天，我们访问了我外婆的学校，一位黑人将我们带到她住过的房子，他戴着一顶豹皮毡帽，脖子上挂着一只骨哨。趁没人注意的时候，我溜进了我外公的房间。他的床上没有床垫，很硬，上面盖了一张藤席。他的枕头原来是个陶瓷罐。他的写字台上有一令正方形的中国纸。据说他雄心勃勃，想写本书。所有的橱子和箱子都空了，有股樟脑和万金油的味道。在一个一定有二三十个小抽屉的箱子里，我发现了一对很小的真丝绣鞋，看上去好像不适合她穿。我身后传来了一阵噪音。尽管在半明半暗中外婆看不到我，但她知道我找到了什么。这些是玩偶，她说。她做的是圣诞礼物，准备送去尼日利亚的。但是我一刻也不相信。

慈父

从他身上我们更多地知道了一点我父亲的女人品位。

就在维吉尔像蚂蚁一样积攒自己的财富的时候，欧洲发明了斗牛舞。1924年，我父亲在上海一家舞厅里举行的斗牛舞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以前没人见过这种舞。他和卡维塔·嘉道理在科斯莫俱乐部一起跳，她站在地板的中间，怒目而视，黑裙已给汗水浸湿，她经历了一种最为暴露、最具裸露的色情展现。然而他则一心瞄准奖品。

当他讲述跳舞的时候，他强迫我们祈祷，他一边说话，我们一边大声背诵玫瑰经，不许我们停顿时间太长，他将我们的祈祷和叠歌“荣耀归于圣父”联结在一起，很难想象在旧时代，他一回家就强迫我们跪下来，给他问安，亲吻他的戒指，说：欢迎爸爸！他是严格的天主教徒，他说他公司里有许多人到他跟前，跟他坦白他们的倾向。他说多丽丝·利德比特，那个充满浪漫幻想的英国女人，说他应该成为主教，“荣耀归于圣父”唱了几个星期后，我父亲没有去办公室，直到有一天中午，他居然下午四点半就回来了，他穿着一件真丝的吸烟服，在我们的小房子里来回走动，对着他特制的放在冰箱上的圣犹大塑像祈祷，我们要得到许可才可开冰箱，生怕圣人倒下来，如果那样，那真是厄运当头了。这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安静的时刻，他的时间大多花在家里，这也是我童年最恐怖的时候，他说我们应该跟他一起去远游，并给我们每人买了一

条牛仔裤和瓶装水，一天，他带了两条阿尔萨斯狗回家，他称它们为苏丹和王公，他在圣特雷萨教堂后发现了一棵弃树，用来做了一根旅行拐棍，并在上面刻上了“荣耀归于圣父”，我们第一次旅行的时候，来到了一片小竹林，伊尔玛大叫蛇，我们全都跑了起来，不知道她实际上是在小便，结果拐棍也丢在竹林里了。“荣耀归于圣父”，于是我父亲就让我们将耳朵贴在九广铁路线的铁轨上，听着火车的声音，我们得闭上眼睛，他告诉我们，共产党如何会超过我们，火车经过之后，他指着货车车厢说里面有棺材，然后他建议我们去寻鬼，并带我们来到山坡上的坟墓这儿，他说有些坟墓在战争中被日本人的炮弹给炸开了，鬼给放了出来，只是无目的地到处游荡，把村里人都吓坏了。我总是把他们带出来，他说，带着我的玫瑰念珠，一看到这，他们就消失了，“荣耀归于圣父”，我父亲最喜欢用的词就是消失，后来才成为西班牙英语中的及物动词流行起来，这很容易，他说，让人们在这儿消失，“荣耀归于圣父”，回到家后，他决定教我们下棋打桥牌，我们做梦都在思考着这些概念。只有斯特拉轻松地掌握了叫牌，诈唬和游戏的残酷性。我要让你的王后消失，她会说，然后砰然一击桌子，“荣耀归于圣父”，一天，我长的够得上我父亲书架的顶层了，发现了他那些秘密的书，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书，而他从来不看，我在书架中发现了《美国女人的性习惯》，两眼盯着那些图片，但是最使我迷恋的是性交后的忧愁那一章，忧愁，一个始终困扰着我的单词，正是这种性交后的忧愁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得性习惯和美国女人特别的吸引人，由于我的忧愁特别好奇，于是我开始观察教我读书的美国修女，她们既携带着怜悯，又充满了欲望，没有一丝忧愁的迹象，“荣耀归于圣父”。每到星期天，我们都会穿得十分整洁，排好队，等着车去教堂，他不让我们伸手去招呼汽车，如果车子不停，他会追赶过去，有时候会用警棍狠狠地敲一下，这根警棍上包着真皮，里面是铅，如果司机停车走了出来，我父亲会威胁要揍他，如果警察赶到，我父亲会拿出他的徽章，说他是在例



行检查非法移民，“荣耀归于圣父”。到了星期天的晚上，他会给我们读大仲马和雨果，尽管他一心想做一名好父亲，我们都希望他不会进入这种半退休状态，因为这让我们大家都很累，只有母亲除外，她脸上的笑容倒是多了不少，就连她在呕吐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很快，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停止了打斗，这种离不了躲藏和愠怒的休战并不稳定，我们当时都不知道父亲已经失去了他的生意，失去了他的储蓄，失去了他可怕的夜晚乐趣，每天中午到下午四点之间他都会去赛马场，去给达里奥疯狂的特蕾萨按铃，想得到点小费，所以圣犹大塑像就是她的思想，说它可以驱走鬼，这倒是真的，因为就是一身汗，在充满泥泞的思绪中奔波，他夜里也不会醒，他不会为偿还不了的债务恼火，但是圣犹大从没让他赢过一次，确实，圣犹大是绝望者的希望，是失败者的圣人，“荣耀归于圣父”。还有其他的鬼要谈，舞之鬼，那些鬼迈着轻快的步子，死去的卡维塔就是一个使人受不了的舞鬼，这得归功于她的老师，教授，主教，“荣耀归于圣父”……

身体

童年之景。下旋命运。又是骨头。

生命无通译；只有强健的记忆。

没有什么记忆比搬家更强健的，这是境况与性情的更迭。从一个国家搬到另一个国家。早就谣传要把我送走。1959 年，在香港，父亲再次失去了一切。虽说他对此已司空见惯……他说无处藏身有时也未必是坏事……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极大的创伤。

我从学校的屋顶上跳了下去。

那时候跳楼很常见。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一群人会练习从高高的秋千上往下滑，仿佛在进行跳伞训练。后来我们爬上狮子山公园附近那所学校的后山，从壁架往下跳入冰冷的水库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名叫普洛斯彼罗·达·科斯塔，没有跳好，脑袋撞在了混凝土墙的边上。那天下午他就死了，于是我对其他人说道，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应该在第二周再跳一次，但是没人跳。

没上学事前我就开始跳了。四岁的时候，我父亲拉着我的手，强迫我从烟囱上跳到我们家房顶。在赤柱监狱旁，也就是伊尔玛的第一个丈夫给提升为副监察的地方，我父亲迫使我们从长长的桥墩上跳到海里。我还不大会游泳。所有这些跳都没有制止我对高度的热爱。这使我对死亡更加热切。穿着卡其服的囚犯一身汗臭，他们一边正步走路一边唱

歌，空气中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有一天一大早，我们给绞刑惊醒了。整个监狱都在唱歌，然后整个监狱的歌声戛然而止，伊尔玛说如果我们仔细聆听，我们能够听到关门的声音。但是我们听到的就是隔壁卧室里的门，我父亲伸长了脖子在匆匆扫视身穿衬裙的俄罗斯女人。在上海，我们有很多俄罗斯人，我父亲说，上了绞刑架。

到了 1959 年，我们从所有那些跳过的地方搬到了太子道上一幢公寓的四楼，一个很小的公寓，一边俯瞰着加油站，另一边则是一个院子，里面养着尖叫的鸡，搭着帆布雨篷。所有的窗户都有栅栏，无法跳，但是我设法将纸折叠成了转球扔给外面的世界。在编码组合中，它们随着虚幻的希望在短暂旋转、停顿、高飞，最后却偶然发现掉落在鸡屎里，或落在潮湿的垃圾上，垃圾的主人住在狭小龌龊的地方，有五六户，条件比我们还要差。这种跌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而我们却没有一个人识字，于是这就出现了最后的终捻：这种跌落不会有翻译，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是地狱的另一种循环。我们不得说出我们的滑行。我们不得说话。于是转纸就替代了跳跃，一种经文匣，一种生存暗示。但是在那个箱子主导的空间里，页码意味着汉字，一切都可操控，十分自由。

外面则是一片混乱：巴士在早上最黑暗的时刻穿过洪水，婴儿被扫进了下排水沟，山腰塌方，大火烧坏了建筑，留下了一片黑色，隔壁的棺材铺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他那沉重而细长的棺材吱吱作响，顺着楼梯而下，我们则从观测孔里观看着，深信死去的人已经被搬运出了我们的门槛。但是等到变换学校，换到较高一层的学校时，我下定决心再跳，不用伞，也不用人看。

那天下午，米格尔·里贝罗呕出了燕窝，得送回家，那天下午，我因背诵吉卜林的“划桨奴隶之歌”而得到了一只鲜绿色的水笔，那天下午，约翰尼·夏洛甫，那个疯狂的印度尼西亚小男孩，被赶出教室后，不顾警察搜索，经下水道回家，结果从城市的另一头出来了，无论何



时，只要数学老师说出小数，玛格丽特·麦考马克都会莫名其妙地放出一个非同凡响的屁，但是那天下午，她却突然将屎拉在了裤子里，那天下午，霍华德·方在班级后面的院子里种了一块大蒜，并告诉我他父亲买下了一个农场，他要到加利福尼亚去，那天下午，贝尔纳·佛朗哥在回家的路上再次解开鞋子，然后将鞋子绕在脖子上，说是为了保护鞋子，因为他的父亲也失业了……我上了楼梯，经过正在阳台上啜饮金汤尼酒的英国女校长，然后爬上排水管。排水管上的长钉已经陈旧，就像是一条用来防盗的狗圈，但却正好给我做了扶手。我蹑手蹑脚，爬上学校的两层楼上面，爬到柏油和瓦片铺就的楼顶，嘘走了几只鸽子，然后跳了起来，从我们女校长刚刚闭目、沉醉在酒精带来的欢娱前滑过，我

跳下来的时候仅仅刮到了几株连翘，突然之间我的脑海里闪过一种念头：我的坠落并不是一件坏事。

几天之后，胫骨开始出现疼痛，此后就一直伴随着，随着年龄的增加，疼痛的地方肿了起来，一个无形的参考，我将此牢记为金钟花时刻。于是就这样开始了，沉默之中的自由将财产从良心中释放了出来，写入贫困，就从我这条变了形的腿上，这点就撕破了家族记忆的触角。

相信

在相信中，孩子们讲故事

我九岁，正躺在床上。学校放假。天文台山发出警报。十级台风。我父亲在俱乐部里，无法回家，因为所有的摆渡都停掉了，巴士和出租车也不开了，就连能够上下摆动，躲避三米海浪的哇啦哇啦小船也穿不过港口，你就是给他一百元也不行。母亲生气了。她知道他和谁在一起。就是些男孩，她确信，就是现在。但是之后，他就会去雪厂街找那个女人，他们会按照中国的方式一起喝茶，聊天，而她就会用拳头来回敲打他的脖子和后背，然后就会悄悄地贴近一点，开心一点，让这些幻觉见鬼去吧；让他也见鬼去吧。

我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声音。阅读《到灯塔去》①，但却一点也看不懂。到灯塔去，再回来。但是在家庭风暴的中心，我孤立无援。安静；作茧包藏；四分之一杂交种；八分之一杂交种。我没有英国灯塔。没有僵硬的上嘴唇。

我开始写信的时候一定已经七八岁了。我大多写给德国女孩，她们在香港很时尚，德国人，20世纪50年代。很好的德国女天主教徒，叫什么贝亚塔，玛丽亚，特雷莎，她们的父亲背景都有问题。在台风中，从我的灯塔这儿，我给她们发送我的状况和每天发生的悲剧。我告诉她

们，在我房子的对面，他们炸掉了一整座山坡，想建造一家医院，去年夏天，一块巨石下来，一路下滚，一个苦力想用双手去阻挡，但是到了最后一刻只能退缩，站在那儿，一脸傻相，笑嘻嘻的，巨石横在了路中间，惊奇的是没有伤到汽车和行人。后来一辆消防车叮叮当当地开了过来，苦力站到了路的中间，做出手势要它停下来，因为它正直冲巨石而去，然后又是一辆汽车撞到了他的盲区，撞得他飞了出去，在空中飞快地盘旋了一下，血跟着他转圈。我告诉我的德国女孩建筑者们在这个地方立起了脚手架，阻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然后有一家人在竹子和木头板墙下避难，他们睡在包装用柳条箱上，很快，他们开了家商店，出售连环漫画册和淫秽杂志，在这儿谋生了。他们对我很好。圣诞节的时候他们都会送书给我作为礼物：精装版的《到灯塔去》和《铁面人》，而我随时可以用这些书免费交换连环漫画，《读者文摘》和登着裸体金发女人给绑在丛林树桩上的杂志。那些年我读了很多书……雨果，伦敦，塞万提斯……都是简写本，都是非法复制品，印在廉价的纸上，由捏造的翻译家，如亨利·布赖特尔，牛津大学学士，从法语或西班牙语翻译而成。有一本书，康拉德的《台风》，不可思议地将英语里的双S全部换成了日耳曼语里的β，于是我读英语古典这个单词时舌缝里就漏音，整个大陆失去平衡，多元文化碰撞了起来。这种教育来自我父亲的祝福。他身穿辅警服，手上挥舞着高级督察的警棍，从而确保我有书读……也可以保护住在板墙之下睡在柳条箱之上的三口之家。大家都很幸福。

我躺在床上，进出于过去、未来和书本之中，我生了一种怪病，不过不用去学校。一束油灯的灯光经板条窗帘渗出。台风开始转向。我在给我的女朋友写信，她名叫玛丽亚·冯·耶格尔，动作轻快，喜欢滑步而舞，她的父亲是大众汽车香港及远东分部的总裁，她的英语只能说是马马虎虎。玛丽亚·冯·耶格尔穿着明亮的衬裙，我们站在学校专线上

---

①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的一部小说。



的时候，她会将长长的金发轻轻地甩过肩膀，打到我的嘴巴上，因此，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地去品味她，引诱她，给她讲述一个想象力惊人的故事，这种故事的采集得产生共鸣，十分精彩，而且只能在成人精心准备的威士忌酒柜里才能找到。我偷了我父亲的威士忌，写了一首情诗，表现的是一位天真烂漫、性感潇洒的东方青年和一位无忧无虑、强大有力的西方女人之间的爱情。这个深层情节是我从电影《生死恋》[①]中学来的，由威廉·霍尔登和詹尼弗·琼斯主演，只是我将性别颠倒了一下。我选这部电影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许多辉煌这个形容词比非常辉煌或更加笨拙一点的多倍辉煌要更加吸引人，也更加绚丽。我立即使用了它。玛丽亚，你有许多辉煌。我写道。第二，电影里充满了令人烦扰的问题，十分奇怪。一个德国人对异族通婚会怎么想？这就是我在故事中间提出的问题，这是我的寓言，是我对玛丽亚·冯·耶格尔的满腹牢骚。我没有完成我的故事。我想激怒她。于是我开始梦想着给绑在树桩上的金发。更为大胆的是，我接下来的一行是从非法连环漫画里采集到的一句：多重高潮。不知怎的，她父亲的英语突然之间比想象要好得多，一天，他来敲我的门，而我正抱着父亲的阿尔萨斯狗，他隔着门缝骂我为恶棍，玛丽亚·冯·耶格尔再也不跟我说话了。

---

① 1955年香港拍摄的一部电影，根据欧亚混血作家韩素音的自传小说《A Many-Splendored Thing》改编而成。

我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待在床上看书，或去看电影，或到公寓楼里，和我的中国朋友多林·谭一起坐在黑暗中，专心致志地看成人电影，将花生射到摊头上温顺的情人身上。谭的父亲是米高梅公司的地区经理，我们可以免费去看日场电影，所有的电影都不分级。有些电影表现的金发女人给绑在丛林的树桩上，令我们十分着迷，影片用的伊士曼彩色底片，展现了袜子上端的紫色光泽和黑色的乳罩，格外刺激。多年来，我们到电影院里看的就是内衣。但是一如既往的是，看完电影后，我得见我的父亲……他会带我回家，这是我母亲的巧妙安排……是想让他下班后直接回家，省得他溜到一家酒吧或香港小姐的冰室酒吧里，和她们一起拿个轧压机，将冰刨成饮料，口袋、木桶、胸脯。和平常一样，看完电影后，如果我父亲带我回去，我就会严格地下一盘棋，从观看这种垃圾中拯救出来。玛丽亚，我梦想着我的创作中心。我的床，我的电影院里的座椅，我放在你枕头下的信，你懒洋洋地躺卧在枕头上，穿着伊士曼彩色丝袜和德国无带乳罩。我的茧就是你的茧。请随意。然后一如既往，接着做梦：我往前推进二十年，我父亲命令我跟他再下一盘棋。这一次他对棋子做了不同的安排，我得提醒他，这不是惯例。但是他已经老了，听不见，或根本就没听。也许他知道得更多些。我搜索着棋类书籍和规则之类的书籍，但是却一无所获，无法反驳他或证明我的观点。毕竟大家都知道它们总是这样给放进和放出时间范畴的。我现在意识到，我的内脏一旦受到写作规则的冲击，化成碎片，那么我父亲就会永远疲倦，几近死亡。有时候，他会拽出一块女人的手帕，凝视着它，然后再放到鼻子上。也许这是种吗啡。他永远疲倦得跟死了一样，我总是跟一个死人在下棋，而死人是不讲究规则的。

但是当时我正在创作的中心，而台风即将转向，下午，狂风回转，在越来越令人难过的气压下，我扔掉毯子，驾船驶向灯塔，心中确定灾难肯定会降临（它确实来了，几天后邮差回来工作，玛丽亚·冯·耶格

尔的分手信也到了，信中她说她不想跟抄袭电影的男孩讲话，在她无可挑剔的英语中，她用许多辉煌的蔑视将我嘘出去），这种灾难我一直像天启一样投射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只是没有想到它会斜射到他人身上。绝望之下，我开始跳舞，我歌唱台风了不起的强度，歌唱自然的伟大荣耀和恐怖，歌唱两者交融在超自然的吼叫和全能的力量，沿着上帝的手而下。我大吼，我尖叫，我大嚎，为毁灭感到高兴，我母亲从她的高山住屋中奔了下来，内心郁积着抑郁，将世界上每一个忧愁的全部重量都承担了下来，她称我是个白痴。由于无法打开给钉子钉死了的窗户，将那些产生这种创伤的书扔出去（窗户给栅木板封死了，预防台风，因为据说有人给台风吸了出去，落到可口可乐广告牌上），她把我的书扔进壁炉里，幸运的是，壁炉里没有火，不过由此一来书也沾上了烟囱上落下来的黑雨滴。灾难已经造就。我的储料台也坍塌了。创作中心没了。癖好也没了。

那天夜里我父亲回来了。里面的冰比外面的风暴还要糟糕。就在半夜前，由于梦太多，睡不着，我听见了一阵潺潺流水般的声音。接下来是演唱，再下来是雷鸣般的爆炸声。透过给雨弄脏了的窗户，我看到了脚手架，然后是板条弯曲，在压力的摇晃之下，竹子和铁像六角手风琴一样错位，再接下来是咯嚓一声，肋骨断裂。山坡随后冲了下来，带来了一片泥土和漂石。我叫醒父母，将梦告诉他们，但是没用。他们不相信我编造的世界，我的梦幻状态，我的真实经历。我是一个懒惰无用的电影迷。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把我送回床，始终不相信，直到救火车和救护车响着警笛抽走了他们坚实的睡眠。

擅自占住者全家都给冲走了。我再也收不到书了。余震之后，我的教育之源也随之终结，一股潮湿的泥土和巨石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之中。他们直到早上才发现三具尸体，我父亲得宣誓作证他从没看见事情的经过，我的话给偷掉了，一切都是因为不相信。一个作家的状况决定了事情就得如此。永远准备好一张干净的纸。永远准备好忘记。但是一如既

往的是，我尖叫，我大嚎，我去跳舞，加入到队伍的行列，去理解真实的石头味道，因为在那儿，越过那儿，恒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规则的，如果有，死去的人也会不断改变它们。

无所申报

“无所申报”：卡斯特罗的这条家训刻在西海堤老区一所宅子的门楣上。

我记得我的伯母特蕾莎。她是一个疯女人，来自巴西的马瑙斯，一个坐落在亚马逊丛林中的城市，以歌剧院出名。她在雷暴中燃烧花瓣，在睡觉中梦游，并且喜欢赌马。某种意义上的伏都教徒。就像我讲的故事一样，未必全都是真的，这让不相信的人提高了警惕。由于我讲的是伏都教故事，因此，他们将我送到了几千里之外，让我流亡。

我的伯伯达里奥，也就是我父亲的堂兄，在罪孽之中和特蕾莎生活在一起，因为他已经同他可怕的妻子拉蒙纳分手。有一次，拉蒙纳从阳台那儿拿起一只花盆向他砸去，想谋害他，结果没有砸到，花盆落到了他的脚下，一颗纸做的小球出现在黑色的土壤里。这么多年来，我伯伯一直在给女人写情书，给她们送具有异国情调的植物。有些人拿了东西后并不睬他。还有些人(前修道院里的修女，现在仍然生活在虔诚的修女和嫉妒的丈夫的保护性监视下)则很礼貌地给他回封信，信写得文雅，谦卑。她们使用比喻和熟悉的字句……她们是正在凋谢的花朵，已经幸福地安了家，正在期盼着子孙后代……暗示他不用再费心思了，同时也不想伤害他的感情。她们都没有好好地培植一下园艺，发现在她们繁茂的植物根茎内所隐藏的宫廷诗歌，双关语言和奇怪的比喻。但是令达里

奥伯伯暗喜的是，他那些猥亵的纸球牢牢地培植在根下，而枝干部分的生长则显得十分耀眼，他的文学创作就在被人发觉的风险中得以繁荣，他在隐藏自然的同时也在揭示自然。他很高兴地看到他的热带花朵姹紫嫣红，装饰着许多富有的葡萄牙家庭的茶色外表。

后来，一直想发现他秘密的拉蒙纳突然对栽花产生了兴趣。我们家总是将指甲放在泥土里，她说。不管怎么说，她想杀他，于是他离开了她。后来终其余生，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在纸上写写弄弄。这点我认为是一个家族特点。

达里奥伯伯做着准备。每天，他说，他都要坐下来设想。就这样，连续几个小时，他为离婚，为战争和死亡的创伤做着准备。不过，爱情是永远设想不出来的，爱情必须永远出其不意，他说。这就是爱情的美妙之处。不过他举起了手指，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加了一句，这只是为了让爱情对象注意到伤口。毕竟这个世界对爱情带理不理。

这些我看出也是家族特点。

我一直知道我伯伯很穷，但是他却很富有见解。我在十岁这个幼小年纪起程前往澳大利亚的前夕，他对我说道，如果没人发现你，你就会一直想自杀。记住这点。

死者准则。

我父亲给我二十镑让我路上用，但是我伯伯的建议在我的口袋里显得更重。达里奥伯伯和发疯的巴西人特蕾莎住在一起。她也没工作，除了给人算命，收点小费，或赌马。她说上帝给了她数字，每天夜晚梦游的时候都会在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印刷品背后发现各种组合。上帝满足了她，将标有数字的小纸球粘贴在画的背后。她总是赢。他们从不结伴来我家，原因是他们生活在罪孽之中。达里奥伯伯是唯一一个定期来访的人，每个星期天都来。他会在做弥撒的时候和我们见面。这也是别人看到卡斯特罗家族唯一在一起的时间。然后我们会走回家，达里奥伯伯会在开饭前演奏一段小提琴。他什么都演奏，就是不演奏拉蒙



纳。我父亲不停地忘却，还会哼几声，于是达里奥伯伯就会停下来，一副恼怒的样子。没有人发现他的天赋，直到有一天，他从我们楼梯上摔下，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而这时，我毕业已经很久了，一直想靠簿记为生。他们说是心脏病。在他去世之后，有人发现吝啬的达里奥伯伯留下了一笔财产，就是西班牙黄金，埋在他的花盆里。绝密的东西。至少足以诱惑他求过婚的那些社会名流。他所需要的就是她们的兴趣。

特蕾莎赌马连赢。她变得十分严肃，也十分理智，在太平山上买了一套时尚的公寓。我父亲就是冲她而来，决定送我去澳大利亚的。

游戏规则

在这规则中，一支名笔被发现、遗失和再失而复得

战后，我父亲在汇丰银行谋得一份会计的差事。他拿出战俘证明，但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老板查尔斯·雷德曼是一名前英国陆军上尉，而他的太太……唉。现在，“回报”的时候到了，两个月后，我父亲收到了解雇通知。他每天两次乘着渡船横越香港，读着珍·格雷的西部小说，一边撕下那些书页，一边咽下他的傲气。生命苦短，他没有沉浸在忧郁、焦虑、绝望和对过去遗产的梦幻之中。他完全沉浸在一种彻底的急躁之中。要想朝前闯，现在永远是一个伟大的时间，他说。辉煌的日子；这些是辉煌的日子。他开始沉溺于酗酒，到湾仔去跳舞，在湾仔，他跳得浑身是汗，从中找到了某种共鸣，行将死去的堂兄记忆出现了偏差，而他们还把这些当作是自己的记忆，封在时间的蜡中，形成了痴呆蜂窝。

他的堂兄恩里克·何塞是个可怕的少妇杀手。少妇杀手这个词从上海开始就经历了风格上的变化。现在这个词回到从前的含义，意味着调情者或放荡者，但是回到混淆一切的多语种环境中，少妇杀手指的是某种魅力，还没有指引诱，不过它却背叛了使用者。作为一名少妇杀手，一个人是要经受折磨的。他会憔悴，经历崇拜带来的折磨；他会心情脆弱，轻易染上相思病。他通常还会很丑陋。他的朋友会充满同情。这就

是恩里克，我们可以说他身上具备了不可抗拒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绝伦的魅力。如果他碰巧来到嘉道理或沙逊花园，他会发现自己在茶舞时和大多数绝妙的女人唱对台戏，他会站在人群边上，靠近露台，或宾治盅边，周边全是些小型装饰桌巾，餐具柜和枝状大烛台，他会用一块很大的手帕来擦自己的眉毛，手帕上还用银色绣上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他唱对台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会话能进行下去，为了吸引女人的注意，他想吸引这种女人，但是这种女人已经不再感到困惑，而是感到厌倦，他唱对台戏就是为了将自己淹没在她的眼睛里，从她身上的香水嗅出她的世界的光泽，一听到她的走动，他就会感到心跳。他永远也不会主动去邀请她跳舞，本来这是测试她兴趣最简单的办法，但是他会将自己转化为对手，抛出或辩护他在其他场合永远也不会持有的观点。恩里克将困难全都堆积在自己身上，他说话模棱两可，一副若即若离、敏感脆弱的样子，把那些漂亮的女人都搞糊涂了。作为一种延宕战术，它很少起作用。就连最有耐心的上当者很快也会感到这种挫折很奇怪。然后他就会扔下一颗炸弹，重复着降低他身份的流言蜚语。

当然，1932年，当炸弹真的落下来的时候，事情并非如此，虽然不知道这是否事关魅力，炸弹直穿恩里克在爱多业路[①]上的房子，穿过电梯，摧毁了他的高速电梯，但却没有爆炸。炸弹真的落下来了，这些漂亮的女人也就转变成了一个个恶婆，她们冲着缓慢的队伍大声谩骂，并用绳子在舷梯上拉起围栏，争抢回家的头等舱位。就这样，每次出现战争状态的时候，他都会有一刻的宁静，进行重新调整。但是，他是真的喜欢在跳茶舞的时候和她们争辩啊！事后变得气喘吁吁，然后再写情书，将花送到她们的家里。他独自一人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乐队前一天演奏的曲调，眼泪流到了他的真丝领带和伦敦西服上，他穿上这些就是为了狐步舞这种想象中的场景，穿过大理石大厅，缓慢而谨

① 今延安东路。

慎地分离，走到阳台上，拿出金色的烟盒，在盒角上看到了一个徽章，上面印着拉丁文难题，然后他很有礼貌地点上两根香烟，开始立论和反论之间的对话，一会儿给这个人找一个案例，一会儿又给另一个人找一个案例，就像一个孤独的棋手自己在进行两军对阵，各种观点快速转变，这样，他们之间全都理解，就这样，恩里克伯伯，这位少妇杀手，在那些记住他的人看来，成了最后的人文主义者，他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也确实储存了一橱柜新近流行的古巴高跟鞋和轻便舞鞋，为的就是用于那些重大的人员调整和激烈辩论的时刻。

但是礼物证明了他的荣耀和魅力，就像达里奥伯伯的植物和埋起来的情书清楚地说明了爱情和迷恋一样。无数的女人收到了水笔、钻石手镯、蓝宝石胸针和给采购商店做广告的匿名卡片。无论是小心还是轻率的询问，得到的都是付完钱后的笑容和封紧的嘴唇，偶尔还会遭到中国人对外国人愚蠢行为的鄙视。有时候，恩里克会在吃饭时或在大街上碰到他那些天真的情人，狡猾地赞美她们戴的珠宝，欣赏着她们的虚荣和她们款待情人时的谎言。他和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埃尔维拉·朱莉娅玩弄着游戏，但是令他大为失望的是，朱莉娅将刻有恩·何·卡斯特罗名字的祖母绿威迪文水笔扔进了抽水马桶里。这支水笔后来被一个女仆捞了上来，她急于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将笔还给了我的父亲，某个夏日下午，在一次运河狩猎会上，我父亲在恩里克伯伯时尚的胸袋里看到了它的配对。有一天，在法国总会俱乐部里，我父亲将笔拿了出来，在恩里克的注视下，使劲地在登记簿上测试着笔尖。

二十五年后，那支笔又出现在了香港，在首届全校吉卜林诗歌朗诵会上，雷德曼夫人将它作为奖品送给了我。我把笔拿回了家，但是没有说我赢得了吉卜林比赛，因为我漏背了几行，我的同学艾尔弗雷德·陈表现得不错，他用单调的嗓音减轻了负担。

但是，尽管我在比赛中取得了成功，他们还是要把我送出国。他们把我送到了澳大利亚，漫长的下午，我用祖母绿的水笔在那儿书写着。

别的同学在周边踢着足球，我则躲在一股牛粪味的手球场后边，在练习本上拼命地写着。我坐在一根腐烂的枕木上，上面给油弄得黑兮兮的，在阳光晒黑的木头上，有两个苍白的条纹，这就是过去火车车轨铺设的地方，条纹里的两个洞满是蛛丝和新近滚过的泥球。放眼田野，你看到了栅栏和防风林，乌鸦发出沙哑的声音，沿着水流向家飞去。年轻的斯卡利迈开大步向我慢跑过来，他一脸的雀斑，给下午的疲惫搞得一片茫然。他们叫他无檐便帽。他头脑有点简单，动作迟缓，也没实际需要，他到这里来并非仅仅是在其祖父的土地上驾驶拖拉机，这片土地上已经布满了水坝的孔，小龙虾在里面沸腾，他到这儿来是为了提高自己。

他侧眼看了我一下，拉了拉自己的袖子，感到寒冷下午的第一阵寒栗从瘴气般的阴影中爬了过来。

——你在干吗？

——写东西。

——你就不厌倦写作吗？

——不，

——我但愿我是在家里。

——这就是你想念的，无檐便帽？家？

他耸了耸肩膀。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田野的倒影和球队五彩缤纷的运动衫。他的眼睛蓝得像是要淹死似的。他从枕木洞里拔出一根野草，吮吸了一下，不过吸错了头。

——我想是的。

——得了吧。你觉得最难过的是什么？

——我不属于这里，他说。

——这倒是真的，便帽。我们都想在这儿找个地方安顿，但是如果你半途而废，你就会失败，我说得对吗？

他想了想。他看得出他是想得到休戚与共的帮助，重新找回业已丢失的友谊，希望与人分享非正大光明的意见不同，组成亡命之徒联盟。

他有可能希望在行动之中进行领导，一种流浪汉似的生存，我们两个结伴出行，睡在有轨车里，采集水果来维持生命，然后再飘泊回他祖父的财产。他有一个地方，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但是我却无所适从，因此我备感沉默，我也不想死。我是真正的罪犯。我能够看到他脸上的失望，他对缺乏同情这点一点也不理解。泥泞的下午沉没到潮湿的阴影之中，吸收了泥板岩和枯草的味道。

——我做什么都失败，他说。

我想他大概要哭出来了，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斯卡利说话总是慢慢吞吞地，咽下去很多东西，因此，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压抑着还是在生气。他的坦白是一种策略，目的是想从我这儿掏出秘密。

——你知道我难过的是什么吗？我想让他知道。

——什么？

草茎给嚼碎了。他的头发涂满了男用发油，发油的白色泡沫都流到了脖子上。

——我就是感到难过，就这些，我说。

——为什么呢？

——为我的水笔。

——那是我听到的最蠢的事情，他说。

我想那一刻就是斯卡利胜利的时刻。有人比他还笨。有人最终说了那么愚蠢的话，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恢复应有的尊敬，一向强调实用的斯卡利发现我的脑子开始糊涂，光芒开始从裂缝中渗出，他的嘲弄一直深入到了我的灵魂深处。

夜晚，回到宿舍，身上盖着四床灰色的毯子，毯子中间有一个栗色的大屠杀斑纹，我感受到了不幸的分量，浑身颤抖，一想到从前虽然受苦，但还比较安全，不禁伤心起来，身上开始出汗，从前，在另外一种生活中，我靠枕头底下那些积满灰尘的书维持，一会儿踏入衰弱，一会

儿又走出衰弱，发现了深深埋藏着的世界，品尝着黄铜和拜占庭。后来熄灯后，我重新读了一封家常信件，再次确认命已如此，我永远也回不去了。我父亲再次失业，我被抛弃了。现在水笔揭示出了它大理石般的光芒。没有哀伤那么深，没有绿色那么环绕，也没有裂缝像该死的海洋一样宽。是我让它顺利通过……像白痴一样，用高雅的笔尖敲打着不能原谅的记忆。斯卡利恰好就是我理解错觉所需要的温柔现实。笔尖永远开了槽子，再也无法书写梦想和魔幻，再也无法追溯古老的威尼斯宫殿那些已被遗忘的香味、十分脆弱的人造洞窟和水上画廊。不，我同它最深的交易已经结束了，我躺在铁路的枕木上，为它的突然沉默感到遗憾。过去，它包含了隐而不露的事情；其本质的真正含义，现在，世界上的灾难堆积如山，全都涌到了这儿。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否意味着它理应体现的含义，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难过，这个并不属于我的死亡。然而，渴望强烈地压在焦虑之上，激发起了过分的行动。每天我都要去手球场对面那个想象中的白色灯塔。靠在墙上，感到很温暖，一种梦幻般的文字水准。独自一人；四分之一混血；八分之一混血；一个三合会般势不两立的场所。

多少年后，我平心静气地给儿时的心上人写了不少信，祖母绿水笔换了个便宜的新笔尖，希望有人能跟孤独和受苦联系在一起。因为你看到，我也成了一名少妇杀手，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而我却深受其害，永远也无法公告。

三合会

……于是在整个城市和堡垒，据说有二百名俗人，六百名牧师，约一千五百名妇女，其中有许多人生殖力很强，因为她们生下了孩子，却没有丈夫来做孩子的父亲。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东印度公司新论，1703 年》

我有古老的地图、遗嘱、快照和记忆。完全错位。看不见的城市。我以光的速度到处传送着它们。爱因斯坦说，以光的速度，时间可以转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澳门就像拜占庭，或一个已经失去了的城市，从海中升起。

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我已经将澳门从我的脑海中抹去了。过去，我常常被送到澳门去和我的堂兄弟住在一起，后来我父亲才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将我送到了澳大利亚。我记不起澳门的古老建筑，因为其中大多数的建筑都给拆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丑陋的高楼大厦。过去它曾经是东方的卡萨布兰卡。现在它有六平方英里连绵的宴席和帮派暴力。

天

澳门掌握着高雅文化。贡多拉小船停靠在灰色的公寓旁，那儿回荡着内港的冲击声。电影剧组的工作人员像猴子一样在桶架上晃来晃去。

歌剧来到了这座城市，突然之间，泰国的妓女看上去像卡门一样出现了，俄罗斯的美人哼着瓦格纳的曲子，到了晚上有灯火表演，诗歌朗诵，而小明星们则像喝醉了酒一样从产生回音的修道院里演奏着琶音。轻声地，有人说，这是东西方文化在天上的汇合。中国人知道，天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你死了。从画布那儿发出了抖动的声音。恋母的儿子，才智出众的人和精疲力竭的歌剧女首席。

三合会的坏消息。就在几个星期前，在垃圾场那儿发现了被切断了的手，又一名警官被开枪打中了头部。一车车回程游客避开赌台，沿着狭窄的街道闲逛，他们戴着盘绕的面纱，穿着晚礼服，仿佛是在 17 世纪。星星下的歌剧。三合会不开心。

我打电话给我堂兄询问信息。我现在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堂兄，他的血统比较模糊。他看东西内斜。我父亲的家庭属于那个你将私生子大都留在家里的年代。战争分散了一些，但是一个网络还在维持着，一种疯狂的痕迹，一个疲劳过度的电灯泡里的一根灯丝，再闪几次后就爆炸了。我从来就不属于这个网络。我是一个外人，很早就被送走了。我无权享受灯光，现在我回来称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小文人，摆出一副架子，挖掘污秽不堪的东西。我在我堂兄没有回应的电话里读出了所有这一切。除此之外，他的嘴唇还流露出一副讥讽的样子。我发誓我听到他咳嗽了一声才把电话挂掉。然后，我换了条电话线，结果突然通了。

弗兰奇，你父亲怎么样?

他父亲是警务处处长。

还可以……他们从他脑子里取出一些他们说没用的东西。

向他问好。顺便说一下，我需要你帮忙。

寒暄从来就不是我的强项。我想这是遗传了我的母亲家庭，她们这个家庭隐遁、害羞、偏执，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发火。所有这一切的迟钝、寡言和托辞让我变得急躁。

弗兰奇，我想了解一下我的父亲。

弗兰奇十分爽快。我想是他父亲的状态让他变得柔和了一点。他说他今晚想去葡京娱乐场，因为罗伯·林将要在新葡京酒店里举办一个讲座。罗伯是澳门首富。全部赌场中有四分之三归他所有，而且他还想拿下河畔大酒店。澳门不需要海港，他对媒体说。我们需要高速公路和机场。遗憾的是，他的远见还不够。一百幢空荡荡的房子坐落在泥滩上，等待买家。唯一的住户是赌桌上的输家，被迫按照荒谬的利率进行交易，他们现在坐等时间，等待他们的生意能够在马尼拉或香港或巴西得以复苏。拖欠的人则用自己身体的某个特定部位来进行支付。

我在新丽华酒店外叫了一辆出租车，并甩掉了一名乞丐。这是一个颚裂者，他拼命将他的脸贴到我的脸上，想讨一两枚硬币。我已经习惯于这种恐怖的事情，挣扎着把他赶走了。他说了一句，操你妈！带着一副爱尔兰口音。出租车司机假装不知道葡京在哪儿。我跟他说，如果他不知道新葡京酒店在哪儿，那么他就应该将我放到罗伯·林家，因为罗伯会让我搭车。听完这话，司机调整了一下车挡，飞快而高效地穿过拥挤的交通。

葡京娱乐场一定是高迪和达利醉后在浴缸里打泥水仗时设计出来的。水泥还没有完全干，他们就决定将其改变成蚁丘，布满中世纪的窗扉，而且，为了改善单调的正面形象，还在上面悬挂了许多五彩灯光的装饰品。还没等你进门，你就听到了赌徒的喊叫；裸露的背上传来的桦树枝声；可塑体轻轻地弹向有感灵魂；高度焦虑而发出的歇斯底里式的叫声。我最后再看一次黑暗的天空。脏雨丝丝落下。楼上的一个金发妓女像拉弹弓似的冲我拉了一下吊袜带，并眨了眨眼。我走了进去。

空气感觉像汤。这是一个充满了贪婪、失落、期待和绝望的健身房。你能够看到他们走来走去。汗水嗒嗒的脸笑容不断，十分光滑，就像拳击手出了一个好拳一样。撞击弹回来的头和鸟眼和盖子的喀哒声和磨亮了的指甲和香烟抚爱笨重的珠宝而产生的闷浊空气。这是一个没有性别的地方。既没有诡辩也没有诱惑。如果你停留的时间太长，那么你的抗体就会战败，渗出物会被挤压穿过人类的贪婪和信用卡。它搞得你精疲

力竭。我继续往前走。里面几乎空了。心情沮丧的赌台管理员摆弄着轮盘。身着马甲的伙计在没有效率的荒芜中洗着牌。礼堂在路的尽头，要走下一段铺上了地毯的楼梯，就在下楼梯的过程中，我感到有人在看我，我经过自动门，进入了黑暗。高雅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歌剧在公园，但是钱在这里。正如诗人所说，地球被天堂占据。不需要地狱。

地

你在黑暗中进入了新葡京酒店，在各个世界之间滑行，偷偷地预览一下。这儿在放映一部电影，香烟的烟雾盘旋到了放映光束上。你发现那一闪一闪的原来是三文鱼，下巴上有个钉子，在岩石上有条不紊地动着。你把后面的一个座位折下去，观看着这一海洋朝圣，三文鱼溯流而上，悬在一个瀑布似的东西上，红红的，闪闪发亮，身上一道道血纹，它背负着记忆的重负和萌芽中的本能，挣扎着要往上游，却在瀑布之处又给打了回来，它蜷曲着，将乳白色的卵放到满是鲜血的肚子上进行抚养。过了一会儿，它又试了一下，穿过旋转的泡沫和缠结在一起的渔线，树干沉闷地撞击着它的后背，它跳着舞，再次向上游冲去，结果又给吐了回来，电影的胶片重新绕了一下，然后再从头开始，最后，它穿过缠绕着莎草和树叶的最后一个漩涡，在清水的冲洗中搏动着，好像死了一样，让自己得以享受片刻的漂流，找到一个可以长期释放的池子，然后肚皮朝上，死了。还有什么可以留在记忆里？这种挣扎在下一轮无情的竞争中并不受欣赏。闪烁终止了。

人

在跟人类密切相关的暗淡黄昏中，在经历了咳嗽、打喷嚏和清喉咙这些后电影的动作之后，你听到了一种翅膀呼呼在飞的奇怪声音。灯亮

了。然后又传来了一阵鲨鱼皮西装僵硬拍动的声音，几个保镖排成队列，像蛇一样迂回来到舞台中央，然后从后边出来一部柳条轮椅，看上去好像它过去属于某个太阳王的扭曲后代。农夫的一只手上点缀着钻石，在凶狠的光头汉子的指导下，椅子转了一圈，形成一个优雅的弧，之后你看到了柳城的先人，红花亭的大祭司，教友的大哥，三合会的夺魁者。他戴着一顶白色的软呢帽。

罗伯·林本人。

你知道他是罗伯特伯伯。

多少年以前，在另一个过去看来是朦胧，现在看来是充满灰尘的黄昏，记忆靠不住，意志瘫痪，但人们却又对它们产生了深深的依赖——那会儿我大概五六岁了，正在别人家的公寓里——万物茂盛，天很黑，好像是古代的雨林给柚木和竹子围了起来——在那个暗淡的新石器时代的夜晚，我听到父亲说罗伯特伯伯要来了。我躲藏在最暗的婆罗洲，从巨大的壶飞快地转到巨大的杜鹃花那儿，从树木繁茂的磨石子地那儿凝视着别人的空中花园，这是世间的奇观。女人们大惊小怪。在恐慌中，人们看到的是一片喧闹，挣扎和炫耀，很快，仆人就把饭准备好了，雕花玻璃酒瓶里装满了白兰地，开胃酒也拿上来了，还摆上了象牙牙签。我眨眼看着一个松动了的牙齿，它跟我的联系还没有中断。我是一头生了气的大象。我父亲在大钢琴那儿晃悠，测试着高八度的门牙，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穿着跳康康舞的衬裙，不停地旋转着，剃刀锋利，长袜上的缝也给拉直了。我记得我们家看上去十分残忍，并急于给人留下印象，这点就是到了现在看上去也比较野蛮。罗伯是首富，他们说，罗伯拿到了一个剑桥大学的学位。

很快电话响了，罗伯特伯伯说他不来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后，门铃响了，一个衣冠楚楚、头发中间分开、脸给太阳晒黑了的家伙走了进来，他说他不能待，但是很高兴看到我父亲的儿子。我猜想当时出现了

某种原初场景，因为我看到他把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伊俄卡斯特带了出来（她可能是一个脆弱的装饰品，只有十六岁，满脸泛红，一副骄傲的样子），他的手指上戴着一只澳宝戒指，把手掬成杯形，放到她光滑的脸上，因为康康舞已经僵硬得像孔雀的尾巴，允许他在下面。直到今天我还看到这个姿势，在无风的大街上，手挡着一支闪亮着的香烟，捂住嘴巴，掩藏着咳嗽，止住喷嚏，作为遗传性隐秘的一个标志，这是文明对天真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伤害，是对无情的谦逊所表现出的一种虚伪宣誓。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虚饰。我父亲假装没有看见。我的其他同父异母姐姐不在乎。她们曾经有过一个母亲，洗澡都用牛奶，从来不关浴室的门，并为其明亮的肌肤感到自豪。我感到不舒服。棕榈树给潮湿浸得起了水疱。罗伯·林站在我的椅子后面，我记不清这椅子是高还是矮，并用他经过训练的手指钳着抚摸着我的颈背。我不敢动。这是理发师有时候会传递出来的那种感觉——一种并非不舒服的安慰和发痒，介乎礼仪和生产之间，如果把这个动作运用到我那条阿尔萨斯狗身上，会让它产生一种粉色勃起。很久之后，我把秘密社团的美学又看了几遍：所有的交流都是图式的。我父亲一只肘倚靠在键盘上；我的狂热的同父异母姐姐将罗伯特伯伯围在了中间；相对称的是，仆人们目睹了这一切；我大概是坐在高的椅子上；后面的背景蓊蓊郁郁，都是些盆栽植被。园艺人家。难以定位的相机眼搅乱了道德准则：罗伯·林在我的脖子上演练着他给我的同父异母姐姐的希腊古瓮编织的同样的传说，这只狼在微笑，坦承对我们大家的优势和快乐。我一直感到，他玩弄的是我的脖子。

现在，他的轮椅旋转了一下，陷于停滞，将舞台两边接了起来，他的头发整洁地分开。一切都严格按照规则操作。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女人在照顾他，她的行动很像一只金翅蝴蝶，身上一股香水味和香烟味。当我的眼睛最终适应了礼堂里的灯光时，我发现她正递给他一个氧气罩。他一把抓住氧气罩，吸了起来。她把氧气罩拿回来，给了他一只麦克风。他仔细看了一下，好像在打量棒棒糖一样，然后便哆声哆气，吸

着鼻子，像金属一样说道：先生们，女士们。这是主题游乐公园的主张。你们不仅得到自然展示，而且还可以获得上手经验。游客们可以将自己的猎物(他是说现金?)带到漂浮餐厅进行烧烤。听了这话，大家礼貌地鼓了鼓掌。但是最重要的是……罗伯冲着他们来回摆弄着手指，这只手上没有钻石，但有一支金嘴卷烟……创造，正如你们刚才看到的，需要努力。他的声音一会轻，一会重。不仅仅是要生存，而且还要生产。每一位艺术家都知道这点。你们大家在设计中都有发言权……

疯狂的掌声，然后是一片骚动。我期待的更多，但是这位剑桥家伙沉默起来。我以为大家都在投票，但是他们在写支票。我感到局促不安，假装看一眼我的皮夹。呼呼声又开始了，罗伯·林设法来到讲台边，股东们或单个或成群地来到前面，将信封塞进他上翻的帽子里。我也排了队。他一只催人泪下的眼睛看着我空空的双手；当我靠近的时候，他眼睛向别处看去。他的脸很红，全是那些知名女人亲吻时留下的口红。我想起过去，耶稣受难节那天，我们常常亲吻耶稣的塑像。没人擦它。我禁不住伸出了我的嘴唇。我在烈性酒中发现了红色的友善。他的衬衫前沾上了灰。他边上的那位年轻美人紧紧地盯着我。我不想做出任何错误的举动。

罗伯特伯伯，我说，往前走走，我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帽子吗?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一个白泡在他的嘴角抖动。他伸出两只颤抖的手指。香烟掉到了地上，他的助手熟练地把它踩碎了。我认出了助手的金色脚镯。14K。

嘿，辛迪·林！我冲着我的表妹大声叫了起来，我还以为你和威利舅舅一起待在佛罗里达呢!

说真的，我到现在才认出她来。她涂抹得过于夸张。我上一次见到她是在威利舅舅的家里，脱掉一只鞋子，甩着光滑的头发。你想给人留下印象的时候，你的心怦怦在跳，真有趣，但是后来，这些脸消失在某个被人忘却的美人博物馆内。罗伯·林当场抓到了我。他的笑容凝固

了。我知道我得抓住主动权。

我们可以趁女士们采桑花的时候聊聊吗，我一手抓住他那冰冷的手，问道。

我希望我得到了正确的密码。许多年过去了。在三合会里，在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构中，那些没有文身展示的人最好要理解创制——在合仄押韵的俚语中，一切都以三的形式出现——采花的是三位女士吗？三个提示，两个没了脸？三个女王和一对高手？整个房子带着冰冷的怀疑凝视着。我在吸引着人群。就在我们沉默的时候，死亡打了个呵欠。至少就眼下看，我们可以通过挖掘记忆来打开未来。罗伯·林看着我，没有认出我来。他喉咙周围起皱的皮肤抖动了起来。

记得上海吗，罗伯伯伯？每个人都在跳舞。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

是啊。他们肯定是在跳舞，他说。他们确确实实是在跳舞。



1926年的除夕，维纳斯咖啡吧。我父亲作为乐队指挥坐了下来。他最好的朋友罗伯·林站在他边上。后来他们要轮流去亲吻那些女孩，看着未来随着焰火和子弹而打开，早上，他们将裤子拿到洗衣店，路上看到了一排尸体冻结在阴沟里，子弹穿过无袖套头衫，每个人的后背都中了枪。

葡式免治

我在吃着免治，这是一道澳门人吃的杂烩，由碎肉、洋葱、大蒜、切成方块的卷心菜和松脆的土豆片一起放到橄榄油里煎炸，再配上酱油、干藏红花粉和咖喱，对我而言，这些混在一起，代表了难以忘怀的混乱和安全，并象征着我自己的混杂，生活的混乱，世界的混合，昏厥，到处惹是生非的态度……我就是免治，吃就是安全。我坐在圣地亚哥古堡酒店里的福塔莱萨烧烤旁，看着水顺着墙流淌下来，我在等我的表妹辛迪·林，她答应来见我。

我不记得她小时候的情况了，只记得她是乔治舅舅众多私生子中的一员，赤着脚到处跑，小辫子在风中一甩一甩，无所畏惧地在洪水中跋涉，手臂跟令人难以置信的人链联结在一起。乔治鸦片上瘾后，他们一连多少天看不见他，当他两眼浮肿，一脸憔悴的样子出现的时候，他穿的是洞穴遍布的衬衫和牧师领，戴着船长的帽子，斜眼看着这个世界，就像伯特·兰卡斯特一样，在九龙市九龙城寨擅自占住者和寄居在下水道者中，他显得高大，一双蓝色的眼睛，他会一直寻找辛迪，他的黄金女孩。那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的中国母亲死于霍乱。有一天，辛迪会成为大人物，我母亲说，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冷酷的蓝眼睛，她很聪明，虽然她没有上过学，但是她能够在炸鱿鱼摊那儿摆弄算盘，学会抓住她的机遇。正是辛迪开车来到码头，抢救她快要淹死了的父亲，那天起了风暴，她正好在南丫岛。乔治舅舅两腿分开，跨坐在快要淹没

的小游艇上，跟我父亲公司的游艇进行易鱼交易，却不料从船上掉入水中，头撞到了船舷上缘，人给缠住，沉入到正在下垂的网中。没人愿意跳到那令人恶心的馊水中，在即将到来的涨潮中，垃圾和死耗子都堆积在这里，因此，他们只能任他在腐蚀性很强的漩涡中旋转，给吸到阴间里。他们希望他能回来，他们永远如此，这些白鬼，他们信奉的是娱乐，第二天，他们会一身晒黑的样子，重新出现在酒吧里，一口咬开金酒瓶的盖子。但是辛迪从码头那儿跑过来了，她拼命地想保护她父亲的安全，一头扎进水中，就像从前，她多次投入洪水中，将他带回家。她瘦小的手臂找到了渔网，但是却拖不动他，虽然他因吸鸦片已经变得骨瘦如柴。看到她陷入了麻烦，他们叫人拿了一个大鱼叉，将他们俩拖上岸，然后飞快地送往水边的一家诊所，但是太迟了。

现在，辛迪每到清明就去给他扫墓，她看着灰绿色的水，告诉他要睡好。在那些无家可归的日子里，罗伯·林发现了她，他是乔治舅舅的老客户。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为他工作。实际上，所有聪明的和无家可归的人都为罗伯·林所收留，他成了每个人的舅舅。这就是得到忠实员工的办法，他说。

我在想着金色的脚镯，裹脚，专横的家庭和污言秽语的小妾，我在想着文化、特征和容貌的混合，我在用我的舌头品尝着免治，这时我看到辛迪·林穿着一件充满活力的亚麻布衣服走进福塔莱萨烧烤，四周看了看，在寻找某个特别的人，尽管吃饭的人不多，尽管我敢肯定她先看到了我。餐厅领班马上认出了她，将她带了过来。你知道这一刻。这一刻流动终止了，线给折断了，这一刻实地考察工作者称之为阈限或门槛，在这个起始点阶段，一个项目变得既令人振奋，又十分危险，或者说只能容忍一下，最终注定要失败。

辛迪·林看着我，没有笑。在她那双天蓝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她要了两杯白兰地都没有说一个字，而我则一直喋喋不休，想避开这尴尬的沉默。她随意地摆弄着那些花生，流露出了布鲁克林

口音。

罗伯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她一边舔着手指上的盐粒，一边开口说道。此外，他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他会记得我的名字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这么说你在写故事?

传记。

是虚构?她傻笑了起来。挖掘垃圾?你父亲一直想拥有一家报社。

我只是在寻找一些旧事，想先启动起来。是真实还是虚构这倒没关系。我没有什么鬼鬼祟祟的议程。

是啊，他们都这么说。

我只是想知道谁跟谁有瓜葛；此外，这是陈年旧事。

对我来说未必是陈年。他们冻干了一切：鱼，水果，尸体。

澳大利亚四十年已经摧毁了你理解中国女人的能力。东方主义积聚在你脑海的仓库里。你忘了他们并不真的需要你；他们会剥夺你扫视的权力；给你盖棺定论，然后将你扫地出门。而你一直还以为这种冷漠是简单的谦虚或礼貌和矜持，实际上这也许是故作清高。但是之后，你老是梦想别的地方。你不想下半夜坐在那儿想象着那些生意和成功的合伙人。你不梦想收购，或给哪一个建筑师打电话来设计你的房子。相反，你将生活荒废在读书上，午夜以后，你老是梦想着那些梦和那些梦的影子，无缘无故地堆积着那些文字，突然之间你想到了鲁西·阿恩霍尔特，一个大学毕业后你就开始约会的女孩，有一天，在悉尼北边的中国人海滩，你顶着炽热的太阳在游荡，喝了很多冰镇香槟酒，而且还说道：鲁西，我从没离女孩这么近，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什么期待。这很平常。你一开始就将想象中的建筑和终身好友加以扼杀，你是一个恶棍。但是你已经梦想到了经得起竞争的怨恨，家里的气压计，她母亲钢琴上的小摆设，鲁西在律师事务所辛勤工作一天后将隐形眼镜取出的方式。

整天写作？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工作？她会带着某种蔑视斜眼看着你。当然了，我就是不想要中国的宝宝，她会说。但是一年之后，你娶了鲁西·阿恩霍尔特，一切正按你想象的那样进行。

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想跟辛迪·林生一个中国宝宝。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基因上偏好表妹吧。

你为什么不跟威利舅舅去佛罗里达，我问道。

我又不是他的私人助理。

那么你是罗伯的？

听着，你最好跟紧你的舅舅威利。他到佛罗里达是去激光治疗他的前列腺，如果他回来了，他想知道他的租金是否收齐了，他的植物是否有人浇水，他的仿金是否完好无损。他会感觉自己有点男人味。按照他说的去做吧。这是你的机会。用你那本小本子写点好的东西。你肯定会赢。

辛迪·林的美国口音随着听众的人数多少而提高或降低。一个菲律宾乐队站了起来。那个女孩不会唱歌，但是她肯定认为辛迪和我是情人，她冲着我们发出亲切温柔的声音，结果走音了。也许她以前在这里看见辛迪·林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下子想了起来。他们的记忆得到了回报。服务生大步走过舞池，过来给辛迪点烟。她略微颤抖了一下，然后吐了口烟。她的肩膀随着音乐轻轻地摇晃。

跟我来。

她站了起来，轻快地向舞池走去。七名服务生转过身来看着。我拿好皮夹。不，他们微笑着，是房子。没人付钱？你不用付，他们说。外面雨已经变小了。她的司机开来了白色奔驰。尽管没有这个必要，但看门的人还是弹开一把大伞，把门打开。我们开车来到海滨。她问起了我的婚姻。

这么说没有任何进展？

她的口音转向了某种清新的牛津与剑桥的混合音。

没有。

跟我多说一点。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也是。跟我在一起，你得多交换点秘密。

辛迪·林第一次笑了起来。我能够在黑暗中看见她的白色小牙齿。十四岁那年，她提醒我，就是我回香港的那一次，我们在阿妈住的地方彼此拥抱过，而且还亲过。当时她比较可怜，是乔治舅舅的赤脚女孩，而且经常烦我，那时我感到强大而歉疚。

我们慢慢行驶着，穿过入口处的检查站，来到改造过的水边那一望无际、无人居住的房屋前。几盏灯光在到处闪耀着。高楼上，赌徒们正在计算着他们半夜里的数字，盘算着如何借钱来继续他们的生意。一块可乐霓虹灯牌在一家无人杂货店上闪烁，但却错误百出。保安人员招手让我们通过。我们开车经过没有铺柏油的街道，轮胎压得砂砾喷到了车的底盘上。司机开进了一家三十层楼高的车库。车库里的灯光从头亮到尾，还有一间警卫室和一扇卷帘门，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影子爬到车前，打开我这边的门。这是那个兔唇，就是几个小时前在葡京前说操你妈的那个。他占了一些地盘，或者说这里没准儿有他的很多同党，但是辛迪·林似乎认识他，她从她的古姿钱包里拿出一点小费给他，这钱包就像是一个酒囊吊在一根细细的皮带上。他吃吃地笑了起来，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蹑手蹑脚地消失在阴影中，这时繁星满天，我听到了水的对面传来了歌剧……萨尔瓦托……某个男中音发出了警告。

又是一个被罗伯保护的对象？在电梯里我问道。

不，是一项计划，她说。

不，我不是说建筑或歌剧。

我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没有看到，罗伯有一副好心肠，他收留无家可归的孩子，照看他们，然后他们就成了一个良好的信息源。不管如何，乞丐听到的东西不少。

她用指甲从银盒里弹出一支香烟递给我。

不，谢谢。你让这一切听上去像是一个儿童保护机构，但是这更像是一个黑社会勒索保护费的行径，辛迪。

随便你怎么想，她说，但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生存的，中国也是这样生存的，这个世界就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你，给懒惰的生活宠坏了，想给自己伤风败俗的话语中增加点自以为是的东西，然后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

你在这一切当中起什么作用？我问道。

我们形成了社团，表弟。

这部电梯装了一个烟雾探测器。

没有连起来，她轻蔑地说道。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她的鼻孔放大。电梯门嘶地一声打开了。我们来到了阁楼。她将一只手放在我的前臂上。

你的皮肤很细腻。

她在钱包里摸索着钥匙。我们穿过第一组厚重的木门，这些门是按中国风格建造的，墙上装着托架，门铃给固定在了加工过的柚木上，然后，我们进入夹楼，来到一个下沉式娱乐室，大得跟曲棍球场似的，里面有一个能发出柔和的嘶嘶声的池子，有一个角落还有桑拿。她通过努力来到了这儿，这比炸鱿鱼要好多了。

罗伯真了不起，我说，心里很想去涉足一个我知道我永远也进不去的领域。

我听到了卷帘门发出的沉闷声响。也许是歌剧那儿发出的焰火。

你穿短裤的时候，辛迪·林会举起一只尖尖的手指，指向我这个方向，不幸的是，它圈的是一个不受保护的区域，罗伯在剑桥。他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却从未完成学位。看不懂你为什么要去弄明白那家老字号。回来管好他的事务吧。

他是一名搬运工，我纠正她。

她不喜欢被人更正。辛迪本人在伦敦拿了一个商务学位。她已经成了一个人物。

是的，她说，但是他有图书馆特权。不管如何，他买下了你父亲的所有权。你父亲的橡胶鞋卡壳了。他在走下坡路。他无法制造足够的鞋子卖给穷人。他太慷慨了。罗伯一年之内将整个生意盘活了。

是的，我父亲总是说它会复苏。

你父亲没有任何选择。罗伯从橡胶鞋转到避孕套……将它们卖到美国去。

她推开门。卧室。

这地方不错。

不是我的，她说。

罗伯的。

开玩笑。罗伯住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度假岛上，在那儿，他们只开高尔夫球车，在那儿，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送去的，包括菲律宾女佣和加勒比男管家。

那么这是谁的?

你的。



什么?

瞧，她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不停地皱着眉头，你来是有目的的。我们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说你在写一个故事，但是这不大可能。你住在威利舅舅那儿，现在你破产了，也许你想挖掘一些旧的联系，从中骗点什么。但是罗伯一直为你的家庭感到难过。第三代，他不停地跟我说，总是想重振家声。

你父亲做生意毫无指望。他一切都是做

秀，喜欢女人、高档的生活和他所谓的等级。他一直好高骛远，而罗伯则脚踏实地。你父亲应该在迈阿密退休，在小哈瓦那安享余年，扳手劲，品柑香酒，和头戴卷边平顶帽，身穿夏威夷衬衫的古巴流亡人士聊天。而你……你不应该写书。

安静的生活，我说，但是其中还有几场战争。

几场战争，没有远见。总的说来是这样的。我开门见山吧。你是一个作家。那么你写一些好的广告……给退休的大学教授，60年代的汉学家和灰白胡子的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内容大体如下：投资澳门，了不起的滨水地区，赌场，带池子的阁楼！等等。你卖出去三个，就能免费得到一套公寓。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不是恩赐。将广告做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不要给他们官样文章。……由于需求加大，因而想投放一流的房地产，对于我们的特殊报价，望客户惠予考虑，等等。我们将此做成一个投资机遇，让他们飞过来，一年之后推动销售，清理掉悬着的条款，在模糊的合同里挤出一个缺口来。真正的公寓还没有完成呢。

她来到阳台。打开落地门。三大盆圣诞红一直在落叶子。我出现了童年时代的阵痛，拖着脚将血红的叶子放到了水磨石砖上。

圣诞红

圣诞红说我们将贫困、富裕、再贫困。

快圣诞夜了，在一次大胆的赌博中，我父亲刚好失去了他的橡胶厂，他参赌是想进入零售业，但是他一点也不懂，以为这只是买卖问题，但是这确实是削价抢生意的活儿，是在等待割喉的机会，加快了腰的弯曲，碾碎了手指。但是我父亲是大家的朋友，他借起钱来就像这已过时了一样。他很豪爽，是一名慈善家。他想建立一个基金会。别着急，他说，我总是能弹回来的，就像橡胶一样。但是他实际的举动是酗酒，每每到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然后他就一头扎到床上，他的房间只是一个薄薄的胶合板墙隔离的，他会定期起来洗劫冰箱，寻找冰水和橘汁，然后我就会听到他呕吐在痰盂里。



也许他是在打喷嚏。救火车将闪亮的灯光打在天花板上。我躺在床上，玩着他的左轮手枪，我将手枪从枪套里抽出，瞄准冲向窗户的飞蛾。也许枪里装了子弹，但是我还扳不动扳机。

我们搬到了花墟道，离西边只有三条街，一次别人找不到的搬家，超

越了社会界限，经济界限和味道界限。虽然名字如此，但是这儿其实看不到花。相反，这儿可以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里面混合了开放水道那儿流过来的污水，印染工厂那儿流过来的化学品，还有臭豆腐和猪的味道。这是一条潮湿的街道，充满了裁缝和染工，排水沟日夜排放出红色和紫色，斯特拉和伊尔玛说，这是屠夫在洗衣街拐角处屠杀的猪血，她们看到猪脚从防水布里露了出来，并且听到了猪发出的长声尖叫。

公寓的窗格坏了。楼梯平台对面的三个家庭及其孩子过来盯着看。外国人搬进来了！他们叫了起来。我们用橡皮圈轻轻地砸他们。大卡车在街角的加油站里进进出出，一缕缕黑烟盘绕着经过窗户，到了大热天，水还要实行定量配给。我们大部分时间赤着脚，拖着塑料桶来到加油站这儿的社区水塔。世界是由塑料和橡胶组成的。

有一天，我父亲坐在花墟道肮脏的公寓里那架钢琴前，将贝多芬的一段音乐转换成爵士。*爱情会给你带来皮毛和连奏，爱丽斯*，他哼着。隔壁的中国学生用棉絮塞住耳朵。他们正设法牢记数学大考中要记住的开立方。阿纳尔多想到了上海，只记得痛苦、恶臭和疯颠。在一次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他签字卖掉了他的生意。*我要用日常的诅咒塞满你的钱袋*……他甩开左手，大步前进，低音乐器一起一伏，他的戒指在钢琴键上敲着切音节奏。天气很热，医生们还在开着降温处方。突然他疾病发作。没什么要紧的，就是一次冰流，就像是被冰箱处了电刑，放慢了曲调，穿过哈尔滨一条冻结的湖，听着子弹经过时发出的逆行哀鸣。既冷又热。他从黑暗的水中露了出来，躲过了巴黎咖啡馆外一个水手的拳击，但却没有躲过拉着漂亮女人飞跑的人力车夫，车杠打在了他的左脸上。*无情的妖女*并没有停下来。扑嗒！他并不缺乏文字，这也就是说中风跟肌肉有关，某种充血扩张的动脉瘤搏动着通过了他的左手，某种和弦发出的可恨的不和谐音，咚咚，咚咚，没有节奏，刺耳的妖术，象征性的栓塞，时间冻结，随意插入，跳背游戏，希望有一个口子，插入到线性命运之中，有那么一阵子，步伐得到了健康操控，隔壁的中国人取

下了自己的耳塞。噪音现在已不再是音乐，可以成为一种不错的记忆存储器，3√666，魔鬼般的三位一体，阿纳尔多和魔鬼，阿纳尔多见鬼去了，他的手现在已经麻痹，大楼倾斜，奠基石混乱，大楼开始下沉。这就是上海留给他的。那条街叫什么来着？他的声音留在了水下。这就是答复：你再也不能演奏了。在充满诱惑的城市里，一副无用的手套又起什么作用？他的命运已定。

但是和以往一样，阿纳尔多开始着手工作。他让自己从前的那个工厂做了一副模型，现在这个工厂已经成为弥补术的开拓者，并将此改编到大三和音之中。幸福键永远也不能被打败，他说。他信心十足的是，无论上帝给了他什么，他都能运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是现在已经是圣诞夜，我父亲还没回家。他说他不相信圣诞节，于是我母亲给我们穿上保暖的衣服，将我们带到午夜弥撒，而我自始至终在睡觉，在睡梦中我看到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完全醒着，看着我们从前归属的名门望族，缓慢地行走着，从声音低沉的意大利牧师手上拿过圣餐。每有一组人过去，我同父异母姐姐都要猜一下香水的名字。幸运的是，和音又开始了，他们获准可以离开，趁乞丐骚扰之前冲进夜晚寒冷的空气中。这是历史记载中最寒冷的冬天，回家的路上，我们从一个深受喜爱的小贩手上买了烘烤栗子，第二天早上，这个小贩死在了自己的炉旁。双层巴士缓缓经过，通过打开的窗户，人们听到了车上天使般唱诗班的颂歌，同时也听到了咳嗽。天很冷，没什么受不了的，但是这种冷带着冰冷的风，不停地在建筑周围呼啸，这种冷飕飕的味道在记忆里渗进渗出，还有布厂的染料，中电集团边上湿货市场里卖出的鱼，还有我们拖树时留下的枯死松针排列在楼梯井里，给墨水弄污的绉纸和教会的熏香，我们将天使的刺毛铺摊开来，让它们看上去像雪一样。在餐桌上，我母亲和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摆放着烤牛肉、腌火腿、熏猪肉和烤土豆。我父亲说，要想过一个真正的圣诞节，你得有一棵树，一个壁炉，还有一张堆满了东西的桌子，听平·克劳斯唱《白色圣诞》。我们或一点一点地吃着

食物。我父亲没有露面。我们围着桌子坐在老的散热器前，这个散热器一会儿砰砰，一会儿嘶嘶，上面都是锈，我想起从前，在我生病的时候，散热器就在我床边，我一遍又一遍将喷嚏都打进去了，看到我的高烧在跳舞，闪烁，然后在这个口吐火焰的设备的作用下，高烧渐渐退去。我母亲不说话。她无法高兴或开心，每次她想尝试的时候，结果都很尴尬。她催我们打开礼物，但是我们都觉得这还不是最佳时间，于是我们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先是玩游戏，然后再彼此刺激。伊俄卡斯特和维也纳一边，斯特拉和伊尔玛另一边，我则居中，最后，总是我建议我们爬到屋顶去看看梅布尔斯，因为这是解决我母亲压抑的外交手段。至少我们离开了房子，这个圣诞节，我们彼此挑战，看看谁可以送一件没有打开的礼物给梅布尔斯，这个住在屋顶的狂人。我们爬上楼梯，穿过倒退了的中等阶层这道屏障，奔向难以企及的自由和荒野。高空中，空气散发出恶臭；煤炉，嘶嘶的油锅，煤油，破布，猫尿。浓烟抚摸着星星。这些擅自占住者挤在一起，烧着臭豆腐，因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虽然有人告诉过我们要当心肝炎和霍乱，但我们还是尝了一下。我们坐在翻过来的桶上，吃得有滋有味，因为正如伊俄卡斯特所说，禁食尝起来最香，私下里我们都想死。梅布尔斯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上下跳着，用被包裹起来的手和脏兮兮的手指打开礼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一个针线盒，一条围巾，还有我放在盒子里的一套戴尔漫画。他和众人分享，不过我们没有把这些要回来。很快他打起了饱嗝，流露出一脸嘲笑，那副样子我们真想揍他一顿，过了一会儿，他来到邻近屋顶的一角，脱下裤子，拉起屎来。斯特拉说只有生性懒惰的人才会将我们拖进这种混乱中。哪怕你的母亲出去工作一下。她说这话并没有特别针对谁，但就在这个时候，维也纳打了她一下，于是她们重新扭打在一起，幸运的是牧羊场主们正好在场，将她们拉了开来，最近，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开始摔剪刀和织针，但没过多久就开始摔斧头和刀。她们打架的时候，我感到仿佛有人将一快巨大的石头

压在了我的胸口，难得一现的幸福记忆也消失了，留下的是对大家的憎恨，恨他们一个一个都欺骗了我。不过一想到幸福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是心中也就将此快速转化成了一种奇怪的幻想……但是等你去想了，它又变得遥不可及。梅布尔斯很开心，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想，这也就消除了欢乐和悲伤之间的等号。一切都只是一个幻觉。我曾经看到母亲去中国妇女事务部找工作，因为父亲已经将开饭店赚来的钱全都挥霍掉，和一个每一子儿都偷的买办混在了一起。母亲在战争期间当过护士。她在被占领期间照看过日本兵，斯特拉说。那是通敌。现在她还想找一份护理工作，但是没有一样令她称心如意的，因此她的心也不在上面，我看着她回家时神情沮丧，一副绝望的样子。我知道她本该从事的工作。我知道她本该充满笑容，不会表现出一副求职若渴的样。跟我外公一样，她生来就不是这块料。她在等一份家庭遗产，但实际上却是分文皆无。她对着镜子，看到自己的一部分正在消逝。她不能强颜欢笑。我听到她好几次在说：你不要一下子就死。这种悲痛出自她的家族。死亡总是要容易些，而且不可避免，但是你要坚持。你得坚持。但是我父亲家却无话好说。空生空。但是他也不想三思。这就是幸福？我母亲坐在床边，吐到了地上。她几乎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斯特拉说她还得将呕吐的东西清理掉。斯特拉说脏活总是让她做，因为她是他们中最聪明的，要想不让最聪明的人出人头地，一种办法就是强迫他们去干卑贱的活，就像在中国的乡下。但是你瞧，斯特拉说，我们欧洲人知道等级和品位，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我从没看到斯特拉清理过什么。伊俄卡斯特冲着她啐唾沫。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和我们在一起，和他在一起。她指着弯着腰的梅布尔斯，他正嘟囔着，挥了挥手，摇摇晃晃地倚靠在大楼边上。从楼下的大街上，我们听到了沙哑的笑声和尖叫，还有杯子的碰撞。是爸！斯特拉叫了起来。我们冲下楼梯，去迎接爸爸、叔叔、婶婶，还有所有的情人、妓女、情妇和舞男，他们构成了我父亲的纵队，他们从口袋里拿出各种礼物送给我们：手表、戒指、给我的美国大兵的

打火机、韩战中得到的奖章和真正的美国海军军帽。我父亲忙着拌饮料，梅梅叔叔直叫肝痛，胡安钦和架起了萨克斯管，大个子恺撒拿起了低音提琴，外号“比利小子”① 的小个子苏萨站到了鼓前，最后，达里奥叔叔拿出了他的小提琴，但是他醉得太厉害，没有注意到有一根弦已经断了。爵士音乐腾空而起，充满了整个房间，这一切真他妈的快活，我对维也纳说，但是我母亲却看不到了。她在洗澡，维也纳后来告诉我。维也纳正对着镜子撅着嘴，上佩内洛普·平送她的唇膏。佩内洛普·平在美丽华酒店大堂工作，知道唇膏。后来爱丽斯·德·萨尔瓦向我走来，将其细腻的小手放到我的头上。爱丽斯是葡萄牙和意大利混血儿，看上去像丽塔·海华斯②，只是她是一个了不起的舞蹈家，而今天晚上她身着一件荷叶裙，脚穿红色的高跟鞋，一双手在我的头上来回摩挲，而我也随着她的节奏摇晃，仿佛在她的香水波涛中仰泳。我盯着她看是因为爱丽斯太漂亮了，你无法不去仔细打量她，这么黝黑，这么高雅，一张脸由不得你不时不时地去抛几眼，然后还要扭过头去，好像是要劝说自己这张脸还不够完美，虽然我头不动，但是我能看到乔治舅舅躺在睡椅上，脖子上系着圆点花纹领结，一只硕大的手上拿着一小杯威士忌，看上去就像是伯特·兰开斯特③在思考一个棘手的道德问题，或小镇上出现的一个新的逃犯或女人，“比利小子”苏萨倚靠在鼓边，揉着他的肩膀，他们奇怪地避开彼此的眼睛，交换现金，将它折叠成小小的正方形，然后放在空空的糖碗里，到了派对结束，房租就会付掉。在临时搭建的栅栏旁，我看到父亲靠在配好了镶板的镜子旁，将骨折处复位，我看到贝基·梁还在学校里，在靠近浴室的阳台上浇灌着植物，光头叔叔达里奥腋下夹着小提琴弓弦，上面拖着马毛，指导着他。这时看上去十分撩人的多里斯阿姨出现了，其实她算不上阿姨，只不过是我父

① 比利小子(1859—1881)，美国西部传奇人物，著名神枪手。个头不高，绰号“小子”。
② 丽塔·海华斯(1918—1987)，美国女演员。
③ 伯特·兰开斯特(1913—1994)，美国演员。

亲的秘书，但是我父亲并没有生意可做，因此对于他为什么还要秘书，大家都在猜测。多里斯阿姨是英国人，一头金发，举止得体，不苟言笑，就是她笑了，也只是一种退缩，对此你还真得表示感谢，我父亲说她十分得力，他的意思嘛，斯特拉给我们解释道，就是说她没有将时间浪费在无聊的谈话上。多里斯坐在远处的沙发上，罩有椅背罩布的那种，小心地看着一瓶白兰地，她身上穿着一件打褶的格子呢花裙。她的小腿很粗，她站起来的时候，那样子就像是一名女警察。我叔叔罗贝托，就是西非雇佣兵，说她在床上的工夫一定棒的不得了。后来雪铁龙夫人走了进来，打断大家的谈话，说她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妻子。雪铁龙夫人是西印度群岛人，住在楼下面，有一次，她想修理一个电灯开关，结果差点电着自己。听到楼下的尖叫，我父亲拿着棍子就冲下楼去，发现她的手粘在电线上，于是将电线撞开，救了她一命。雪铁龙夫人就像是一盏灯泡，上面是圆的，几乎看不到腿。英国人就像这样，罗贝托叔叔接着讲多里斯阿姨这个话题；脑子很笨，但是穿着得体，在阅兵场上十分守纪律。罗贝托叔叔在非洲当兵，杀死过许多人。他那套小房子有一半给围上了丝网，做成一个巨大的鸟笼，里面收集着各种奇异的小鸟，你只要一进屋子，就能闻到那味道。但是我父亲现在出去找我母亲去了，结果麻烦来了。噪音越来越响。门铃响了，罗伯叔叔出现了，穿得像圣诞老人似的，手上拿着一大袋礼物。我得到了一套巨大的电动火车，达里奥叔叔摆弄着电线，想让它启动起来，突然，他触了电，像木偶一样甩起了臂膀，但是幸运的是，这只是在电线的变压器一端，不过这也给了他几个电伏的打击，他说这就像是在他的光头上重新长起了头发。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是雪铁龙夫人靠着火晃动着乳房，说她要晕倒了。威利舅舅举起电线，就像是举一个美味佳肴，然后再将电线挤回到变压器中。什么也击不倒他，他说。我将整套火车和其他礼物打好包，带到我的房间。我将这些东西放进我的抽屉，满心欢喜地回味着这一天，私下里，我会将这些礼物全都带出去，将它们全

都修改一下。拿掉轮子。将它们变成流线。通过修改，我可以摧毁原始，为的是让它彻底成为我的。这也是家族的特点：凡事都要操心，修补关系，各种途径和方案计划来计划去；修补尚未破裂的东西，为的是要得到事物的核心，再也无法复位。就像记忆。就像文字。不经意之间突然迸发。我父亲发现了我母亲，他在洗澡间的百叶窗之间扔下一个巨型爆竹，我母亲什么也没穿，只在身上围了一条浴巾就冲了出来，满脸发白，站在那儿，还以为是日本人又在扔炸弹了呢，我想她就差哭出来了，但是一片喧嚣，达里奥叔叔在拉小提琴，他将提琴夹在双膝之间，并解释说是想体验一下电击的感觉，而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们也是一片尖叫，在舞伴之间彼此追逐着，大家都喝醉了，谁也没问为什么我母亲身上只披着浴巾站在舞会的中间，他们还冲着她招手，但是乔治舅舅发觉不对劲，于是他给了她一瓶白兰地，扶着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的同父异母姐姐斯特拉气喘吁吁地冲到我跟前，尖刻地说道：你母亲真上品位。阳台上，圣诞红的红叶都给爆竹炸飞了。

蝴蝶夫人

哎，你觉得怎么样？

你有没有睡觉？

辛迪·林说道，我们眺望着歌剧灯光映照下的水。

没有家庭，我们没有了家庭。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她坐在摇椅上，两条腿像剪刀一样一张一合，一会儿将手指缠绕来缠绕去，一会儿摩擦着她的大腿，一会儿又上下起伏轻轻地抚摩包得很紧闪着光泽的长袜，过了一会儿，她冲我眨了眨眼，站了起来，到酒吧柜台那儿拿过来两个磨砂玻璃杯子，倒上了威士忌。

我回到了洗澡间，水池哗哗作响，龙头不停地喷涌，水流如注，轻轻的浇灌下来，我堕入到了地狱，变得放荡起来，再一次理解了分别的含义……这只是一种化学状态，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要冷静地战斗……最好的交涉就在疲乏之中，没有幻觉，也没有欲望。就这样，在一片刺耳的错误噪音中，凭着一节节没有技艺但却很有价值的手指，我重新获得了我的荒原，我放弃一切典雅的焦虑，再也没有了欲望，能够清醒地讨论辛迪·林的诽谤，正视她放荡而明显的引诱。

我没什么好声明的。我想到了明池。只要我一想到吃明池的东西，我就会走向贫困。明池的菜装饰得十分轻盈，仿佛充满了浮力，没什么好公开的，简单到就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洋葱、土豆、少量的碎肉，再配上不幸和悔恨这道主菜。这既体现了绝望的形状，又成了生命的主

食。这是一出肚子罗曼史、是内脏的欲望。用不了多久，人们又会饿起来。

对不起，我终于对辛迪·林开了腔，到了这时，她还以为我是在犹豫，目的是为了消磨时间和欲望，为跳舞做准备，一旦跳舞，乱伦和禁忌就都给消除掉了。辛迪·林同样从现在中给消除了，正期待着未来，她倚靠在长沙发椅上，听到了我的声音中充满了倦息，于是马上就知道她对我的诱惑失败了。不过她丝毫没有流露出吃惊的神色，她已经推测我有可能在洗澡间给同事打电话，同事告诫我要避开。接下来什么事也没发生。她笑了笑，耸了耸肩膀，喝下了她的威士忌。水对面的歌剧已经进入最后的咏叹调。辛迪·林调整了一下鞋子，塞进一只手指，抓了一下她的脚背。

没关系，她说。歌剧已经进城。也许某个著名的男高音会抓住机会。我会让司机将你送到古堡酒店。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想走一会，听听那歌声。

好吧，我们都尝试过了，她说。罗伯向你爸爸承诺过，如果你需要什么……

噢，对了，趁电梯还没来，我赶紧说道，我还真的需要一点信息。

没问题。她咧了一下嘴，表明她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是的，我听说过枕边书，她说。她皱了皱眉，想了一会儿，手放在头上，倚靠在开了的电梯上。日本侍女写的日记。

不……我是指……

你会发现威利舅舅十分着迷于书法。你知道，书法和内容无关。

这么说……

它跟复制有关。也可以说它涉及到敲诈。

敲诈？

但是她没有回答。她用小手指挥手告别，满脸笑容，门叹了口气，关上了。

小宝贝！去，去玩吧……这一最后的旋律痛苦地回荡在小岛上，此刻，一阵薄雾早早就出现了。最后一班喷气飞机带着一群沉重的失败者轰鸣着掠过平坦的水面。一位老人坐在一棵挂满小灯的树下，听着音乐，并用手指在耳朵里掏着什么。在随后到来的黎明中，高雅的音乐就会消逝。

我回到舞蹈广场内的小旅馆里，睡了一整天。后来，晚新闻爆出了一条充满暴力的警报：机关枪炮火渗透。罗伯叔叔的车子那天早上遭到了伏击，司机严重受伤。这一切都给摄像机捕捉到了。

摆渡

我乘渡船回到了香港。

渡船很慢，全是锈，只能算二流，也许是三流，只有游客和难民才会靠冷茶和啤酒来打发肚皮，消磨掉这三个小时烟雾旅程。这种缓慢将我抛进了一个伴随了我大半生的洞中，所谓洞就是我没跟上船，因而也就一直没有到达；这是一种十分熟悉的自由，站在船尾，找到一个容易跳的场所，只要没有其他诗人开过先例。

渡船、船夫、河流，所有这一切都充满了神话和故事，不过这一切再也勾不起我的兴趣。它们太抽象，寓意太浓，跟我隔了一层。在我的血液里，只有引擎那充满了安慰的节奏才能诉说起现在。我们经过无人居住的小岛，这也就意味着没有淡水。渔夫会跟你讲这些地方的故事，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埋葬死人。到处是石头，十分贫瘠，还有容易破碎的粘鸟胶，海盗会藏在这些山凹里，突然袭击这些汽船，抢劫游客。渔夫的手瘦骨嶙峋，满是皮屑，你问问他们，让他们讲讲扔到船外的那些尸体。在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中，他们的船快速推进，捕鱼、日出、菲食；怀孕、出生、生死，所有这些都在水上。令人惊悚的故事，夹杂着空洞的方言，还有满嘴的唾沫星子。

那么你一定记得这件事。我母亲当时乘着渡船，匆匆忙忙地赶往某个地方。她喝着冷茶，情绪低落，看着水面上像油一样的光亮，感受到了气压的下降，聆听着俯冲的海鸥发出的尖叫和即将到来的风暴发出的

低沉连续的声音。她闻到了浩渺的水，想走到船外去看看，凸起的肚子差点要伸到天边。没人能拦住她，也没什么能压抑这一肉体。除非她父亲的平衡观，即是前一步还是后一步犹豫不决。她孤寂无援，开始准备我的出生。她怀孕时出现了一些综合征。现在，在痛苦之中，她决定去香港，到她父亲的私人医院里去接受治疗。没有男人陪伴；她也没有碰锈迹斑斑的船尾栏杆。她不等我父亲了，因为我父亲给重要的生意绊住了。汽船的缓慢拖住了她。

就在这时，她感到了摇晃动作所带来的灾难。

一边是思想意志，一边是睡眠带来的无知，而处在这两者之间则是产能最高的……做完爱后，下午开始出现了疲乏，这种温柔的期待，对无的期待，使你进入到不满的入口，去驾驭征服这头狮子。不，一个男人做完爱后不再爱。一个男人结完账后，就开始漂流到下一个生产欲望中。我出生时我父亲不在场。他想的是如何让茉莉给他生一个孩子，也许是一个儿子，他会用足够的礼貌和冷酷来培养这个孩子，就像此刻台风正在海上酝酿着，带着黄色的光芒，无情，不可预知……

是这样吗，多里斯？这事不是一直如此吗？他对他的秘书说道。

他们告诉我我是难产——是用厨房的钳给钳出来的，我躺在门口，好长时间没喘气，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一直延长呼吸，想堵住说话。痛苦的嚎叫，令人耳聋的抗议，抗议自己从这永恒的漂浮中给拔了出来，无尽的大海那水晶般的地狱已经变成了这种沉寂而充满书法动感的净化。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正好船上有个医生，阿尔马多·桑托斯医生，一位生性阴郁但却十分利落的医生，他从船上的厨房里拿了一条围裙，然后开始给我接生。

枕边书

又是声音，一夜接一夜。中国的声音。就这样，我继续着我的翻译，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蛇……没有月亮的时候更加困难。

从她最初的记忆开始，她就里外逃——记得她过去常常用樱桃枝来做耳环——哎呀，男孩子拽这些枝条的时候，那简直是要割破她耳朵了，她知道为了美，她得忍受——人们常常把她比作茉莉花和小白花，香韵十足。她每天经过蒲柏路[1]上的小栅门，在花园里进出，一边拎起小裙子弯腰摘花，一边祝愿，祝愿她妈妈能够停下无休止的旅行，回到家里来，每次她来回摆动的时候，一个蓝色的影子就会悄悄地爬到房子的窗格前，查理叔叔看着——后来，他会轻轻地抚摩她的腿，向她吻安，他会把她的手放到他的手上，说她会受到很好的保护，不会受到坏人的侵犯，因为他在站岗监视着望志路[2]十字街进出要道，因为陌生人会在夜晚进出，到她们博文女校里消磨时间，并且吃掉门卫给他们做的所有食物，女孩子们放假的时候，查理叔叔监防着坏人，宪兵队则于次日晚上进行搜捕，但是里面却没人，他们只找到了工会的徽章和帽子，帽子上面刻着一个人的名字：毛泽东：湖东——好一个名字——听上去对她而言并不坏；她躺在那儿，跟他一样，避开了她的身份，裹在一件鸭绒被里，想象着她被带到一个湖边，享受着优美的音乐和茉莉花茶，《杰塞米》[3]给小西秀，客西马尼茉莉花在忧伤的花园里飘香，在她的哀伤中，她的孤独正在为所有想象中的情人开放，希望他们来采摘——不

她不想走得这么远，查理叔叔说道，但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狂热的幻想，将她带到十足的冒险之中，非常强烈，有点不对劲，不是神魂颠倒的风流韵事，而是她发泄在查理叔叔身上那种刻薄并且需要全力对付的激情，查理叔叔一边教她跳舞，一边将警棍放在裤子里，在她的一生中，她就是想征服男孩子，用她耳朵上的花环将他们扣在地上——她这股怒气从哪儿来，我们始终不知道，多拉·西德尔说，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孩，什么都敢碰，别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她，英语是她最差的一门课……

有一天，她母亲对她说道，你这样子一点淑女的模样都没有——你必须改变美丽的念头——但是在博文女校，她是首领，她与那些胖女孩扳手腕，扳得她们叫了起来，她带领她们在东上海的弄堂里，靠近小贩摊档的地方进行考察，怂恿她们观察呕吐情况，因为这是她父亲的医学遗传，她一会儿指指这个水坑，一会儿又指指那个水坑，说这些都是肝炎/霍乱/腹泻/醉酒等病理证据，她还捕捉耗子来进行诊断，就这样，她的同学全都病倒了，但是她却一点也没有感染，学校关门，提前放假，而她则在家里消磨时间。

不过她很漂亮，个头很高，颧骨很宽，一双眼睛呈淡褐色，陌生人开始从人群中将她嗅出，她学会了不去打击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产生痴迷，那些没有将她误认为妖女的人发现她不愿响应，觉得她相当稳重、现实，充满了情感，这些正是你在英国女孩的身上有可能看到的，小腿结实，有乡村教养，她用笞鞭抽打着岗哨，但却一遍又一遍地迫使自己做到名副其实，她出席维吉尔举办的重要宴会时开始穿中式服装，不过除此之外，她还是玩游戏的头，并使博文女校的校长相信垒球是儒弱的

---

① 蒲柏路，今太仓路。
② 望志路，今兴业路。
③《杰塞米》(Jessamy)，儿童文学读物，由巴巴拉·斯蕾(Barbara Sleigh)创作。在这里，作者与后面的客西马尼茉莉花(gessamine Gethsemane)放在一起，玩文字谐音游戏。

人打的，她带领棒球队赢得了上海冠军，她一拳击破马场中间钻石看台上的皮革，惊得锡克教骑兵一路小跑去调制咖喱午饭，要不她就将拳头击向排球，将球直接打到对方的脸上，她的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到了此刻，她已成为学校最受欢迎的女孩，直到多拉回复到正常生活，为自己与异教徒调情表示忏悔，同时也提醒自己的女儿要有宗教观，一种救世主般的使命他们很快就要看不到了，她们有可能迁往香港，到了香港，英国人有可能控制住灾难，将其控制在九龙湾口，哈哈，用正确的标点挡住大批民众，在那儿女孩要学习烹饪和女工，待在家里，操持家务，然后嫁给商人……

全是放屁，不过这对她并没产生什么特别的压抑，没过多久，她就一连几个星期待在那儿，什么也不看，想着她的生活已被出卖，整个人生每一刻都要省下来，免受伤害，她在日记上记下完美，这并非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只是对时间和日常事务进行的思考和承受，实际上，她五岁的时候就已显露出解决问题的天赋，比如向树桩里注水，将丢进树桩深洞里的橡皮球给找回来，她倒是想和威利和乔治一样去修补汽车引擎，但是他们翻墙到俱乐部偷啤酒的时候劝阻了她，于是她孤独一人，非常孤独，只有喝祖父的鸡汤，祖父还会带她一起骑马去乡下，她会用祖父的剑鞘去鞭策马，她祖父还带着剑鞘是因为他生怕战斗会随时发生，这样他就可以抽出剑来，进行最后的冲击，但是他十分喜欢这个梳着辫子的女孩，这个女孩就跟他一样，坐在饭桌边的凳子上，仿佛她骑在马上，开枪射灯，熄灭了灯火，完成了艰难的任务，而他则在哈尔滨的雪地里进行了一场决斗，在火车的车厢里吃了一盘鹿肉，和孙中山签署协议，然后拿出一袋金币给她，说要悄悄地把它埋得深一点——出于对你未来儿子的考虑——并额外教她喝了一杯烈酒……

这是她的结束还是她的开始随便你怎么看，因为酒精使她变得温柔，多了份红润，而且十分迷人，这使她想起了她的女人身份，想起了一个遥远的湖或穿着靴子曳脚走路的样子，从在女校里跟男人到妓院附

近和男人及女孩进行危险的约会，她开始振作起来，随着季节的更迭，定期将仆人从他们的住所唤起来，在陡峭的屋顶上阁楼里忙活，寻找满是樟脑味的真丝和缎子旗袍，展示给小姐看，她骄傲地选择了真丝长袜和危险的衩口，多拉不知道，她和她的朋友们到大世界娱乐中心展示了一下，每个人的头上都佩戴了白色的鲜花，身着悦目的内衣，展现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在一次外出之中，她遇见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家肥皂公司的经理，是一家英国公司，他说，笑起来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他说的很好，但是中国味十足，他非常希望她能给一些广告做模特，他说他的名字叫雷基·叶，就像一条狗，他说，或者说像一声喝彩，无论哪个都充满了欢乐和自由，这一能量将她深深吸引，而他也为她所吸引，她的衣服一直开口到了腋窝，不过他们两人都很矜持，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大胆的行为．当然，雷基说他飞的是他自己的飞机．她的父亲维吉尔最喜欢旅游，一听如此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这般这般，中国式的做媒不声不响地安排好了之后．他们便订了婚．恰好准备在南京路上出现炸弹之前结婚……

窥视癖者

我在地砖上跳着舞，聆听着我自己的脚步，但是黄金别墅阳台的水蒸气变了：柴油机油夜晚堵塞，从超大型油轮的滚筒里散发出的船底污臭一层层弥漫在空气之中，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又一天最后的粉红色痕迹消退在来回奔忙的渡船之后。威利舅舅将租金簿留在一个最明显的地方，穿过楼上的餐厅，经过第三道门，靠右就看见了，我拿起这本租金簿，有一张条子钉在封面上，上面教我一大早就去收租金。我读这段指令兴趣不大。此外，我还想感觉一下不同的地方，然后再忍受这些令人不快的举动。我最后看了一眼小书房。有一只角落里有一个文件柜锁着。我拿着威利舅舅留在走廊里的钥匙圈，将每一把都试了一下。顶部的抽屉滑了开来，我看着文件的名字，出租财产，租户的名字，还有逐客通知。再后来还有一个绿纸板装着的奇怪的旧文件，纸板上还有一个金属托，割破了我的手指。上面标着梅布尔斯，里面都是些信和他从意大利采购石料的发票。

从黄金别墅走了一段，我就来到了坚尼地城。这个地方很特别，但却很近，是富人区和穷人区的中间地带。这是一个比较开阔而且长满了草的小圆丘，是一个几近遗弃，但却非常古老的建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经用它来做日本宪兵队的集中营，后来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子倒了，几英里肮脏的房子，露出墙外的管道，垃圾站景象，每隔几码就有一家店面出售干鱼，还有百万家其他疯狂出售主副食品的产业，使得焦

虑变得珍贵而空洞；脑力生活影响到了内脏。正是在这儿，一个人变得困惑，迷失，任性。在这里，一个人像被催眠了似的堕入地狱。我在那儿待过，我父亲在那儿待过，一切就在一夜之间，无论是灵敏度还是文化资本都无法挽救你。突然之间，你的钱就用完了。就这样，你看到你的虚荣消失了。突然之间，你来到了普通人群中，你陷入了竞争，要不然你就会成为遭受别人残忍压迫而受苦受难的缪斯。你尽量不想逗留在那儿，但是不幸就像运气一样随浪潮而来，长时间待在那儿，你给整个吞噬了下去。刚被杀死闪闪发光的猎物器官在你的脚下摇晃。在一家商店内，一位老人凝视着，他认识你，在预测你的前途。他满脸微笑。还没有，但很快，他好像在说。血痕还在继续。在这些楼梯平台上方，绿门背后，有一个私人工作室。一群杂乱的信箱粘在蜘蛛网上。有不少是未被收集的信。我过去经常在这儿等我父亲，上下奔波，一次要跳三个台阶，将邮件重新发放到所有错了的信箱里，楼梯破旧，行将倒塌，所以用一个锈迹斑斑的隔板将它封闭起来，有一天，透过隔板的孔，我看到一个身穿内衣、脚穿丝袜的女人焦躁不安地上下走动，双臂交叉，激烈地争吵着，她的语言我听不懂。我记得当时的激动场景，起先感到奇怪，然后是她走路的声音，对此我还很害怕，再接下来我对她的穿着开始感到着迷，就好像她是否受到伤害都取决于这一迹象，一种风格的幻觉，? 如果没有这点，她一定会冷酷，穷得可怜，一丝不挂。但是最烦人的是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那腔调抑扬顿挫，充满了咝咝声；提升了一种神秘的权力范围，超出了我的凝视结构，这比期待见到我的父亲还能催眠，因为我的父亲是看不到的，尽管我也尝试了其他不太完美的孔。这种语言挫折一直伴随着我，那女人任性地搅拌透明的凉水，权力和感性迸发时既强烈又微妙，像真丝一样，但却储存在那儿，成为怒气和语言撕裂，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感情来源。正是由于这一场面的权威性才记下了这一落差。我父亲始终保持沉默，完全隔离。我觉得这点很奇怪。后来我知道她是将此当作工具施加到他身上，在这种戏剧性的音

乐中显得非常有效，这种申斥他喜欢，这是生命的转化。当然了，我还是个孩子，虽感觉到了这种烦恼但也无话好说，就好像这个世界就结束在这个莫名其妙一片混乱的漩涡中，当然，我的感觉是真的，我使劲地敲击着马口铁和木头，敲碎了信箱，并发出一声嚎叫，想唤醒楼下那个麻木了的屠宰场，结果我父亲穿好衣服冲了出来，看到这点我很高兴，我父亲拦住我，将我带回家，一言不发。他已经吃了败仗，他的脸已经充满了褶皱。我没有。他气喘吁吁地说着话，我们爬上台阶，来到荷李活道，我在那跟K小姐学习钢琴。

我沿着皇后大道漂流，避开垃圾。夜晚，有轨电车陷入到各种线路的迷宫之中，俱乐部开得很早，乖戾的厨师对着锅抱怨着，上面是玻璃似的小路，后来我发现了一条架空小道，便随着这条道走了下去，这些小道就是透明的空中过道，像迷宫似的，同时又很短暂，因为有时候道路的尽头就是商店，于是便消失在电梯和牙医诊所里，或者延伸到广袤的没有方向的走廊里，到处都是饭店和广告。但是在这些小道上，大雨无情地掠过乞丐的破屋，纸板早就被人忘掉了，我与令人眩晕的吗啡进行搏斗，这是我从外公那儿继承来的，他曾经给过我一个管子让我嗅，看着我陶醉的样子，他露出了微笑，并就此得出结论，我不适合继承医学，他认为我的身上集中了他所谓的主要缺点：无精打采的梦想、自暴自弃、夸夸其谈。我一直记不住他的脸，我常常在过道里听到乞丐的肺部咳嗽；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吸收着有害的文学药品，给最不需要的精神提供无用的希望，而撒在我身上的是炎热感冒，生病的时候，我躺在纸板床上，读着书，渴望得到昏迷的优美翅膀。小时候我就听说过，在排除和引诱之间挣扎，后来，我满怀焦虑地走在吊空小路下的雪厂街上，想和我们的牙医和亲戚海姆叔叔约一下，不去想这件事，海姆成天嚼着口香糖，他问我在看什么书，而我则在沉默中经历着新的血统的考验，我在等他自己回答，跟我讲述那些书，我仔细看着那一盏盏五颜六色的灯光，我的骨头都给它们拖走了，又给吗啡筛选了出来。他给我带

来了史蒂文森和司汤达，并对我的惊人之举做出了推测，但是我知道早年就开始的这一身份标志——学者般的导师，对成功的迷恋——并继而推测犹太性通过非凡的禁欲获得了一种苛刻，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想渴望另一个私人世界。一连两次我甩起拳头对准他那张强有利的脸。海姆医生的助手来自新泽西，满头红发，十分迷人，她那份钟情在左右摇摆中求平衡。虽然我已经做了自我调整，以适应她这个替身母亲，但我还是得出最后的结论：她的一切苦心经营只是为了让我不承认她。后来，我准备到银行去见父亲，在香港国际牛奶集团门口吃冰淇淋，在集团门口，他会严加盘问我有关海姆红头发的事。而我对史蒂文森更感兴趣，梦想着各种小岛，渴望追溯到那不勒斯人一词的词源，我外婆说这个词来源于那不勒斯，这是无师自通的，而我深信这是法国皇帝发明的一种带条纹的安慰剂，目的是为了产生痛。只是到了后来我母亲才告诉我，冰淇淋是为了驱走扁桃腺，而不是牙齿。

最后，我跟渡船联系上了。坐在上下摆动的玩具船里，闻着柴油机的味道，拖着鞋子走在填过缝的甲板上，上面撒着可爱的沙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保留在上面了，我看着一条海岸后退，另一条海岸又出现，周边闪烁着霓虹灯和脏兮兮的磷光。我常常站在木制船舱的窗口，想知道我怎么才能将自己扔到海浪上去，一种骨痛似的疾病敦促我走向这个掉头屑似的接待场面。我一生中就没干过什么妥当的事情，我父亲会告诉你这点，如果他活着，他一定会说。在悉尼，我先是学了点医学，然后又学法律，再以后，我听从巴尔曼专卖店底楼酒吧的意见，漂流到文科去了，当时，专卖店快关门了，便衣警察从几个鬈毛瘾君子那儿搜出了大麻，同时藏在口袋里的还有金斯伯格的《嚎叫》。

有一次，我父亲在离威利舅舅不远的坚尼地城的房间里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如果你回来，你就会在鱼市工作，你得忍受两天。这些信很长也很难懂，但是它们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好像一个彤红的烙铁带来的

疼痛一样。别的他也没给我留什么。

现在我回来了，几乎是在鱼市，在干收房租的事。刚开始事情还没那么糟，因为我是新面孔，因此我出现在楼梯上的时候租户都不逃。大多数人很不情愿地付了租金，但还是一连串地抱怨水电、木工、耗子、墙和天花板上的漏洞等等。我听着，这使他们失去了防备。威利舅舅会强迫他们。我一路沿着旺角线房租较高的小房间去收租，同时又确保我不要露在雨篷的外面。有时候他们能够看到你的到来，于是到头来你的头发上就会堆满猫屎。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是威利舅舅的随员露了马脚，不过这都是后话了。此刻，天色很晚，我走出闻上去令人作呕的太子道地铁，穿过夜间作业那刺人的烟雾，而电热焊枪迸出的火花闪耀在人员稀少的店面上，脱漆留下的烙印，汽车的废气，油火喷射在熟食上，透过呛人的烟雾，看到穿着睡衣的老妇人像幽灵一样，推着满载纸板的手推车，走向陌生的秘密终点。我转过拐角，来到了界限街，突然间，眼前的景色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建筑众多，也更加宽广的林阴大道。在这一片新的发展之中，容氏大厦显得孤独而寒碜，我拿着威利舅舅公文包里的钥匙，每一把都尝试了一下，想打开安全门，我敢肯定我遭到了别人的监视。但是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只有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他们能无人不知地做事，甚至都不担心遭到别人监视。一个黑人男子从另一边走出电梯，揿了一下开关，于是门喀哒一声轻轻地打开了，我想：尼日利亚人。突然，我发现是奥伯龙·温特伯勒在回头冲着我笑。

奥伯龙他知道我迟早要回来，因为上一次他还没有讲完跟我之间的纽带关系，后者说是丢失了的关系，他邀我一同进入电梯，尝了一下他从古巴圣米盖尔·德尔帕德隆区搞到的大麻烟卷，并甩了甩手，说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失去联系。他行事像个幽灵。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失去联系让幽灵夹在了我们中间，他说。奥伯龙动不动就扮演这个幽灵角色，他到处建立联系，有时候这些联系让他陷入狂暴，逼得别人跟他和解。我记得他在重庆大厦就有一个女孩，后来这个女孩给逼得绝望了，她擦

起裙子给我看她的伤疤，她的身体在疼痛，哪怕是一丝温柔的话语都会让她感动，而这也只有陌生人才会如此说。他把他们都送走了，奥伯龙说，就像把紫罗兰抛给了残忍的白天，然后它们带着幽灵般的信息回来了，半死半活，生活在半人半鬼的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在折磨着他，而他又无法到达，这是他母亲为了让他居住而建立在支柱上的一个神圣棚屋，现在，这已经成了一片淤泥滩，他一边说一边打开一瓶葡萄酒，这瓶酒还是他从出售给异域商场的一堆非洲小地毯下面带来的，他甩开臂膀，嘎嘎笑着，就像一只熊，虽然他长得很瘦小，一点也不像熊。淤泥滩上已经爬满了螃蟹，犹如蟹山蟹海，将他进一步放逐到丛林里。充满了瘴气、溃烂的木头建筑的木排路、丛林、人。我们冲着这无穷无尽的奚落抽着烟。我们都知道，非文明人跟文明人不同的就是杀人的效率……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幽灵的尖叫，如此一来，做个文明人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距离我们都很敬重，他一边说，一边在垫子上移动着，我们都坐在垫子上，在他多出来的一堆摆设中还有一堆破伞和几只编织而成的吊床，这是无情者的文化，他们不知道我们一片混乱的爱恋和愤怒背后所包含的那些错综复杂的象征意义，然而我们也不知道灭绝这一概念，因为瞥一眼我们自己的幽灵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馈赠，难以用言语来加以表达。起先这可以保护我们，因为由于我们无法融入，因此我们只能跟我们的幽灵保持联系。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转化成了效能意识。一种合理的归化。他们称之为交流，压制交流的也是他们。这种双重性使我们自我反过来反对自己，从此之后，我们不停地说话，援引各种教义或信仰后充满了词汇的体系。我有幸目睹了一次这一稀罕事件，他说，自此开始清醒……瞧，你得看这些书。他递给我一些法文版的平装书籍。弗朗兹·法农[①]，他说，然后走进厨房，于是我就用拇指一页一页地翻阅着这本难懂的书。

---

① 弗朗兹·法农(1925—1961)，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

在那些无效的屠杀中……就在此时，奥伯龙重新出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仿佛是想隔开我跟这种亲近的联系……达达从丛林中把我和浑身凌乱的母亲找了出来，将我带到他家，或他所谓的蜂房，因为这是由他那些女人经营的，不是靠感情来出售、强奸或掠夺的。这是一个合作社，达达，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跟艺术有很深的渊源，他较早地理解到乡村的社会理想并非冒险主义和个人富有，这是传统的智慧十分看重的，各种秘密机构已经在我们乡村猖獗起来。但是，质朴的理想主义愚昧遇见了社会现实之后，这些事情就偏道了。谣传盛行……(起先是铁皮鼓和烧烤盘所产生的花俏的烟雾，然后出现了奥伯龙自己幽灵般的声音，那音调高过了他准备烧的秋葵汤)……说达达给我植入了一个妹妹，这是他一晚私欲后受到限制，容易受到攻击后的结果，使得他精神膨胀，良心遭受痛苦。村里的夸张说法是，他们需要证实并非事实的传闻。不管如何，传闻成为法律，人们发现她生气，几乎所有的空旷地带都可以看到她的形象，空地的下面则是急速爬行的地蟹和掠夺者，在这种悲愤中产生的报复情绪中是很难讲述正义或政治的故事的，于是谣言乱飞，将达达赶出他的计划，他巩固的地位和他荒诞的公众演示，他开始了一个更加荒诞的活动来阻止恐怖。你瞧，好家伙，达达被逼得对他所谓的抱负的民主化彻底鄙视，因为他一向认为这是抱负的贵族化。他是一个发声王。达达知道这点，伙计，他知道语言的规训，其目的就是为了摆脱镀了金的历史信息的影响，因为丑陋的文字通过收音机、报纸和有效的侮辱性谣传行为涌进我们的国家。达达知道语言已经失去了抱负，一天下来，他想知道其他世界的信息。他喘着气，将我放到他的肩膀上，好像一根拉长了的天线。这就是达达，混乱而无意义的现代化群体中的一只木马，也是它的背叛者，那些收了费的告密者不断嘲笑他。有一天，他放弃了抱负，将我留在家里，寻求一种老一套的欺骗性行为，他跑了，真是一种个人羞辱。奥伯龙说他成天端着纸盘，开启葡萄酒，丛林在他耳边轰隆作响，而世界也将自己展现在他身体面前，他一

会儿保持一会儿又超出他的限度和岗位，梦想着在跑步，生活在跑步之中，用未来才需要的价格购买跑步。他曾经一路跑到三角洲，回来的时候满嘴吐着谬论，开始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尽管在他的基本观点上，他的人生哲学主要还是孤立主义。有时候，别人和他一起跑，但是他好像没有留意到，他只听到大树一步一步向湿地推进，巨大的树根往前挪动的声音，快到三角洲的时候，他听到了水的溅泼声，浸软了的沙子留下了他脚背的痕迹，形成了一个个弓形，脚上的烂泥是踩没了，而他的心灵也经历了洗涤。所有这些，奥伯龙说道，所有这些都驱走了声音，使他相信……一切都有可能爆发，相信沉默的尊严所导致的最终无能，相信庶民对欺诈所产生的反抗。再回到丛林。透过黑色的叶子和蜿蜒的小路，他和别人失去了联系，挖掘出了他曾经擅长的恐怖，十分明亮的恐怖，这就是他出生之前所发生的徒劳杀戮，这些时刻都留在了他的脑海里，那时，外国干预、帝国恐怖教部落灭绝，并用灭绝来清除幽灵带来的混乱。清醒；大脑；回顾与思考。他现在有办法了，加倍努力，否则他就得一直跑下去。可是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他的脑海，而他只是远处的一个旁观者，跟所有这些地方都没有联系，过去他本想跟这些地方建立联系，这些世界里包含着大量可吸收的音乐；这些世界不属于他但却可以给他指明方向。他现在的手段就是全部重新粉饰一遍：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意愿、受难、孤立、个性；黑暗的塔内他的油灯烧得很晚。他完了。给撕成了碎片。

他没有看到卡车司机。他们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想，奥伯龙从丛生的杂草中吐出了第一缕蓝烟，他看到了这缕烟，知道它，也想得到它，蓝烟从丛林里冒了出来，也从他口里吐了出来。他跑步的噪音和汽车的噪音交叉在一起，运木材的卡车从他身上经过，死亡之冠下的死亡之冠，就这么一刻，达达意识到，他不是风，也不是他背后的叶子，更不是美国卡车上刺眼的金属。他的追随者们将挖空了的鸟骨塞进他受了伤的喉咙里，仿佛在用死者的幽灵来喂养他，如果不是如此，他是活不下

来的，他重新开始呼吸，从那时起就好像他已经死了。他再也不说话……但这不是我借他说话的原因。我不是一个代言人。奥伯龙笑了起来，举起手臂，用手心敲击了一下空气。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我们陷入令人郁闷的沉静之中。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得到多处假释，最后他们终于在这里发现了他，于是将他驱逐出去。但是正是由于他的委托，这事才变得神圣起来。说话又不要付钱，奥伯龙说道。沉默使你在生活中心怀无常。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这点，我想告诉你这点是因为我相信你：沉默等于写作，写作也等于沉默……此外，光靠文字表达不了多少，不是身体症状，医生问时是很难回答的，也不是幽灵的症状……达达在船上工作了10年了，因为他沉默不语，所以他们认为他耳朵也聋了……他们一直也无法分离……就像丛林和语言，黑色和理解……他们让他在锅炉间和机车间工作，并且不停地敲击着他，于是这个人成了一个会行走的手鼓。他在香港这里下了船，聆听着某个远方的信息，在地球最拥挤的地方，有必要实行非同寻常的隔离，以正视自己的黑人特征，他在一个女子学校里当了一名体育教师，这所学校以保护隐私出名。有一天，他就这么闯了进去，是你的外婆，多拉·容给了他这份工作。她是校长。瞧，现在你知道了。现在魔鬼无法从你这里溜走了。

我拉了一下厚呢短上衣，看着奥伯龙在另一个幽灵身上铭刻着满怀尊敬的圣洁。烟雾将我进一步往回拉，我坐在一个寒冷而潮湿的过道里，看着一个黑人在球场边上收集篮球，将它们放到一个大箱子里，然后他轻轻地将观众坐过的椅子整理一下，拣起糖果纸，用旧梳子刮掉地板上的口香糖。风将院外的尘土吹了起来，像漏斗一样。8岁的时候我就第一次想到了死，因为我闻到了尘土和老人的生活，还有陈旧而高扬的口香糖的薄荷味，看清了同样的境地：他发出的尖叫；衰退、爆炸和挥之不去的记忆里出现的喘息、呻吟和委屈。

这时，奥伯龙变得十分豪爽，开启了更加自信的领域，说那些是他

释放出来的达达的幽灵，在他上下起伏的各种尖叫声中实现了这些抱负，当然还得到了你的外婆多拉。明白吗。是的，他们有共同点，不是搬弄是非的谣言或警察都不知道的秘密，不是他们彼此赠送的毛主席纪念章，也不是她长时间地给他阅读布洛赫[①]和布莱希特[②]。他们的共同点是：月明星稀的夜晚，他们一同驶入三角洲，多拉勇敢地面对着船首，像柚木一样坚挺，她的头发扎成了小姑娘一样的小辫子，手艺十分笨拙，他们彼此讲述着失败男人的故事，从围栏处他们看到了水鸟，听到了朦胧之中，驴子十分生气，冲着夜晚的愚蠢行为大声尖叫，海滩边的商贩穿着耀眼的衣服，还在骨骼般的阳伞下月光下盘旋，接下来是温柔和安宁的掺水烈酒打破一切宗教的束缚，征服了他们，这一切在你祖父去世后还不到一年。起先没人说，后来周围的人开始议论，那些舌头就像滑行的蛇，无情地抛弃自以为是的伪善之言。你瞧，文字可以一样有效地阻击抱负，除了描述责备和仇恨，他们拿文字，拿围绕着孩子们周围的故事没有任何办法。他们生活在谎言中，在谴责的怒视中度过了许多许多年。你有一个伯父就死于其中，他情绪低落，生活在围起来的城市里，生活在致命的崩溃迷宫里；他无法面对他唯一的信仰出现崩溃时的结局……

就这样，奥伯龙举起手心，这一次他没有笑，仿佛是在思考他自身的状况，达观地看待这一问题，竭尽全力来解决自己的生活。

于是你把他安置在了利物浦?

是的。那天还有其他送葬者。

一个好人。

是的，就埋在我祖母旁边。他的家人安排时一定花了不少心血。

他们结婚时他是英国人。这么秘密。是的，不声不响的英国人。

---

① 布洛赫(1886—1951)，奥地利现代派作家。

②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诗人和戏剧家。

*　*　*　*

那天夜晚我在一种奇怪而轻松地状态中离开了，如果勾销奥伯龙的租金，我面前出现了上百万的解决方案。我错过了本可和一群夜猫子一起到达对岸的最后一班摆渡，我看着船缓缓驶离，带着满船狂喜的客人，叹了口气。我转过身来，身上已经是跑得湿透了，冰冷的，满脑子晕乎乎的都是错误的信息。一个孤独的狩猎者，追随着血腥的痕迹。我在口袋里拨弄威利舅舅的钥匙念珠，沿着海滨走着，跟绝望和疯狂的人聊着天，聊着聊着我发现了自己那套刺耳的开启工具，上面标着克拉芙迪娅，于是我记起了两天前就应该做的一个讲座，而我完全忘了。我叫了一部水上出租车，直奔嘉道理古今语言系。

克拉芙迪娅·恩格尔的办公室在10楼，我拿着软皮封面的法农著作向安保挥了挥手。他们已经习惯了学术怪僻。我打开克拉芙迪娅的门，拿开长沙发椅上面的学生作业，然后坐了下来，听着通风机的嗡嗡声和她吧柜冰箱的古怪嗝声，她的冰箱我已经朝觐过好几次了。后来等到几乎天亮，我将德国《时代周报》盖在自己的脸上，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死者的声音，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新闻大战

上海属于眼下。

爱米丽·韩

1923年的一个秋天，阿纳尔多·卡斯特罗和阿尔弗雷德乘上一辆出租车赶往上海赛马场，如果没有过去和未来，也就没有害怕……阿纳尔多·卡斯特罗手上拿着报纸，对他的堂弟说道……所以干吗要担心呢，如果你担心你死，如果你不担心你还是死。

但是一切都一样，阿纳尔多寻找着黑色轿车和白人面孔。

南京路和静安寺路交叉口，树叶瑟瑟。这对堂兄弟脱下帽子向时尚的女郎敬礼，这些时尚女郎围着围巾，站在敞开的希斯巴诺-苏莎车前。生活就是为了吃，生活就是为了爱，阿纳尔多告诉他的堂弟，而他的堂弟抑制不住地对着白色的手帕打起喷嚏来。他们准备在秋天的狂欢节时全都去参加冠军日，卡斯特罗一家还可以在包厢里享受一顿正式的午餐。阿尔弗雷德想到山上去打野猪，但是最近他的肺不太好，不大适合此类运动。阿纳尔多说山上麻风病患者太多，他为什么不能来汽艇上射击呢。我们可以去铭洪号，登上我的游艇，沿着运河上行几英里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船上射击。

阿纳尔多喜欢在他的堂兄面前展示一下，因为他的堂兄是葡萄牙驻上海领事，不可能过那种奢侈放荡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们此刻坐在

了出租车里，而不是阿纳尔多的布加迪车里，那辆车每小时可跑 85 英里。你总是要我不要担心，然后你说我该担心什么，阿尔弗雷德叹了口气，整了整翻领。没什么，阿纳尔多说，他帮着他的堂弟别好康乃馨，尽管现在只是早上 10 点，但是他的呼吸却散发出一股味道，好像他一直在喝玛姆香槟，喷着古龙香水。又一车女士经过。但是有时候，阿纳尔多一边说，一边整了整他的白色费多拉帽和领结，我将自己放在某个可怜的混账位置上，这家伙就是因为照顾生意而掉了脑袋。我的意思是说，公平交易就是良心，不是吗?

嗯。

我是说，如果贸易成交公开，英国人决定退出，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大半生意，而买办又开始钟情其他国家，你该怎么办?

嗯。这个……这个……

阿尔弗雷德，你还去犹太教堂吗?

哎！有时去。

每个礼拜五下午还去摩西会堂领取薄饼卷和百吉圈?

不。礼拜五我们最忙，礼拜六有时候我们得去。

你知道吗？你是唯一一个犹太籍葡萄牙领事。这可不是一般的事。

嗯。但是我是现代的，世俗的。你那可怜的混账朋友……他是中国人吗？一定是的。他们是唯一在这儿失去理智的家伙。

我们其余的人都逍遥法外。

我不管什么犯罪行为，我们没有使用武器，也没有流血。只需要两位知名人物作证人和两个外国人出庭。也就是说，如果被告是葡萄牙人的话。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出现了流血和谋杀。

啊，哈，啊，那就流亡到非洲；流亡到帝汶岛。

多长时间呢?

他们到了赛马场。阿诺尔尔多很喜欢到这里来，他故作夸张地走下出租车，挥了挥第三指和第四指之间夹着的钞票，经过司机的窗前，用

手杖敲击着鞋罩，甩掉踩上的马粪。人群拥挤了过来。他跟人们握着手，给出小费，接过人们用长细杯给他倒的香槟酒。阿尔弗雷德看上去特别的不舒服，但还不得不强颜欢笑，看着他此前不幸在法庭上看到的人们，当时他是起诉人。非洲献给你！他想，鼻子打着喷嚏。他妈的卢安多河[1]也给你，亲爱的，他发现自己对着一个女人大声说着，这个女人将她的手臂放在阿纳尔多的腰前，而且还是一位金发美女，虽然寒气逼人，但她穿着一件华丽短裙。你要冻死的，他提出了忠告，手上的手帕四处挥着，他的喷嚏打得太响，她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他们走进自己的包厢，看着第一圈赛马，男仆拿着他们的外套，突然，喇叭吹了起来，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悄然穿过人群，来到包厢前，递上她的名片。她外面穿着皮大衣，里面穿着一件紧身的真丝绿裙，上面还绣着一条金龙。阿纳尔多将名片放进口袋，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赛马。她在他的眼睛里搜索着什么，这时，人群开始挤占更好的视位，就在阿尔弗雷德起身往栏杆前倾的时候，他看到她突然对着他堂弟的耳朵小声嘀咕，抑或是亲吻他，将她的舌根塞进他的耳朵里？他僵硬的防范心态里开始对她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感到十分脆弱，看着她的嘴唇在他堂弟的脸上兴奋地吻着，直到他的眼睛转开，想起一盘他多年没有解开的棋局。

——嘿，瞧，这就是沙逊，还有大卫，瞧！埃兹拉本人。

——嗯，是真的。

——别傻了，阿尔弗雷德。这是提示。卡斯特罗人。我自己的小马驹。纯种蒙古马。我已让其他骑马师联合抵制，来保这匹马。瞧，是不是更快活。或者你想尝试一下教皇新城堡[2]？要注意，教皇知道如何生活。也许你想从银匣里得到些什么？

——是赛马？

---

① 非洲安哥拉宽扎河的重要支流。

② 法国地名，以产葡萄酒出名。

——不，太棒了，是粉。你想要粉吗？

——鸦片？不，谢谢。

——真是奇妙的字，领事。你不会想到沙逊、大卫和埃兹拉正在失去它。不，你光靠看是不会这么想的。

——失去它？

——这种同业联盟完蛋了。异教徒正在挤进来。你想知道是谁吗？

——为什么你提起粉时说起话来就像个芝加哥骗子似的？

——芝加哥？至少我去过那儿。阿尔弗雷德，你得到处转转。开阔一下你的眼界。他们那儿禁止喝酒，充满了暴力和谋杀。要你应付的东西多着呢。

——谁在威胁埃兹拉？芝加哥无赖？

——不是，是英国人。怡和洋行。他们想做毒品生意。重新书写他们的法律。

——那个女人是谁？

——哪个女人？

——那个时髦的女人。

——杜月笙的小老婆。

——黑帮？

——生意人，阿尔弗雷德。他去寺庙比你频繁。他想去拯救沙逊、大卫、埃兹拉及其儿子免遭灭顶之灾。再来点香槟？啤酒？你知道吗？犹太人从12世纪开始就来中国了……在开封？

——灭顶？那么糟吗？

——灾难。这下你知道了。告诉你，卡斯特罗人先来。有人擅自给你买了一打同注分彩[1]。不，不用谢我，要谢观音。

---

① 一种对赛马或赛狗进行赌博的体制，赢家扣除管理费后按他们各自押的赌注的比例分享全部赌金。

——那个年轻女人？

——一个真正的女神。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样看来看去。阿尔弗雷德。如果你在地上看到钱，千万不要表现出一副绝望或吃惊的样子。现在时兴的是超然物外。管家来了。把你赢的拿走，别忘了在盘子里放一点小费。是啊，再加一点。只有钱才能叫得响。

——我根本不可能……

——被人看到？

——我的车站……

——当然了，首先不要错过火车。如果火车进入隧道，再也不出来了，那么你就什么也就不用担心了……你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害怕，因为到了明天我们都要死。

——那一直是你的人生哲学，阿纳尔多，总有一天，你会为此感到后悔。

——我没什么好后悔的。你存货，我唱歌。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区别。蚂蚁与蚱蜢[1]。

——你知道寓言解决的是什么？

——是啊，我创作音乐，而他们将你的办公室泼上煤油，将你烧毁掉去？

——这就是你今天想告诉我的实话。

——(　　)

——不是埃兹拉？

——不是埃兹拉。埃兹拉不是纵火犯。此外，埃兹拉完蛋了。

——肯定不是英国人吧？

——瞧，先尝尝寡妇的香槟酒吧。就在这。这样更好。谣言四起。

---

① 喻指伊索的同名寓言。

碰巧这些谣言都是真的。

——什么谣言？

——我能帮你解决。不需要消防队。

——那我心头的石头就落地了。

——还有奖赏。你不必碰她。她会到我办公室来。她会认为她作准备是为了我，你知道，她会解开纽扣，缓慢前行，身上一丝不挂，只拿着一杯威士忌放在脑袋上保持平衡，自我炫耀……摆出姿势，你知道。

——我有一个视位。

——是窥视孔。

——（　　）

——所有这些都为我，为什么？

——再来一些。我亲爱的堂弟。我有一个可怜的混账朋友。

——哦，我知道了，可怜的混账朋友。

——他需要一个名义上的公民身份和一切治外法权的特权。他是中国人，他干的这些事情要被砍头的。

——我要是拒绝就他妈的不是东西。

——你很聪明，一点就通。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保护他，我们可以争取得到法律认可，这样一来我们就都会有银子赚。埃兹拉已经组织了一家土耳其货船，由陆军、海军和警察护送。

——这样是否会降低价格？

——眼下只有平价才能拯救整个生意。我们的主要障碍就是一个爱动用中国公众舆论的英国女人。一个专爱生事的利物浦传教士。

——好吧，那我得给埃兹拉打个电话。

——没问题。嘿，我在这场赛马中也赚了一把。

——让你那个可怜的朋友星期五来找我吧。

——该来点开胃的东西了。你要北京烤鸭还是点心？吃蟹还早了

点。伙计！给我来杯啤酒。麻风病猪肉[1]就免了吧，啊？

——随你的口味吧。你的那位朋友，他叫什么名字？

——杜月笙。

最后一圈赛马跑完后，阿纳尔多和他的朋友梅梅、卡林霍、年轻的沙逊和雷米迪奥一家——五个很有教养但不算很漂亮的女儿——一起去跳舞。

上海的跳舞狂出现在两个时段。第一个是鸦片受到挤压，英国炮艇封锁河的时候，第二次是日本人准备进攻上海公共租界的时候。第一个阶段或许要更安静些。这么说吧，或者按我母亲的说法：疯狂的外国人误解了鸦片的平静。当然不是用那些字眼，而是：没有头脑，这些鬼佬；他们不知道一个沉睡的中国对他们有好处。封锁毕竟没起作用。大量的昏睡漂浮到了黄浦江。正如波士顿的茶舞聚会，只是每次抢劫包裹背后都有一个苦力的帽子，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出局了。保持警惕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如果无法睡觉，那么还是让跳舞开始吧，因为大米的价格总是要涨的。这点对大家都没好处。于是阿纳尔多和他的堂弟们(除了阿尔弗雷德，他说他喜欢看，但做起来很难)来到华懋饭店，和夜总会表演歌舞的女郎一起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中跳舞，或到礼查饭店[2]，同稳重的英国人和喧闹的美国人一起跳狐步舞，或被紧紧贴住，或给人掐一下，一切就是如此，或来到卡萨诺瓦意大利餐厅，拿一枚通孔银元，你就可以跳快步舞和摇摆舞，还可以和一两个女招待调调情，和她一起跳一种淫荡的探戈，将她柔软光滑的大腿夹在你的腿间，然后再跳草裙舞和玛

---

① 4世纪欧洲人由于对麻风病感到十分恐惧，因而错误地认为人是由于吃了得麻风病的猪肉才患上麻风病的。

② 礼查饭店，今上海浦江饭店。

祖卡舞，之后再找维也纳要金酒和爵士，一个湿吻，再和一个庞大的英国水手在户外帐篷里打一架，直到阿纳尔多一拳将那家伙撂倒，胡奥十分欣赏他的拳击，问他是否想成为专业拳手。不想，他说，然后将一个银色指节金属套从出血的手指上取下来，放进口袋。到处都是跳舞，达里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一种自由表达方式，拍击指向忧郁的摇摆舞，他说这种舞直接来自于血，他在扭曲，蠕动，炫耀，弹跳，一个节奏也没有丢下，直到整个舞场都为他的奇特表现跳了起来，这真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夜晚。

就是在这个夜晚我父亲遇见了德斯蒙德·帕雷特，他醉醺醺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哀叹自己不能跳舞。不是他不会跳，是他太太不让他跳，并告诉他，如果她听到一丁点儿有关他跳舞的消息，她就会杀死自己和孩子；不是他没有想过血腥场面；也不是他得用五十种不同的方式来跟大家一一解释。帕雷特是一个公共人物。他会讲五十种方言，有一个中国太太，还有无数个孩子，每到春秋，他就会来到户外的亭阁酒吧，跟每一个听得见的人讲述他为什么不回家，因为中国，他说，已经深入你的骨髓，然后他就想罗列他孩子的名字，用金色的水笔将他们的名字一一打在他面前的杯托上，直到罗贝托·达·席尔瓦告诉他将杯托扔掉，因为他的真正兴趣是枪。德斯蒙德，我们来谈大炮吧。他用的单词是canhao，而德斯蒙德非凡的语言天才帮助他将此翻译成一个老丑婆或母夜叉。好吧，不过不要侮辱我的太太，他对罗贝托说。手边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德斯蒙德的报纸上公布的毛瑟手枪的枪数，人们在怡和洋行第2号仓库里发现了这些。自从公布之后，法庭



煞费苦心，仿佛他们是要没收这些武器，奇怪的是，他们居然一路找到卡斯特罗家仓库里来了。

此后，黑帮站在外滩边上，彼此拍着照片。

是的，你有五十个孩子和一个母夜叉似的老婆，你是你自己报纸的发行人。来吧，跟我这个美丽的堂妹跳个舞吧。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薄绸。她知道如何让你发飘。

1925年2月21日，《北华捷报》开始刊登混合法庭上的诉讼程序，在庭审诉讼中，埃兹拉一家受到正式指控，从事鸦片进口。这标志着犹太人对生意兴趣的结束和杜月笙领导的青帮获取巨额利润的开始，现在，杜月笙的活动已扩展到绑架，武装抢劫，凿岩(贩卖男孩)，采桑叶(贩卖女孩)，而且还将目标瞄向毛瑟自动手枪。没有得到保护的夜总会发现舞池里出现了有毒的眼镜蛇。汽车配备了装甲，保镖上了汽车两旁的踏脚板，已经得了肝硬化的梅梅说，他只想喝最后一瓶酒。



在卡萨诺瓦意大利餐厅户外亭阁里，跳舞不停地进行着，不顾一切的俄罗斯舞女旋转着。现实就是狂欢。他们的眉角出现了汗水。一切都在旋转，旋转，旋转到发狂，就连阿纳尔多乘着间隙和杜月笙一起来到乡下打虎的时候，跳舞还在进行，骑马，打猎，压制洪水般的音乐，而且在黑暗之中，他自己就想赶走所有这一切，但是节奏不愿离开，野兽更加闪亮。

情感生活

从中我们对母亲有了一点了解。

父亲是靠海洛因扮演的英雄。

我父亲抱怨说我母亲困窘太多。

我至今还不知道，如果用西/英语中的不及物动词来表达，他的真正意思是否是指母亲常常遭受困窘，或者说她是否令他困窘。这一困窘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词不存在，也许这个问题也不存在。困窘。障碍，妨碍，窘迫。就这个意义而言，她只不过是为不善表达所困。但是正是在这个意义里，这个词不小心滑进了别的什么事里，这才是问题所在。困惑，羞怯，胆怯。很显然，这就是革命前中国中产阶级妇女的状况。她理应害羞矜持。害羞和矜持遮盖住了一种令人困窘的匮乏。事关教育和授权。她很容易受窘。这点比较迷人；面赤腮红，退隐到黑色角落，媚眼秋波。她很容易困窘。这更严重。她永远也不会和一个西方男人平起平坐。西方人的怡东性包括面对女人的风度所出现的骚动。就我母亲而言，这种骚动是对恐怖回忆的结果。在她困窘之中，有必要忘却，隐藏，掩盖，然后她才会发出尖叫，领会恐怖。她叫得根本没道理。她将夜晚撕成了碎片。

她不喜欢碰人。我从没见过我母亲跳舞。我第一个记忆：我在婴儿床里。她在那里，然后她消失了。我再补充一点：夜总会；男人的味

道；香烟；酒。充满敌意的笑声。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她回来了。每当我想起母亲跳舞，我只能想她是消失了。记忆：一个男人只有一个手臂。每当我想到母亲跳舞，我就想到了战争时刻。有一次，她不得不和一个日本上校跳舞，这是我父亲喝醉后跟我说的。很显然，就因为如此，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们去了一趟敌人的战舰，然后带回家一袋袋的白糖，大米和咖啡，她们一边将袋子拽上楼梯，一边拉着彼此的小辫子，欢欢喜喜地将战利品倒进她们的行李箱里，将它们藏在衣橱的后面，直到我母亲开始敲打她的女儿和继女，用鸡毛掸敲打她们的腿，将所有的粮食锁在厨房的碗橱里。只要我母亲一跳舞，她人就丢失了。她想忘却，她自己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现有的一切，她的窘迫迫使她用一系列遭到折磨的语句将每一个事件，每一段记忆，味道和面庞编成代码。她的半英面庞变得半红起来。清晰，她说，我只想要清晰。茉莉！她大声叫道。突如其来。这是她的名字。她常常叫她自己的名字。有时候，当她认为她真的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她就叫喊孙中山！拼命叫喊。

身体的压抑就是记忆的压抑。我母亲不好意思去触摸，亲吻，或展现任何感情，因为这样不是暴露了熟悉的代码就是暴露了恐怖的代码。对她而言，生活就像是面对玻璃，犹如她给搁到了玻璃的下面，就像我的外婆躺在棺材里一样。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是否有什么感情。英国女人和她拥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儿。英国女人，有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她的中国丈夫瘦得只剩动脉和颌骨。中国女儿甩着小辫子在大街上跑着，耳垂上还悬着樱桃，而不爱讲话的父亲则将自己锁在上海医院附近的房间里，只有到了周末才开口，冲着小狗的滑稽动作大笑，或指出骨髓钙化后，内部呈蜂窝状。他们都在玻璃后面。他们生活在骨骼和悲伤亭里。我记不清小时候我母亲是否抚摩过我。

为了她，尴尬，这也很尴尬，我父亲用法语说道，他两眼黯然，回忆起了他的第一个太太。一切错误的感情。对你母亲而言，亲吻已经变得十分尴尬。无论是对她，还是对他。他让我们亲吻他的戒指，就像亲

吻主教的戒指一样。欢迎教皇！我父亲亲吻过很多人。他的嘴唇特别灵活。我记得我奶妈柔软光滑的后背和修长油亮的黑发。我记得危急时刻，我一遍又一遍地对我母亲说：你必须爱我！你必须……就像我奶妈恳求的一样。我从母亲和她家族这里继承了这种富人的尴尬……僵直的上嘴唇是英国的，谦逊是中国的。我很少跟人使用“爱”这个词。我用了，我也就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表明了我应该表明的意思，我也不知道爱为什么会感觉这么难过。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合同，但是我知道它的形状：这是阻塞，是障碍，一切写作因此而生，一种死亡的力量，非自我能操控。

我六岁了，我看着母亲在穿衣服，赶赴总督的舞会。我们住在一套两层楼的房子里，有花园和车库，我父亲从办公室里打来电话，让司机把奔驰车开过去。阳台上栽着圣诞红。小狗在嗅着圣诞花，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们则在自己的厢房里打架。我母亲穿着一件薄薄的旗袍，透露出一件件内衣，令我心神不定，感到不舒服，仿佛她太冷太透明了。她的衣领很高，好像是在翅膀上飘动，她试了她那件小的貂皮大衣。她放上唱片，关上了门。我透过铰链和门柱之间的缝隙向里看去。她假装在手上拿着什么。她昂首阔步前进了几步，然后又摇摆起来。她自己照着镜子。她跳着舞，仿佛看不见，搂着一个看不见的舞伴。她的高跟鞋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了踢塔踢塔的声音。茉莉！她轻声地说道。她跳舞就是为了忘却。在大厅里，我能听到电话铃在响。不停地在响，然后就没声了。也许有人拿起了电话，但是我母亲对此毫不知情，还在跳，完全给包裹在她并不存在的舞伴中。她停了下来。清晰！我只要清晰，她用中文说道。她垂下了手臂。

1937年8月14日。

我父亲住在上海华懋饭店的客房里，要了一剂海洛因。男仆将它放在一个银色的托盘里端了上来；海洛因包在薄纸里，边上是一个微小的

瓶子，看上去像一瓶干邑白兰地酒。我父亲将它倒在黏膜上。他说这可以治他的痔疮。

外边，大街上挤满了购物者和日常吃饭的人群。一个男人站在南京路的一角，兜售着沃利斯·辛普森[1]的肮脏明信片。辛普森夫人两腿叉开，身上一丝不挂，只围着一个救生圈，脚上穿着高跟鞋。大街过去是一家饭店，戏剧家尤金·奥尼尔[2]化身威廉·奥布赖恩牧师出来旅游，此刻正经历着一场精神崩溃，需要一个金发女按摩师来给他按摩。天空嗡嗡作响。接着一个中国飞行员从飞机上向上海的繁华地区扔下了一颗炸弹。事后并不清楚此事的政治意图。唯一清楚的是大街上发生了一声剧烈爆炸。一道闪光过后就是爆炸，好像要把人的心从胸腔里吸出来。饭店的窗户都给炸出去了。很奇怪，窗户为什么是给炸出去，而不是炸进来。我父亲穿着短裤坐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房间里没有一片玻璃，感到很着迷。接着又是一道闪光，这一次耽搁了一下，好像有几秒钟，然后才出现爆炸的声音。就是到了这时，爆炸声多少也给压低了，我父亲想，他穿好衣服。他不急不慢。没有空气。他知道，生死关头，关键的就是要控制好时间。盲目的恐惧就是慢动作。他走下楼梯，因为电梯停了。许多人躺在大厅里，有的快要死了，有的在流血。大街上飘起了有毒烟雾。兜售肮脏明信片的男人不见了。他给炸碎了。一块带血的肉滑到了墙边。尤金·奥尼尔紧紧抓住他的女按摩师，立马决定乘船回家。第三颗炸弹落了下来。我父亲给炸到了大厅里，悬在衣帽架上，支撑一下。有人将带血的手印留在了墙纸上。这场爆炸过后，一种黏稠的液体洒向大街，同时还夹杂着玻璃和尘暴。

当时，我母亲正在新新百货公司试衣服，准备和鹦鹉和日光牌肥皂一起拍照片，听到爆炸声后立刻冲了出来。第一声爆炸之后，她一只手

---

① 辛普森(1895—1986)，英王爱德华八世夫人，即著名的“温莎公爵夫人”。
② 奥尼尔(1888—1953)，美国戏剧家，获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

捂住了嘴巴，因为她看到一个快死的孩子躺在人行道上，她的手臂炸飞，内脏从开裂的皮肉和冒炮的糊状物里溢了出来，黑色一团。她冲了下去，按住一根仍在出血的残肢。她能感觉到她胸口的热血。第二颗炸弹将她送入空中。她单脚旋转，感到一种奇怪的恶心冲击波和热土将她举了起来，她这种充满负担的身体一头扎进了已被震裂的商铺里。她的衣服飞掉了。还有这种需要压抑和隐藏的可怕尴尬。在她的记忆里，这比被杀了还要重要。但是我母亲还年轻，她只是跌了一下，然后给弹跳到人体模型上，直挺挺地站着，几乎一丝不挂。我父亲就是这样遇见她的，他将她包在自己的夹克里，将她带到了自己的客房。

我母亲比较丰满，在她的记忆里，她在某个人的手臂里跳舞。她什么也听不见，听见的只是沉闷的铃声。她摇晃着，旋转着，在镜子中打量着自己。突然，我那些同父异母姐姐们哄然大笑，是捧腹大笑，呼哧呼哧的。她们一直透过门缝在看着她。她们在我后面，努力想忍住笑容，但结果眼泪都出来了。我母亲停了下来，走到门口，将门甩开。她一把抓住斯特拉的头发，使劲掴她。她想踢伊尔玛，但没有踢着。伊俄卡斯特和维也纳立刻终止了笑声，将手背到后面。

就在这时，斯特拉满怀恶意地告诉她，父亲已经打来电话，总督的舞会已经结束了。我母亲脸上的怒气消失了。她一言不发，但是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一切。她正经历着我父亲既嘲笑又可怜地称之为她无法表达的感情生活。伊俄卡斯特打破了沉默。

为什么？她问道。

斯特拉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尽管她本可以耸耸肩，然后一走了之。

因为达里奥叔叔已经被警察逮捕，共产党人正在向新界进军，父亲回家取左轮手枪和散弹猎枪！她大声叫了起来，令人困惑的是，这并没有产生意想中的效果，让我母亲陷入恐慌。

我母亲的困窘变成了胜利。面对同父异母姐姐们的兴奋，她露出满脸

的笑容，这点告诉我，所有的跳舞和忘却其实都只是对灾难的期待和实现的一种保存。至少这一次，她紧紧抓住了灾难，如此一来，她们所有的愚蠢行为都将暴露无遗。这一次，照相机充满噪音的震荡展现的就不是她了。

想想看，她曾经给日光牌肥皂做过广告。



雷基

对母亲们和父亲们有点困惑。

空军预见不到自己的死亡。

我母亲的命运已成定局。

那天下午，我父亲将她带到自己客房的时候，上海的大街遭到了轰炸，茉莉·惜秀·容已经订婚。正因为如此，她才在人们不认识她的上海做时装模特，给肥皂做广告，赚点外快，准备嫁妆，大家都在议论说，雷基·拉夫·叶真他妈的幸运。茉莉受到了庇护；得到了正当的养育；茉莉上了中学，除了缝纫，她的成绩是门门第一。她一毕业，新教传教团就想让她进入管理工作。她会投掷垒球，就像投掷的是一颗子弹，她会拉拉衣服，将腿前进一步，然后球就会砰然抛出，就像渣甸[①]的午炮，雷基听到嘶的一声飞向本垒打，却在最后一刻变成了一记无话可说的曲线球，弹开了。她是香港女队的队长；瞧她这刻正在扣她的纽扣。他那天理应高兴，因为他快得到刚刚组建的民国空军的资格，他来香港是想了解几乎不存在的英国空军。

在机场，他们认为他是个笑话。他们叫他雷基·纳夫·叶，在体育俱乐部的酒吧里，我父亲会折叠起报纸，放在胳膊肘下，跟任何喜欢听的人重复着。

茉莉一毕业，雷基就邀请她出去，他得忍受无数次有人监护的午

茶，而她的英国母亲则摆弄着《圣经》和字典，严厉盘问他空军的事。他知道多拉支持他的兴趣。他知道多拉喜欢他的魄力，将每一种思想都付诸实践。更重要的是，他女儿母亲都讨好，答应皈依基督教。他携带着月饼、丝绸产品和笼养金丝雀。但对她的父亲维吉尔来说，态度则大不一样。维吉尔不喜欢军人。他不喜欢雷基的花菱草[2]和军服，还有他胸前佩戴的徽章。他说他看上去像花生蒋[3]，就是多了头发。维吉尔不想见他，他请他把鼻子改变一下。但是雷基坚持不懈，将卷宗送了过来，证明他是第一批去伊顿的中国人，并且学过工程，现正接受俄罗斯人培训。

我知道，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上还没有这点。他从没采取过什么行动。这点我能从他的脸上看出。你可以告诉那些人，他们是真正的废物。我父亲继续说了下去，想想他们会怎么看你，这里难免会有点心事重重，有恐惧，也有警惕，犹如一种癌症，正在逐渐消耗着每一刻宝贵的时光。



关键时刻，雷基请蒋夫人代他请求。维吉尔松了口。他们在上海的家里举办了婚礼，由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主持。之后他们来到大华酒店举办了一场中式婚礼，有中式服装，乐队，还有证婚人，喧哗阵阵。不停地鞠躬。有人在天竺葵后唱着“哦，答应我”。但是没有亲吻和跳舞场面。

---

① 暗指苏格兰裔英国人威廉·渣甸（1784—1843），他和另一名苏格兰裔英国人詹姆士·马地臣（一译孖地臣，1796—1878）于1832年7月1日创办怡和洋行。

② 美国加州州花。

③ 指蒋介石，“花生蒋”是史迪威给他取的绰号。

雷基？他不会跳舞。我记得这点。正是这点促使我觉得他对生活……或死亡一无所知。那天我正好在大华酒店，俄罗斯乐队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群，但是他们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在他的生活中他一点也不需要这些。

第一个孩子来得太快了点，之后他北上华北战场，而她独守空巢。她不再打垒球。第二个孩子后来也跟着来了，又是一个女孩。几个旧的求婚者前来拜访，一方面是出于敬意，另一方面也带着渴望，但是她已习惯了战前香港最沉闷的生活，养育孩子，采购商品，看着自己的父亲将几乎所有的钱都挥霍在她兄弟身上。雷基现在回来的次数多了起来，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头发也没有了光亮。他的手指打着响指，阅读着报纸，并幻想着和英国女人发生风流韵事，他说这些英国女人永远也拒绝不了他；公务员的妻子。

阿纳尔多在等待时机。他很善于等待时机，因为他有许多其他的琐事。他很善于转心、转移和转题。他穿梭于香港和上海之间。他和卡维塔·嘉道理约会，她舔着他，并将他介绍给她的同胞姐妹。他成天跟她们在一起，撩拨着她们，惊羡着她们细小的拳头和卷曲的脚趾。后来有一天，卡维塔说话十分流利，并冲着半岛酒店的服务员打了个响指，在喝了第六第七瓶白兰地之后，她告诉阿纳尔多他来时最好带点钱。这是果亚的规矩，她说，并给他抛出一副死一样的面孔，过去她就是这么对付她的求婚者的，但是现在她正跟罗洛离婚，心中满是焦虑，没有多少机会来展现她那副死一样的目光，因而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热情。我父亲给了她钱，接下来再给她钱，再后来娶了她，是非正式的，他非常简短地说道，上海风格，由阿尔弗雷德主持；我这大部分生活中还得承受着两对同父异母姐妹。

你的母亲，她知道这些，但是她什么也没说，我父亲讲些什么我也听不懂，他滚动着草地滚球，将球滚到西洋波会[1]修剪过的草地上。我那时八岁，也许九岁了。哎，你还指望什么呢？冰雪公主，结了婚之后就没有了抵押。茉莉是个谜。雷基要的是健谈的人和街头妓女，他开始更加不计顾后果地到处飘逸。我有一个熟人叫雷德曼，空军。他是你学校校长的丈夫。战争爆发前他在九龙湾有个私人机场，他利用飞机跑道从事周末欢乐中国行。我去过几次去找老虎。后来有一天，他说他要接收一架法国飞机。他们称它为西蒙，以坠机出名，我对雷德曼说道，如果他真的想要一个艺高胆大的飞行员来进行测试，我可以给他推荐一个合适人选，这个人可以找出其中的毛病，并写出一本操作手册，他可以和俄罗斯人一起飞到华北，去体验一下。可以打赌。

所有的记忆都是分裂的，但是我一点一点地回忆起了我母亲锁在一个抽屉里的东西，拼命地想赚钱买一架小小的铁皮鼓，当时我得做出决定，这就是我长大后想要从事的……在乐队中做一名鼓手……我用着我的伙伴弗兰基·古特雷斯所谓的万能钥匙，令我吃惊的是，我打开了禁止进入的分隔间。里面是鲜红的珠宝盒，光滑的圆墓，坟墓里还包含着一些失去了光泽的戒指、仍闪亮的钻石，还有一张我不认识的照片。照片上还别着一枚部队服役章。我感到吃惊的是，玩具店里的那个人卖给我一个更大的鼓，比我讨价还价买的那个还要大，一把抓



① 香港一个草地滚球组织，位于九龙京士柏加士居道 20 号，卫理道交界附近。

住我手上的徽章，作为支付，并急不可耐地将我买的东西包裹起来。我母亲后来发现了，又用数倍于鼓的钱将徽章买了回来，并用鸡毛掸揍了我一顿。

他乘西蒙飞机去中国时飞机坠机，因此他成了一名英雄，没人知道这和粗心检查的变距螺桨之间的差别，雷德曼说过，变距螺桨重新起飞之前需要维修，但是雷基坚持说这件事由他自己来做，结果呢，雷基下午喝酒去了，然后又匆忙赶往重庆去做简要汇报，但是由于日本鬼子白天将什么都打下来了，因此他不得不半夜到凌晨两点之间离开，他从没飞过山峦，但是我们的脑子里想的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职业舞女……

帝国

我们肯定会目睹闲荡和妓女模式的剧变。

路易·阿拉贡[1]：《梦游者》

你听说过卡蒙斯[2]吗？一位伟大的诗人，写过《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之》？这是不是指卢济塔尼亚人的骨头？

有时候，你笨得真是让人看不懂。之，形容词。我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美丽的伊内丝·德·卡斯特罗遭人谋杀。她为爱而死。我想这真了不起。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为爱而死。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为雪茄而死。你觉得医生会反对吗？实际上它已经不再反对。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给我来一根哈瓦那雪茄。

我父亲快死了。我背着他爬上爬下他在悉尼的公寓楼梯，背都累折了。一个星期之前，他还在周围转悠，拄着拐棍，抱怨悉尼老人的急剧增加。他们都跟他一样拄着拐棍。这不对，他说，都像那样瘸着。悉尼的山太多，他说，这就是他们瘸着的原因。一个星期前，我父亲约好我同父异母姐姐最好的朋友，将她带到了文华社。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赌掉了好多钱。现在他不能走了，他让我打电话给应召女郎，让其上门服务。

——告诉她没有危险。告诉她危险已经过去了。

——你确定要这么做？

——当然了。她们聊天收的费和别的一样。告诉她们我要的是一个会谈话的人，一个交际花，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但是……卡蒙斯。跟我说说他。

——他是一名帝国之人，路易·瓦兹。他很坚强，个头不高，喜欢街头吵架，年轻的时候失去了一只眼睛。你知道，由于失去了这只眼睛，他一直没有结婚，但是他写出了美妙的爱情诗章，并将钱都花在美女身上，但是她们一点也不在乎他。后来他加入了海军，在湄公河三角洲遭遇海难，就像四百年后你的堂兄波波跟美国特种部队遭遇到的一样。但是卡蒙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幸存了下来，并和爪哇奴仆一起参加了在摩洛哥的战斗。结果每一个人都牺牲了性命，包括国王在内。再说遗骨。卡蒙斯的遗骨给安放在了里斯本的圣安娜教堂，但是后来却出现了1755年的大地震，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看到遗骨。一些赝品出现在圣赫罗尼莫修道院。卡蒙斯说过他的遗骨会散落在世界各地，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是一名帝国之人。东方将成为天堂，为他那一代而复苏。

——所有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很笨吗？你以为你的老人是个傻瓜？瞧这儿。17卷葡萄牙文学史。现在已经没人写这些东西了。我要把它们送给圣维杜斯·德·保罗教区。

——这些书真美。

——他喜欢跳舞。

——谁？

——卡蒙斯。他常常是身无分文，但是他却了解每一个舞蹈，只要

①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作家。

② 卡蒙斯(1524—1580)，葡萄牙诗人。

他在城里，他会光顾每一个舞会。

——你是在这些书里读到这些的?

——还没看到。我不读这些还没有裁剪的书。我更喜欢看带有空白的历史。

——这是你的雪茄。

——(　　　　)

我父亲正在打盹。我把雪茄放在他面前的餐桌转盘上。桌面上放着他的细颈酒瓶，酒瓶里的葡萄牙波特酒弥散在午后的光线之中，像红宝石一样鲜艳；打鼾的声音犹如地震，震得酒瓶发抖。他那娴熟的手指轻轻地来回翻阅着放在腿上那本老的旅游指南，《上海调情概览》。跟所有的梦想一样，准确的地理地图总是存在的。我能够看到上海的街道……他的《拱廊研究计划》[1]……犹如一件神圣的散发物展现在他下垂的杯子前。我从他的胸袋里拽出方巾。方巾是真丝的，上面浸着酒，散发出一束束枯死已久的熏衣草的霉味。

一个长久不衰的笑话，福煦露台。你向科卡尔大街走去，到了1157号之后左转，就来到了福煦露台。夜晚，一套套复折式屋顶公寓灯火通明。你在铁木辛哥饭店的拐角转弯，这个饭店老是有股过气啤酒和蟹壳的味道，不经意间你来到了福煦露台的灌木林中，整个顶楼都给波默罗伊家族和他们甜美的埃尔维拉占据着，她已没那么年轻但是依然令每一个人伤心……你知道的那种……然后爱上某个对她兴趣不大的人。

现在已是一伤心之地，过去，钢琴四重奏演奏着圣桑的曲子一直到深夜，楼下的宝马汽车突突作响，像问号一样盘旋着汽车的挡泥板，左

① 暗指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的《拱廊研究计划》。

轮手枪藏在手套箱里，十分危险地开在乡村小路上，经过岗亭和栅木门，然后突然之间，眼前出现一堵白墙围绕的城堡，爵士音乐，一杯杯泛着泡沫的香槟酒，还有一种新的舞蹈，名叫城堡行。

1157号，福煦路，现在是延安西路。中国人相信进步，就像人们相信过去在福煦路上跳的圆舞曲一样。当你沿着这些街道行走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忘记这些事的。你记得手上拿着几乎没有碰过的阿尔伯特亲王牌金嘴卷烟行走在亚尔培路[1]186号，到贝德福德酒店去寻找里基·卡瓦尔霍，结果发现他无法起床，他通宵都在往铜痰盂里咳血，这个前游泳冠军，击水十分轻盈，你只要眼睛一离开水面去看一下海滩，你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他告诉你不要太相信情感，这就是他所有的一切，你走进厨房，他的妻子索尼娅就会给你准备一份三明治，只要你两眼向外，凝视着他们所说的堤防窗，研究着那些驳船，她就会突然从后面抱住你，洒满香水的头发飘到你的脖子前，你会感受到她的抽噎，她的胸堤倒塌，等到她放下两手，你轻轻地说声道别，经过隔壁房间的时候，你看到里基已经知道背叛的真相，满脸发白，就像他们很快就要盖在他身上的白色床单一样，你使他比你第一次来的时候少了些活力，外面，美丽的亚培尔路186号前，栗树繁茂，窗户开着，夏天的酷热冲洗着郊区。

吕班路[2]169号。现在这成了一个地址。拐角处就是望志路，这儿正举行秘密会议。几个俄罗斯人和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革命家。你常常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到来，而你则一路前往巴黎法院参加一些更加重要的会议。

汽车旅馆。非常不确定。你年轻时的褐石熨斗大厦。你的第一个妓院，那是1921年。你父亲给了你五个银元，你独自一人去收集付钱关

---

① 今陕西南路。
② 今重庆南路。

怀的奇怪乐趣。陌生人的手，理发店里经常得到女店主的暗示，她的手像母亲一样，用竹签清理你的耳朵，将战栗一直送到你的脊髓，然后再用灵巧的手指将热毛巾捂在你的脸上。再之后，你看到你父亲进来了，开始了他下午的约会。

祁齐路[1] 195号总是有些秘密功能。这里有一个百泉馆。在这里，你可以订一桌20道菜的宴会……蜜浸乳鼠，白兰地浸蛇蛋，猴脑……这一道道菜都是由一位美丽的歌剧明星来上的。在每道菜的间隙，还会有一位歌女用热毛巾给你擦身。擦完之后，借着米酒的酒兴，你挑选你想要的女孩，有的时候你喝得太多了，什么也不想做，还有的时候你吃得太多了，感到恶心。但是你还是选中了一个女孩，带她到上海美琪舞厅去跳舞，然后再送她回家，这通常是在时尚的法租界地区，再之后你沿着外滩的阶梯独自前行。还没有发生关系就离开了女孩。当然，中国人知道这些经过训练的做法所蕴含的美妙乐趣。

许多年后，百泉馆所在地已改名为岳阳路，只对高级官员开放，你重访它的时候，看到一名身患癌症行将去世的共产党领导，将20道菜推进了一只航空袋里，每次他咳嗽的时候，他就会鼓起腮帮子，将血吐到地上，这时他的歌剧小明星就会帮他擦嘴。

圣母院路[2] 148—150号。一个合适的名字，还有建筑，艾斯特拉大厦，根据艾斯特利塔和艾斯特拉而命名，这两位都是西班牙神圣的犹太女人，是对双胞胎，她们擅长烟火，鸡尾酒会和探戈比赛，两个人的身材都很好，柔韧有余，节奏感强。她们一时成为上海的明星，在酒点里表演镜面抛光舞，同时还经营厦门书屋，在书架和为你买书而订购的靠椅之间为你提供茶和鸦片服务。

---

① 今岳阳路。
② 今瑞金一路。

我父亲睡着了，但是我打内心深处知道他的梦想。

霞飞路927号。这是一个路人皆知的荒唐行为。这是一条最长的路，一直通到法租界外滩，或者像他们所喜欢称呼的那样，法兰西外滩，这里卸下的鸦片比世界上任何一家码头都多。在这里，在927号，他们伴随着新奥尔良乐队的节奏，在新年之夜跳起了黑人扭摆舞和蜜糖舞。他在这里设置了办公室，调度他的航运计划。他只有两三艘船，从菲律宾过来，装运的是冰冻的水果，还有两三艘油轮，装满了运往英国和美国的橡胶轮胎。时不时地船上还装载着新的妓女。办公室一直很安静，除了木制天花板上的吊扇发出的呼呼声，盆栽棕榈树发出的有节奏的沙沙声和他的秘书帕美拉·莫里斯穿袜小腿不时发出的摩擦声，这位莫里斯小姐属于上海有名的莫里斯家族，她寻找文件，搜集证据，向她在伦敦的父母发电报，派一名审计和律师，因为有好几家公司的账款已付，储备物也已因为奇怪的植物和黏性十足的树脂而得到加强，但是这两者跟水果和橡胶都没有什么关系。她出神地站在窗口，看着她的手表。外面，午后的飞船在水上嗡嗡作响，带来了家里的消息。

这些办公室墙面装饰的是胡桃木板，天花板装饰的是镜子，地面上铺的是大理石，再往上两层，菲洛梅娜·奥古斯丁娜·维迪盖尔老太太，他的奶奶，他的亲爱的奶奶，正注视着帕美拉的每一个动作，非常自然，一面面镜子犹如一个独具创新的潜望镜，给安置在了灯罩里，记下哪一件文件给选中，哪一封信经海底电报给发了出去，哪一个电话打了。勤杂工拿了点小费后将电话线进行移接，分线到一间温度过高的卧室里，里面挂满了雕像，《黑面马利亚》雕像，金色的十字架，薄如纸的肩衣，绿色的天鹅绒遮盖着每一件家具，音响效果非常好，话筒的安放形状像一副悠风号，十分美丽，从中回荡出帕美拉·莫里斯刺耳的英国嗓音。每到星期天，阿纳尔多就会开着他那辆呜呜叫的皮尔斯银箭汽车，带着他的奶奶去教堂，那车急转弯时开得太快，像飞蛾似的颤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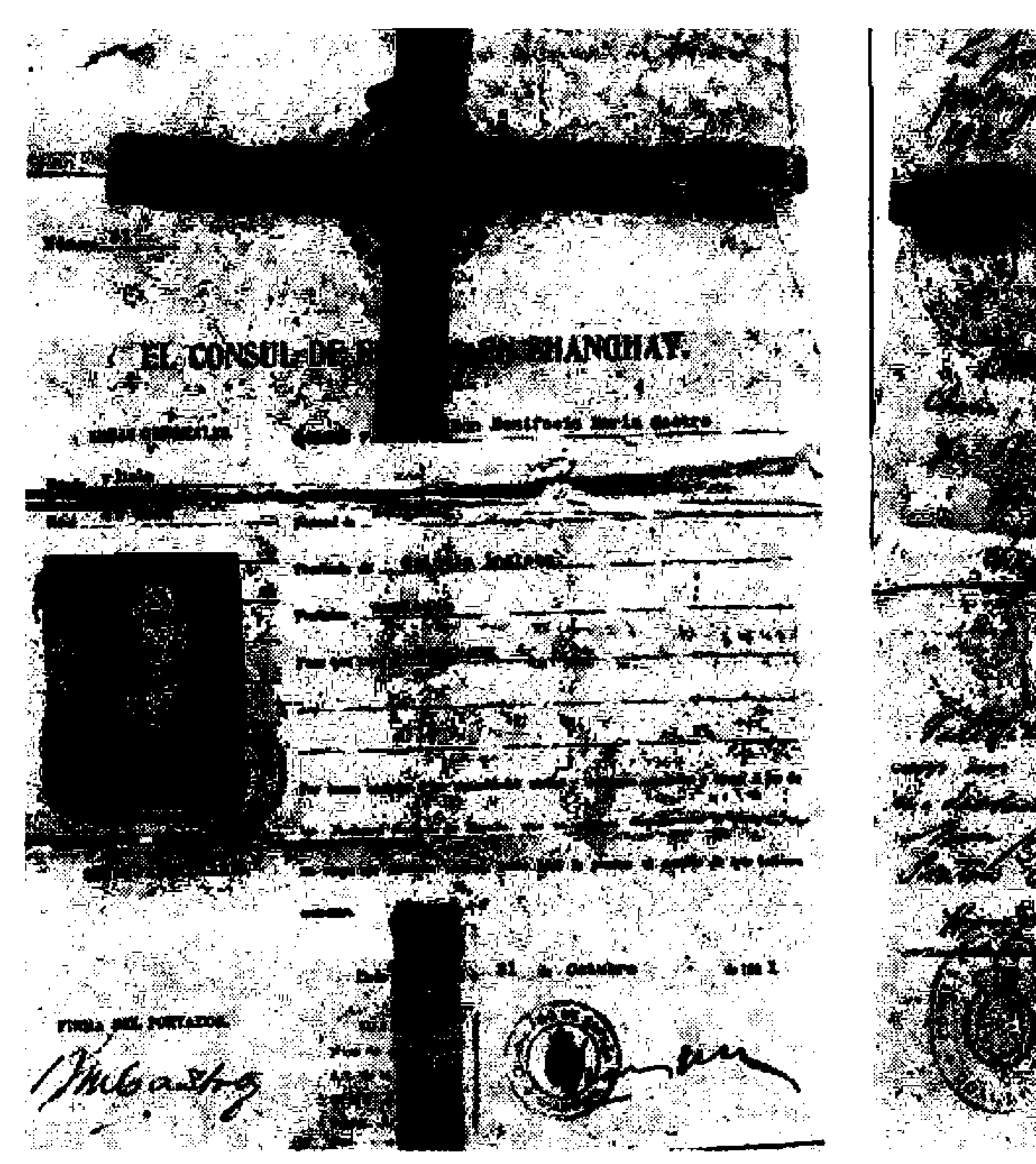
留下尘土飞扬，等到了 11 点做大弥撒的时候，维迪盖尔奶奶就开始隔着面纱，在烟雾缭绕的熏香中，向他详细讲述了他雇为秘书的那个女人，就在前一天晚上，他还和她上了床。每个人都相信对方拥有更多信息。



哈！西摩公寓！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荒唐地。在这里，在法租界的边上，秋日中的法国梧桐突然间产生了语言无法表达的效果，而且经常如此。那是 1926 年。一天早上，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博尼法西奥·何塞·卡斯特罗，从这些黑石公寓[①]里走出来，一路走向法租界外滩，到冯家小吃去吃早点，然后，就在他用计算尺测量一船麻绳的时候，他瞥见了绳索的一头，于是一纵身跳到了另一条船上，那个跳就跟奥林匹克比赛似的。两艘船体淹没了。正在上稀饭和油条的查理·冯看了一眼防波堤，想到了两百张白布盖着的桌子，弦乐队，还有他从生日聚会上赚到的钱，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防波堤，看到了博尼法西奥的纵

① 复兴中路 1331 号。建于 1924 年，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公寓住宅（巴洛克原意希奇古怪），墙体和部分构件采用黑色石材，建筑由此得名。

跳，他的后摆飘扬，一只手拿着点心，另一只手拿着两脚规，仿佛他在测量的同时也在抵触旧的双面上衣，他看到你生存不是为了吃饭，但是吃饭是为了生存。要是他停止测量他的点心就好了。他的计算尺飘到了顶上，但是他们在几英里之外的下游发现了他的身体，少了一条腿，在洒满了法国梧桐叶和机油的漩涡中旋转。



EL CONSUL DE [redacted] SHANGHAY.

FIRMA DEL PORTADOR



他总是朝别的地方跑。

江西路。这不在单子上。很快迷失了。醉得一塌糊涂。计算尺也没用，但是他还想指点它，就像手上拿的是一根魔杖。

下午三点，他醒了，脑子里还是跳舞，在江西路 52 号的妓院里跳华尔兹，这里有远东最好的英语图书馆，他和一个女孩在苏州河边跳探戈，打着欠条，然后他跳起了查尔斯顿舞，剥开粉红色的鸦片丸，就在这时，一伙中国土匪大声喧哗着从旁边经过，在执行某个绑架任务，他赶紧躲进一道拱廊里，一辆辆大型黑色汽车全副武装，准备进行快速基本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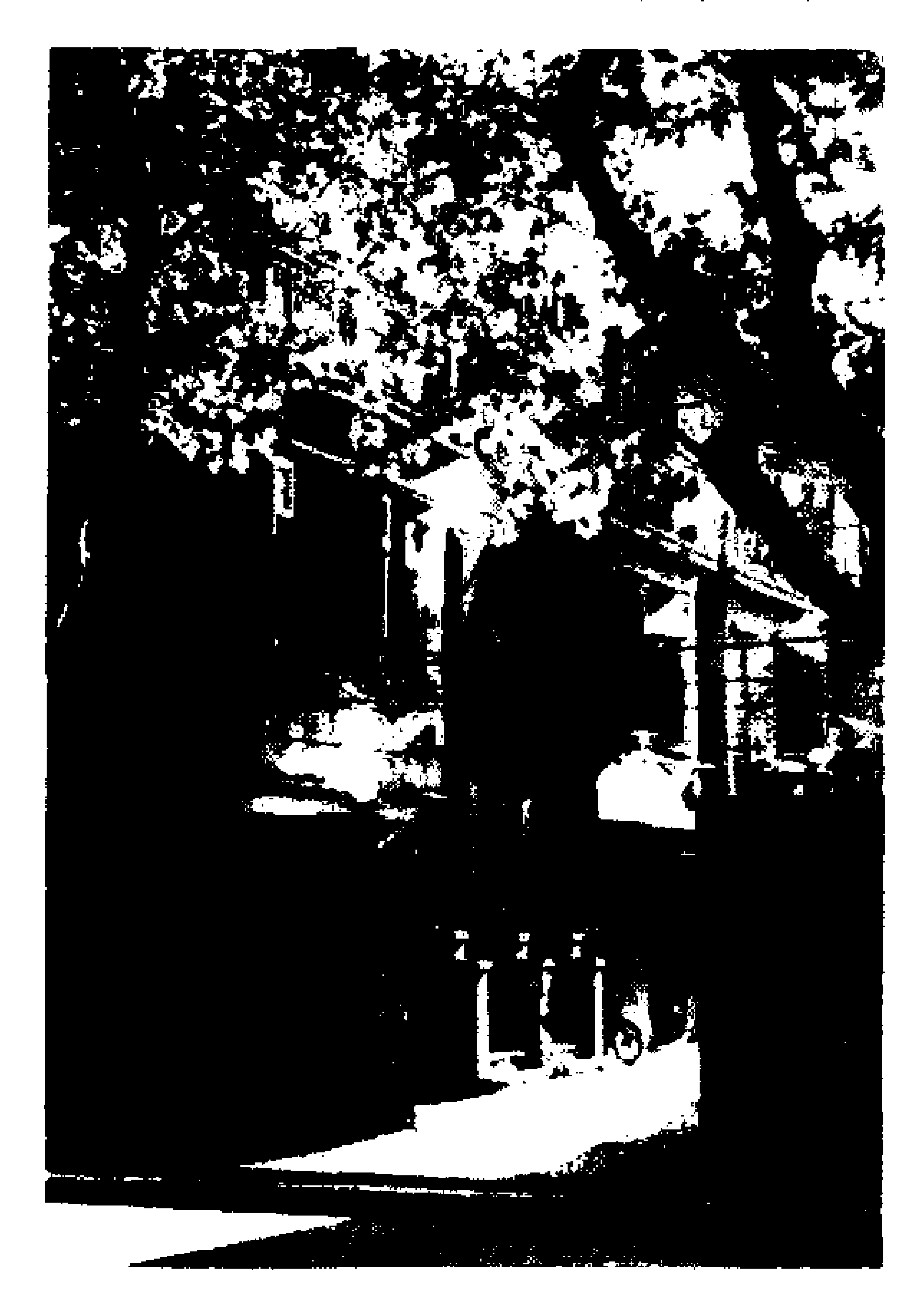
他在乔杜里咖喱馆内用手吃着饭，知道假霍乱[①]开始在街上蔓延，人力车夫正一个个死去，他不得不将其中的一个推到一边……要不他就在一张浸过苦艾的床上跳爵士舞，一直跳到深夜，然后再继续狐步舞，跳到超级俱乐部，在他舞伴的豪宅里结束，1924年，过时的反交谊舞法取消之后，中国女孩趋之若鹜，那一年，她们放开了一切，包括裙子，在厨房里，你可以看到巨大的金色熔炉和秀丽的女仆，她们给他舀一勺在香槟酒中冷却的小金块……或者跳着疯狂的华尔兹舞，这些女孩薄纱衬衫，透明地旋转着，她们的乳头泛着红晕，在夏日的夜晚……在这种旋转下，他们的衣服早早就给汗湿掉了，因为他们都在提前……在夏日的夜晚，他看到他的父亲博尼法西奥一只手拿着香槟酒，另一只手拿着女孩裙边，他看到快要死去的人力车夫透过落地玻璃门，睁着大眼看着，绑架分子半夜赶到了，他们完成了使命，湿漉漉的街道上全是黑车，血溅到了他父亲的肩膀上……在夏日的夜晚，他研究着生意，一直忙到下半夜，在三四拍子内，高烧开始上来，小姑娘留着短发，看上去像个男孩，在他的耳边吹着吻，他听到了大海，是的，大海，感谢记忆。

环龙路[②]68号。卡里加里/卡里古拉/卡洛斯·玛丽亚·卡斯特罗的房间。他是一个亲戚，他的桌子上堆满了罗马森林之神萨梯[③]各个阶段阴茎异常勃起的雕塑。他不管什么端庄不端庄，但他对怪诞的钾、汞狂欢却颇有研究。他不喜欢什么蟾蜍汤、捣烂的蝎子和旧的备用药，洒尔佛散606[④]……他在眼镜前挥了挥脱脂乳注射器和砷，你的视力怎么样？他问道。

海格路[⑤]600号。大战过去了，新闻短片报道的都是遥远的雷声和没有雨的闪电，他刚开始学华尔兹，他的祖母汉纳·塞凯拉身披西班牙

① 夏季和秋季发生的症状为严重痉挛、腹泻以及呕吐的急性胃肠炎。此词科学上已不用。
② 今南昌路。
③ 罗马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好色之徒，性欲极强。
④ 梅毒特效药。
⑤ 今华山路。

披肩，站在弹性舞蹈地板边上，步履蹒跚。1937年10月，一颗日本流弹直穿大陆法院，却没有爆炸，但是汉纳·塞凯拉给吓死了。约翰·李当时正在地下室里检查他的酒，炸弹穿过天花板，落到了他的脚下。他查看了一下遭到的破坏，然后毅然决然地将住在隔壁房间的另一个奶奶菲洛梅娜·奥古斯丁娜·维迪盖尔的东西包裹起来，和她一起搬到了香港。最好要不停地动，他说。大多数人待的时间太长了。



虹桥路222a号。格拉纳达不动产。这里有棕榈树，铸钢螺旋式楼梯和阳光充足的庭院，复制着了无生趣的忧伤，柔和的吉他弹奏着微妙的换位，再现了爱的经历。他聆听着滑音；花钱买新车，买大钢琴，周游纽约，这样可以调整渴望，在灰暗的地下酒吧里，在浸满了威士忌和枪油的桌子上，给茉莉书写明信片。他在沃尔多夫酒店谈了一笔生意，同意从槟榔那儿向凡士通提供打折橡胶，压低价格，但是他对凡士通谈及的非洲和在利比里亚建立种植园心有疑虑。他在最好的芒贝尔奶酪中挑选着葡萄酒，打算乘飞船回去，并梦想着到格拉纳达不动产那儿去拜访她，透过绸布衬衫去摸她乳头的种种方式。他和两三个铁了心要嫁给他的固定情人出去，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工作太忙，爱就这么等着，说不清，道不明，出人意表，而这更增添了美妙的味道。他一时兴起，在对面买了一套公寓，就是想将他的德国望远镜聚焦到她拉上帘子的窗户上。但是她不在，他们说，到香港去了，于是他拜访了她的日本朋友。她和他一起出去，吃惊地发现他知道得那么多，并且对她熟悉的日常生活很感兴趣，当他和她一起跳舞的时候，他将手放在她的腰带

结上，手指在后腰上触摸到了点32手枪，于是感到很失望，他听到了琴弦在滑动，键盘在变化，离开舞场后，他将她送回家，看着她从袖口处悄悄拿出一把折扇，她用双手将折扇送给他。这么神秘，爱的滑音；而她还沐浴在早春的清新之中，身着红白相间的和服，化身成为光明的古老护卫，成为她公寓正在融化的影子。他穿着礼服，独自沿着危险的街道行走，感到出路迷茫，他想找出解决办法。虹桥路。虹桥路。这些喝醉了的路没有改变，只是些充满幻想的拼写。不像爱，一直在变。他的爱突然分裂了，因为他知道爱会轻易改变，酸甜苦辣俱全。这带来了一丝安慰。

一天，他在信中收到了一双人手，还带着些体温，活生生地给切下了，一根手指上还带着他的大主管阿休的戒指，这是他从前的朋友，黑帮头目杜月笙寄来的。

他浑身是汗，沿虹桥路走向卡德路[①]，空气中充满了湿度。有些人从睡梦中爬起来，看了看他，抓着湿透了的汗衫，嘴里叼着牙签，眼睛盯着他的金色袖扣，但是他看上去并没有迷失，不仅如此，他还面露凶色，表明他理解这座城市的布局，他的步伐坚定、匀称。他先是沿着小巷，然后又顺着繁忙并且闪烁着煤气灯的海滨走去，苦力们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有的在拖着一车车成山似的大米，海水成了波纹状，就像屋顶瓦楞板和肺栓塞一样。接下来他向右转去，跨过打狗桥，一路数着，来到了王曹路。他向戴着头巾的卫兵点了点头。然后又拐向一条弄堂，爬上楼梯，来到一个黑暗的庭院。门口靠着一把梯子。他走进房间，感到他以前好像来过，他看到了一卷锡纸和一盒火柴。他取下大礼帽，放到桌上。他拿出一只象牙吸液管，为悄悄降临在他灵巧的下巴上的黑暗做好准备。透过生了锈的铁栅栏，他朝窗外看去，看到日本哨兵

① 今石门一路和石门二路。

站在沙袋和磕头的平民后面，他迈开大步，但看上去没那么匆忙，就在这时，有一个人，身上也穿着礼服，向他走来，现在你看清了，虽然天气没那么热，但是他脖子上围了一条白色的真丝围巾，他人很瘦，脚步轻盈，等他爬楼梯时，你想到的是一只猫，你还没来得及开门，他就扑向了你，他的大耳朵好像是从他的衣领里飘出来似的，使他看上去像是抓住了一只救生圈……

——你好。你怎么不磕头？

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脸转向别处，不想露出来。

——给鸟磕头，阿纳尔多。我们是同类。

——我没跳华尔兹舞，伙计。

——这可能有用。

——这地方已经布满了特工，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喜欢。

——都会过去的。

这个瘦子坐在坚硬的木床上，将一只手放到了卷起来的铺盖上。他摆弄着悬在天花板下面的灯泡，脸一笑，一道金光就露了出来。

——我不知道，罗伯。看上去仿佛明天就是末日。眼下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也许你没有看；也许你还没有找对地方。

——算了吧，这个地方就不错。这就是她告诉我应该来的地方，花烟间。

——这是最下等的妓院。你知道后面就是墓地。

——当然知道。我不在乎墓地。在巴黎我参观了很多墓地。和埃尔维拉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离开墓地。她总是在寻找死去的名人。肖邦、雨果、左拉……这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巴黎的墓地简直就是艺术品。死者在跳舞，翻筋斗，跳跃……骨骼、魔鬼、狂欢者，那一双双眼睛就像是受到惊吓的动物，周围都是些皮毛、血液和孩子们的尖叫。至少听上去如此。也许是猫。

——是的，妓女。这就是她们永远也离不开的地方，在一个严肃而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挑选顾客。

——真可怜。

——可怜?

——是啊。埃尔维拉看到的只有死亡，而我看到的是生命。她怀孕了，她应该充满幸福的红晕。当然了，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

——那孩子……

——我们大吵了一架。她说警察会来清理这个地方。我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来这种地方。也许她看到了她自己的死亡。她跑遍了所有的墓碑，带着我尽兴跳了个舞，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得让她安静下来，因为她不停地在叫，在哭泣，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什么?

——有两个妓女跑了过来，威胁着要用手上的刀片杀死我。她们还以为她们是在保护她们的同伴。想想看，我觉得她们都不是女人。

罗伯·林笑了起来。从一包软盒里抖出一根烟来。

——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阿芳。她是阿休的女儿。她拿不到什么，她能吗? 阿纳尔多? 你付她钱?

——她已养成习惯了。她做奶妈会更好。

——我认识很多奶妈，阿纳尔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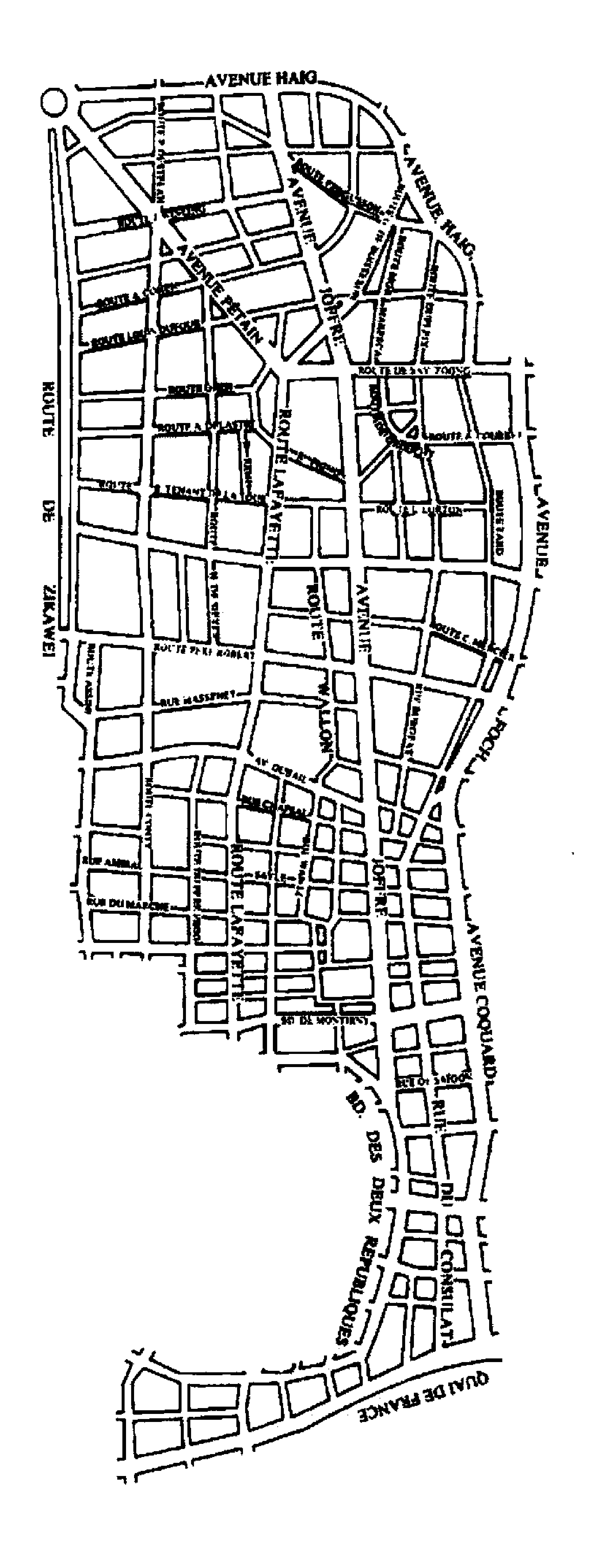
——是啊，但是这个人是个哑巴。不会说话，但很忠诚。

——瞧，我又不知道这些事，但是这个孩子说不定需要哺乳。奶妈不会那么容易放弃她们的工作的。

——她年纪轻又很小心。

——那么好吧，我们去看看她。

阿纳尔多站了起来，跨过罗伯的腿，打开门。他去了没几分钟就带回来一个满脸哀伤、神情忧郁的女孩，只有十六岁，也许还要小，不过


AVENUE HAIG
AVENUE HAIG
AVENUE PETAIN
AVENUE JOFFRE
ROUTE DE ZIKAWEI
ROUTE LAFAYETTE
ROUTE WALLON
AVENUE JOFFRE
AVENUE FOCH
ROUTE LAFAYETTE
AVENUE COQUARD
BD. DES DEUX REPUBLIQUES
RUE DU CONSULAT
QUAI DE FRANCE

从那些眼睛里你看不出她受到了极度惊吓，怀里还抱着一个身有残疾，长相丑陋的婴儿，孩子的粉红色兔唇向上，像天线一样呼吸着空气，一个有角的手臂只有两根手指，伸向她的脖子，像猿一样牢固地抓着她的辫子，而罗伯·林则向她解释说她已经知道了她的情况，习惯的做法是让富有而没有孩子的叔叔们从一个家境不好的亲戚那儿收养一个孩子。因此他领养孩子是没有问题的。他就是罗伯叔叔。他也会照料好她。

汶林路[1] 120号。这儿有一个花园。他无法快速离开。他感到头晕。他看上去好像要跌倒。他需要人，需要跳舞，生活和音乐。交换舞伴，不停地动。他无法照看那个孩子。他对罗伯说道：眼下我们无法看。时光飞逝。何谓创造？其实还不是某位心理失常的万事通先生玩的一个花招。自傲自大。他感到很愤怒。他拥有一个帝国但却没有花园。

我得找到我自己的路。

这就是他说的。

① 今宛平路。

花园

没人记得茉莉是在哪出生的，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女孩的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无关紧要，此外，维吉尔忙于研究，多拉忙于建立一百个协会，每个人都跟俄罗斯有关。但是这一定是在乡村，乌云密布，树木细长，因为茉莉之前的回忆是一个黑色的暴风雨。也许她被扔掉等死，也许她什么也记不清了。

小瀑布边上有一个花园。她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长大，玩弄着光滑的石子，在耳垂上悬挂樱桃圈。她的军阀祖父每隔一天就会行走五英里，到村来看她，给她带来他在经过的铁路路垫上发现的陶瓷小人和瓷制玩偶。然后他们会一起检查她帮忙在学校种下的菠菜，一起温习她的功课，检查一下她在宿舍里和其他十二位同学分享的更衣室，然后容外公就会给她留下一个锡壶，里面装满了温暖的鸡汤，并且发出感慨：这个主日学校就是比他看到的大多数学校要强。

刚开始生活比较孤独。茉莉种植庄稼的时候心态大多比较平和，每天能一言不发地干杂务心里就更宁静了。她每天用刷子洗刷，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从记忆里洗刷掉了。她是一只小鸟。有时候你看见她，有时候看不见。有些人没什么事可做。种点什么。那是为了明天。这就是她说的。



我没有走进我母亲的花园。有段时间，在九龙塘区的窝打老道，她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面长满了康乃馨，每到潮湿的夏天，背后的山上就会吹来一丝微风，这时她就会喋喋不休地评论着色彩和微风，仿佛如果她独享这份乐趣，她怕她会遭到报应似的。

我们大多住在高楼大厦租来的小房间里，她花园里的东西都长在小厨房的罐子里，花盒子吊在肮脏的院子里，院子里都是些淋湿了的鸡，晒着的衣服和喧哗的麻将桌。我没有走进她心灵的花园，因为这里面一直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到了现在，这种危机感里还保留着各种怪物，牢牢地固定在根基里，周围都是石墙，上面撒满了碎玻璃。

后来我父亲买来了成箱的滴滴涕，来杀花园里的臭虫，然后像测量威士忌一样测量一杯杯的臭虫。

我对这个大花园太了解了，有一天，放学后，我正赶9路汽车，一个女人从家里跑出来，喊着我的名字。她招手让我下车，挽着我的手臂，我的朋友们哄然笑了起来。我被一个疯女人抓住了。他们从窗户里大声叫道。

我扭动着想甩掉这个女人，但她满嘴泡沫，跟我说她从天堂里听到了我母亲的呼唤，她说的都并不成立，就在我从她的花园小径里挣脱了之后，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汗水。她被带走了，我的世界突然凝固了起来，就好像是粘鸟胶斑斑点点地撒在她的墙上，好像旧的血迹在路边石上变成了紫色，而就在前一天，一个孩子就在这儿给一辆逃亡的军车给碾死了，好像我不得不从上跳过的狗屎，好像我们家的沉默，我走进去，我母亲还在医院里，满脸苍白，她不停地问，她是否还有什么可牵

挂的。那些日子里，她徘徊着，然后又恢复，父亲则给我们做三明治，给我们演奏“是爱我还是甩我”，一直到深夜，给我们讲解家庭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斯特拉则照看着家务，说未来几个星期，母亲应该留下小便给花园用，要知道她吞下了所有的滴滴涕。

但是斯特拉的声音里充满了颤抖，仿佛内心里有种恐惧：什么也杀不了她的继母。我们都说这是一次意外。我避开了那个疯女人的公交站点。

我们搬家前在花园里拍了张全家照，然后搬到了那个小公寓。母亲教我们如何生存，就是到了今天，当我在社会一栏里看到斯特拉的照片时，她的下巴上依然还能看到被辅导过的手指。

月光下的小教堂

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抖动，我醒了过来，一丝不挂，地上撒的都是克拉维迪亚·恩格尔的报纸。我在她的办公室里睡着了。我手忙脚乱地寻找着我的眼镜。

哇，多么盲目而赤裸的野心啊，克拉维迪亚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

战争已经进展到了一半，而我还在上海，在这种战争之中，黑帮跟黑帮又打了起来。俄罗斯保镖，还有双枪科恩[①]，他是这场战事中唯一一个拥有摄影般记忆的人。他建议我父亲离开这个城市。暴徒已到眼前。

克拉维迪亚坐在睡椅边，甩着她那头浓密的长发，按摩着我的脚。她爱挑逗，性感迷人，十分危险，而且还有点超重，她天生就能搜寻到每一个细节来表达丰富的感情。

今天我可以帮你做作业，我说，但是我需要图书馆的通行证和你的一些帮助。我的头脑发热了。

天哪，你的肝也坏了。中国人说过，肝比心还要重要。

她的手指刺刺戳戳。

你真的需要放缓，她建议。

克拉维迪亚，这杂种认知力哪儿去了？

我喜欢你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着古代希腊人。

杂种认知力就是脑子里塞满听力，视力，嗅觉，等等。脑子里充满了对地方的种种记忆；空想家的脑子，行吟诗人的脑子，流浪者的脑

子。经不起推敲的感觉。他们已经赢得了不少注意。

感觉的速度和推理的迟缓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吗？有没有可能其中的一个其实是在靠另一个生存？

克拉维迪亚耸了耸肩膀。有可能，但这是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关系。

通过体验来给事物取名。难道这不是一种训练？

这个嘛……古代的精神分裂症让激情看上去十分可疑，而不是上帝的声音。

于是他们接受了精神分裂症的话，但是对诗人却充满了怀疑。

大学的目的就是将你的命运拒之门外，她笑道。现在你自己说说清楚。

她从冰箱里抽出一瓶东西，将它打开，我能闻到其承诺里所带有的寒气。它再次冻结了我的半睡半醒感觉。

夏天，我母亲难得地建议我们，也就是她和我，到位于山那边的中电集团去付电费。我会发现一股香味，一片凉凉的空气，包含着瞬息即逝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虽然令人兴奋，但却与恐惧结伴。比方说一片温暖的浅水，看上去好像是在云彩下起着涟漪，转瞬之间却变成了下面的一个寒冷的深洞。如此一来，在栗树下走到中电集团使我充满了奇怪的焦虑，我的口袋里放着一部小小的玩具汽车，我沿着长石阶旁的女儿墙奋力前进，来到了窒息的汽车，喇叭鸣叫的巴士和逃避警察的繁忙妓女这一深谷里。但是此刻却一片宁静，我落在母亲的后面，后者说给什么人丢下的神秘的棕色纸包给拖走了，这个纸包里存的可能是三明治，也可能是一只耗子，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还可能是钱，我母亲有一次欢快地说道，但是她没有弯腰去捡，任由我踢它，仿佛这不是我们真正需

① 双枪科恩，加拿大籍犹太人，孙中山保镖。

要的。就这样，我们沿着狭长的道路慢慢地走着，两边长满了竹子和棕榈，有时候，山边的流水使得小路折来折去，我将汽车放在这样的小路上行驶，想像着那群黑帮分子和保镖一起紧紧抓着脚踏板，趁着雨夜逃亡。我母亲在床单般的树叶上慢慢地跳着华尔兹，她那把绿色真丝阳伞可以用来抵挡飞来的麻雀，有一次，她还用这把伞抵挡住了一只喋喋不休，充满了攻击性的红屁股猴子。后来我们沿着没完没了的台阶往下走，我数了几十个台阶以后就再也不数了，我母亲就会停下来，唉声叹气，我努力想培养出对这条路及其湿淋淋的植被的感情，滚热的沥青，朦胧的顶，栏杆，还有隐隐浮现的中电集团的尖顶，其凝灰岩砖块向工程师居住的水泥建筑群表达了庄严的敬意，我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人间接触和人类痛苦，仿佛和出纳员之间进行的记忆的偶然交换吓呆了我们，将我们努力想忘掉的一切都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渴求正慢慢地给淹没；人际关系的中椢；在一个角落里有副冻结了的符号：嘉道理道。

——感觉，推理……一定还有第三种生存方式，我对克拉维迪亚说。

——柏拉图发现了它，她说。这是一种香槟酒式的梦幻。你冷吗?

——我永远也无法理解。

——你会的，如果，比方说，我们……她满怀期待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将心思放在上面。

——我还以为你结婚了呢。

——这是一种权宜婚姻。哈里周游世界，进行考古挖掘。我们在机场旅馆里短暂地见了个面，那里通常比较糟糕……你知道哪一种？你要一个冰桶，但是他们却给你拿来了一袋碎冰，就像你野营使用的那种。不管怎么说吧，哈里和我见面很不方便。上次他来的时候，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衬衫，十分的浪漫。我真的觉得他相信自己非常健康，因为他在

埃及晒得黑黑的。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金链子，他正设法收紧腹部。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个哑剧似的动作，坐在旅馆的床边，看上去直挺，僵硬，仿佛在进行舞台表演。如果你想要性，哈里，我说，这将是一个冗长的废话，你知道这点。而且这家旅馆一点也激不起我的欲望。就连旅馆的服务员也要死了。如果我们起飞前还有五分钟，也许还可以，但是你应该知道，哈里，没有一个你能扣动的扳机。好吧，现在他开始流汗了，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才产生这种戏剧。我们俩都喜欢表演，这点你们知道。你还记得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吗？我们都在和平饭店里，还有那个可怕的爵士乐队在表演，他们每个都上百岁了，演奏起来好像他们已经忘记了是什么爵士，演奏的每一个音符都一如当初，有些并非如此。你和那个中国女孩在一起，她叫什么名字？

——卡门。

——是的，卡门。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们分了吗？

——我们各行其事。我的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一种爱的流产和审判的不公。

——就像我和哈里。总之正如我说，哈里躺在床上开始抽搐，我不停地说道：起来吧，哈里，这不是引诱，你知道这点。到了这个时候，我脱掉了我的裙子，以为我的巴黎裙裤会使他兴奋，但是可怜的哈里真的是在发癫痫，于是我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找医生，你知道，这是一个机场旅馆，他们送来的是一个冰桶……我一定是在说，基督啊，真他妈的见鬼！但是我注册的是恩格尔医生，哈里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以为我们急需的是一个冰桶。最后，一个医生终于赶来了，通过商人通道将哈里送到了医院，这样客人不会感到惊慌。我们不应被叫做医生，你知道，只是一个本科学位。哈里活了下来。他会挺过一切。下周他会带着一个披着面纱的模特儿去勒克苏[①]。她要戴面纱，我说，如果你不想让

---

① 埃及一城市，位于尼罗河东岸，开罗以南。

他们拧她的屁股。我告诉他在埃及，我们会开枪射杀游客，也许他也应该在头上围个毛巾。但是到了这时，哈里确实已成为埃及人，我不停地忘却，不过他声称他出生在亚历山大里亚，这座城市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政体。亚历山大省。过去这里满是希腊诗人和哲学家。

——说到这……

——哦，是的，柏拉图。他称之为宫籁①。第三种生存方式，非常特别，有其空间和场所特征。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杂种认知力和合法推理的综合。宫籁就是一种容器，一种梦幻感受力。简单的来说，一种吸收，一种思想的接受，而这跟场所有着必然的关系。这是记忆的基础。是一个真实的根基，记忆的台柱就建立在这上面。一个冰桶。

——谢谢你，克拉维迪亚。

我吻了她一下。她没有反应。她正忙着写图书馆通行证，我喝光杯子里的香槟，感到手指球给叮了一下，这是在威利舅舅一个吊挂式文件夹上给划的。我也变成了一个容器。但是我们都没有场所，我想，虽然这有可能成为一种卑微的解放。

外面，湿度十分吓人。我向给氨水席卷的图书馆方向走去，路上碰到了一群咯咯笑的女孩子，留着乌黑发亮的长发，穿着充满光泽的黑色短裙，背上背着背包，我想这里有可能发狂，在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卡门。他们的语言让我发疯。

卡门·吴。你还记得她吗？那个带着尼康相机的上海姑娘。过去我是在旅馆的大堂里碰到她的。现在她已成为巴黎时尚摄影师。她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我想你再也不会跳舞了……她写到。

我来到珍稀书前，出示了一下我的通行证。在一个电脑终端前，我

① 柏拉图用的是 Chora，指在(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之外、一种必须加以设想的第三类，难以指称，是孕育、滋养众生的容器，只有母性的子宫可加以比拟。

敲了一下梅布尔斯这个名字。什么也没显示。我什么也不期盼。书法给我带来了骨文，骨文有几处提到了以色列的德·卡斯特罗。他收集的档案里所保存的一切都转到了一座小岛西侧的一个小型圣方济会里。那个教区的头是塔瓦雷斯牧师。我记下地址，感到彻底的失败，我随意浏览着塔瓦雷斯用别名编辑的一些虔诚的日记和季刊。跟日记有关的大多数信息要么丢失，要么给分了类，也有可能是马虎的出版商省去了日期和地点。大量的献词都是给赞助人和机构的，还有不少都提到了一个文学指南。后来，纯粹是出于偶然，我发现了它，其中包含着下面一段，十分寒碜，其中特别提到了东方基金会的弗朗西斯科·费雷拉：

唐·弗朗西斯科成功地推出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战争之后，有许多所谓的“减轻良心不安的小说”。有些没其他小说成功，但是它们一直没有被人忘记，原因就在于此，即使在后来的生活中它们的结局令人失望。例如，有一个人，他有的时候用梅布尔斯这个笔名来写作。据说他出生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上海。从一出生，他就严重残疾，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他的父母将他遗弃。他设法度过了种种剧变，并成功移居香港。他进进出出儿童之家和各种机构，最后，一名医生对这个充满非凡智慧的男孩留下了深刻印象，将他收养。就这样，梅布尔斯在澳门的一家纺织厂里谋得了生计。

战争

几段音符。日本人来了。

我父亲离开了。

许多年来，一位伦敦先生经常来拜访我们。他很老，有点谢顶，过去他卖钢琴，等他卖掉了他的钢琴铺子，他开始给钢琴调音，以此来谋取一些扑克钱。每个周末他都会来我们家给钢琴调音，他嘴里叼着烟斗，芬芳的烟草味一直飘到我的房间，我梦想着伦敦桥，听到了连续敲击的八度音，五度音和三度音，最后，在一片不和谐的音调中，传来了一个平衡得当的和弦。这就是伦敦先生在音乐上提供的全部，有时候，这种音乐美丽而纯洁，它终止了我幼时的消遣。

伦敦先生……那不是他的真名……过去他常说，他一直相信一跳跳过沟，余人全随后。他会嚼着烟斗柄，眼睛紧闭，一脸皱褶，思考着音阶，他会说这个世界分成离开者和滞留者，而他属于前者，因为离开者(降B半音)都是些小鸟，永远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内心生活，因为他们一直在动，他们无所依附，因此一个外人可以接触它，说这是一个多么小的生活圈子，看着伤心地收藏着的小古玩，照片，感伤和过时的家具……(C大调)，然后拖着铺路石，将一切全都砸碎；不，一个离开者不会追寻痕迹，总是在重新塑造自己，伦敦先生说，他身着红背带，拨开键盘上的层层烟尘，而一个滞留者的好处是永远也不要去做那番努

力……一个滞留者，阿纳尔多，伦敦先生说，他一直在跟我父亲讨论这事，我父亲会礼貌地点点头，但是他急不可耐地等着他把钢琴的音调好，好让他演奏埃林顿[1]的最新作品，一个滞留者会被催眠，会中魔，会接受宿命论(C♯小调)，会得周期性的忧郁症(G小调，哦，天生就那么悲伤，无法恢复)。我知道有许多人只有在受到强迫后才离开，从柏林到巴黎，再到西班牙边界，没想到最终还是自杀，他们的一生都在追寻着离开的幻想，伦敦先生说，他紧皱眉头，而我父亲已经打起了鼾。正因为如此……伦敦先生最后说道，他看上去像一条圣伯纳狗，将威士忌倒在他的领结上，此刻我母亲给他送来了蒸鱼作为午餐……正因为如此，滞留者实际上就等于离开者，他们从不相信行动，等知道了，也晚了。

我五岁的时候，伦敦先生自杀了，当时他八十二岁。验尸官公开了他的发现。伦敦先生吞下了所有的安眠药，他的床着了火，但是就在此前他还给我寄过两张火柴纸呢，这是他火柴纸收藏爱好的遗物，他曾经梦想着离开。不要留下痕迹，他说。这是灾难控制的第一课，从那时起，我的感觉就开始变得钝滞，沉浸在舒适安逸之中，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思路还很清晰。

我父亲不同。他会惹祸，但是等祸真的来了，他也不看一眼，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本质，他说。

飞机闪耀了一下，然后掉了下来，发出隆隆声音，有力地震击着空气，飞机的引擎还在抽动，爆炸发生前的一刻，霞飞路927号的玻璃就碎了。还没等到你听到声音，闪光就瞄准你了，他说；你能看到飞行员的脸，这个杂种戴着满是油渍的护目镜和真丝围巾，还在笑，这时下面的空气给吸走，阿纳尔多的办公室瞬间变成了一堆碎片，他的耳朵开始出血，他想至少是上一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待在一个大饭店里

① 爱德华·肯尼迪·埃林顿(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

呢。他想喝点什么，于是打开最后一瓶宝利白葡萄酒，看着飞机再次进来，这一次没有炸弹，然后他看到了一群轰炸机，于是赶紧提着手提箱，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梯，因为电梯正在喷着微蓝色的火苗，他发现卡维塔和两个姑娘畏缩在地下室里，歇斯底里地叫着，他把她们聚集起来，对自己说道：要想清楚，但他不知道任何方向，因为烟尘弥漫，到处都是血和散落的肢体，于是他们跟着乞丐跑，因为他们至少已承受了重负，是幸存者中最精明的，他挤出人群，离开外滩，卡维塔的衣扣解开，给撕破了……这里，拿着这条围巾，今晚我们跳舞……像放羊似地赶着她们，每人抱着一个孩子，找到汽车，然后开车爬上租界对面的小山，一队队的汽车已经封住了主要路段，这条你不得不穿越的罗别根路[①]，这个外出之路地区对离开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考验，因为虽然日本人还没有进入租界，但是在那段绥靖加恐吓期间，他们已经雇佣了黑帮来威胁离开者。他向第一个冲着他嚷的卫兵出示了通行证，这个卫兵暴食杀人，两眼都睁圆了，他的刺刀指着卡维塔，阿纳尔多赶紧吐出了几句关键的日语，就像吐米粒似的，这还是他最近刚从一个女朋友那儿学来的，就跟他认识的特工一样，他两眼盯着挡风玻璃前面，而这个卫兵，一个满脸疙瘩的乡下小伙子，摸了她一下，笑了起来，然后挥手让他们前行，阿纳尔多咯咯笑了起来，对这种通敌似的模仿感到很开心，他将后视镜对准卡维塔，而她正绝望地用舌头顶着牙齿，恐惧已使她失去了他心目中的美丽，他想失去了白粉的供给，她已经离不开他了，他将白粉藏在了座位底下，他开车猛地一下绕过转弯路口，到了运河口紧急刹车，这里一片宁静，运河两岸，灌木丛生，略带桃色的爱情花来回晃动，一闪一闪的，他抬头又看了一眼，数了数柱子上悬挂的头颅，双眼垂睑，骨头闪光，组织绯红/发灰/发绿。他赶紧让卡维塔和孩子们上汽艇，打开舱口，透过舱底盖溢出的满是绿头苍蝇和令人窒息的大便和

---

① 今哈密路。

呕吐物的味道。土匪撬开了所有的碗橱，但是却忽视了船首舱，正是在这里，他私藏了他过去送给中国游击队的枪，最好的葡萄酒，几罐鱼子酱和一听英国饼干，苍鹭在河堤上鸣叫，他一边清理着这片混乱，一边唱了起来：啊！啊！啊！感谢记忆，他眺望着一长片脱了皮的蓝绿色芦苇，然后越过芦苇，看着远处的烟雾，懒洋洋的下午，蜻蜓嗡嗡，不时被枪声打断……他希望他能记住如何开始这件事，用力拉住吸气阀杆，打开燃油开关，什么也听不见，油箱吭都不吭一声，于是他爬到顶端，将卡维塔和女孩子们安置在船舱里，让她们上床，给她们掖好被子，告诉她们不要担心，如果发生了什么麻烦，她们就拿着他放在床底的小日本的旗子，让旗子招展起来，并且疯狂地挥动着，而他则拿着左轮手枪，爬到隔壁一艘小船上，从他在维纳斯舞厅里曾经见过一次的一对老夫妻那儿征用一点燃料和煤油……对不起了，程先生，我不想在你们的周日游览中吓倒你们，但是我时间太紧了。

之后马达启动，发出咳嗽般的声音，在水面上喷出一阵油烟，就这样，他们平稳地驶了出去……他是从射击党那儿了解到的这些运河……他看到这座伟大的城市正在崩溃，陷于一片沉默之中，深感痛心，并相信它有能力再次崛起。但是上海的无形也有某些好处。日本人很快会发现它是一座迷宫。黄昏时分，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发亮的碎石和燃烧着的地平线。到了拂晓，他们出现在了杭州，他们驶向东海，随着上海越来越远，他感到自己也越来越小，因为突然之间，城市没了；喝彩、跳舞、欢呼，所有这些都没了。卡维塔拒绝离开她的床铺。他们只能在夜晚航行，花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用钱来交换燃料和食品，后来他们作为难民进入香港。

在英国海军军官面前，他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个头矮小，十分潦倒。现在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你能看到她们，伊尔玛和斯特拉，是对双胞胎，在破旧的船上爬上爬下，而他则要办些手续，告诉他们日本人还要进攻香港，结果引来英国佬满脸不相信的嘲笑。他透过锈迹斑

斑的坞边栏杆看着熟悉的灰色港口。这个地方充满了小山和海岛；自鸣得意，热带特性，簇叶丛生。一个容易被击中的目标。他在这里应该参加什么俱乐部？一只经过训练的熊，翻着筋斗，十分可怜，他得学些新的手艺。不要误会我；我不需要同情。但是请将这只戒指从我的鼻子上拿走。

Saltation：（名词）舞蹈。

Saltus：跳跃。

我父亲也许恳求得太多了，因此没有得到释放。

他到处寻找他留下的每一个亲戚。他找到了老约翰·李，他的外公，找到了菲洛梅娜·维迪盖尔，他的奶奶，一起住在摩罗庙街 16 号，这样更加方便些。他们很高兴租下了顶层，一个巨大的宫殿般的楼层，可以直接俯瞰山边和海水。

1941 年 12 月 6 日，我父亲和卡维塔·嘉道理一起去跳舞，他们在格雷普斯结束，然后一起喝香槟酒，吃草莓。奇怪的是，卡维塔感到有点头晕，脸上甚至都没个笑容。到了晚上十一点，有人宣布，所有的志愿者都得报到。

在太平山上的公寓里，容氏一家深夜不睡。他们惊呆了，他们僵硬的姿势映照在墙上的镜子里。他们不相信战争的谣传，但是现在收音机里发出了空袭警报。多拉说温斯顿·丘吉尔到了早上就会派增援部队。茉莉照看着她生病的孩子。这是她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他看上去好像活不下来。他的头很热，在发高烧，看上去已经像一个小天使，娇小的红脸，细小的手，正在消失的身体。维吉尔提议将浴缸里放满冰，然后将孩子托尼欧放进去。他没有哭叫。他是一个小王子。这时天空开始下雨，他的眼睛开始阴沉起来。他们打电话叫送冰的人来，但是没有回音。已经太晚了；12 月，圣诞花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日本人侵袭。卡维塔·嘉道理爬到石栏杆上，想更好地看一看轰炸，到了此刻，她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床上。瞧！她对女儿们说，到处都是浓烟。她一定是有些晕眩，因为她待在那儿摇晃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过没人看到她倒下。

枕边书

我的情况更糟。

栅栏后面全是声音。地下铁路系统的高峰时刻。我的思绪犹如一张票子。吸起了一套系统。不像华兹华斯诗歌一样说出来就出来。但是这个与人类存在有关的火车头开足了动力，折磨着我，将我毁掉了。不过，就在我将能够分清怀疑与事实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父亲的另一道遗嘱。

> 我，阿纳尔多·何塞·卡斯特罗，兹任命罗伯·林先生为我的托管人和遗嘱执行人，附加下列说明：附录（1）：我在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账号________里的5,000美元，为________代管，等他到了二十一岁，这笔数额和由此产生的利息都属于他，放到他的名下。

我查看了一些继承法方面的书：

关于私生子

1. 三种私生子。
2. 乱伦和通奸生下来的私生子无法享受遗嘱利益。

3. 前一条结论的种种延伸。

4. 同一结论的种种限制。

5. 有关通奸和乱伦生下的孩子的营养和抚育，教会法和民法之间的差异。

6. 这种法律中涉及到私生子的种种法律法规。

7. 个人行为之间生下的私生子。

8. 私生子得到的遗产是否可以用于他的抚养或解救。

亨利·史文朋：《遗嘱论》（伦敦：1635 年）

在上海，私生子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正义面前，法律缺位了。对外国人来说，一切都是公正的。法律需要宽容，强行实施，使宽容的人有权力去实施宽容，给乃尔宽容的人授以爵位，让宽容主义者享福，将宽容者封为圣徒，崇拜那些可以容忍的，并以宽容的名义净化那些不宽容者。这样就圆满了。自由恋爱非常流行。然而在香港，上海人反对那些不近情理的规则和殖民界限。大街上再也没有穿梭来往的轿子了。除了看病用，再也没有可卡因了。再也不能通过邮局在帽盒里送蛇了。哦，对了，私生子得注册。好玩的结束了。

我有各种法律文件证明这个家族的世系。但是作为见证：到了这棵树这儿就停止了。我不会让它繁衍，我要将它连根切掉：一个挥之不去的冒号，不用营养或救济来表明一个贪婪而呆滞的家族的结束。我现在看清楚了……这些遗嘱由一个速记秘书，拿着一支柔软的鹅毛笔，用一种黑色的杂种语言记下，她的劳动全在她的眼前。这是一个穿着漂亮花呢衣服的金发女郎，一边是头，另一边是世界。

弥诺陶洛斯[①]

伦敦先生过去常说，如果你想摧毁什么，那么你不仅得知道它，而且还得感觉到它。杀什么就得是什么。当然，知道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话的含义。

> 船的主要守护者
>
> 我得到消息，我们的印度守护者（巴拉·辛格）在病了三天之后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孀和三岁的孩子。在日本占领期间，他遭受了毒打，受了内伤，最近开始复发。那些有心资助这个可怜家庭的人，请在下面签名。

我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草垫，盖在信上，所以这封信没人看见。我还记得这个垫子，许多年前，它给我们家的餐桌增添了鲜艳的色彩。小时候，我常常研究这上面的花纹，结果发现这影响了我的吃饭。我诧异于这格子造型自身所发生的变化，能将绿色的稻草糅合到橙色稻草之中，这样，一个背景花纹渐渐地变成了前景，将后景融合到自身当中，这样一种图案就构成了垫子。这样一种对称令我着迷，因为这里包含了一种正义，我想。

雨水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牢固的屋檐，影响着我的思绪，让我回到了地毯上的花纹、节奏和图案之中。

吃完饭后。雨滴滴答答还在下着。我五岁了，我有四个同父异母姐姐，我相信她们一心想摧毁我；我还有一个缺席的父亲和一个母亲，她的世界黑暗而黏滞，已经没有了欢快的念头。我想象着我听到了楼下一群群孩子们的喊叫和欢笑。这事有点不自然。

但是我有一半的时间活得并不自在，我讨厌地看着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几乎病态，我看着她们大吃大喝，好像要吞掉这个世界，这饭是不可能吃的舒心了。这是一种诅咒。这是一种竞争。像我这样的傻瓜什么都浪费，玩弄着她们的食物。伊俄卡斯特吃起饭来嘴巴大张，什么也不拉下，就连飞过的苍蝇也不丢弃。再看看维也纳，她不失时机地为了自己的利益写好了遗嘱，十七岁的她讲起话来就像她为其工作的律师，威胁着任何盯着她钱的人。斯特拉说她将来会很富有，因为这是一个算命的告诉她的，现在她已将一切安排妥当，计划嫁给一个外国工程师，他在中电集团有一套很大的公寓，她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永远离开远东，因为这个地方肮脏，到处都是穷人，牙齿破损，还有讨厌的继母、她们吸吮着筷子，只知道叹气，却对生活不闻不管。伊尔玛现在戴着一副眼镜，能够做智力算术，几近天才水平，她一脸傲气地将鸡骨头吐到盘子里，因为没人想到送她去上大学，她的时间都花在商店里，向英国主妇兜售内衣，而这些主妇总是要讨价还价。她们都在谈论着汽车，好像汽车可以帮助她们摆脱平庸，她们还不停地谈论着丈夫和财产，她们老是拿我取笑，看着她们如此地炫耀财富和权力，而且双关话出口就是，充满了讽刺和精明的算计，我感到很痛苦。我很迟钝。我真的很迟钝，我研究着餐垫，沉闷地在脑子里进行文字组合，而且间隔那么长，什么也无法表达我想要说的东西，等到我开始想说了，我已经遭到嘲弄，成为笑话，大篷车继续前行，只有我还甩不掉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杀戮之

---

①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住在克里特岛的迷宫中，吃掉雅典进贡的童男童女，后被忒修斯杀死。

前，就是在恐惧之前，这些人也会同样如此，因为他们对一切都变得冷酷起来，这种冷酷是一种对稀汤里的臭虫视而不见，只管前进的符号，是一种沙漠，应得之物以及不用问就来收取欠债的符号。

我出门到了后面，看着狗津津有味地在雨水浸透的水泥上吃着食，内心产生了同样的胃口，我抬头看着给狗弄得一团糟的院子，隔壁是黑暗狭小的厨房，地上一直是湿的，这些天来，我母亲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里烧饭，我看着空中盘旋着飞下一个纸捻儿，上面写的是中文小字，我也看不懂，这成了我一个萦绕于心的梦想，纸捻儿上传递的信息是拯救与解放，小巧的经文护符匣，我将这纸卷塞进小狗的嘴里，这家伙懵头懵脑地苏醒了，恢复了野蛮，而我的四个同父异母姐姐们看着我躺在狗的边上，当我看着她们的时候，我看到这家伙内心在吞噬着她们，但是就在此刻，斯特拉一把抓住了绞起来的纸团，将它扔了出去，它歪斜着飞过院墙，落到下面的弄堂里，掉进了一个阴沟，里面全是狗屎和洗衣店淌出来的染料，维也纳吃吃傻笑了起来，转过身去，将黑辫子甩过肩膀，嘲笑我动作太慢，不会读书，一副傻乎乎的样子，相比之下，她们对现实，对人情世故都了然于心。这是野兽的标志。但是现在，差不多过了四十五年之后，餐垫下有一札纸上跳动的手迹我能看懂。

俄亥俄州阿克伦市

哈维·塞缪尔·凡世通先生

亲爱的哈维：

近闻你身体欠佳，深感不安，衷心希望你尽快恢复……快得跟阿斯顿马丁 V12 跑车一样，你的代理商曾经给我托运过，但是这些惨事破坏了我的公司，也使我结束了这种奢侈品。最近你开过吗？有人告诉我，它对充血和黏膜炎，甚至对鼻窦炎都有惊人的效果。

长话短说，我写信是告诉你，由于最近上海发生的动荡，我和家人

撤离了这座城市，现在住在香港。

由于这次搬家，我跟上海当局失去了联系，我一直在跟他们接洽，争取获得我和女儿进入美国的签证。与此同时，我也在跟香港的美国领事接触，我拿着我的护照和我在美国时通过贵公司得到的相关证明文件，但却被这里的领事拒绝，他说要使我的女儿进入美国，就必须得到贵处移民局的同意……

香港电力有限公司

尊敬的先生：

近闻贵公司有一小职员职位空缺，本人恭求这一职位……幸蒙教会和牧师的仁爱，本人在……接受过教育，本人迫切需要这份工作，好养活我的女儿，她们的生计全靠施舍，希望你的慷慨能使本人在贵公司谋得一个机会……

澳门

大西洋银行

经理

尊敬的先生：

请允许我为两个女儿读书一事给你写信，相信会得到你仁慈的建议和考虑。

我现送两个女儿去澳门的嘉诺撒修院寄宿，因为她们的母亲重病在身，我想修道院是她们的最佳去处。

我的难题在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汇差。修道院的修女们非常通融，慷慨地接受了她们，但是由于港币进一步贬值，她们很难在费用上达成共识。

眼下我的工作是名没有报酬的运货代理商，我的薪水来自香港义勇防卫军，我教他们的新兵如何使用轻武器。在这变幻莫测的时代，这是一份可靠的工作。

尊敬的先生，敢否打扰一下你的宝贵时间，请你伸手援助，平价接受本人的汇款，免掉银行的佣金，如此将会大大减轻一个父亲对他女儿的责任……

如需鉴定真伪，本人将根据要求随时奉上。本人是葡萄牙会会员，有关本人人品等事宜可向其询问。

这些是用铅笔慢慢起草的，然后又做了修改，用打字机打在很薄的纸上……特级债券，美国产。还有许多其他的信，职员表，推荐信，为中国人写求职信，为印度人写人品推荐。看着这些东西，我现在开始意识到，我父亲一直就是个写信者，一个嗜写成癖的人，非常乐于别人心目中的替代过程，也许他为普通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希望，提高了自己免于向下螺旋的几率。在他的铅笔短笺中，在充满了水印的纸上，我看到了他起草时的缓慢表情，他的句子平衡而公正，在这些背后，我还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看上去很像他父亲的人，他的世界给麻绳和船索包围着，他很尊重尺度和表达的准确性和必然性；但是，跟忒修斯不同的是，他沿着绳头纵身跳入黑暗，然后又突然跃起。

战事又起

各人有各人的说法。

奶奶有个破锣嗓子，有时会吓我一跳。这是大奶奶。我不太记得小奶奶了，在我四岁的时候，她就死了。小奶奶是斯特拉和伊尔玛的祖母，一个黑黑瘦瘦的干瘪老太太，走路拄着拐棍儿，如果你离她太近，她会用拐棍儿从后面抽你的腿。小奶奶做的酸辣酱和咖喱是最好吃的，有时，她会用拇指和食指掐着你的脸蛋儿，念道：辣辣的洋葱，辣辣的酥油，辣辣的大蒜，笨笨的我，然后你的脸蛋儿就感到火辣辣的，如果你想逃走，她就揪着你的衬裤把你拽回去，口中叫着胖墩胖墩小胖墩！而你根本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直到你脸蛋儿的痛楚让她觉得满意了，她就会笑嘻嘻地露出残破的牙齿。小奶奶不见了，我一点也不难过。人人都知道她是个怪人。卡维塔死后一个星期，她牵着斯特拉和伊尔玛的手出现在容氏公寓。她告诉茉莉有情人就一定会有拖油瓶。

大奶奶则完全不同。大奶奶是英国人，她又聋又瞎，你可以轻易躲开她，但却躲不开她震耳欲聋的叫喊。大奶奶嗓门高，声音像破锣，你能看出她这把年纪所表现出的威严，我敢肯定，当父亲告诉她日本人来了的时候，我的大奶奶，腰板笔直、戴着一片挂着链子的单片眼镜，总喜欢在黄昏时分在他们山顶道公寓的阳台上喝杜松子酒，她当时一定也是用这样的嗓音说，他们不敢。香港是英国领土，她用破锣嗓子叫道，

然后拧开无线电，无线电里充满了令人困惑的嚣叫，还有就是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声音，听上去和大奶奶的声音差不多。

开始，只是在山前有沉闷的炸弹爆炸声，爆炸之后腾起一小股黑烟。大家都知道，日本人逼近了。阿纳尔多训练他的手下向天空瞄准。第六连是高射机枪连，是香港义勇防卫军中的葡萄牙小分队，他们拥有老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和一挺路易斯机枪，机枪手必须把枪顶在肩膀上，阿纳尔多则在一旁用手扶着枪身，他的左手放在油桶下，已经被烧得皮开肉绽，黑乎乎的。日军主力营竟然突破了防线，人们对此错愕不已。两艘皇家海军驱逐舰偷偷拔锚逃向新加坡。这是非常不道德的，这些王八蛋，父亲说。日军突破了醉酒湾防线，父亲他们且战且退，且战且退。人人都知道那一溜防御北方、中看不中用的碉堡，没有增援的话根本就是纸老虎，只不过是个狂喝滥饮的好地方。奶奶拿出了她的拐杖和《圣经》，眼睁睁看着幼小的托尼欧因为没有冰块降体温而死去，他攥着小拳头，脸色青紫，又渐渐变得苍白，连个可以埋葬他的地方也没有，奶奶知道，这么多年来，她在中国经风历雨，但眼下的形势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糟糕。

父亲他们边打边退，在夜色的掩护下上了岛，日军开始实施无固定目标轰炸，轰炸很有规律。建筑物巨大的厚壁被削平。山坡被轰塌。轰炸的间歇，尘土刚刚落定，高压水龙头的总管就接好了，奶奶腋下夹着个包裹，大步流星地向清真路走去，进了老约翰·李的花园，她听到水池那边传来一阵乐曲，那是甜蜜的家和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她拿出了包裹，把它塞进了一大堆树叶底下，看起来放在这里很不错，还有音乐相伴。奶奶就那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之后回到了山上。日军的驳船登陆了，并在港口的防波堤上装设了高音喇叭。

阿纳尔多来到浅水湾一家规模很大、储备充裕的酒店，酒店坐落于山脊之上，他的那个连只剩下半个排的人了，只能眼看着日军步兵架起了机关枪。尽情快活吧，他说着，把酒倒了一地。他们没希望了，躲在

酒窖里也没用，子弹和迫击炮就快把这座建筑掀个底儿朝天。跪在满地血浆酒水中，看着四面墙壁火光熊熊，伤者发出了垂死的哀号，很快变得神志不清。阿纳尔多明白已经全无希望。没有命令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逃散了。他从后窗跳了出去，游水逃离大火的包围，最终昏倒在下水道的沟渠里。他的手严重烧伤。全身浸在齐耳的粪水里，却松了一口气。在浑身恶臭中，他亲眼看见自己那一排有些人向日军投降，却被逼着跑步从山崖上跳了下去。他们跳下去的时候还茫然无知；毫无反抗，浑身颤抖；以前躲在柜台下偷看漫画的银行职员；因为皮肤不够白皙未能及时得到疏散的大英帝国属民。他能听见他们跳下去时身体撞到山岩的声音。他赶到赤柱堡垒请求支援，一路沿着海滩前进，但海岸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只看见日本宪兵押着一队队用绳子强行穿透手掌，拴成一串的中国俘虏，还有被捆绑在防波堤沿路灯柱上的一群群妇女，口渴难当地干喘着，这里、那里，不时有人倒下，像玩偶一样吊在那里摇荡着，然后慢慢死掉，身上的衣服都撕成了碎条。远处，大火肆虐，向着山的另一边蔓延过去，这是一个晴好的冬日，海水懒洋洋地轻轻拍打着海湾，他想他本可以绕岛游上一圈，他父亲压力过大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双臂慢悠悠地划着水，一点力气也不费，上下轻轻地浮动，在水面上拖出一条长长的波痕，坚持不懈、不知疲倦地朝着白色灯塔的方向游去，那里装满了三文治和冰镇香槟。他因为自己身上下水道的恶臭而屏住呼吸，一瘸一拐地走着，已经没有时间去回想了；他往前走了没多久，遇上了一个排的日本兵在原地踏步。开始日本兵没在意他，直到他转了个弯，日本人发现他走的方向不对，就派了一名士兵用刺刀捅他的背，朝着他哇啦哇啦大声叫嚷，让日本人惊讶的是他居然会说日语，因为在轰炸中磕掉了门牙，他说话呜呜噜噜的，他说，还是投降算了。

此刻，我母亲和四个小女儿坐在一起，正等着有人敲门。维吉尔什么也没有写，在恐惧面前，什么理论也不管用。他摘下眼镜。又戴上。他们离窗远远的。多拉出去了，还没回来。没有了平日按部就班的吃

饭、洗澡、睡觉，时间漫长得奇怪。

阿纳尔多被带到日军总部受到了审讯。日军总部设在薄扶林一幢漂亮的大房子里，那里原来属于一个银行的副总裁。阿纳尔多记得自己曾来这里求过职。当时，副总裁彬彬有礼，请他喝了茶，但没给他任何答复。在那房子的一间厨房里，日本兵敲碎了他剩下的牙齿，用火烧他另一只手，但当他们发现他真的会说日语，就转变了态度，送他进了医务室，并小心地为他疗伤。

——爸爸，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

——你逃跑了。你丢下你的枪和头盔，脱下军服，是的，脱得只剩下内裤和背心，为了活命而逃跑了。跑得快的那些人捡了一条命，多数人死了；那么多人死了是为了什么？刺激？你电影看得太多了。美国人胡说八道。都是美国人在胡说八道。

没有证据。没有照片。只有上嘴唇的一道伤疤，对那十年的生活，他就只说了这些。

卡琳荷·罗莎·塞凯拉：

是的，我和他母亲的家族有亲戚关系，但直到战争发生，我才真正认识他，香港陷落后两周内，我们两个被赶上了同一条船，我们看见的只有螺旋桨的轮轴和把用油乎乎的破报纸包着的食物拿给我们的卫兵，我记得自己对他，阿纳尔多，说，如果日本人想杀了我们，就不用把我们赶上船了，他问我是否会说点日语，我说是的，我当然会说，三三年的时候我还在横滨当过英文老师，于是他说，那么，我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在这里的原因，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在那个黑乎乎臭烘烘的船舱里还有另外大概三十多人。

茉莉坐得离窗远远的，无线电广播说为预防炮弹碎片击碎玻璃，最好远离玻璃窗，维吉尔在落地窗上钉上了木条，但没有足够的木条把窗户也封上，就在那时，有人咚咚地敲门，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门就被撞开了，大概六七个日本兵闯进了屋子，浑身散发着汗臭、黄卡叽布制服的味道和大蒜的臭味，冲着屋子里的人大声叫嚷。他们根本不理会维吉尔的抗议，把他推进卧室，锁上了卧室的门，然后他们把茉莉和四个小女孩赶出公寓，押下楼梯，走上了大街，街上有一大群妇女和儿童，排着长队，她们也被迫加入了这个队伍，看上去她们全都是外国人，不过没有一个英国人，日本兵押着她们向港口方向走去。

阿米特拉·卡尔德拉：

我们不知道要把我们押到哪儿去，但有些士兵朝我们微笑，我们并不是很担心，事情还不是很糟，有艘赌船泊在码头，发动机还突突地响着，我们都上了船，我想，坐着这艘船和满船的妇孺一起渡海虽然有些奇怪，但也让人觉得安全，不过我们心里还是担心着丈夫、父亲和儿子，我和我在皇后大道的邻居茉莉说，感谢上帝我们长得又丑又胖，那些长得漂亮的可能会遭到不幸……我就是有这种感觉，你等着看好了。

多拉正走在罗便臣道上，一队登陆的日本兵从她身边冲过。她以为这些士兵只不过是要占领这个地方而已。生活总还是要恢复正常的。但当时天色已暗，周围没有灯光，她突然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每条马路看上去都一样。她在这些马路之间转来转去。除非先下山，看来她是找不到上山的路了。眼前的路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山脚。她路过一幢不认识的大楼，听到大楼门内传来一个声音。

——喂！进来吧。

——什么？你是谁？

——别管了，你快进来吧。

——是你吗，坦纳先生？

——是的。我是银行的坦纳，你是多拉·容夫人，对吗？

——发生什么事了？

——日本人入侵了，就是这样。你他妈还是小点声吧。

——你看，你不能那样和我讲话。

不过现在还讲究这些细枝末节已经晚了，坦纳拼命把多拉拉进门来，多拉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狗叫声，狼狗的利齿已经咬住了她右腿肚子，她身后紧跟着一队日军扫荡队，牵着阿尔萨斯狼狗，日本兵冲进了大楼，把坦纳按到了墙上，他们发现银行金库里躲着大概三十多个英国人，他们逼着坦纳打开金库把人放出来，不一会儿，大家都被赶到了夜幕笼罩的街道上，哨兵们牵着狼犬，士兵们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打人的脑袋，多拉腿肚子上流着血，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

日本兵宿营在湾仔的一家妓院。愤怒的妓女们朝他们大喊大叫，床被搬得到处都是，日本兵在楼下肆意淫辱他们挑上的女人。第二天也是如此。哭喊、行军，他们住在一个墙板很薄的旅馆，几乎没什么吃的，但多拉却受到了优待。毕竟她是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英国女人，日本人对此还是有些在意。一名军官给了她一听奶粉。她和身带婴儿的莫伊拉·弗格森一起分享了奶粉。莫伊拉看着她的样子有些古怪，好像以为她已经投入了敌人的阵营，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奶粉。两个星期，他们就这么待着。那地方已经污秽不堪。没有干净的水。多拉开始提出各种要求。她对日本兵的威胁充耳不闻。日本兵冲她大声叫喊、向她挥舞着刺刀，但她不为所动。她说这都是为了维持秩序，解释说再这样下去会爆发传染病，连军队士兵也会被传染。她也朝日本人大喊大叫，对那个中国翻译说她耳朵聋了。他们扇她耳光。她毫不退缩。后来，日本人只好允许妇女们用澡盆和油桶盛水。

有一天，她已经无法辨识日期了，又命令他们行军。一点点的，多拉认出了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他们被逼着连夜赶路，而多拉记起了她在礼拜天早上，曾无数次开车来往于城市与港口之间，有一次还雇了黄包车跑了远得累死人的距离，黄包车夫一边喘气一边满脸堆笑，看上去就要被累死了，但还是不敢放弃，生怕拿不到车钱。眼前，那些黑暗的角落在她的记忆里一一掠过，她开始意识到，满腔怒火很快就会变成心虚的恐惧、绝望、屈服，她知道不能让自己松懈下来。

——奶奶，您为什么不喜欢苏丹?

——我很喜欢苏丹。

——那为什么每次你一来我们就要把它锁起来?

——它老是叫。

——它不会叫的，奶奶。它总是贴着耳朵，摇着尾巴。

——我看不见，会踩到它的爪子。

德芙拉·钱德勒：

告诉你吧，这是我在战争期间最后一次乘坐渡轮。我后来再没去过港口，直到我们拉吉普特获得了解放，我丈夫来找我，他在保卫鲤鱼门山口时头上被打破了个洞，他坚持说吉塔·帕特奈克是他的妻子，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他也不相信，后来我就用拳头给他脑袋上来了一下。可怜的吉塔被弄得那么窘迫，那可怜的姑娘因为对这个战争英雄着了迷，搞不清他是在恭维自己还是要强奸自己，亏了我那一拳才让这家伙的脑子清醒了起来。不过我当时在哪儿? 哦，是的，那时我已经上岸了，在海的另一边，那些日本人对我们推推搡搡，把我们赶在一起，排成长队，我们走过的地方，围巾和纱丽掉得满地都是，在弥敦道兵营附近，我们看见一个班的日本兵把一帮中国土匪赶到墙边，用枪扫射，子弹穿透了

他们的身体，在他们身后扬起一蓬尘土，过了很久都没人动弹，死尸没有动，那些日本兵也没有动，告诉你吧，当时那个场面非常怪诞，他们好像都在摆着姿势等待拍照一样。

“比利小子”苏萨：

我们以为，伙计，我们在船上，他们不会费这么多功夫来杀死我们，伙计，船舱下臭气熏天，我们根本无法辨识时间，但是有天早上我们上了岸，他们把我们集中起来并让我们走出去，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要么是到了朝鲜要么是在日本，因为码头边上站着很多身穿和服的女人，我们当中很多人穿着香港救世军肥大的裤子，伙计，他们都受了伤，裤子都破了，伙计，你真该亲眼看看那些男人，在女人面前拼命掩着他们的衣服，好像这时候这种事情还很重要似的，然后我们上了卡车，被运到了战俘收容所之类的地方，然后又被赶上火车，所有人都装在运牲口的车厢里，伙计，那车厢并没开动，只不过是用作关押我们的围栏，半夜时分，火车突然开动起来，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兵营模样的地方，就在那儿，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在长崎的一个船坞干活，由于从事焊接，或得了脚气病，很多人眼睛都瞎了，或者快要瞎了，一队队日本人不时来查看，伙计，把那些死于痢疾的人抬走，我一天有十八个小时得蜷缩在钉满铆钉的洞里焊接，在焊机的荧光下，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一会儿又发热，伙计，现在想起来，我还忍不住浑身发抖。我后来在一个舞蹈乐队里当了鼓手。我挺过了冷热病活了下来，有些人第一个月就死了，伙计，听听这鼓声吧，还有谁能演奏出这样的节奏……

雷金纳德·利特尔顿“教授”：

如果你把这些讲述拼凑起来，可以推测出日本人所做的这一切都是

有目的的，他们本来的意图是雇用专家造船，提高长崎船坞的产量和质量，也许是由于一系列语言沟通上的问题，当我们，主要是那些懂点日语的人提出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时，我们却发现，真正的造船专家显然并没有几个，更多的人则是船运代理，港口监理，船用杂货商，进出口贸易公司职员，有那么一两个还是船主。从那时起，他们就决定强制这些人做劳工，用这样的办法来消除他们的错误。

米奇·古特雷斯：

教授的观点不无道理，不过他并不在现场。他已就此写了一本书，但他根本就没亲身经历过。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大多数都是菲律宾人、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后来我才得知在船坞的另一边，有一整队的英国人……三年间，我们彼此从未谋面，这难道不是种族主义吗？教授的观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每个月要进行一次“展览”，他们让我们穿上黄卡叽布制服，排队走到山上，走过一群看上去像是重要人物的日本人面前。第一次上山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要被枪毙了……

茉莉，女人，孩子，老人，年轻人，被集中到一个操场上，命令他们坐下，进行登记，然后又被驱赶着往前走，穿过太子道和嘉道理道路口，黄昏时分，走进了落叶遍地、尘灰笼罩的拉莎勒学院。他们将被拘禁在这里，人们纷纷摘下围巾、丝巾，脱下外套，整队人终于有了歇脚之所，一时间，有人穿着夏衣或内衣就地躺下，打开按规定携带的单人行李箱，拿出藏在里面的雪利酒。她记得当时的场面毫无文雅可言。没人愿拿出自己的东西帮助别人。孩子们吵着要喝橙汁和牛奶，得到的却是父母的耳光。一阵微风吹来，从窗口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摇动了天花板上的坏风扇。黑板上还零乱地留着几个月前上拉丁文课时的板书：amo（我爱）amas（你爱）amat（他/她/它爱）。几个老女人掏出了鼻

烟壶，她们的喷嚏激起了土黄的灰尘，在空中飞扬，而瑞克哈·辛格说道，哦，这可不是 Amahs（奶妈）的拼法。不，这些字的意思是爱，艾米尔·希特伦说。Amahs 的意思是爱？维也纳和斯特拉在讲台后面互相掐扭着，茉莉精疲力竭，再也没有力气把她们拉开，因为轮流抱着四个女儿，她的手臂酸痛无比。女儿啊，女儿啊，女儿啊，她真该扔下她们，她们真让人操心，还有，她们还学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绝对学不到的东西。她没有行李；他们说要带着孩子就不能带行李。那个教室里的阳光让她感到胸口彻骨的疼痛，各种谣言像发疹子一样蔓延开来……拉丁文说我们爱你们爱他们爱。噢，可以顶一两个奶妈了，瑞克哈·辛格说道，对茉莉一脸的看不起。

哈辛塔·佩雷拉：

当然了，每个人都在猜测，但没人亲眼看见，不过你能听见从下士的房间传来他们的叫喊声，渐渐地，人们就明白了，如果他挑中了你，就赶快把嘴伸过去，要前所未有地卖力表现，让我告诉你，法提米哈·佩雷斯干这个最拿手，她总是在嘴里塞满东西的时候还能不断说话，怪不得她丈夫从来没让她怀孕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逃脱一死……那些老女人和丑女人就不行了，她们总骂我们是荡妇，我们走进兵营的时候故意转过视线不看我们，就好像我们是自愿的一样，我就对她们说，是我们救了她们的命。请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如果有人拒绝，就会遭到你们现在所谓的轮奸……

法提米哈·佩雷斯：

他们让我们一边数着，一边用筷子把一粒粒的米夹进米袋。如果你表现得不好，这是常见的惩罚。你数着数往米袋里夹米，一名中士会对

袋子进行精细的称量，如果比规定的数量差半盎司，就两整天不准吃饭。我立刻就知道这种事情我干不来。我在这方面根本不行。我的手会发抖。直到今天，我数数还是数不准。

斯特拉数着天花板上的风扇……一、二、三、四，然后又数窗户、门把手，跑到院子里数鹅卵石、树木，她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正在求饶，这一次声音很凄厉……好啊，他们打她了……也许她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也许在讲述回忆的时候，她在这里、那里有些添油加醋，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她有一次走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远，越过了警戒网、出了大门、走过了医院的病房去，闻到了一股可怕的味道，这股味道越来越浓，她看到一个大坑，有人从袋子里抓出白色的粉末扔进沟里，沟里都是手臂和腿脚，也许他们也要这样处置她的继母，砍下她的手脚，她一定是放声尖叫起来，那些中国工人，嘲笑她，捏着她的鼻子数数……一、二，让她不断尖叫；三、四，对我来说这仿佛就是一场梦境。

多拉所在之处是斯坦利拘禁营，她在那里，饿着肚子，看着海浪拍打着半岛。她对其他英国妇女强调卫生的重要性，并以此来抑制自己的胃口。她不断打扫、清洗，再打扫、再清洗。她们的灯笼裤一尘不染，洗得发白。她利用自制的扑克牌组织了桥牌队。她为她们读《圣经》，要求她们触碰自己的脚趾。她们开始恨起她来，并在背后嘲讽她。她冒出了个聪明的主意，想发动每一个人帮助她编撰一部字典。哦，《浮华词典》，她们叫嚷着。但是头一回有人发现，如果用梳子梳一下，那空气还真能给吸进去。即使在冬天，她也鼓励她们赤脚。别担心，你们的脚趾不会掉下来的，她说。这不是在利物浦。真希望这就是在利物浦，你这老骚货。好吧，有件事必须说清楚。我可不是什么骚货。用不着你告诉我们。你敢再说一遍？哎！好痛。

若昂·雷梅迪奥斯：

几个月后，我们只剩下了二十六个人。多数人都死于伤寒和白喉症。作为他们当中唯一的医生，除了检查病情，乞求得到血清，我束手无策，而血清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可是每个月，他们还是把我们拖上山，让我们立正站好。我们站在那里，在风中不停地咳嗽、呻吟，非常怪异。说这事怪异是因为我承认当时自己的健康状况非常脆弱，可能已经失去了理智，但我却坚信，这种做法开始是为了进行某种宣传……看着外敌受到羞辱……后来却成了旁观者的一种宣泄……从他们的脸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他们脸上明确无误地露出羞愧和尴尬的神情，在这些人中，看得出有人穿着礼服打着领结，有人穿着传统的和服……看着我们二十六个人站在西贩山上的一块麦田里……他们当中没人说话，也不允许我们任何人说话……

阿纳尔多正经历着一期伤寒。他头疼不已，浑身酸痛，腹泻物顺着裤脚渗了下来。他站也站不稳，用那双破烂的靴子戳着软塌塌的草皮。从土里露出了一块尖利的骨头碎片，人骨还是兽骨不得而知，但后来卫兵告诉她，这里曾经是葬马的地方。他心绪不宁地挖掘着这块碎骨，十分费力地把它从尘土里挖了出来，趁人不注意，将它塞进了口袋。回到船舱，他吮吸着这块骨头，把它弄干净，不顾高烧，雕刻着它。这一疯狂的举动是支撑他坚持不死的唯一原因。他真的相信他从骨头里吸取了营养。他用锉刀在上面钻了六个孔，用一块老竹片做成了吹嘴儿。他吹着骨笛，感觉舒服多了。不久他就能用骨笛演奏出曲调。很快他就学会了演奏“阿拉比酋长”和“甜蜜的乔治亚·布朗”，“比利小子”苏萨提供了节奏乐器，用一块马皮蒙住一个大桶，他们唤醒记忆，重新改造了舞步，就这样，他们生存了下来，因为他们抱着小事不放。

——爸爸，我是有抱负的。我才不要坐在香港的家里做一份速记员的工作，一辈子碌碌无为。

——斯特拉，你当然不会。没人想要你变成那样。你应该到另一个国家，要有所成就。我们这些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嗯，我们已经失去重新开始的机会了。听爸爸说：嫁个欧洲人，趁中国人还没越界接管，离开这个他妈的鬼地方。你呢，儿子？你想去澳大利亚吗？

——我当尸想去。

——别说当尸。说当然。你得学会像英国人一样说话。

每当想到战争，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热浪、医院、毁坏的风扇、沮丧、警报声、咳嗽声、腹泻、自杀。伦敦先生和一支你曾拥有但又丢失了的翠绿色水笔。你认为这印证了战争经历者的话：战争主要是饥渴、围困，无聊以及储藏几乎毫无价值的东西。还有疾病，当尸还有死亡。还有澳大利亚。每个寄宿学校都是收容所、兵营、一种围困的形式、一种疾病、一长串名单。每座战争纪念碑都是战争的沮丧；每个战争纪念馆都是战争的停尸房。纪念碑和纪念馆都铭刻着一串名字。军团、国家和死者的名字。这一切触目皆是。于是你得出结论，对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列表和计数极为重要。

1960 年 12 月 12 日，周一。

你好爸爸，我正用我亲爱的丈夫昨天买给我的新的根德录音机录制这盘磁带。我们住在这幢漂亮的好莱坞式木屋里，就在悉尼的边上，我们有：

五个散热器

一个有四只炉灶的电炉子

一个有六格的冰箱

一个胡佛洗衣机
一个伊莱克斯吸尘器
一个贝尔德电视机
满铺的地毯
一个露台
一个烧烤架
一个双门车库
一部莫里斯迷你车
一个新光搅拌器
一台胜利割草机
一个可升降的晾衣架

一个长沙发，一个短脚衣橱，孩子用的双层床，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你也许在纳闷有些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塞西尔正准备买一架德国最新款的照相机，那我们就能把这些东西都拍成照片给你看……

亲爱的斯特拉，

谢谢你寄来的磁带。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录音机，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工作，不过我们向楼下的查理·马达尔借了一个。你还记得查理吧，他总是问起你，我告诉他你在澳大利亚过得非常好。顺便说一句，这些东西我们在上海几乎三十年前就都有了，没有的大概只有可升降的晾衣架和割草机，那是因为我们拥有中国园丁和保姆。我们也能看到最新的电影，比电视可好看多了。我很惊讶塞西尔居然开一辆莫里斯迷你车……以他的收入应该可以买辆更好的吧……

——爸爸还是没有工作。我敢说你的母亲已经变成洗衣妇了。你知

道，茉莉以前连拿块洗碗布都感到难以忍受，现在却要当老妈子了。

——爸爸会翻身的。他总是这样。

——是呀，不过你母亲呢？

斯特拉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她四岁，尖叫声不断。她沿着小径一路数着法国梧桐，当时法国梧桐的树叶正纷纷凋零。她看见茉莉从下士的营帐里出来。她发髻散乱，鼻子在流血。她几乎都无法走路了。在冰冷的学校教室里，她躺在一架行军床上，三个印度妇女服侍着她、照顾着她，伊俄卡斯特和维也纳围在她的身边，把茉莉吃不下的山羊奶和糖全都吃光了。这两个爬虫、寄生虫。

后来有一天，茉莉恢复得能够走路了，她看见斯特拉走在边篱附近的小径上，就给了她一个大嘴巴。事情总是这样；斯特拉和伊尔玛总是无缘无故吃耳光。

不准这么骂吉塔。你的母亲也是印度人，不要忘记这点。她用山羊奶洗浴，还在两眼之间按上红色的拇指印。

斯特拉记得有一次，茉莉把一名医生给她的皮球拿走了，然后来到院子里，拿着红色小皮球和一根斧子柄组织了一支棒球队，玩得开心极了，奈玛打了个好球，那球越过外场，飞向警戒网，茉莉身子往后一仰，伸手去抓球，就像从半空中抓一只苹果一样，就在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有个日军中尉正盯着她，这个中尉一脸笑容和仰慕走了过来，扔给她一只芒果，茉莉很专业地接住了，从那天起，三号俘虏收容所就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了：水果、大米、糖、茶叶，长途行军结束之后又过了两年，茉莉和她的四个女儿终于被释放了。

——为了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释放，她付出了代价。日本人为金子而疯狂。他们就想要金子……金子、金子、金子。她有一小袋金币，如果小托尼欧还活着，那本来是容爷爷给他的，所以说是小托尼欧的钱

把我们从地狱里救了出来。

——别相信她的话。看在上帝的分上，那是因为那个日军中尉喜欢上她了。谁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你们怎么敢这么说我的母亲。

——是呀，她像照顾你和伊尔玛一样地照顾着我们。

——胡说。

——放出来以后我们还有米饭吃，对了，隔三差五还能吃上肉，而不用像苦力一样在砖头搭起来的锅灶上煮香蕉皮和咖啡壳糊口。母亲救出了你们，是因为她在你们身上花了金子。

——好吧，让我们问问家里的男孩他是怎么想的。小子，你是怎么想的?

——那时我还没出生呢。还有，战争时期哪能弄得到肉。那都是他们把死掉的小孩切开吃了；父母把自己死掉小孩的一片片肉，拿去当街叫卖，这样其他人才得以活下来。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帕梅拉·莫里斯：

可怜的多拉，她的灵魂是好的，就是给那本《圣经》和中国政治误导了一点。一年前她拒绝撤离就因为她的家人没有一个可以和她一起离开。在被收容的那段时间里，她都无从得知自己孩子、丈夫和那个可爱的小女孩的命运。她像个军人一样生活着，清洗打扫、组织活动，但并非高高在上地对我们指手画脚。正如你知道的，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大块头女人，嗓门就像一名操练士兵的中士……是头真正的英国斗牛犬。我知道为什么她的丈夫维吉尔在战争中毫发无损。日本人完全忽略了他的政治问题，他为自己的活计忙里忙外，作为外科医生，把裂开的地方从两旁边缝起来，他供不应求，收受了很多贿赂。这是爱丽丝·周说的，她是同一家医院的护士……不过还有些人们本不准备说的事，过了很多年

以后才说出来。什么事情？就是他为了得到所需的医疗物资在实验室里干的那些事……

没有音乐阿纳尔多就活不下去……流畅滑移的音符，使人狂热的节奏，变换的音阶，这一切使灵魂中黑暗阴沉的一面在无尽的音乐中坠落。收容在等待；囚禁在等待；战争在等待。能经常听到音乐，藉此消磨时光，真是一份绝妙的礼物。等人认领。把他列入遣返名单不是因为他生病，而是因为最后一天，在长崎的那座山上，他用骨笛演奏出了一些音符，那是他发烧的时候听到、不知从哪儿传来的一首编排简单的采莲曲……也许是从产房下的浮萍里传来的，产房的门口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他看见一个女婴，仰脸望着月亮……那群官员被打动了。这种蚀骨的原始哀怨和忧郁来自何处？从那里吗？来自这个瘦骨嶙峋的家伙，可他对我们的情感一无所知啊？他是在刺激我们吗？还是一种愚弄？他们不安地四处走动，握紧了拳头；戴着帽子的神父们，头上不停出汗，身穿礼服头戴礼帽的官员们用领带别针顶着胸口；这一切都发生在阴沉的天空下，海上吹来的风越来越大，一段记忆，最终像古代的森林一样，消失无踪了。当然这是无法解释的，你只是感觉得到它在那，从往昔中浮现出来、凸显出来，借助于某种仪式，仪式应该是首先被认出来的，然后是平静，最后统统清除、驱散。光线透过云层洒在这群乌合之众身上，他们看起来好像散发着光芒。然后他们就四散走开了，很快，上头来了命令。他们把他送回来，给他安上了个帝国囚犯音乐家的头衔。这是一个来源可疑的宫廷头衔。

多丽斯·奥马拉：

问我是否还记得她？开玩笑吧？她就是我这辈子的冤家对头，洁癖和虔诚碰到一起会发生什么，有一次我告诉她，如果洁癖和虔诚经常一

起上床，但却没什么结果，那么人类早就该灭绝了，不是吗；世上哪有什么一尘不染、完全圣洁高尚的事情，嗯？我告诉你吧，多拉·容脑子有问题，总是拿着她的字典和抹布，我还告诉你，当日本人让她管事的时候，我们把灯笼裤都洗烂了，我们看上去破衣烂衫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留了下来，因为和剩下的男人们度过的时光实在美妙，包括已婚的男人，花钱如流水，因为其他女人都已撤回澳大利亚了，而多拉却一心一意为了所谓的救赎让我们生活在悲惨之中，她说，我们以前的肮脏行径需要救赎。不过真干起活来，这么说吧，即使有苦力在帮厨的时候，她也是个了不起的助产士，很有天赋，让我告诉你，她像拽小鸡一样把婴儿从肚子里拉出来，就在第一年，就凭她那套卫生措施，她救活的孩子比我们想做的要多得多，因为我们在别的小孩身上看出了一些我们熟悉的特征，而所有那些……

多拉·容：

没人对她的想法感兴趣。所以才要编字典，纯粹是余兴节目。除了让大家在营帐里忙忙碌碌，她还发明了一套编码记忆系统，用这套方法可以激发潜意识中一些怪异和冷僻的词语。根据环境来调整历史。悲伤标志着爱欲。她把这些用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陶瓶送出去，酒喝光了，这些陶瓶就被扔在沙滩上；双耳细颈酒瓶、安瓿瓶、13 夸脱大酒瓶、罗耶波安香槟瓶、玛士撒拉香槟瓶。每天晚上，当她进行印度式清洗的时候，她喜欢把清扫叫做印度式清洗，把衣物蘸水后在大石头上摔打，月圆的时候，她会让这些符咒借着潮水漂出海去。她做过很多次尝试才最终准确掌握了潮汐，漂出了瓶子，有时，她会聚精会神地倾听悲伤的塔鲁帕德乐(瞧，欠印度人塔某的债已经还清)，完全忘记了自己只缠了块头巾，甚至连块腰布也没围，就这样赤身裸体站在低洼的沙滩上，但是即使是蟋蟀唧唧的叫声也丝毫不能分散她的心神，两个晚上之后，看见(好的，又来一个)滴着水的漂流瓶漂回来了，她游出海去把它们捞上

来，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除了知道自己放进去的东西有人拿走读过了，这些空的瓶子并未带给她任何讯息。至少某处还有收到讯息的人。为此她感到颇受鼓舞。于是又放漂了更多的漂流瓶。她向她手下的那些女人讲述了这件事情；使她们在熄灯后还想入非非；测试她们的词汇量。但是够了。她打算就在自己的脑子里写，包括洗澡时要对这群伦敦佬笨蛋做的讲话，像奴仆一样把她们送到退潮的沙滩上，送给正在捕对虾的男战俘。因此，她在锡浴缸里宣布了亲密接触时的卫生要求，并对乳木篱笆两边的各色人等表示了鄙夷（当然篱笆是通了电的，还有萝卜头们[1]牵着凶狠的狼狗在巡逻），她一会儿背诵韵文，一会儿又朗诵断断续续的赞美诗，正式发布指令，警告大家要警惕皮肤黝黑、毛发茂盛的情人。我们应该先唱上一段《浴室颂歌》，然后我再给你们讲述一段警示故事，她说，故事讲的是婴儿在洗澡，或者说在潮水中清点婴儿，就像这儿所发生的；哦，我见过这些婴儿，双目失明，在血红的云霞中驶向拜占庭，这些都是从一文不值的贱货两腿间爬出来的无人认领的欧亚混血儿。比如米德塞斯大学某专业的工程师，或许很快就会问谁是婴儿Y的父亲。真的，那个小名叫“外”的婴儿，头上长着直直的黑发，永远也进不了英国，这还没在谁身上发生过呢。我曾经做过社工、在浸信会。我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溺死，当然了，我是说溺死他们的希望。

萨曼·阿巴斯：

嗯，告诉你吧，实际上我就在沙滩上捡这些瓶子，我发现瓶子里装着小纸条，我把瓶子带回家给罗莎蒙德，我太太，她可爱管闲事了，我们把这些瓶子拿给隔壁的老约翰·李和菲洛梅娜，他们都是上了年纪、有学问的人。在我看来，在他们这个年纪，阅历比学问要多得多，不过罗莎

① 抗战时，中国人管日本鬼子叫“萝卜头”。

蒙德说他们认识古英语，因为她在他们家里看见过各种各样的装饰物、牌匾和盾牌，上面刻着“这古老的”或“那古老的”，约翰·李曾是位乡绅，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两个人都老掉了牙，离死不远了，对他们来说，熬过这场战争并不容易，他们连东西都吃不下了，所以我和罗莎蒙德拿着瓶子和几斤黑市买来的发霉的大米到他们家去，老约翰·李说他已经几个月没有出门，花园里有什么东西发出难闻的气味，可能是什么动物死在那里，我们就对他说，下次碰到这种事不必客气，在那东西腐烂之前就找到它，告诉你吧，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腌起来或者做成咖喱，当约翰·李看了一眼瓶子里的字条，他大笑了起来，然后说他知道这些字条是从哪里来的，我和罗莎蒙德说我们不想卷入什么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刺探情报之类的事情，这么说吧，我们还希望脑袋在脖子上好好待着呢，但是他说，别害怕，这是多拉·容的东西，你们了解多拉的，这就是她说“我的天啊”的方式，我现在就能听见她的声音，约翰·李把耳朵贴在瓶子上……不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放声大笑，第二天早上，约翰·李和菲洛梅娜双双中毒，肩并肩地躺在那里，死了……而我至今也坚信他们是吃了发霉的大米……你也许会说不是每天都有人自杀吗，你看，我也开始引经据典起来，都是受了多拉的影响，不过对李家来说，情况一定是糟透了，因为他们听说日本人准备征用他们的房子，尽管我们主动邀请他们搬进我们家住，而他们，年纪这么大了，并不想搬进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又或许是因为罗莎蒙德太爱管闲事了，我早就告诉她，她的爱管闲事已经造成了很多人的自杀，总有一天，我也会因此而自杀的，因为说了这些话，我不得不抓住她的双手，阻止她扇我的耳光。可怜的李家老两口……我也不能肯定他们是否结过婚……也许是为了两个人的方便而凑在一起过日子的吧……他们也真是穷途末路了。老约翰以前总是喜欢身边环绕着女人。他一度非常富有，战事刚刚爆发的时候甚至连日本人都以为他和犹太人银行有什么关系，而没有找他的麻烦，但是李家两口却很快就花光了他们所有的钱，所以我觉得也许他们一直以来就打算

这样做，他们从我们的黑市订购大米、鱼、鸡，和我们吃的最后一顿饭简直就是一场盛宴，大蒜炒鸡块、清蒸鱼、莲蓉包。后来我们还听到从他们窗户里传来了音乐声。罗莎蒙德说她看见他们在跳舞……

第二天，我们把瓶子都扔回了海里。不过我们弄清了一件事，那就是约翰·李并不识字，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知道这些字条是多拉写的？罗莎蒙德说，人快死的那一瞬间，一下子会什么都了然于胸。我说，罗莎蒙德，我觉得……从她的眼神我看得出她又要扇我耳光了……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约翰·李说他实在是太累了。因为这些限制和拘禁，因为没能到达上帝应许之地。他想要结束这一切。战争结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了一本字典。

雷金纳德·利特尔顿“教授”：

在有些文化活动的背后有一种生物化学方面的原因……噢，这是千真万确的，在沦陷期的第一年，有一种舞蹈狂热。就好像人们不愿意忘记他们还可以跳舞，还能像往常一样生活，虽然大家都是偷偷地在跳舞。不过这只是一种与物资匮乏相关的发泄式的狂欢，尤其是当大家都吃着发霉的大米。我不相信有人能自信满满地说在大瘟疫的时候，由于饥荒，吃了感染了病菌的谷物，跳舞狂热也曾流行一时。那只是因为吃了不洁的食物，人们才摇摇晃晃、左摇右摆。嗯，结论就是这样的。由此可知，那种死亡之舞变成了一种宗教和文化神话，这是可被推论出的论断。



阿纳尔多来到了九龙这边的一个海军造船厂，他们用一艘登陆驳船把他运送到了香港岛。他身上的衣裤肥大而褴褛。当时正值隆冬，他不停地打着摆子。他们向着汇丰银行大楼走去。那里挤满了人，如果有家人认领，他们就能获得释放。潜台词就是：没有家人认领的就只能回到俘虏营，继续劳役，等待死亡。当时在黑市上购买家庭的交易掀起了热潮。弄来伪造的证明文件。他坐在岸边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人们拼凑出一家一户，就地驻扎，把名字写在一块纸板上，互相讨价还价。他斜倚在一根柱子上，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没人来认领他。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他眼巴巴看着囚犯们和其他人团聚一堂。团聚变成了一件怪异的事情。相认的震惊。我们要亲吻吗，还是拥抱？事实上却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一天又一天，人群的队伍在缩减。有个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英国妇人四处游荡，对着人群大声呼喊。他只有叹息。他吃着定量配给的食物：一些看上去油腻腻的丸子。还是扔了算了。怎么吃得下。简直令人作呕。已经是第三天了，剩下的人已经为数不多。日本宪兵回来了。有传说要把剩下的人都关进深水埗区俘虏营。下午时分。他看着那个头发花白的英国妇人在一个水罐里浸湿自己的手帕。那妇人透过破裂的眼镜盯着他看。刹那间，仿佛一缕阳光点燃了他的希望。

——是你吗，多拉？

——是啊。你是谁？

——阿纳尔多。

——真的是你吗，阿纳尔多·卡斯特罗？

——是我。

——上帝，你看上去糟透了。

——你自己也不怎么样啊。

他的体重降到只剩下七十五磅。看上去就像个侏儒顶着个大脑袋。胡子拉碴，满身虱子。她穿着一件满是破洞的护士服，像件束缚疯子的

紧身衣，一双细长的手臂笨拙地舒展开来。她的头发剪得很短，看上去像是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她解释说日本人之所以释放了她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佬。他们两人笨手笨脚地拥抱着，好像在跳舞一样，互相抱住了对方。日本人只好耸耸肩。打开了门锁。这疯女人，省得还要为养活她浪费粮食。

茉莉在外面接他们。她说她已经在那里等了三天，因为没有证明文件，他们不让她进去。他们本想拥抱，但人行道上躺着个死人，于是他们决定往前走。她看上去老多了，脸色凄苦，皮肤黝黑，在她的微笑之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游弋。

——女孩儿们还好吗？

——哦，当然了。

——那么我们要走着回去了。要跳探戈的卡瑟行走步了。你还记得卡瑟行走步吗？我们在和平饭店跳过的，当时炸弹正落下来。

——不记得了。

——你当然记得。好时光还会回来的，茉莉。

她对着他满脸堆笑。再没有别的男人能让她有这样的感受了。她决定先不和他说卡维塔的事情。树上的叶子旋转着，坠落进海港。

* * * *

阿纳尔多和容氏一家在薄扶林道分到了一处住所。这正是他之前被拷问长达一年半的那所房子。他们擦掉了厨房和浴室墙上飞溅的血迹。环境还不错，从房间里看出去，下面是一个公墓，再往下就是溪流。不过房间里没有家具，日本人把所有能当柴火烧的东西都搬走了。没有电、没有取暖的燃料，也没有水。他们只得从山脚下一个中国人村庄的一口泉眼里取水。村里人要他们付钱才能取水，看着身边那群厚颜无耻的家伙，阿纳尔多真想用皮带狠狠地抽他几下，但是他突然意识到，要做这样的

争斗，他根本不是个儿，他的手臂软弱无力，他必须用所剩无几的力气把水运回去。他真希望自己有支左轮手枪，但佩枪的日子已经是陈年旧事了。随他们往水里吐唾沫吧，他现在根本不在乎，在萧瑟的秋风中，他们用手指戳着他的口袋，不怀好意，而他却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像个苦力一样，努力让挑在竹杖两头的两个水桶保持平衡，那些人则在一旁嘲笑他，不过总有一天，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混乱之中，他一定会带着一支汤姆森冲锋枪到这里，看看到那时他们还敢不敢嘲笑他，他敢说，到时候这些人会一个个都不一样。但现在他只能学着怎样保持谦恭，每天爬下山来取水，直到那群人厌烦了嘲弄他的游戏，也就不会再理会他了，他还看见公路上停着日军的卡车运输队，车上装满了古董家具，都是日本人准备用来当柴火烧掉的，有一天，他看见车队那里只有一个锡克族巡逻员在看守。这个巡逻员正是以前在副总裁家当门卫的那个人。

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摸上了公路，他知道在戒严时间出来自己有可能吃枪子儿。他很紧张，神经绷得太紧，感觉有些晕眩。但是如果没有木柴他们就没法活下来；他们不能生吃大米，也不能把抓来的耗子生吞活剥。公路就在他的脚下，陡峭而黑暗。在公墓里，他觉得自己看见棺材浮现了出来。探照灯扫射着山坡，把黑夜照射得如同白昼一般。一片漆黑之中，突突作响的柴油船在海岬来回逡巡。他腰里别着一柄自制的羊角锤，当他拔出锤子的时候，手臂不停地颤抖着。他看见那个巡逻员来回地走动着，手里只拿了根手杖。他知道这个锡克人可能当过警察，知道如何格斗。他向后躲进阴影中。那个巡逻员走到最远处，然后转身回来，而他则计算着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他松开了第一辆卡车的手闸，但卡车没有移动。他蹲下来潜入了驾驶室，等着脚步声渐渐靠近，然后就听见了靴子刮擦沥青地面的声音。他已经准备好攥着锤子扑过去。但那脚步声又渐离渐远了。他爬出了驾驶室，用肩膀顶着后车厢挡板，卡车动了起来。开始动得很慢，几乎难以察觉，但是很快就有了加速度，

一边滑动，一边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听见那个巡逻员转身追在卡车后面奔跑起来，边跑边大呼小叫、骂骂咧咧的。探照灯追踪着滑动的卡车一路冲下山去，最后撞上了一堵矮墙，冲进了水塘。阿纳尔多跑到最后一辆卡车那里，从帆布底下抽出了一些柚木家具：精雕细刻的龙，小巧的凳子，清朝的脚凳。他把这些塞给已经面如土色的维吉尔，维吉尔穿着睡衣，抖得像筛糠一样，腋下夹着一支羽毛球拍充作武器，他本来根本不想参加这次行动，却鬼使神差地同意了。维吉尔一把抓过那几件家具，拼命朝前跑去，从早年在重庆那时起，他这辈子就没跑这么快过。

那天晚上，他们煮了花梗和碎米，美美地吃了顿热乎乎的晚饭。他们还听见从山顶上传来那个巡逻员被日本兵毒打的哭喊声。

三天后，我开始到北角的日本军官俱乐部上班。我要在舞蹈乐队里演奏单簧管，和我一起的还有敲鼓的“比利小子”苏萨、弹贝斯的米奇·罗恰和弹钢琴的海梅·吉梅内斯。市民切分音演奏家。是用长崎的一处地名命名的。我们认出了那些来俱乐部的人。我们在上海就认识的一些女人。法国女人、欧亚混血女人，和日本人一起跳舞。我想如果她们想要跳舞，那是她们的事。她们穿戴得非常华贵。有些还带着孩子。大多数日本军官喜欢孩子。所以我派伊尔玛和斯特拉去见野口指挥官，他们一起去了一艘战舰，回来的时候带回很多袋面粉、糖，还有足够我们吃的萝卜。但是随着战事渐渐不利于日本人，我们的日子也开始艰难起来。有天晚上，海梅·吉梅内斯……你知道，战前，海梅是个拳击手……那天晚上，海梅没有向一个步兵或诸如此类的什么蠢货鞠躬，他以为自己能应付过去，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周围已经是一片喊叫声，一柄刺刀插在他的胸前，血咕嘟咕嘟地冒出来，溅得我满身都是，那名步兵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我一把扶住了海梅，而他在我的怀中，已经断了气。哦，你还能怎么样？把他抬起来。血已经不流了。背着他。为他找个送葬的。

但是他明白，唯一可以免受羞辱的，就是那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因为沉默就意味着说谎，有一天，他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这么说的同时也明白换肤的昂贵代价。他只有乐器，只会演奏乐器，而那些女人们继续跳着舞。后来他把我的母亲和我所有同父异母的姐姐们都送走了，他花了一大笔钱买通了垃圾船船长，我的家人们从港口溜了出去，逃往澳门，澳门当时是中立地区，他知道，即使被逮住了，他们也会无恙的，因为日本人喜欢孩子，他告诉茉莉让孩子们待在甲板上，尽量让他们在甲板上爬行、奔跑。当事态变得更糟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就是这些了，同时他敦促多拉和维吉尔一起一直待在医院，因为医院还是比较安全的。他注意到舞场上的女人们看上去更加苗条和漂亮了。她们变得几乎有些傲慢，似乎物资匮乏和危险反而使她们肆无忌惮地轻佻起来。第二天早上，有架飞机飞到了垃圾船的上空，俯冲下来，又拉平，然后又飞了回来。女孩子们玩耍着，挥着手。飞机一次又一次飞近垃圾船。这使船上的蝙蝠翼船帆上下摆动着，就像阿纳尔多的心，在他生命的逆风之中忽忽悠悠的；这些女人啊。他被她们的背叛弄得神情恍惚。

他朝医院方向走去。维吉尔或许已经知道他们是否安全到达了。这个晚上有些闷热，空气中充满着花香。四周静悄悄的，只听见巡逻艇发出的汩汩的声音，那艘巡逻艇在水面上不停来回扫射着探照灯。他在大门口出示了通行证，当五楼的警卫朝他叫喊的时候，他又出示了一次。他要求见维吉尔·容。他们指向了走廊的尽头。医院里黑乎乎的，即使有亮着的灯，也因为电力不足而忽闪忽闪的。他找到了那个房间，维吉尔的银丝边眼镜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感到疲劳。他在那儿坐了一会了，

翻找着抽屉。他找到了一块巧克力，于是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食物最好还是储存在胃里。他听到有些声响，于是透过门上的舷窗朝外看去。一束明亮的荧光灯灯光在门前闪耀着。阿纳尔多无声无息地进来了。两个人面对着一张手术台弯下腰去开始了对血肉之躯的加工。一张面目全非的面孔对他们笑着，嘴唇翻了起来，鲜血从破裂的皮肤里不断渗出来。外科手术医生和护士正在低声说着什么……他们为自己手术刀下的这个怪物营造了一个充满温柔和关怀的气氛。阿纳尔多在一旁看着。一个白色的带抽屉的柜子、一个搪瓷盆、毛巾，还有一个痰盂。当他们动手切割并在皮肤之下摸索的时候，阿纳尔多不得不背过身去，然后又转身看着。病人的眼球从眼窝里弹出来，然后又被轻轻地调整了位置，就像两颗生的、没有破裂的蛋。他们缝合了嘴唇上的手术切口……然后，一定是感到身后的阴影里有什么人站着……那医生转过身来。那人可能是维吉尔，身高和体型都差不多，不过他戴着口罩和帽子，还有一副沉重的护目镜，护目镜上发出一束光线，一团柔柔的，模糊的泛青的光。他一只手拿着一副镊子，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块血淋淋的绷带。你在这里干什么？这简直太离谱了。卫兵来了。

他回去了，并没有得到关于茉莉和女孩们的消息，但却难以忘记所见到的那一幕：荧光灯、口罩、鲜血，以及他认为他从护士眼中看到的内疚。他无法忘记那房间的简陋，伸出的双脚，地板上令人作呕的废弃物，随心所欲的即兴操作。他进屋后，那怪物转过脸来看着他，脸上鲜血直流，但面露温柔，在闪烁不定的微光中飘浮。他回到家，面对空荡的房间，跌坐在稻草床垫上，把脸埋进了双手之中。他感到他自己的血肉也将离他而去。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有人急切地敲门。五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冲了进来，他们告诉他要把他赶出去。他只有两分钟时间。他认出了五个人其中的几个。他们都是那个村子的人，而且他们找到了枪。他绝不会忘记他们的面孔。

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屋顶。我记得那层沥青的壳子，熟悉的烧饭的味道，小便的味道，还有屋前那座灰蒙蒙的山。我总是被逼着跳跃，滑过沥青外壳的边缘，摇晃着落在黑乎乎、黏糊糊的断裂层上。跳！别多想！这就是父亲对生命深信不疑的态度。但还有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欣赏的更显雄心壮志的东西。风化的水泥上有斑斑血迹。在我们家屋顶的这个小小角落里，你常常不得不踢开一些废弃的瓶子、腐烂的衣物、狗屎，有个中国土匪曾在这里被打个半死，然后就在储水箱旁边被身首异处了。



战争之后每个人都中立了，父亲说道，语气中隐隐有些嘲讽。一切都发生在这张照片拍摄之前没几年，你可以设想，相机后面那冷酷的雄心，在我心中也播下了凶残的种子，我被定格在德国光学镜片中的聚焦框中，斜眼回视，思考着可怕的未来。

也许我就是日本人。

重建

你都看见了，战争是如何拖慢我奋斗的脚步的。

我漫步在香港街头，脑海中捕捉着快照，这时战争横插了一脚，打乱了我的步伐。但是现在，回到了和平时代和无所事事的状态之后，我又恢复了和平时代的游手好闲，回味着稍纵即逝、旋转于香气之中的往事踪迹。

眼下，我正忙着跟别人讲话，可惜声音不是我的，几杯啤酒下肚，再加几杯威士忌解酒水，大学的大楼在眼前倾斜起来，还有墓一般的现代和古代语言系一会儿自转，一会儿公转，发出循环往复的声音，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就在这座建筑里讲述着过去，讲述着历史中的天然艺术品。研讨会的主题是：翻译的局限。有个不停眨着眼睛的女孩，带着一口美国口音，坐在我的对面。我们把名字打印在卡片上，折叠一下，放在自己的面前。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尔。从她身后的窗户，我能看见秋风拂动法国梧桐的样子。给风神这么一搅和，研讨会莫名其妙地跑了题，最终毫无头绪地结束了发言。当时，我正在谈论中文的语态，谈论如何翻译痛苦。难道心灵上的创伤激发的是虚构，而不是事实？之后我就完全偏离了思路，思绪穿过历史，在可预见的历史轨迹里漫游；我看见了扭曲的铁轨，烧焦成碎片的领带。我看见砍断的人头，烧焦的照片，还有幽灵的鬼脸。我开始谈论传响。谈论逝者的声音。童年时代，我就是在这个大楼里第一次有了这样的体验。感应回响：一种丝绸通道

般的声音，由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发出，再通过另一个器官传输。逝者就在我们体内，我说道，以古代语言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古代语言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语言之中。正像通过肺部我们能够听见心脏的跳动。传响就是一种分离，如果我们对它敏感，它就会回到我们心中；被埋藏的血亲关系。但如何才能解释处于生、死两界之间的种种存在？我无法揭示这个神奇的境界。我不在这里！我大叫道。这时，克拉维迪亚·恩格尔赶紧插话，开始谈论音乐和回声，不过她也狠狠地瞪了我几眼，说明我已离题太远，没把话讲清楚。幸运的是，人们逐渐开始有所领悟，不过，我还是不提为好。当然，令人尴尬的是有人真的感到了绝望。正如有人所说，这些事实令人目瞪口呆。

也许我已没有必要再去重复我已经瘫痪，过去，如果需要做出决定，但却遭到无限推迟时我母亲也会出现同样症状。她会不时出门，来到田野与燕子为伴，筹划着她的小花园，探索着她的空间，并把这些都圈起来，不允许别人窥探。这种事情我早就说过，她会神秘兮兮地这样说。

也许我没必要讲这些特点都来自维吉尔·容。多拉·西德尔身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她只相信实际行动，还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健身教练温特伯勒，他给她讲述游牧生活，使她获得了解放。七十九岁时，她毫不在意人们注视的目光，伴随着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乐曲，和一位比她小很多、皮肤黝黑的男人一起，磕磕绊绊跳了一支华尔兹，让满船的英国人大吃一惊。

奶奶的死穴。温特伯勒先生。

也许我没必要提及我的家人中有一半大都生活在压抑和拘禁之中：

基督教青年会

遭围困的城市

寄宿学校

俘虏收容所

医院病房

教室

所以，务请谅解这种占领。我相信这是自传辞令，在揭示的同时也在隐藏。虚伪的辩解。

克里斯托尔·谭在我的对面坐立不安。

最后，我的发言变成了单调的嗡嗡，我感到浑身不自在，在愚蠢的现代性面前，人们想将各种异类连接起来，但却徒劳无益；这些照片……我内心的震荡。我把浮云也拉进了话题；香水微熏；古代事物的了解程度。这些鬼东西。

我从公文包里取出舅舅的书法，这是我最后的杀手锏。

这些就是我想要表明的。传统就是操纵杆上的一只死手，我说。

听众毫无反应。这些事实并没给校内专家留下什么印象：这些桌椅和那张乙醇组合白板都无法使他们接受我的看法。传响偏离了它的语境。我冒犯了这些听众。或者说我自己声音之外的那个声音冒犯了听众。克拉维迪亚发表了一个成功而夸张的答谢词，在她的带领下，听众们稀稀拉拉鼓着掌，而我则拿到了我的信封，里面装着金额不菲的现金。

在他们走向酒吧的路上，他整理了一下胸口的衣袋，也就在此时，那个叫做克里斯托尔的女孩找到了他。

——不管怎么说，她耸了耸肩膀，那幅书法真是非同一般。

——你也懂书法？

——当然。知道吗，在大学里，老头子们书写书法主要是为了能在自己的专用房间里抽烟斗或鼻烟，不过我倒是头一次见到像你这样的人涉猎书法。你自己不写书法吧？

——不写。

——这幅字……(她用留着长指甲的一根手指慢慢拈出一张纸)……是仿的何绍基的字体。看到了吗，这些滴成一团一团的墨迹？这是因为何绍基写字时惯用悬臂。他自己写的字看上去笔法涩拙，就好像他很难驾驭整幅字的布局似的。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典型的自谦风格。他是在尽量避免炫耀自己的博学。

——你是书法专业的学生吗？他问。

——我是搞民族志的。我在这里待到三月份，然后就飞回美国。

他刻意把克里斯托尔从通向酒吧的路线上引开，走到一张小桌子旁，他收起文件夹，将它塞进公文包里。他告诉克里斯托尔他正在从事一项搜寻工作。

——唔，她搓着双手，开心地说。我最喜欢搜寻了。

他正在犹豫这个话题该讲多深。

——这些中国书法，他说，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已经喝得太多了，而酒吧服务生还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先生，还要一杯吗？

——我真不能再喝了。

——哦，再来一杯吧，克里斯托尔说，我来请你。

——可不能让你为这里的酒买单，克拉维迪亚在酒吧那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约翰尼，都记在我的账上吧。

——好的，夫人。

——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些书法帖子不断出现在他的遗物中。我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但一无所获，后来我就来到了香港，在我舅舅的物品中发现了更多的书法。

——你舅舅也过世了吗？

——没有。他在佛罗里达。

——和过世也差不了多少。那么。你是从你舅舅那里把这些书法偷来的喽。

——不能这么说。他知道我在写书。所以他留了一台打字机、一本字典给我，有一天我在浏览字典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夹着些东西。当时我没在意……也许是他自己的笔记。但那些东西与我在我父亲航海日志中发现的书法相一致。

他坐在那里，身体向后靠去。克拉维迪亚正望着他。他举起酒杯，她点了点头。

这时克里斯托尔倾过身来，小声说道：我们是有关系的，你和我。

——是吗？

——我父亲。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朋友。多林·谭。你们常一起去看电影。

——哦，是的。他还记得。所有那些金发美女都给绑在柱子上，此时此刻，丛林正悄悄推近。他的……你的家人……从事的是影视行业。

——我父亲还在干这行。他现在是制片人了。他正在制作一部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已经投资了四百亿港币，我觉得简直就是浪费。我想再仔细看看这些东西，克里斯托尔指着他的公文包说道。

他同意了。除了看到些勾勾点点，他对这些书法的研究毫无进展。他跟克里斯托尔·谭说，他私下怀疑遗产的秘密就藏在这些蛆一样的笔划里。他说他有个同父异母兄弟……然后就说起了梅布尔斯的事情，那人就住在他父母公寓的楼顶。

——这些字可能是关于那一家人的……说不定就是他们写的。

她看上去将信将疑。这反倒增添了他的信心，于是恳求她帮助把事情弄清楚。

这个梅布尔斯的字，她说，优雅洗炼，不可能出自一个乞丐，一个在楼顶上晃来晃去、笨手笨脚的蠢蛋。大家知道，天才白痴的举止中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才能；这种才干他们在模仿中自然而然地加以流

露。但是这些字好像经过精心雕琢。文字不是为他准备的。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过几天，我要把这些还回去。你住哪儿？

他摸了摸胸口的衣袋，黑暗中尝试了一下。君悦酒店，他说。

她看上去有些惊讶，不过那也许是因为她腿上的文件太重的缘故。

现在，我得离开了。

她悄悄地溜了出去，没人注意到她，她心中明白他只是在利用她；他利用所有的人来实现他的梦想。她并不生气；她只是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感兴趣；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她父亲就是。

我看着克里斯托尔穿过双重玻璃门走到电梯那里，我谨慎地拉开一段距离跟在她身后。我乘后面的一部电梯下了楼，继续观察她……楼下的气氛全然不同，一场舞会正要开始。她在前门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一部加长的绿色车子停在她面前，她迅速地钻进了黑乎乎的车厢。我回头走上台阶朝后门走去。正在此时，一个高挑身材，衣着华丽，上了年纪的女人靠近了我，碰了碰我的胳膊肘。小伙子，她问，怎样才能从这座楼里出去？

天开始下雨了。地上的水坑一闪一闪，反射着冷冷的光线。我在瓢泼大雨中一直游荡到黄金别墅，感觉神清气爽，一身轻松。在黑乎乎的房子里我闻到了上一餐吃的咸鱼和辣豆腐的味道。没有其他人的气息，房子并未遭到盗窃，我感到十分欣慰。走廊里，一道绿光一闪一闪。威利舅舅有五个电话留言。

♪—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我猜一切都还顺利吧。你查看房租账单了吗？别搞错了。

♪—还是没你的消息，你一定觉得我一切无恙吧？他们给我动了前列腺激光手术，把我肚子里的病灶清理得妥妥当当；我现在容光焕发，连屁股眼都放射出太阳的光芒。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都能腾空升

起。斯皮尔伯格也许应该为我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拍摄一部电影。

♪一嘿，如果你实际上没住在那儿，要记得一直把警报器开着，如果那个太难弄，你就到汤米·李那儿去，让他在那里放几只看门狗。你的书写得顺利吗？辛迪·林说你在澳门。明天她还会打电话来。老天，我真想念我的高尔夫。下周我有两个集装箱的东西运到那所房子，告诉他们就把东西放在网球场上，好吗？是从这边的贝尔公司运去的直升机零部件。总有一天我会带你坐直升机到沙田去，我们能在航线附近的松林后面看到情人们在做爱。我也想念这个。你可怜的舅舅那套家伙什儿被他们弄走了，连个调换的零部件也没有啊。

♪一呃。还是我。你可能觉得我上一个电话充满了自怜自艾。在医院待着你就会变成那样的。真该请这些护士吃耳光。说起那个奥伯龙。他总是欠账……按非洲时间上班。如果你听到他那里没声音了，就用钥匙打开他房门，进去。如果他在的话，房间里一定吵得要命……就算他睡着了也不消停。告诉他我要卖房子了。

♪一有时间的话给我回个电话。我知道你很不愿意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受到打扰。知道吗，要过日子用不着那么艰难。我早就说过，你随时都可以来为我工作。帮我换掉合同中的英文法律条文……我看香港回归以后，我们所有的合同都要用中文起草了……当然了，翻译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内容无法完整地翻译出来……不过就像从事救捞行业的人所说，有漏洞才有好处。大家都开心。搞翻译的话我付的价钱可不止一个字二十美分。看看在我们法律部工作的那些家伙吧。他们整天坐在那儿，一有什么想法或写出了一段东西就站起来乱叫……啊呀，啊呀，啊呀。你知道他们拿多少钱吗？

磁带只能录到这里。要不是我很了解我的舅舅，一定会感到伤感惆怅的。他很可能给十几个人打了十几个同样的电话，因为就在我听电话录音的时候，我看见汤姆·李的管家牵着两条淌着口水的洛特维勒牧犬

走了过来，吉米·陈大声嚷嚷着找寻他的总门钥匙，有位包先生打开了锁着网球场大门的铁链，站在一辆卡车的后车斗里挥着手。这个地方一时间充满了灯光、犬吠和车辆的喇叭声。

我上楼到书房。三楼右边的房间。迅速瞄了一眼那些书。我还没有认真地看过这些书。我挑了几本医学书、一大部关于继承法的法律书，统统塞进了我的旅行袋。我又回到楼下，把我的文件装好。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那辆卡车的大光灯抛出了弧形的光线，转动着它的小型塔吊，吊起了集装箱。吉米·陈正盯着我。他说话大舌头。

我们总西夜里干活，他笑着说。香港西个铺夜城。你不等容舅舅回来吗?

吉米就是法律部的头头。

遗嘱附录的定义

---

1. 此处，遗嘱附录一词是指一本小册子。
2. 遗嘱附录的正确解释。
3. 遗嘱附录与遗嘱的异同。
4. 在此处遗嘱附录定义中“仅”的含义。
5. 遗嘱被称为主要遗愿，遗嘱附录是次要遗愿。
6. 遗嘱和遗嘱附录就像大轮船和小艇。

亨利·斯温伯恩，关于遗嘱以及最后遗愿的著作

（伦敦：1635）

我父亲有没有留下一本小册子或者可以救命的小艇?

去问吉米·陈。

去问威利舅舅。

酒店

你父亲这一辈子大半时间都住在大酒店里。你也遗传了他这种毛病，但却负担不起。

你在走廊、宴会厅和餐厅之间逡巡，尽管酒店员工很快就对你特别留意，总能认出你来，你却尽量不动声色，少言寡语，一知半解，于是酒店工作人员很快就不再理睬你。但是大酒店不仅仅是没没无闻，大酒店总是在变化，人来人往、人流涌动，总是试图创造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温馨的旅途休憩站、多姿的生活汇聚的港湾。你坐在沙发里，抽样尝试着香水的香气，雪茄的烟味，记住人们的面孔，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男士洗手间，你把冒着蒸气的热毛巾敷在脸上，在前厅接待室，有人把你的外套刷净、整平，而在宽敞的大堂，无须借助任何语言，只需一支正在演奏的管弦乐队，就足以证明，只要有音乐，生活就会变得很时尚，你的父亲就这么说过，家里刚装上电话机，他就把电话放在钢琴上，打电话给他的阿尔弗雷德堂兄，现在已经坐到轮椅里了，父亲为他的阿尔弗雷德堂兄弹奏那些老曲子，让他跟着音乐感受痛苦和欢乐，直弹到他痛哭流涕，难以自已。而当你的艾尔达阿姨在大教堂的午夜弥撒中演唱朱利奥·卡契尼的单声部歌曲圣母颂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感到怅然若失……那些吝啬的商店老板、职员，那些卑鄙的经理们，都会抹着他们的泪花……而你父亲，处于感动不已与无动于衷之间，在教堂后面抓住了一个小偷。不过你母亲就从来不哭，于是你得出结论，

她并不渴望生存，你的这一印象从未改变，伴随了你的一生。

你坐在包厢里，点了饮料，写着信。单独旅行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但你发现，在你昨天拿着一串名单开玩笑地打了无数电话，调查天主教会，对其百般诘难，作出了那些危险的探问，从而引起了别人的猜疑之后，这是保持镇静的最好的方法。但是保持镇静并不容易，尤其是刚刚才遭受了挫折，没能问出想问的事情，你甚至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打点行装，干脆离开，省省力气。还是承认现实吧，你的家族成员大多数都短命，往往都是因为某种愚蠢的嗜好而突然毙命。



镇静。你在包厢里写着信，外面又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夹着骤雨，犹如长长的幕布，拍打在玻璃窗上，汇成汩汩细流。你脑子里在想着你父亲的物品中那些包在丝绸里的纸张……一捆捆颜色泛黄，薄如蝉翼的船运单，上面用紫色的碳素墨水写满了字，还有英国婆罗洲木材公司的表格，胶鞋的装箱单，威灵顿长统橡胶靴(颜色晦暗、涂了清漆)，雪地靴，还有胶底帆布鞋……他自己的一张照片，一个身着水手服的小孩，左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于是你想起蒂费涅·德·拉洛希[1]的话，他是十八世纪中期第一个构想摄影的人，他讲到他的愿望就是将一块丝绸浸泡在某种敏感的物质里，然后再把活动影像固定在上面。他坐在大酒店的大堂，左手抽搐，右手搭在一个女人的膝头，脑子里就在想着这些事情。

① 蒂费涅·德·拉洛希(1722—1774)，法国作家。

但是，等等。有个侍者这时候正端着什么东西向你走来。

一个邮递包裹，你把包裹的纸板箱拆开，发现里面是一双用五颜六色的羽毛精致刺绣的白色丝织长统袜。你把这双袜子摊开在桌子上。还有一封信。不用读你就知道信里写些什么。我爱上一个人了。她本来用不着一开始就这样写，不过事后想来，这种早早到来的致命打击，倒是对透彻理解和斩断因感情脆弱而引起的纠缠不休有着奇效。

卡门·吴。一个曾让我签署一份假婚姻证明的上海女孩。她很拼命，你可以想象得出，早些时候她做模特，然后搞摄影，折腾得精疲力竭，却无人赏识，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白费力气，在巴黎过着像吉普赛人一样的流浪生活，彻夜派对，因为猫步走秀而浑身酸痛，在灯光、音乐和奉承中，将欲望与权贵类的东西混同起来，摸不着，注视，被注视，再注视，迷幻中空虚的旋转，一小片一小片半透明的窗户让她心旌摇荡，步履振颤，眼前一张张面孔肿胀起来，和其他的面孔融合为一体，形成一片粉色、红色的海洋，最后，精疲力竭的她坐在休息室，小口啜饮着健怡可乐，吞下一些粉末，而他们，端着支票本，淌着口水，就为了能和她说上几句话，他们想象着自己的情人身份，说话的嗓音深沉而略含慵懒。卡门。阿门。

你把那双用柔软、多彩的羽毛缝制的长统袜在手中揉成一团又展开。你把它们展平，又卷起。把它们举近鼻端嗅着，你相信你的祖父也是这样做的。非常讲究地把它们放在盘子里。别的用餐者惊异地望着你。此时此刻，你觉得自己解开了一些缠绕不清的东西。传响的狂喜。你将杯中的马提尼酒一饮而尽。你到前台询问关于这个邮寄包裹的事，却一无所获，只是被告知有人已经为你支付了酒店账单。没有差错。没有细节。大堂正举行一场婚庆派对，相机闪光灯乱闪。世界在倾斜，人们纷纷滑落。

能请你再查一下吗？

支持阐释

安东尼奥?

这发音本身就充满着魅惑。

我的名字来自于那位迷途知返的圣人。

我房间的电话叮铃铃响个不停。我一直都不喜欢电话。那玩意儿就像是在空旷的恐惧苍穹下拉响的一种警报。我让铃声就那么又响了几次。拎起听筒。我能听见大堂传来的嘈杂声。我能记住所有大酒店内大堂特有的声音。文华酒店的大堂是出租车的声音和海港吹来的风声，而富丽华酒店的大堂则充满着印度门童的哨声。港丽酒店耳垂形大理石铺设的大堂外是劳斯莱斯汽车殷勤轻柔的靠泊声，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把肖邦演绎得冷酷无情，像刺耳的金属声，而君悦大酒店的楼上则有个慵懒的菲律宾三人乐队，瓮声瓮气地演奏着“鸳鸯茶”，我敢肯定我认识这个乐队的成员，几个长相峻酷的男人，双手僵硬，很多年以前常在周末到我家来，喝着啤酒抄写我父亲的乐谱。飘来浓郁的咖啡味。

喂?

是克里斯托尔·谭。

喂? 她又说了一遍。我点燃了一根细长的雪茄，她一定在音乐声中听出了我点烟的声音，感觉好像雪茄的烟雾就在她的耳边升腾，于是变了声调。是的，她说道，是的，是她，克里斯托尔，她就在城里，想看

看是否能和我碰个头，她可以把那幅书法还给我，而且她在书法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等等等等。我听着她讲。我知道，当她说她在城里的时候，其实是在酒店的大堂，而且除了书法，一定有其他的事情。没问题，我回答。大约一小时后在游艇俱乐部一起吃饭吧。我洗了个澡，花了很长时间，把几罐子的浴盐都倒进了浴缸，在浴缸旁排了一排酒瓶，再往浴缸里倒了一瓶威士忌，然后全身深深浸泡在浴缸中，遐思翩跹。

我在酒吧等着，闲适地望着港湾里巡航的游艇，还有穿梭来往进进出出的集装箱轮船。我比约定时间晚到，但她来的更迟。我想起父亲晚年的生活，脖子上挂着双筒望远镜，窥探邻居、马匹、汽车、女人，仿佛他的生活就取决于一场游戏的输输赢赢，而这场游戏本身正在谢幕，因为回忆，他两眼通红，手指不安地捏着小呢帽；他的一只手不停地颤抖；他说这是战争的创伤造成的，也是为了不让他的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么。中风以后他说话总是带着一丝嘲讽。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到我的寄宿学校，满纸训导之言；处理人际关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都是用复写纸打印出来的，为着将来备查。他并不期待我的回信。在休息室里，大家把来信像飞碟一样飞来飞去，我也并未领会父亲的语重心长。六年来我没有回过一封信，却在读盗版的萨德侯爵①，挖空心思思索着失恋救治法：一系列狂暴发泄的行为：放血、嗑药、运动、酗酒、学习、肢解、放荡、自我疲惫、殉情跳崖、电击治疗法。我爬到树上，听到自己的精神动脉咝咝流淌，无情地穿过支脉。向前，父亲总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学会厌恶爱。但他还是回到了母亲身边；最后，当他意识到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就连习惯也无法恢复，于是他彻底离开。他总是给人这样的忠告：教育之后就是纽带，就是面临分崩离析，这种纽带也会永远地连在一起。不这么做，他就会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他和我，我

---

① 萨德侯爵，法国贵族、作家，创作有一系列的色情和哲学书籍。

们两人一起把这智慧的基因螺旋体一代代传了下去。父亲知道那些话都是讲给他自己听的，我只是一个被动听众。在悉尼，在我居住的艾瑟尔大街，他的电报塞满了信箱，给水浸湿，遭老鼠啮咬，给蜗牛围成了扇形。我并未遵从父亲的教诲，四处窥探。一小股哀怨的心情让我无暇此道。归根结底，你终要孤单一人。

但此刻，热血在回涌，澎湃在另一个人的体内：他记得克里斯尔是在他之后进来的，当时他正斜靠在桃花心木的吧台上，克里斯托尔的柔荑已攀上了他的肩头。她一口气说个不停，生怕停下来就陷入尴尬的气氛，但是他却没有在听，而是关注着她修长的双腿，看着它们变换着微妙的姿态（目光向下溜去），看着她的意大利丝绒面鞋子、旗袍领无袖上装，耳边呢喃着母校布林莫尔学院特有的磁性噪音。他从小就厌恶爱情，这种感觉至今挥之不去，促使他想找个借口溜走，他跑下楼梯，来到亭子里，挥手叫上一辆正在坡道上空跑的出租车。台风就要到来，天气又闷又热，整座城市仿佛是散发着热气的页岩，他知道，另一种思维，那个阴影，又回来触动着家族树的外皮．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它的形状，他想要亲吻她的足弓——为什么不呢？——就像潜艇在台风来临的时候潜入深水一样，他弯下腰来，感到大楼在摇晃，仿佛是防波堤护佑下的那些小船，甲板上的椅子也在前后滑动，立足不稳的侍应生伸长了手去，却没能抓住，这时他注意到她穿着银色的长筒袜，每个女人在台风到来的时候都应该穿这种袜子，能够测出电压的强度，她的头发里粘着黏黏的雨珠，像闪亮的钻石镶嵌在发际，先是习惯性地眨眼然后突然就转入了工作话题她什么喝的也不要或者只要一份香草茶但却把菜单递给了他他把菜单拿在手里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最后要了一份总会三明治和一杯啤酒他们来到了水泵餐厅安静而不失豪华的区域周围装点着起锚机和旧绳子还有几个“鲤鱼号”蒸汽机帆船留下的烟囱皮革陈旧的沙发咯吱咯吱作响一坐就坍了下去她调整着坐姿和手中的纸张解释说不

应从书法的内容上来理解一幅作品而是要看内容以外的东西而他却看见她上衣里面的蕾丝花边脑子里想的是每次在自己房间里想着她的时候对她的想象是多么的正确她的吊袜带是绯红色的他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喝上两杯在黑暗中踱步试图继续自己的梦境在梦中自己到处找喝的没想到喝下的须后水烧得喉咙直痛却无法扑灭自己的渴望……书法内容没多少分量，她说，而用典，前后关联和形式等在视觉双关上产生了混乱，就像……就像在风暴中航行，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撩人，他花了点时间才弄清自己是在哪个岛上，一个波利尼西亚美人从吧台里递给他一杯鸡尾酒，她的手腕上荡着一串贝壳，她身后彩虹般的船帆在风中啪啪作响，而他脑海里则想象着不同的画面，在一艘运鸦片的帆船上，她慵懒地躺在他的身下，而他则压在她的身上奋力冲刺，但是她设法让他明白文本空洞无物，只有文本的工具才能对它加以阐释，犹如插花，她一边说，一边啜了一小口饮料，这种静止的生命保住了他的欲望，他感到痛苦，继而展开了另一轮令人目眩神迷的失恋救治……这个，她说，就是作家希望我们能够思考的……一种无伤大雅的偏离；天哪，女士内衣设计师在他的淫乱驿站上大展雄图。所有的书法都由此起步，避开一切主题……主题必须透明，品位当然不高；所以才有许多与正题无关的准备工作，各种恋物情结……用八月捕捉的在峭崖边生长的兔毛制成的毛笔，用在高山上生长的松炭制成的墨汁，用鹿角熬出的胶水……总之，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就是表意文字，自成一体，像个地下室。一切都秘而不宣。

她向他眨着眼睛。

他听而不闻。埋头吃着他的总会三明治。其实他并不饿。几杯啤酒下肚，他生了一肚子气。他走神了，又神游天外了，他继承了这些比划，但并不想对此加以阐释。他永远都是遭人侧目的外国人，他们很想知道你是否讲他们的语言，是否过圣诞节，去火车站的时候是否需要他们给你指路……在各种思想出现常规性堕落，并且去繁就简后，这些迂

回只有一个结果，上不上床；阿纳尔多以前总是说，他只听管弦乐，他摇动耻骨弹拨他的乐曲，在他身后，生活中的一切鱼贯登场，就像这家俱乐部的舞者排成队，在舞厅门口打蜡舞池里不停旋转，1945 年，他们或在教堂外，或在小镇外，在碉堡里登记结婚，碉堡的墙上还留有最近几次遭遇战的弹孔，然后他们就来到这个游艇俱乐部，这里到处都是侍应生，透过破烂的玻璃还能看见漂浮在水面上的炮艇，他们在这里相拥起舞，茉莉舞步踉跄，和他一起舞向踉跄的未来，他们头上戴着派对帽，身边飞着派对彩屑，他看到她对一切已经毫不在意，诱惑、生活，她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抵抗……

瞧这个，天哪，克里斯托尔说道，这些松松垮垮的笔划……她用涂了指甲油的手指指着那几处书法，一只镶着蓝宝石的黄金手镯顺着她的手臂滑到了手腕……古人常说，这种运笔技巧很有风骨，可这些笔划就好像一堆猪肉和打蔫的猪耳朵；完全没有结构感……

古人不也说过，资深鉴赏家述而不作吗？

资深书法家也不会妄加评议，她笑着说。不过你如果仔细看看这里，就会发现些东西。书法家把这叫做“影子写作”。一种重叠。它亵渎了所有的智慧和传统。瞧瞧这幅，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如果你不能解读，你会觉得这种笔法很荒谬。你瞧瞧人们平常不大关注的这些可恶的跳跃，还有这些造作斧凿的运笔法。就好像他想让人明白他在历史中遭受的压抑就是他为荣耀所遭受的痛苦。不过他的说服力不够；他大多是自欺欺人。你看他每一行开头笔锋遒健，但笔势却逐渐减弱，显得松弛肥腻。如果泼墨挥毫的人胸有成竹，行文就会非常流畅。在这幅字里就看不出这一点。看上去，他正徘徊于表露与隐藏心迹之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而别无选择：为了维护形象，他只能选择用一种无力的笔法来展现自己。这是一种对内心渴望的赤裸裸的表现。

他的思想在徘徊。他的整个家族都对欲望毫无掩饰。他突然意识

到，他的同父异母姐姐们最坏的念头就是鼓动她们的伶牙俐齿对他唇枪舌剑，她们的妒忌之情溢于言表，你总能看到她们袒露着自己热烈的欲望……财富和名誉……两者总是形影不离……尽管她们毫不掩饰她们嫁的就是财富和名誉……当然也包含艺术……你看伊尔玛，她总是在抄抄写写，自认为自己很有艺术气质，当然了，她工作的商店卖的就是刺绣和餐垫，她自己也要绣很多东西，是个针线活的行家里手，看看伊尔玛吧，她在洛杉矶开设了自己的加盟店，并在工作过程中，嫁给了一个德州佬理发师，一个唱歌像佩里·科莫[1]的家伙，他在家乡德州的狭长地带有三十英亩地，那里狂风肆虐、飞沙走石，有一天居然挖出了石油，他开着凯迪拉克汽车整天往返于加州与德州之间，说什么要照看生意，而她的存款日渐增长，在微风习习的科德角穿着楔形紧身衣躺在亨廷顿海滩上，对了，看看这样的伊尔玛，你就知道自己猜对了，因为丹，这是那德州佬的名字，恰巧有三个老婆，住在美国各地，而加州的法律偏偏是不能容许重婚的，丹的照片上了报纸头版，紧挨着奥蒂斯·钱德勒[2]的照片，后者是那家报纸的新老板，你看，可以说伊尔玛已经做到名利双收了。再来看看维也纳，名副其实地嫁给了一个维也纳外科医生，一个和她祖父维吉尔差不多的家伙，维也纳跟着她的新丈夫搬到了萨尔茨堡，生了孩子，买下了中心广场附近的半排联体别墅，可以说维也纳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她丈夫卡尔是变性手术界的重要人物，一个积少成多的家伙，他的爱好就是一边阅读弗洛伊德，一边大笑，他，是的，可能是个反犹分子，所以有些独裁，维也纳在他面前不得不扮演成一只小老鼠，或者像老鼠一样谨小慎微、唯唯诺诺，有时她在家里甚至要打扮成女仆的模样，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她丈夫还说服她穿上一套小小的黑色制服，系着白色的围裙，因为他说这让他兴奋，你能想象得

① 佩里·科莫(1912—2001)，美国歌星。
② 奥蒂斯·钱德勒(1927—2006)，《洛杉矶时报》第四代发行人。

出，维也纳实施了报复，她存了一大笔钱，跑到英格兰和特林克·罗森鲍姆，号称“萨里莎孚”[1]，同居，终于做到了名利兼收。还有可怜的伊俄卡斯特，她拥有容氏在线公司超级油轮的救捞权，当这艘油轮在离开纽芬兰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伊娥卡斯特的丈夫，阿美利哥·莫雷斯，由于错误地计算了船只的减压而遇难身亡，可怜的伊娥卡斯特，作为她舅舅威利的替罪羊吸引了公众的诘难，承担了一切责任，当廉政公署通过沙特的保险经纪人对修复油轮燃烧排放对环境造成的灾害进行调查的时候，伊俄卡斯特表示愿意为纽芬兰人建造一座深水港作为减轻起诉罪名的交换条件。你还可以看看斯特拉，她一直想要写作一部家族史，现在却担任十三家公司的董事，还有个情人，水果商维琴佐，那是个真正的男人，有着漂亮的未切包皮的阴茎，这让她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

书法的书写者可能是女性，不过可能性不大。克里斯托尔说道，声音冷酷而粗鲁。

关于同父异母的姐姐可说的太多了，我大声说道。克里斯托尔用手拂了拂她的长发。她脚上穿的一双意大利鞋子也在地毯上做着相同的动作，来回移动。有时笔法很好地遵循着另一种传统，她说着，用鼻子深深地吸着气，她美丽的鼻翼泛着光泽。你可以把这叫做上海书法。我从未听说过，我说。但我已经联想到某种卑劣的、腐坏的玫瑰，藏在这幅漂亮华丽的书法后面那甜蜜的堕落腐化。上海是一座权力城市，她说，是光影和性欲都市。她的睫毛微微地颤动着；中国女孩谈到性的时候都是这副表情。不过，最重要的是，她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上海是个多雨的城市。中文中淫雨就是指连绵不断的降雨。可以看到很多和雨有关的东西，雨衣、雨伞。淫雨也是一个双关语，还可以指做爱。很多中文作家为他们的小说和诗歌取了这样的标题，比如雨巷，或者春日夜

① 莎孚，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女诗人。

雨，或者雨后彩虹。

所以说倾盆大雨实际上就是众神的便溺，他说。这下完全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好吧，也可以这么说，她说。此处的这种联系更多地是一种转喻。雨、尿、性，都公开地出现了。但是雨和性并非一个整体。后者根本就没出现过。

就好像隔着一个屏幕……

他的脑子又开始走神：

“这里有公共厕所吗？”那男人问。“我要去火车站。”十岁大的伊俄卡斯特，以为自己是在雨中骑游冒险，蹬着自行车带着那男人向前冲去。是有个屏幕；原始的一幕；一声尖叫。从那以后她就不太正常了，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女孩，邋里邋遢，魂不守舍，胆怯闪烁。在那个屏幕背后，暴力横行，就像父亲拔左轮手枪那样敏捷，她用一根手指抵住我的下巴威胁我，并签署文件否决了我的继承权。所以在伦敦的时候我只得乞讨，在音乐厅的后面找了个破提琴盒，用粉笔在小巷的地上书写下我的困境，伸出我空空的双手。

或者是雨伞，克里斯托尔把手掌翻转向下，解释道。顺便说一下，伞，就是雨伞，是分散或离散的同音异义字。

她把手掌向上翻转过来，又向下翻转过去。

注意到吗，他对鞋子、帽子极端迷恋，整天忙着刺绣、播种。针线活和播种。从堕落的最底层，他一步步提升着自己的层次，学会了彬彬有礼的委婉表达，他一直都徘徊于揭露与退缩之间，他的书法笔法正反射了他的自负。

克里斯托尔看起来得意洋洋。她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

和所有的书法家一样，他很善于伪装，不过还不止这些。他对自己

所揭示的东西小心翼翼、善加保护。一种预防法，预防措施。就像那些老旧的上海导游书籍，建议逛妓院时应该在雨天去，因为在雨天，在你之前光顾的、有隐疾的客人会比较少。不过看上去他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游戏。他受着某种煎熬。想要与人商讨，将其公之于众，或者，用中国人的讲法就是，商量，和大家一起变得品格高尚。

克里斯托尔整了整自己的裙子。不过他好像也在把什么事或人隐藏起来。

很难想象他已到了她父亲的年龄；也很难想象他也会有克里斯托尔那样的女儿，其书法造诣居然无与伦比。为了表达一种双向的善意，他打听了她父亲的情况。他还在制作那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她说，他用直升机航拍，用沙袋浸上汽油点燃，要拍出那种成千上万的尸体在河岸上焚烧的感觉。他又询问了她未婚夫的情况。哦，他太棒了，她两只手拍在了一起。说这话时她显得那么天真无邪，然后又说道：我想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幅书法的作者是谁。有时我猜想……

猜想？

如果……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样说……这不是精神问题。我是说，也许这是一种遗传性精神分裂症，无法抑止对隐喻的使用。正像你所说的，时徐时疾，在一瞬间爆发性地脱口而出。

他坚决予以了否认，同时在她的脸看到了失望。我是在不同的地方发现这些书法的；何况，其中有一些还是印刷品。我可不认为我精神失常。

她沉默不语。他向侍应生招了招手。再给她来一杯香草茶。我要一份马提尼酒。诺利帕特干味美思。她的两颗门牙有点畸形，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是气运不佳。再者说，中文我既不大会读，也不大会写，他说道。

这我知道，她说。你连菜单也看不懂。接着就大笑起来，发出一串串咯咯的笑声。墙上的钟指针移动着，显示还有五分钟就到整点了。她希望还能与他再次见面。不过她不想再一起吃饭了。什么也吃不下。

不，她说。那些不只是你脑海中的一些声音。你并未精神失常。这些书法含有危险的、模棱两可的含义。

她站起身来；说她必须要走了，吻了他一下，险些吻在他的唇上。

回到房间，电话又响了。他暗暗期待那是她打来的，但是一接听，传来的却是一个粗粝的声音。那声音嘶哑，死气沉沉，就像用力甩上监狱大门的那种声音，传递的信息让人嗅到了死亡的味道，激出一身冷汗，那嗓音低沉，充满威吓。

喂，你小子。你别再来澳门。想有人卸了你的手吗？还是想剁了你的脚？你给我好好听着，嗯？不准打电话。不准提问。你要是再回来就死定了。

可能是打错了电话，不过电话那头的回响告诉他这个电话并没有打错。这个电话单刀直入。他的电话记录显示了他在过去两天里向澳门拨了二十四个电话。显然有些号码是不该去拨的。

他在浴缸里放满了水，全身浸在水中。难道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难道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房间？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大酒店价钱贵得离谱，给你制造一些富丽的幻象，却让你陷入绝望；他们播放着慢板和自由节奏的音乐。但是这声音并非来自大堂。音响线一直接到了浴室里，一个男中音唱道：再斟满这一小杯。为你家人祝酒。这歌声真是醍醐灌顶。

可是天涯何处是家园？

就在这里。在这巡游不定的脑海里，掩埋在簌簌下落的落叶之下；四野广布，一直延伸到天际，与渐渐暗黑的天空连成一体。失而复得。来来往往。

我决定预订航班飞回澳大利亚。在那里等着这股狂热渐渐消退。

骑着侧三轮摩托的改教者

昨日之非不可追，今日之时尤可待。

宗教。我母亲的晕厥。

澳大利亚。

我父亲到达澳大利亚的那天，我成了一个无信仰者。

我已二十一岁，在距悉尼两小时路程的一个小镇上，那里满地粘污着口香糖渣，男孩子们在教堂外把一盒盒香烟卷进他们的袖管。我因为上班而到晚了，这时一个皮肤皱巴巴、面容猥琐、脸型狭长、装了一车猪犬的门房将我挤到了过道上。前排祈祷长凳上的人换了一拨。他眼中闪烁着光芒，但是没有发出他特有的三声大笑，这是笑声中音区最低的一种，伴随笑声而来的是他随小货车携带的六听啤酒和猎枪，还有他爬虫一样的舌头里含着的食物，后来，他回到了后排的座位上。神父吐沫横飞，向身穿紧身裤的青年男子们布道，我跪了下去，就在那时，我那紧绷绷的卡其裤绷裂了，在挤奶棚后允许我摸她胸部的博尚太太咯咯笑了起来，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成了一个无信仰者。我的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变作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说无神论是狂热的标志，而我并不是个狂热分子。

再说我父亲来了。他身穿条纹服，脚上套着鞋套，在悉尼的派蒙水上码头停泊，期待着和女人们见面。那艘船令人失望。不过还是到

了……一上岸，他就跟我母亲说道……到达是非常重要的，到达了，一切就开始了……但当一个女人告诉他你今天很可能喝不到酒，因为今天是礼拜日，他立马就尝到了空虚的滋味。穿着三件套西装，打着休闲式领结，他赢了不下数百局桥牌，每晚都去跳舞，赢了一打船上的战利品。之后，他面无表情地谈起了妓女。或许她们礼拜日接客？悉尼到处都是匆匆建成的飞檐和四处漫游的鸽子。我的母亲感到精疲力竭。他究竟想要打动谁的芳心？啊，但是还是来了。这里可不像纽约或者横滨。他的孩子们在哪里？他喋喋不休地说要租一辆豪华轿车。一个人一点点地快要死去的时候，就会勾忆起很多已经死了的人。他的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死光了，他也快死了，于是赌马、酗酒、拳击样样都来，拼命要树立自己的招牌形象。他能嗅到露天看台下方的呕吐物和香烟屁股的味道。汽车在土褐色的功能建筑之间慢吞吞地蜿蜒行驶。我迟到了。我的侧三轮摩托车撞倒了一个像兔子一样的男学生，他在马路上跑着，冲刺着，突然停了下来，开始穿越马路的中线。他被车弹开倒在地上，自己站了起来，吓得缩着脖子马上就逃走了。清冷的蓝色夜幕中，月亮已经升起。我把车停了下来，这时斯特拉也开着呼呼生风的捷豹到了，正在那里挺着尖挺的胸脯整理她的雪纺绸衬衫。那时，尖挺的胸脯十分显眼。她那经营水果店的情人一定就在附近，我能嗅到他的雪茄味。我母亲说过斯特拉的胸脯太尖挺了。我还记得有天晚上，我和斯特拉单独相处，她拉下了长筒袜，懒洋洋地把头发束起来，叹着气，然后褪下了她飘逸的内衣，扔到我头上。她沐浴的时候叫我把香皂拿给她，透过水蒸气我看见了她深色的乳头，害得我只能骑在自己的摩托车上，压紧身上那个抽搐不已的部位。爸爸，斯特拉拉下电动车窗，冲着我喘息，那样子看上去像鬼一样。他突然出现在那里，看上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小。茉莉看上去还是老样子，胖乎乎的，罗圈腿，没人还记得当时她穿什么样的衣服，但是她很少在那里，我们看着她脸上带着笑容，给这个广袤的新国家所吞没，她什么也不懂，移民局的小伙子扯着公鸭嗓子说道。

我们把行李搬上车，茉莉坐进了斯特拉车子的后排座位，扑通一声，人坐了下去，座位散发出新鲜皮革的味道。竟然是斯特拉当司机，太搞笑了。在这里事事都要靠自己。阿姨，你还是……帮忙照看一下行李吧？塞西尔在照看孩子们。斯特拉打扮得像个香港妓女。摇着屁股，引得鬼佬们都盯着她看。阿纳尔多戴上墨镜，看上去又变回了那个恶作剧搞笑鬼，手中拿着个土豆用来塞住汽车排气管，用舌头把口中嚼着的口香糖团成一团拿来堵住钥匙孔，在纸板帽盒里装满肌肉发达、盘绕成一团的小眼睛蛇，准备在舞池地板上把它们放出来。他又看了一眼捷豹，还是选择了开摩托车。他小心翼翼地挤进了摩托挎斗，下颌两边呈现出深深的痛苦表情。他是想要问我一些问题。这里的女人怎么样？船上的女人都拒人千里之外，长得干巴巴的，穿着连衣裙，比英国人还有英国派头。我们上次分手以后所受的教育大相径庭……内心的疏离感使我不再使用家族的特有语言。我一路大笑着把摩托车开上了桥，汇入了川流的车辆之中。阿纳尔多拿出了一个伸缩望远镜筒，把它抵在挡风玻璃上，这里的小马怎么样？平日有赛马吗？我们的车开过斯特拉落叶遍地的郊区。这里一半的房子都是她的，她经营的地产加盟店不断扩张，斯特拉一个个指点着她的那些横幅、翼旗、仪仗旗、燕尾旗让茉莉看，银色的捷豹轰鸣着驶过满地湿乎乎的落叶。这儿就像好莱坞一样，父亲说。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一名不可知论者。小心，儿子，你参加了哪个俱乐部，当然了，我的堂兄阿尔弗雷德是共济会会员。有时秘密宗派会更有价值。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组织。是什么让我改变教派的呢？他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举起望远镜筒，瞄上了一辆警车。芒果。芒果？什么改变，倒不如说是一种奇迹。你知道，在上海，法律并不等于秩序。我是我母亲家族最小的一个。我的祖父抚养我长大，教我读《圣经》中的律法书，不过家里没有女人，读书没什么意思。后来有一天，有人在西摩路会堂外投了一枚炸弹。是想炸我父亲。当时正举行工人罢工，抵制洋货。父亲想让自己的工人回来。阿纳尔多又把望远镜筒对准

了一只停在电线上嘎嘎乱叫的乌鸦。从前，他说，我们有时候能用网抓住乌鸦。1924年，这些鸟在哈尔滨是一种威胁。晚上我们把它们的尾巴蘸上煤油，点上火，放飞到空中，就像放烟花一样。这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告。我们的车从法国梧桐树下开过，冬日的夜幕渐渐降临。在前面的车子里，我母亲正聆听着斯特拉的训诫：在这里，你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动手。你知道我们这里没有保姆。不过这个国家处处都是机遇。只要你能忍受得住，并且拼命工作。你的熨烫活计做得怎么样？茉莉直瞪瞪地望着不断后退的平房木屋和早早亮起夜灯的小窗户，所有这些无不令人想起那些晚祷，那些眼光狭小的虔诚行为，她感到一阵剧痛攫住了自己的心脏。现在她进入到另一种环境之中。用不了多久，她就要开始收集一捆捆柴火，用慢火嘶嘶地煮着米饭，听见刻薄的语言和难以听懂的挖苦。她是个囚犯。永远不得释放。她并不适合这个国家，才下午六点，所有的店铺就都关门打烊了。对了，我问父亲，你刚才提到什么炸弹。那次是个奇迹，他说。炸弹没有爆炸。这已经是第二次有人向他扔炸弹了。那是他们用照相器材自制的土炸弹。谁知道呢？可能他们是从我姨母亚历珊德拉·伯纳迪诺那里偷来的，她就喜欢那种东西。后来我父亲博尼法西奥说天主教能创造奇迹。不是《圣经》里写的那种奇迹，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奇迹。这才是它优于其他宗教的地方。就像大世界的马戏团。不过你不能总是指望天主教。上帝总会把那些自作聪明，喜欢揣度什么是奇迹什么不是奇迹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阿纳尔多把望远镜筒折了起来。我们还没到么？怎么像在中国一样。地域广阔。我想喝一杯。我父亲死的时候，手中握着一把计算尺和香芒鸭饺子，阿纳尔多说。这是一场连本带利的生命之赌，可惜他没有看到这样做的缺陷。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没有改换信仰。不。其实是因为我别无选择。要么什么也不信，要么相信奇迹。你很幸运。你还有母亲。尽管母亲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有一颗能感受事物的心灵。她是你的母亲。记住这一点。

我记住了。我记得家里请客的时候，母亲就把自己锁在斯特拉家中

的一个小房间里。我记得别人跟她讲话时，她一副窘迫的样子，因为听不懂语言而惊恐万分。她通向生活的大路已经被截断。所以，后来的日子里，我开车载她出门，登高望远……海边的静谧中，树林刷刷作响，海水有节奏地冲击着海岸，但是她却趣味索然。她只觉得热，拔出一把折扇扑打着苍蝇。她的偏头疼时不时地发作。突然，一只蜂鸟，一只金色胸脯的蜜雀，盘旋着落在了她灰白的头发上。在蜂鸟双翅嗡嗡不停的振动之下，母亲晕厥了过去，经过迟缓的救助，母亲终于喃喃道：下面很凉快。

我也并不了解我的母亲。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父亲说母亲缺乏教育是说她的思维意识在渐渐逝去。那时候，我对父母都不了解，我也得在什么也不信和相信奇迹之间做出选择。

我的父亲一文不名却又喜好浮夸，他说他喜欢澳大利亚的劳工文化。他放弃了战后二十五年来的老习惯：打领带，在水滨酒店波霸云集的吧台前谈论天气，扮演一个见多识广的难民。很快有人介绍他进了工会，加入了一个小规模的演奏会，独臂进行萨克斯管表演。码头不远处有一个空气沉闷令人窒息的窝棚，他在窝棚里还有一本账簿和一个冰柜，帮助男人们打理所得税和啤酒。他对航运业熟门熟路，但却没人雇佣他，所以他一直都站在劳工这一边。每天，他穿着浆洗发白的衬衫出门，偷偷地在赌马上赢取了足够的钱，有一次还带回一个名叫威尼的朋友，身高六英尺四，体重约一百〇二公斤。威尼把一件他不需要的西装给了我，认为我的块头更大。威尼的房子，父亲满脸堆笑地对我说，就在港口，还有一个游泳池！他把手插进口袋，摆出了和七十三年前一样的姿势，站在游泳池前，催促威尼为他拍照。我们喝了一箱酒，我连闯了十三个红灯，开车载他们去澳大利亚退役军人服务团，车后跟着一长串出租车，司机都在高声叫骂。那时的澳大利亚，人和人之间更为平等，我父亲突然发现了他的前世之根。这里，阿纳尔多说，是工人的

天堂。

于是父亲开始好整以暇地拥抱着南半球的种种异域风情，吹嘘说经理办公室一个面貌严厉、名叫莎伦的金发女人叫他甜心。在火车上睡着的时候他梦到了怎样完成字谜游戏和下象棋，并告诉我说，我住在忘川街，在那里，我们此刻都在走向死亡。



枕边书

我们都在怀中摇着一个死孩子。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费尔南多·佩索阿①

凌晨三点，消化不良，我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创作；翻译，重译。

她同辈中的佼佼者已经离开了中国，茉莉梦见了上海，梦中的上海已经消融在华夫巧克力和椰奶的余味之中。

在澳大利亚，她整天就是装模作样。这个东道国也在装腔作势：微笑、点头、苦闷。她不理会出租司机和公车检票员的询问。会谈总会产生问题，而这些问题令她感到尴尬，如果她细细思忖，还会感到受了冒犯。人们知道她听得懂；他们也希望她能听懂。但她尽量把自己听得懂的一点东西藏起来，这真是莫大的羞愧。她企盼有一天自己能像其他伶牙俐齿的人一样直抒胸臆；但是眼前，她只能为自己的存在表示歉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她不会构成任何威胁。她不想给人添什么麻烦。要是那样，她还不如去死。但她看到她的确成了麻烦。

她的儿子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多。他能大谈桉树和衣鱼，到了霜晨，他在百米之外就能听见狐狸打喷嚏。但是当他把这事告诉别人时，他们虽然感到惊讶，但并不想知道。这是那些人的国家，他知道他令他们感到沮丧，因为他的认识、观察和生存方式跟他们非常相似。相似就是一

种威胁。不同也是一种威胁。外人只需熟知自己，不应对他人评头论足。最好把这一切都藏起来。世界最终只是一只枕头，但是一个死孩子却能为所欲为，哪怕杀死自己的父亲。

阿纳尔多是到澳大利亚来等死的。大家对此心照不宣。

他就在那里，左手插在口袋里。

① 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葡萄牙诗人与作家。

忘川，悉尼

我跟我那没用的儿子说，当我看到那个马来护士穿着白色长袜，在油布上进行修剪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只芒果；当我说我因为她而肿胀的时候，她还用肿瘤开玩笑，展现了她的幽默感；我是一个肿胀女孩，她说，她其实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我想抚摸她，我敢打赌，她的乳房一定很漂亮，在淋浴房，她扶着约翰逊先生，嘀嘀答答地像棵橡胶树。推着垂老松垮的老家伙们进进出出并没有什么乐趣，不过我还是能达到半勃起的程度，激情就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嗯，激情能弥补此中的不足；我没什么可遗憾的。她的名字叫弗洛伦丝。她也许是在开玩笑。弗洛伦丝，你的手术乳胶手套让你在这世界上不管干什么都很有效率。上了天堂以后，我会穿着袍子，披着羽毛四处飞翔，偷窥你的私室，看着你和你身体柔软的朋友摆出瑜伽姿态，一起一伏，在表演神奇练习的过程中达到高潮……“书拉密主义”①……不是吗？行将就木的老人躺在年轻的女孩中间，病痛也就治愈了，而一旁的男孩却浑然无知，他孜孜苦读，礼貌有加；虽然事态严重，但都不肯说出一句谎言，让生活轻松些。相信我只是睡去了。我还没死呢。我还有一两件事情要告诉他……时间不多了……跟他说他还有一个兄弟。外形扭曲、性格分裂，半是孩童，半是野兽，他骑在自己母亲的胸脯上，卷曲着他鼠一样的嘴唇，那副样子吓死了自己的母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每个儿子都是一头怪兽；我只喜欢女儿，贴心而又机灵，心甘情愿地奉献，而且她们都很

成功。但这个脆弱的儿子，从不肯为自己的生存做危险的事，他所从事的研究令我感到厌烦。最近他爱上了摄影，像多数人一样，镜头后的他已经失去了个性，等待灭绝；哦，如果是我的朋友亚伯·伦敦，他可能会说，对男孩不能太过严厉，是一场大屠杀才促使我们建立了以色列。我的子孙后代，戴着眼镜，在他们的命运之地摇摇晃晃、起起落落，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更加苍老；他毕业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支烟斗，允许他在国王十字车站过夜，但他却胆怯地不敢接近那些穿着热裤、露着美腿、浓妆艳抹的女孩子们，而是束手束脚一直待在路边的泊车计费器旁。买张票吧！我在马路另一边向他喊道；在旧上海，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总之，那一次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困惑不解地站在马路当中，我们则去看了一场在钢琴酒吧上演的夜总会歌舞秀：三名舞女穿着缀满金属亮片的服装，手中旋转着高顶礼帽，踏着“阳光灿烂的街道”的旋律起劲儿地跳着踢踏舞。护士长来巡夜了。她令人畏惧，是个大块头，把我当傻子对待。我记得有些英国女人就是这样，吃土豆长大，把别人的生活变得像她们自己的一样悲惨。她对待我就像对待小孩子，挖苦讽刺，我太虚弱了，无法大声地进行机敏的反击。不过我专门等她来的时候再腹泻，我用微弱的声音哀求打一针吗啡，被她拒绝了。医生说不能再打了！她吼叫着，身上散发出廉价的香粉和涤纶衣料的味道。疼痛更加厉害，我的头都要爆炸了，多年来在狂饮烂醉或吸食令人神爽的可卡因之后我总是用小管的薄荷脑在头上摩擦几下。至少可以给我一点鸦片酊吧！斯特拉和伊尔玛在哪里？告诉她们我要告她们。嘻！告，那你就要为此感到后悔，老头子；你得的是精神病，你还是个难民，就这样我们就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可以这么说。你是干吗的？中国人？你说你从上海来，不过这里的病人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这里有波斯的沙阿[2]、暹

① 书拉密主义(shunammitism)，源自《圣经》的传说，指老年男子和少女同睡，但未必发生关系，目的是想让他返老还童，保持青春。

② 古代波斯君主的称号。

罗的国王，很可能还有阿拉伯的酋长。哈！鲁道夫。你肯定听说过他，亲爱的护士长；你在的时候他一定也在。我的双腿也感到了彻骨的疼痛，即使用犹大的圣章刮擦，也无法深及某些骨髓；空洞，空洞，空洞。我的最后文件哪儿去了？不能使用吗啡。我要自己签署自己的死亡证书，这里，我自己负责；命是我的，我把我的尸体托付给你；拿去吃了吧，护士长。你这脏老头！我会给你应得的。这些药丸，可待因药丸可以减轻一些痛苦。马上就用我的手指给你塞进去。你知道，神父的双手总是很干净的。她就是想这样把我杀了，既不温柔也不痛快，借用了神父之手，像外科医生的手，对疼痛麻木不仁。活生生的肉身；撕裂。留下我的骨头被捣成粉末。这里。还没完事呢。她正在装栅栏，不过我已经测量过了：要跳过十七点五英寸那么高。我等待着、忍着疼痛先睡觉；我还不确定是否要使用欺骗的手段，折弯，折出一个马蹄铁，把它弄得圆润一些，坏运气就能从开口的一边统统飞走；反转一下身体就能以后空翻从栅栏上滑过去；午夜行动。骑着我的骏马。夜晚她量血压铺床单的时候直打瞌睡，时不时被自己的鼾声或是汽车喇叭声惊醒，然后又在蓝色的灯光下沉沉睡去，她管着这间躺着死人的病房；可以说她就是德克萨斯的南丁格尔；我的意思是，她是一头驴。在这里，他们把你分为：男人/女人/信奉宗教的人/蠕虫/灰尘/记忆。在集中营的门打开之前，他们就用手中的刀给你分了类。我是不是应该换双凉鞋？咯吱，咯吱，咯吱，在冰冷的灰色屋瓦上步履如飞！水银温度计垂直悬挂着。卖出，买进。还好，我便袍里面穿的是件朴素的衣服；还有那个能伸缩的长筒望远镜。我还狡猾地收藏和贮存着这罐吗啡。黑夜过去以后，护士长。拜拜了老臭屁！我在高速公路上轰鸣行驶，有个餐馆的霓虹招牌写着“雪绒花”，迎着南极吹来的风一闪一闪。我觉得冷。我浑身发抖，招手叫出租车。有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司机是希腊人，非常健谈。我是个难民，给你劳力士金表抵车费可以吗？尽管他不知道在希腊语中这条街的名字，但在我的引导下，他还是把我送到了忘川街，并找给我一些

零钱。街角已经露出黎明的曙光，我花钱在一早就营业的店里买了一只鸡。不能空着手拜访别人，即使在这样狼狈的状态下去我儿子家也要带些东西。我带来了重要的消息，传递这消息也许就会要了我的命。就像马拉松的信使①。我的骨头像被火烧灼着，每走三步，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倚在墙上或靠在篱笆上。狗吠不止。我走向他的公寓，一座黑石建筑，就在街道当中，楼梯很陡，时间紧迫，每踏出一步，脚落地的一瞬间，骨头关节都苦苦支撑，磨损不堪，真希望打一针可乐静，让古代的雷神用他的大锤把这分裂的神志从脑子里轰震出来；我是躺在床上听到了天庭传来的声音吗？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的补救，把真相说出来。他曾追问是否有个兄弟，应该给他一度令人恼怒的问题一个答案，我背上的最后一根芒刺。我敲门。无人应答。还在睡梦中。这样的造访，真如死神的造访，总是令人猝不及防。我从洗衣房的门进去，沿着消防逃生通道拾级而上。我的腿一瘸一拐的，但苦苦坚持着。窗前拉着黑色的窗帘，阻隔了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他对摄影有一种狂热的喜好，把辛苦赚来的钱都浪费在去趟照相馆就能解决的事情上。我又连敲了几下门。毫无反应。黑色的窗帘上映出了我胡子拉碴的面庞，从海上来的老头；我这个年纪不应该显得如此苍老；我连续敲着门，直到邻居，哦，多么漂亮的姑娘！脸色红润，风情万种，穿着乳白色的丝绸和服，手拈盛开的樱花，有着深蓝色的眼睛，露齿而笑，她告诉我，他去内地了。如果我是他，我就和她搬到一起住，省下额外的租金。离开这个国家。这样他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我会让他认识到他所犯下的双重错误，我把鸡放在他的信箱上，看得出，信箱已经塞满了待复的信件；这孩子缺乏进取心；他像个乡下苦力一样，特别喜欢给奶牛挤牛奶。走下台阶，步入忘川街，可是这不是我该走的路；我

---

① 相传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和波斯人在希腊的马拉松镇进行了一场战争，希腊人取得了胜利。为了把胜利的消息送到雅典，派了一个名叫菲力比斯的战士，从马拉松一直跑到雅典。他到达目的地时筋疲力尽，报告完胜利的消息后就死了。

蹒跚地穿过这条弄堂，逃离忘川标志，这条街道的捷径，对生长在弄堂的人来说弄堂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我以前就是个弄堂通，对这些弄堂了如指掌，我是上海以前的弄堂之王，走在这些巷弄里从不会迷路，欢欣鼓舞，这些峡谷一样的巷弄有着特殊的气味，走出弄堂，走进外围的街道，就进入了一个更令人迷惑的世界，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从一家正在营业的酒馆里偶然传来的踢踏舞步声和酒徒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悉尼则是记忆的终点。我能听到隔着海水传来的歌剧。嘿！你瞧：从隔壁的赌金计算器代理局传来了叫喊声。多么亲切的声音。进去吧。为了我这把老骨头。你好：向女士们致意。尘土窒息了人的呼吸。冲啊，娼妇！

奥兹国[1]

咚咚鼓响出了咚咚节拍。

他们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就希望能出国，他们心里总是想着出国。过去，我在这里有时倒也感到适应，在机场排队时比手划脚，模仿移民，转移他们的怀疑。但是如今事情变得愈加明晰。过去还有某种我比较感兴趣的简单方言，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有的只是拉长我那神秘外表背后的悲伤口音，快瞅这里，听不懂。他们发现自己的父亲死在一家酒馆的露天啤酒屋里。他穿着一套西装。一个外国佬，他们说。

我回去的地方更加艰难。多年来，母亲东拼西凑地周济我，现在她再也不能给我支票了。有人进行了干预，核算了她节俭下来的费用，借助律师的力量防止进一步的财务漏洞。因此我回来了，身份是难民，我从一个朋友那里要回了我的摩托车，做了三十年学生以后，我口袋里空空如也，开始准备寻找一份工作。父亲曾说过，选择道路要慎重。写作要粗俗。下三滥的人就是这么写作的，赚得盆满钵满。

我骑着摩托回到了我的活动房车。一轮满月为这些隆隆作响的夜晚增添了情调；没有什么比倚在宇宙之中更令人喜悦，胸中充满了随节奏而动的冲动，心从马达中获得温暖，轰鸣着穿越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睡眠包裹在发霉的油毡里，忠实的火和腐烂的木头散发出伤心的味道。我一边开车，一边想着克里斯托尔和她那位举止文雅，戴着银丝边眼镜，身着“吸烟有害健康”牛仔，脚穿拖鞋，晚上就这么出来的丈夫。他们

两人之间的爱体现在学术上，两人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的财富和信仰使他们在一段时期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几年之后，她就学会了口是心非，挥别丈夫去参加会议，一丝不苟地打包自己的内裤，飞机晚点时打电话回家，和有权势的男人享受性爱的欢愉。她已经晋升为教授。在家里，她丈夫看着股市俯冲的股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的历险，细细的命运之线交织着反常的迷恋。他编结着一根绞索。拨通了一个曾经向他飞吻的女孩的电话。够了。我开足马力向山里开去。

我的房车停在森林的深处，一群负鼠吼叫着，在周围转来转去。山脊上，离我最近的邻居排屋正沐浴在灯光之中。那里，一场派对正在如火如荼之中。

蕨草和藤蔓爬满了空地。我小心翼翼、面容冷淡地迈着步伐，趟过溪涧，感到溪水漫上了我的腿。在溪涧的另一边，我发现了一团铁丝，挂在钉进树干里的一个钩子上。我揪出了铁丝的线头，扯着线头爬上了屋顶，把铁丝插进了我邻居的室外插座，看着他们的派对因为突然的断电而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下去，但却没有了音乐，直到我转回并越过溪涧，才又听到贝斯音符咚咚响彻山谷。我的水泵沉到了水底，我解开了水管，用冰冷的手指把水管从水底的泥沙中拽了出来。我拆下了火花塞，在冒烟的火堆旁把它烘干，然后我把煤气管从瓶子那里拖到了房车，拧紧了铜螺帽。我的螺旋桨坏了，用一条链子锁在电缆塔上。远处的半山腰上，我造了一半的房子像幽灵似的蹲踞在它的石基上；一只老鼠摇摇晃晃地滑进了一口干涸的喷泉。有人散乱地扔了一地啤酒罐子，他们还在门廊那儿生过火。两年的时间也许太长了。我走下山坡，把水泵重新组装起来，把水管接上，发动了两次，水泵就发动起来了。我慢慢地加快了转速，将水抽吸起来，然后以一半的转速让水咕嘟咕嘟

---

① 奥兹国(Land of Oz)是美国作家李曼·法兰克·鲍姆所著童话《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中一个虚构的国度。在英语里，Oz 又可以指澳大利亚。作者在这里一语双关。

地流进了水箱。然后我点着了煤气，马上我就享受到了热水淋浴，我在烤炉里还烘着一块马铃薯泥肉饼，是我从镇子上带来的。今晚我累得精疲力竭，准备堵上耳朵死死睡上一觉，然后再为一个牢固的开端构建新的计划，建一座房子，弥漫着雪松清新的味道，幽径弯折，沃土中散播着甜美的激情。远处的溪流在吼叫，歌声嘹亮，我知道，生活不可能长期如此，它将会汇入更加湍急的水流，卷入更加巨大的漩涡，暴风雨来临时，每一条河流都是双心[①]。

我梦想着博尚夫人。我正在打工度假，挤挤牛奶，干干一般的非技术活。我学会了开卡车，擦边撞到了柱子，没有驾照就偷偷开进了城。每天晚上，我都要喂养一条凶猛的狗，这条狗又黑又大，给拴在机棚里的一根柱子上，每到喂食的时候，它都是拼命想挣脱链子，大声咆哮，直到最后只剩下一条袋鼠腿的骨头，到了这时，它就会静静地蜷缩起来，于是我就在袋子里挑拣鸡食，清理收割机，有一天夜晚，博尚夫人从一架架袋子的另一边出现，将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吓得我浑身颤抖。月很圆。这时她解开白衬衫的纽扣，将我的手放到她柔软而做出反映的乳头上，我还是看不到她的脸，因为我的额头紧紧地靠在鸡饲料上，就在我伸出手的时候，她稍稍往后退了退。她带我离开架子，将她的衬衫从她牛仔裤里拉了出来，借着石板缝里透出的一道月光，我看到她很漂亮，虽然一连几周我都认为她太老了，不值得我注意。她将光亮的头发塞进我的嘴，我看到她的头顶有几只袋子需要缝补，种子在她身后慢慢往外溢，就在我爬到她上面，准备爱她，压她的时候，我看到她一眼的惊奇，眼泪潸然而下。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动，她的脸上都是泪水，但是我没有，过了一会儿，她问道她是否可以摸我，正是在她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移动时，我才开始担心我爱上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你第一次真正的驾驶课，她说，没毁掉谁。孩子，孩子，孩子，她笑着，眼

① 喻指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大双心河》。

睛里依然还闪着泪水。你得去忏悔了。

博尚夫人教会了我很多，大多数夜晚，等到咆哮平息，黑狗安顿，开始呻吟和呜咽，我们就爬进她丈夫豪华的陆虎车，在人造革上重温我们的课程。我要给你买书，她说，如果你想写作的话，还有谁会呢？后来有一天夜晚，有人来敲窗户……

你能听到负鼠的沙哑吼叫，博尚先生正在拧门。玻璃上雾蒙蒙的，你驾车离去，一路颠簸，穿过小牧场，来到城里。到了早上，他的太太来到阳光照耀的门廊，练习芭蕾舞步，在栏杆旁抬起放下她那双白皙的腿。她过去曾是个舞女。后来，她戳穿了你的牛皮，花了一天的时间，在你的肌肉硬块上猛骑，让你振作起来。杂种！这个贪求无厌的女骑手大声喊道；她这番情欲十足的刺激深深地挖到了种族好奇之中。第二天，你正在河边钓鱼，看到了她丈夫开着那辆积满灰尘的路虎车。他停了下来，打开后备箱。他摸索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支手枪，在你的鼻子下挥舞了一下，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当然也还有十足的沮丧，然后给你工资，说他已经把你的自行车捆好。你听到他几乎是闭着眼朝水里开了一枪。第二天早上，你骑车离开，她站在阳台上，一只手上拿着一块白色浴垫。

窗户上响了五声叩击。接下来又是五声。敲来的是深深的麻烦。我东倒西歪，摸索着我父亲传给我的警棍，警棍很短，头上是空的，里面灌满了铅，然后我向门口走去，数到十，脑子清醒了，追踪者发起抖来。是我的邻居。他有两米多高，赤着脚跟拖车顶齐平，他穿着短裤汗衫，抓着他的文身，一只猿臂笨拙地绕在他的胸口。你好，他说，想想就是你。我们交谈了几句，跟以往一样，我们彼此话不多，但心照不宣。我不喜欢狂欢痛饮。我想电话是找你的吧。

好的，我说。

完了，然后他艰难地穿过小溪，走了回去。很快我也跟在后面。接着他扔给我一个无线电话，这样我能在他颤抖的房子下面听到我自己。

是伊俄卡斯特。我在澳大利亚，她说，我把母亲放进了一家疗养所。她紧张的语调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又不冷不热。舞女将她们的影子抛过了山。从峡谷那边传来了痛苦的夜猫子所发出的喊叫，一股电动机润滑油的味道，家庭冰块的清晰爆裂。

他们找到了我。甚至到了这里。

停顿

她抱着一只毛巾包裹的暖壶，坐在悉尼冬日的阴影下。茉莉死抱着勤俭的观念。她的长处就是天天省钱，天天扼杀快乐。她可以从这里观看港湾大桥。

她身上有味道。她不洗澡。他们办好登记手续，让她进了疗养所。

这个营区缺粮如果我们能够保存我们就永远不扔因此我们偷偷地将食品藏在席子下面他们大声呼喊用空篮子来威胁我们的胃而我们必须在午餐前将此完成我告诉别人就连幸福也得保住这样就不会有东西溢出边界招惹怀疑一次拿一片出去来满足我们的空胃并且将它用好他们以为我在撒谎但是我的柜子里有月饼除此之外你会看到这里的保姆人很好我在床上拉屎后她们给我打扫帮我洗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好的保姆了我告诉你。

她从她皮夹里拿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递给她儿子。每次他去，她都会给他奖励，跟她生日和圣诞节的一贯做法一样。但是她给伊俄卡斯特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因为她知道女儿拿不住钱。她给的是她所谓的律师淋浴，包裹在她烦躁潦草的笔迹里。

他们在疗养所里给我洗澡。跟我女儿的住所相比，这里犹如度假圣地。有时候，他们从世界的另一边冲着这些女儿和她们可怜的老母亲大声喊叫。欧洲什么时候来看我？他们的伞要颠倒了，你瞧。要抓住钱。

过些年他们就会明白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身体。这么多年来我就想失去我的身体，她研究着字典，将单词跟井然有序的意愿排列起来，你瞧，她不是我。



我们第一次感到不对劲儿的地方是她把所有的影集都拿了出来。我们还以为她在恢复记忆，但是我们后来再一看，她把所有的东西都撕成了小碎片，她那打棒球的手指将每一件印刷品都撕成了碎片。接下来就是她一连多少天不洗澡。她说她摸不着腿和手，她只是树上悬吊的一个躯干。医生说她的本体感受里出了一个小故障，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查找了一下，找到了一个叫维特根斯坦[①]的人。

想想看我曾经给肥皂广告做过模特。利华厨具清洗你的……我的后背还疼着呢。别人还以为工业是他们的救星。他们排好队，编成班，一边唱歌，一边跳着野蛮的舞蹈。笨蛋！我大声叫了起来。他们回头笑了笑。全是疯子。

她坐在床上，将晶体管收音机靠近耳朵，一边听一边等到灾难的证实。过不了多久，警报就会来，然后就是第一批炸弹。所有这一切产生的是停顿，这就是遗忘，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如果说她引人注目的广告姿势压抑了她的身体，使其变得扭曲，那么她应该选择忘却，离开生活。

---

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

我把字典拿到耳朵边，这是我孤独时母亲教我的办法因为字典永远不会回答它总是一次礼貌地说一个词暂停它说的是外语停好停顿停止现在他们头上顶着篮子整齐地跳着舞仿佛他们可以消除他们衰老的面庞脱了发的头滴着水的鼻子他们出生在昨天但只记得关节炎带来的痛苦小鸟从树上俯冲直下拔他们的胡子如果你们不让我安分守己我就要出局了他们头顶篮子排成一条线在镜子面前大展舞姿赤身裸体犹如那些准备赴刑场的人问我点什么于是我告诉你栗子摇晃从战争中落下……

不过，我们看她的时候她还记得我们。

——要是你最后像你父亲，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杂种。但是不。小时候，你喜欢在你的绳子摇篮里甩上甩下。整天上上下下，然后就从房顶跳下。我不记得了……为什么到那儿生活？

——谁是梅布尔斯？

——梅布尔斯？不知道，你这么叫他。他没关系。一个乞丐。他也从房顶跳了下来。

——是我父亲的原因吗？

——不是，你父亲从不回家。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我跟澳大利亚已经拜拜了。让保姆叫辆出租车。

——快了。伊俄卡斯特回过来带你去吃饭。饮茶。饮饮汤。

那天我们很开心。我母亲笑得满眼是泪水。

——你在直路上是否有个小房子？叫服务员，看他们是否知道。告诉他们叫辆车。我们去跳舞。

她的思维减速，最终与特应性惊慌融合在一起。她不停地凝视着高压电线，面带幸福的微笑，确信高和危险说出了她的一个愿望：承蒙天

恩，不是这个世界，要是她真的能那时死去，她再也不会迷途，给人惹麻烦，这种困窘要永远消除。可是她身体很好，因此她接下来要做的一件好事就是到处跟人过不去。她变得看不见，离开了这个世界之道，没有了国土，无人关注。但是她忍不住还要回头看看。

你站在疗养院附近阴凉的岸边，想捕捉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直躲着你，就像一只小鸟，从一堆树叶奔到另一堆树叶，你想起不知从哪儿冒出的一个家庭将你父亲最后的几件财产也拿走了，他们掠夺之后留下的灰尘高高地在平原上空飘浮，后来，你母亲突然来到你身边，紧握着自己的双手。

让他们拿走一切，她说，让他们进入地狱。



他们以为她是给她女儿接走的；确实，有人透过编织的柳条盔看到了一辆捷豹车静静地停在花园里，但是没人说得准。还有人说是一只老虎。草很长。警察提出的理由是她走向瞭望台后突然转向面对大海，头脑发胀感到晕眩，坠了下去；验尸官如此描写要容易得多。她随身携带了几周前储存的一个野餐食品篮，一个破旧的篮子，里面装了烂火腿和两塑料瓶可口可乐。那时她原本是想等待蜂雀，一个单引擎西蒙飞机，在头顶上结结巴巴，不停地咳嗽，然后满怀期待地向我们招招手，她会跳下去，爆炸，然后慢慢下沉。

俄罗斯的教训

不要出现误解；先听写，然后读与记。记忆是历史的安慰剂。

——这是什么意思？我记不住所有这些。我只有八岁。

——不要躲在年龄背后。

——哎唷！

——伤到了吗？我是你爸爸，所以也伤到我了。这里有些膏药。虎标万金油。抹在你的头上。现在，你明白意思了吗？

——是的。

——历史必须永远带来伤痛。要不然人们会一直重复。就连猿猴也知道不要两次把手指放到火里。但是人呢？唉，他们总是说他们更聪明。现在，你写了些什么？

——彼得·斯托雷平①，最为无情的革命者，改革了农业。这叫俄罗斯化。

——列宁也一样，只不过代表了左派。克伦斯基②起来反抗。

——维也纳说我在反抗；这有两层含义吗？

——只有一层。民众就想造反，而且正在造反。如果你不想做民众，那就读读历史。

——但是……

——没有但是。莫洛托夫③。谁是莫洛托夫？

——一种鸡尾酒。哎唷！

——马林可夫④。

——啊唷！

——布尔加宁⑤。

——他是一个失败者。

——日丹诺夫⑥。谁是日丹诺夫？

——啊啊啊啊！

——贝里亚⑦？

——嘘！

——我告诉你一件事。听从你聪明的老父亲：葬礼是一堂好课。

第二天，我已经没有了头脑，因为我将一只西瓜丢到了地上，我父亲生气倒不是因为我笨手笨脚，而是我坚持说不就是破瓜吗，我上学时耳朵里还响着逃课之事呢。但是我了解俄罗斯人，比他们任何人都了解，除了维拉迪·奥斯特洛莫夫，他什么都知道，并跟我讲起了我罗列的仇恨犹太人的俄罗斯人名单，我问他如何知道这么多的东西，他的父亲也打他的头吗，维拉迪说没有，他的祖父告诉他的，他的祖父应该知道因为他从俄罗斯溜冰溜到了上海，你不必去读历史书来了解这些家伙，他们到处都是，就在附近，就是等待机会在你的肋骨上捅一刀。维拉迪和我一起分享酸奶，我告诉他我父亲打我因为我不停地在说我只是破瓜，他告诉我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用语，意思是“使女人失去童贞”。

---

①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罗斯政治家，曾任俄罗斯内政大臣（1904—1905）和大臣会议主席（1906—1911），任期内以镇压革命势力和土地改革而著称。

② 克伦斯基（1881—1970），俄罗斯政治家。

③ 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政治家和外交家。

④ 马林可夫（1902—1988），苏联政治家。

⑤ 布尔加宁（1895—1975），苏联政治家。

⑥ 日丹诺夫（1896—1948），苏联政治家。

⑦ 贝里亚（1899—1953），苏联政治家。

然后我问维拉迪他为什么上天主教学校，对此他再也不想说了。

差不多二十年之后，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我依然感到我没有头脑。就在他最后一次逃避之前，他躺在医院的床上，跟我说在所有的犹太人中，他最喜欢俄罗斯人。他说他们知道如何生活，最终将一切都看得很淡。他说就连东正教也十分疯狂，他的好朋友泽里格去世后，他的儿子都被禁止追随父亲的灵柩，因为尚未产生的后裔有可能生气。想象一下吧，他开始笑了起来，在一阵咳嗽中把话说完，坟墓里产生老泽里格的精子，并且立下法律！

这是继承和血统的法律。这是一听蠕虫。

但是那天，我的肩膀上好像脑袋没了似的，我能记得的只是一系列俄罗斯的名字，他们在我的肩膀之间横冲直撞，历史和噪音的大合唱，还有几个浅灰亚麻色头发的女人发出的抑制不住的笑声，穿着不够搭配，他们从哪儿来没人知道，尽管我们中间有不少人进行了猜测。数一数爵士乐队，整个乐团有一百人左右。我给他们起了俄罗斯名字，哭泣的修女，穿着紧身服的码头工人、中国餐馆的女侍应生、社区医院的护士，还有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非常感谢你能来，亲爱的安德烈·阿历克谢。别客气，我的小斯韦特拉娜。再喝一杯吧，尼古拉·帕瓦洛维奇，我的好朋友。我有点喝多了，不过因为我的悲痛之情他们会原谅我的。为以防万一，我让人在墓碑底部刻了一颗大卫王之星，我的同父异母姐姐们看到了，她们飞快地走向我，愤怒地质问为什么我不先征求一下她们的意见。她们说神父感到深受冒犯。后来，我们来到了悉尼的兰高河北岸，在堤岸上举办了十分丰盛的野餐，我看到了伊尔玛最小的孩子，肤色比别的孩子都要黑，玩得也最投人，她把一块块小鹅卵石深深地埋进了污泥中。突然，斯特拉出现在我的身后。她用尖尖指甲戳我的后背，一把把我揪了起来，扯破了我的亚麻衬衣。她说这一切她都会赔的……她挥舞着手臂……她父亲的愿望……你竟然自作主张，违背了他

的宗教信仰！树叶摇曳，她一脸怒气，驾车而去，轮胎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摩擦声，而乐队继续着自己的演奏，正在吹奏单簧管的帅哥桑托斯此刻突然吹起了“假如我是个有钱人”，把这一场面进一步推向闹剧。

* * * *

茉莉的葬礼几乎没什么人出席。维也纳生了一场流感，正在恢复，只有伊俄卡斯特和威利舅舅到场。我在火葬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等着他们，时值冬天，阳光照耀着起伏的群山。没冒什么烟。我觉得奇怪。也许是因为完全焚化了吧。伊俄卡斯特身着黑色套装，好像是丝绒的，我注意到她耳朵后面隐隐有一小绺灰白的头发，她不断把那绺头发别过去，好像这头发在提醒着她已人到中年，应该举止端庄，不过她穿的裙子实在太短了，看上去不大合适，威利舅舅走路一瘸一拐，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半张着嘴，像一条鱼一样，看上去嘴巴显得更加怪异，他想伸手搂抱我，但却没有抱，我不知道他们还在生产“花菱草”牌发乳，威利舅舅用一条刺绣的手帕抹了抹眼睛，说，他病了，病得很厉害。医生说他只能再活六个月。神父罹患癌症的比率最高，他说。不中用了。家族的这个分支都有这个问题；中国式的长寿养生。这是医生说的，都是胡扯，威利舅舅嘲弄地说，伊俄卡斯特转动着眼珠。我们看着母亲的棺椁咯吱咯吱地下了葬，一块木板滑动着合上了门。伊俄卡斯特哭了起来。我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威利舅舅正喋喋不休地谈论在香港回归之前从香港购买海外地产。价格便宜下来了，他说，然后痛苦地呻吟着。借款很容易，还款也是小菜一碟。不过聪明的做法是不要买断地产。那些价格……他旋转着张开的手指……总是变化无常。聪明的做法是在从事那些买卖的公司中持股。两年之后你的投资就会翻一番。他总是使用将来完成时。对他来说，所有的收益都已经是板上钉钉，业已实现的预言，确实可靠的高瞻远瞩。我想到了致命火焰。我们走出屋子，来到翠

绿的草坪，清风徐来，吹散一堆堆耙归拢的落叶。你说你是一个作家，他问道，上下打量着我。我想你成天读书，做了不少梦。知道吗，你不必担心你是否在滥用这种权力。他发现他刚刚说过的话很可笑，自己也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我想问问我舅舅夹在他书里的那些书法条幅是干什么用的。是他写的吗？我要问的这些问题会不会不太得体？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威利正递给我一样什么东西。他正用那东西捅着我，一只红色的四开本文件夹，上面有烫金字母，就像中国人过年时派发的一只大红包。我记得有一次在巴黎地铁，有个男人也像这样捅着我，向我兜售一包银箔包裹的印度大麻。

看看你是怎么想的，威利舅舅说。如果你喜欢，这就是你的了。我们以后再办理书面手续，顺便说一下，我要开一个盛大的交接派对；最盛大的；就在英国人借着月光扬帆出海的这个晚上。我从大学请了很多人，有些人可能你还认识。你知道吗，我用自己的名义捐钱造了一幢大楼。我可不想像你母亲一样，不搞派对，默默无闻。我可不一样；我可忍受不了湮没无闻的滋味。嘿，你知道哪儿有好吃的吗？

在餐厅里，威利舅舅是个个熟。餐厅经理坚持由餐厅来请客。于是，我就多喝了科涅克干邑白兰地，嘴里还湿乎乎地叼了支雪茄。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伊俄卡斯特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她掐下裙子上的线头，吸引着男人们的目光。她为威利工作，干得很不错。我感到自己真是个败家子，不明白既然数字和合同赚钱更多，怎么自己就偏偏喜欢上了诗歌。不过……威利舅舅接下去说道，可我却没听见……他弹了弹刚才塞到我腋下的那个夹子……我们需要一个海外基地。你准备怎样处理骨灰？

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一切……骨灰和字典。伊俄卡斯特很肯定没有别的遗物。第二天，我带着骨灰盒来到海边，将骨灰全部倒进大海。海浪把一些骨灰冲了回来，沿着礁石堆积了一些灰白的泡沫，然后，一切都给冲刷得干干净净。她有了自己的海外基地。千万不要留下什么笔

墨，母亲告诫过我。写下的东西有一天会成为证据。我在她的脸上搜寻着所有这些冬天，看到她的脸像雪一样消融。

我骑车回到了锈迹斑斑的房车之家，至少房车所在的土地是完全属于我的，不过在这块土地之外，我却永远是一个陌生人。失根意味着失去了本能的爱，但也意味着无拘无束、充满了痛苦的自由。我身无分文。威利舅舅的文件夹里装的是股票凭证和公司债券，此外还有一张不定期机票。不用多想我也知道，行动才能抓住机会，人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实现的，不过威利的质疑促使我学着俄罗斯的样子，把宝押在历史上。如果我签字同意，我就成了他永远的同谋，生活无虑，但也失去了自由；如果我不签字，我的路也就走到头了。母亲提倡的是谦逊。她温柔的话语在窗口回响。

可是我的行动时间还没有到来，历史总是会带来伤痛，这样的教训我还没领教到。我知道，当那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会向狂野的台风眼中探求，此时此刻，这场台风正把我扯向它的中心，拉着我，离它越来越近。

回归

回到香港。一个盛大聚会。燃放烟火。本章已经付印。

我正在承载着我已经穿越的千山万水。

半睡半醒之中，伴随着飞机引擎的嗡嗡轰鸣，我听到了树头发出的指令，右上边发出的声音是好的，左下边发出的声音是坏的。布鲁勒医生说这很正常。如他所说，我得尝试一下，尽量离希腊人远点，也就是说，不要太深地陷入到荷马史诗的氛围中，支配着人的行为，而非感情。他一边看着自己的手表，一边说道，不要与其奋斗。坚持日常生活，你就会达到平凡的境界；简单的言词；平常的话语；直来直去。他满怀耐心，喋喋不休，满嘴吐着建议，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保留着一些返祖性的不良行为。（黑格尔说平淡无奇就等于奴役。）

你的开场白充满了神圣的字眼，但是在经历了预言和狂喜阶段之后，你对这个平平常常的世界大动肝火——这就是神的旨意和主体意识分裂的本性，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溢出——韵律，另一个时间的节奏，深深埋下的韵律分析，患了病的亲情……

我从脖子上拿下耳机，退出他的磁带，要了一份威士忌，卷了卷实用耳塞。我扔掉简册，因为它只能减缓疯狂的步伐，推迟渐渐出现的辱骂。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不是我。我身边有书法可以证明。他者。饮茶时我向威利舅舅问起过这些，他盯着我看，还以为我疯了似

的。后来，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狡猾的眼色。他当然怀疑到了什么；比如正在对他进行考验。不管如何，我将这些与股票投资组合放在一起。我的银行里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抵押契据和木材与石头的透支，因此，对于他的任何提议，我都不能掉以轻心。我唱得时间太长，耳朵都塞不住了。但是，跟所有的白纸黑字一样，这事没那么简单。前面的那个家伙不停地舒展着身体，遮住了电影。他穿着米黄色的背心，嘴里含着一根牙签，每当他舒展自己的时候，他都会透过腋窝看看我。他一直狂笑到深夜，沙哑的声音从舞台前散发出来，那声音是在警告我：回来你就死。

我们在一片湿气和水雾中下了船，穿过人山人海的脸庞，沿着斜坡走着。有人快要上台了。威利派出司机，司机脱下帽子，将我引进一辆占了两个车道的豪华汽车里。我从吧柜里拿了一瓶酒，辨认着街道的名字。我们家曾居住在离这儿半英里之外的地方，但几近潦倒，此刻，我们站在别人家正在滴水的空调机下面，感受着头上的冷水。即使是在过去，我父亲也在思考着这个大问题：离开还是不离开；我母亲思考的问题更大：活还是不活。几个精彩场面：作为乐团领队，我父亲将弗兰克·西纳特拉引进市政厅，他对着观众说道，他跟黑帮也有联系；这是他跟拳击短裤公司建立的一笔可观的交易，他还和他的老朋友都迪·阿贡合作，一起生产避孕药，有段时间小有收获。但是阿贡牌避孕套并没有抓住公众的想象力，结果公司倒闭。昔日的天资不见了。橡胶也没有反弹。

威利舅舅还没回家，但是他留下了指令。我住黄金别墅的绿色房间，这离前屋最远。住在一起的还有十来个别的客人，当我们出现的时候，伙食负责人正将桌子搬进搬出，厨师们则在厨房的外面慢慢吞吞地走着，直升飞机上的飞行员在测试机器下面的灯光。嘈杂的旗杆上已经挂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今晚是一场盛大的活动，司机阴沉着脸

说道，明天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我问他是否留下来。不会，他咧着嘴笑了起来，他要到洛杉矶去，和家人在一起。整个这个地方回荡着上海黄金时期的喇叭音乐：诸如姚莉的“春风他吻上我的脸”，吴瑛瑛的“我有一个爱的罗曼史”，李湘的“你何时归来?”我想打个盹都不成。我抬眼望了一下窗外，瞥了一眼乌云密布的大海，看到远处地平线上的雨正在集结，而在我的下面，整个广场挤满了女孩，这么多的女孩。那身打扮简直能要人命。此刻为鸡尾酒会时间。威利舅舅将第二个网球场变成了一个停车库。我想威利舅舅没有意识到，中国依然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我看到他们的军车驶向海军军营，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们手上的人民币几乎不值什么钱，不会买太多的啤酒。但是后来，威利舅舅快死了，六个月内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梦见我正在移民局排着长队等着，这些队形成了无尽的移民厅，进而又形成了更长的队伍，有些人排队都排老了，有些人死了，搭起了帐篷，遥远的地方，在闪烁着光线的山脚下，他们正在进行大屠杀，清除那些生病快死了的人，轻轻地推着他们的身体漂浮，同时还朗诵着诗歌……后来一下冒出了上百万人。父亲警告说，他们很快就会冲向栅栏。他变得十分狂躁。科学，他悲叹道，技术。你们只会用带电的栅栏敲打他们。他继续说道，肥大的扁桃腺内吐出阵阵气息，他将手指弹向外面，模仿着火花，或者说思想，我想这些思想产生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直到现在，回首过去，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穿着拳击短裤的滑稽演员，头发稀疏，十分幽默，像恶魔一样。烟火提醒我，活动就要开始了。

我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然后在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一只记号笔，将磨损的夹克边抹抹黑。我的领带(我恪守这些服饰要求，因为文人在这里是没有地位的……也就介于失业者和瘾君子之间)皱了，上面还留有我父亲葬礼时洒上的菜炖牛肉痕迹。后来我下了楼，冲着人们笑了笑。有许多老人由女孩陪同。我发现古老的中国这一古怪的做法十分迷人。我也开始变老，但小妾一个也没有。我发现有几个眼圈发黑，握手很有

力的家伙其实是党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被赶到内蒙古，甚至被迫离开祖国，现在他们全都回来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他们的牙齿都给烟熏黑了，他们的手跟胡桃钳似的夹得很紧。有一个人在昆士兰待了很长时间。哎！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摸着我的夹克。一袋澳大利亚水果。后来他笑了起来，喉咙里像是有痰，充满了善意，花生酱沾到了我的袖子上。每隔五分钟左右就会有人站起来，如果没有人注意到，他就会从长软椅上再次站起来，向大家敬酒。他们没把香槟酒当回事，而是将凯歌牌香槟酒直接倒进圆点花纹大玻璃杯里，一口而下。他们将我介绍给他们的侄女或侄孙女，秘书，还有受人羡慕的小明星。这些女孩很懂礼貌，在剑桥读过书(英国剑桥和美国麻省剑桥)，她们看我的表情充满了可怜或冷淡，直到后来发现我是威利舅舅的外甥。后来的转变值得一看。威利没有儿子，有人小声嘀咕道，摸着我的手臂，也许你回来是为了生意？我对这种收获的意义还没有抓透。噢，不，我说，我后天就走。顺便问一下，威利舅舅在哪？

但还没人见过他。随着夜幕的推进，我已厌倦跟陌生人见面。躺在炽热的太阳下，我都没怎么出汗，但是在女性公司里，我却出奇地流汗，几乎难以呼吸。有时候，这需要大量的叹息，而这耗尽了我的能量。有的女人觉得这个状况很迷人，布鲁勒医生说要放松，不要焦虑，但是这样说反而使我疑心大增。我正往自己房间溜，这时一个衣着时髦的小个子走了过来，一脸微笑。他脱下贝雷帽喝酒时，你会发现他是个光头，头很圆。在人群中，我把他当成了文化部的人。你好，他说，你不记得我啦？这些问题一向很难。有一次，我奉献了一个没有认出的女人，一个以前的情人，描述着床上发生的错事。这是唯一令她沮丧的方式。我看着她月亮似的笑脸。噢！我说，那就是你在西藏写的了不起的诗歌！那一年江郎山大雪覆盖！我一边喝着酒，一边朗诵着。我敢肯定他在堪培拉读过，当听众们起哄的时候，他气愤地将诗集扔在麦克风旁。他们把他嘘走了。我们不是开过一个基督的玩笑吗？我捅了一下他

的胸口，问道。我本以为他会走，但是他站在那儿，一会儿咧着嘴笑，一会儿皱起了眉头。不，你根本就没有记起我，他说。他带着清晰的英国口音，使人想起艺术流派理论家和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我是你的老朋友谭拓林。

哦，这些记忆。我一点意识也没有，当时，我们睁大两眼，在前排座位里看着丽塔·海华斯[①]花边衬衫内的乳房……当时我开始意识到，黑暗中之所以悸动着性欲，不是因为我单独和她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和所有其他悸动的人在一起，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一反禁忌，突然看过大街对面，看到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正在对面的公寓里擦着窗户，突然，她爬上窗台，开始拉上裙子，揉一揉腿，就那么几秒，但是就在那几秒里，我看到整个班级都在看她，这种圆形监狱似的观看特别令人感到兴奋，吸收了别人的秘密爱好，这些人都以为他们在观看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在看……这么说吧，我一点也不知道谭拓林已经在研究照相镜头视角和筛选，并且已经解决了光和影的问题，当他将干豆抛向下面的人头上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一方向感到了厌倦，正准备做出新的投掷决定。我记得他有一个漂亮的母亲，将一半的家庭预算花在她并不需要的化妆品上，她的洗澡间里有一个很大的篮子，她将早晨用的纸巾和棉签等各种擦洗完了的东西都倒进这个篮子里，这个篮子里还有一个调色板，上面沾满了色彩。我觉得管道设备有缺陷，于是在使用坐浴盆之前将脏手纸放在上面，结果一地都是水。那是我最后一次受到邀请，没过多久，我和谭家的友谊就出现了动摇。

这真是一个荒唐见鬼的名字，我对他说道。时过境迁，该原谅的都得到了原谅。唉，这就把我给弄进了电影，他说，给我斟了一杯。于是，我就听到了《强奸》。电影怎么样？票房好吗？过了一会，他走开了，不停地谈论着预算和每个场景的开销，还有他不得不做的研究，研

---

① 丽塔·海华斯(1918—1987)，美国女演员、舞蹈家。

究日本人在南京使用的勒杀技巧，不同种类的剑和一下射穿十二具身体的子弹需要射杀的角度。我问道，当暴力麻木了人的感觉，令其失去好坏之分时，公众是否知道或关心这些细节，但是当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所冒出的火焰时，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场圣战。他在到处寻觅，我借机试着往前走，但是他突然抓住我的袖子，说他想让我见一个人，但是他找不到他们。他提起了我的女儿，我的心为之一跳。顺便说一下，你喜欢昨晚住的宾馆吗？拓林问道；我还以为你会喜欢这个宾馆的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克拉维迪亚·恩格尔将我救了出来，当时，她披着几条华丽的围巾，像一阵风似的从前门穿入。她的头发此刻染成了紫色，嘴唇上抹着黑色口红，经过一番寒暄之后，她开始谈论她的最新研究成果：当代中国诗歌，我感到更加愉快放松，因为直到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该跟人说些什么。她一边说，一边摸着我的胳膊。听着她的话，我开始在人群中搜索，但是没什么结果，我向窗外看去，看到车子在雨中来来往往。在潮湿的路上，我听到了令人神经紧张的交通噪音。后来，克拉维迪亚将我说给了她的朋友，一个名叫塔瓦雷斯的牧师。哎哟，你必须见见他，她说。他身上肯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我下周见他。哪儿？我问道。当然在澳门，她说，同时用手轻轻弹着她的眼睫毛。你觉得我的生活值这么多吗？我随口问了一句。舞厅里乐队开始亮相。我看到鼓手正在调整他的铙钹。什么，克拉维迪亚问道，同时将身子倾斜了过来。一条围巾落在了我身上，这时，一个块头很大的女人走了过来。她的眼睑是黑色的，一只手上拿着一只鸡尾酒杯，另一只手则甩开克拉维迪亚的软绸手帕，于是克拉维迪亚迅速将它拿走。你好，她说。我叫卡诺拉·容，跟你失散多年的婶婶。天哪，你看上去这么……这么不年轻。她自己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年轻，由于化妆品用的很浓，她的眼白泛红，浑浊，像螃蟹一样陷到皮肤的皱折里。她解释说 1968 年之后，她就一直生活在巴黎，香港对她而言除了好奇，没有任何意义。她在蒙田大街上开了一家时装店。威利，也就是我的前

夫，当然觉得香港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你知道，威利快死了，他也在想其他的中心，对吗？她用手指转了一个圈。我想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卡门·吴，她说，你还记得她吗？然后她翘起了头，准备听我的反应。

记得卡门。我怎能忘记？我当然记得卡门。她一直在推动着这事，想在上海做个成功的摄影师，然后到巴黎做模特，通过单调的时装表演和经纪人出人头地，她的腿间出现的潮热，T台边的化妆墙前未遂的强奸行为，为名人富人进行的夸张的表演，他们那一卷卷肚皮肉啪哒啪哒地撞在逃亡者身上，饮料溢在了他们面前。她在荒废自己。记住卡门一向不难。我们在上海相识，当时她是一名摄影师，她跟我一起跳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像我父亲，舞步缓慢，对她的抚摩深信不疑，充满了信心。哦，是的，她还在给我写信。

这点澄清了之后，卡诺拉转向克拉维迪亚，跟她解释说卡门是她的门生，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她说，一个出生于旧上海的美人。她一边说，一边抽出一沓照片，一捆用橡皮筋绑起来的照片，是她从古奇牌手袋里找到的，她将这些照片扔给克拉维迪亚。克拉维迪亚看上去无动于衷。

她向你问好，卡诺拉冲着我说道。

谁？

卡门。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因为你从不写信。答应我你给她打个电话。

克拉维迪亚的眼睑跳了一下。

我浏览着这些照片。这就是卡门·吴走着猫步，穿着一件新新朋克式套装——用中国国旗做的破衬衫和超短裙。投射在后面屏幕上的20世纪30年代的一条上海街道。我父亲坐在人力车里。

我不知道该如何感受，但是卡诺拉扔到我手上的这些照片令我感到

很骄傲，我感到骄傲的是，这些年来我恪守使命，坚持不懈，不声不响地收集着这些图片，就像一个可以随时吐露心迹、值得信赖的教授。甚至就在这儿，在所有这些细小的盲点之中，在香港回归的前夕，在黄金别墅的周围漂浮着的一知半解之中。

克拉维迪亚从酒吧间里站了起来。她说她得唱歌。这是威利的要求。一个小姑娘陪着她走到包厢的风琴前，开始调音，她的小腿还够不着踏板和低音，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昆虫，在一个滚热的烧烤架上跳着舞，但是当克拉维迪亚唱歌的时候，嗬，当克拉维迪亚唱歌的时候，这个地方一片寂然。我还不知道她有这个能耐。她的低音十分浑厚，这些音调洗掉了强大的火焰，她看上去像模像样，唱得老人们眼泪汪汪，并赢得了他们的阵阵掌声，许多年前，我的婶婶阿尔达在天主教堂午夜弥撒时唱过卡契尼[①]的《圣母颂》，对此这些老人们似乎知道一些。但是掌声很快被有节奏的敲打声所取代，而且这敲打声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往落地窗外看去，看到威利舅舅的直升飞机在屋顶上盘旋，突然，他出现在楼梯顶，身上穿着细条纹的燕尾服，于是掌声再次响起。克拉维迪亚来到我的身边。他还以为他是圣诞老人，她小声嘀咕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担心他的心理健康。你会到澳门来吗？我点了点头。会的，看到我的舅舅站在楼梯顶，挥舞着手，一脸疯狂，咧着嘴大笑着，这点就足够我直面死亡。至于说我以及我那小小的使命……不错，克拉维迪亚说道。

星期二在峰景酒店跟你见面，一起吃顿饭。顺便说一下，有人在找你。谁？我在人群中伸长了脖子。威利舅舅正在开始他的演讲。亲爱的朋友们……他开始说了起来。我四处张望着，看着周围人的面孔，他们都满怀期待地看着他，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万籁俱寂，这给了威利十足的勇气。我只是一名工匠，他高声喊道。我们都知道他在开玩

① 卡契尼(1550—1618)，意大利歌唱家和作曲家。

笑。我随身携带的只是一小箱文字。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就跟克拉维迪亚先前的表现一样，只不过他不是歌星，他的眼角里闪烁着真诚的眼泪。出于礼貌和困窘，人们的笑容冻结了。但是现在，我的朋友们，这里闪耀着一个新的文明。每年增长百分之十……我看到了她。克里斯托尔站在几个高个子的后面，冲着我眨眼！我招了招手。

我想她还没有注册。后来我记起她集中注意力的时候所出现的抽搐。我回头看去，她还在眨眼。我不必告诉你们，今晚对我来说是喜上加喜，你们不妨可以称之为双重的焰火庆典。我很荣幸能向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捐助一小笔款项，我的母校从来就没有忘记我，他们向我保证，我依然是他们经济系一名备受看重的毕业生……现在，威利舅舅几乎每说一句话，人们就会鼓掌。我很高兴接受他们提名这幢楼为容经容楼……更多的掌声。欢呼声。两边各有一个容，他们说，经济稳定，有人注意到，风水很好。他说些什么，人们已经很难抓住了。更多的是在谈论他展翅飞翔的人生之书。也许就是这些吧。也许没有什么线索，因为他的双关话已经讲完了；他的小箱子烤得只剩下些煤渣。然后他回到了原点。SAR[1]将会带路。他唱了起来。SAR！SAR！大家串在一起，他是要我们说放屁。再问一句，SAR是什么？我问克拉维迪亚。分散逃亡，她说，英国人待的时间太长了，威利舅舅冲着骚动的人群大声喊叫道。一百五十年了，该取消签证了！肩膀分开，我看到她在冲着我笑。然后她的手指在下巴下挥动了一下。今晚英国人要驶向雨中……威利舅舅吸了一口空气，预示着更加糟糕的天气还在后面。那一刻，他不会料到他的母亲也正驶向雨中，而且还和一个黑人。明天，我们要在这个特别行政区履行官方义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其义务大小。但是与此同时，今天也是狂欢节，因此请大家尽情享受。掌声雷鸣，欢天喜地，我注意到威利舅舅自己也在鼓掌，好像是在派对狂欢似的，然

---

① 指特别行政区。

后他又十分传统地把手掬成杯形，来回晃动。我打内心里感谢你们大家。我从服务员手上抢过一杯酒。干杯。再来一杯。这是战前上海。乐队不停地演奏着《自燃》，蓝尼·崔斯坦诺[1]风格。人们开始敲打起脚步，一边走一边滑步而舞。我注意到威利舅舅几乎是一个人站在那儿，仿佛他的感情太过雄伟，别人不敢碰他。他跟人握着手，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又发紫，他的嘴唇变形，给压迫成了一个O形，气喘吁吁。我向他走过去，他将一把虎钳夹口放到我的前臂上。你没事吧？我问道。他不得不转过身来看我。没事。他的声音里塞满了痰。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他说，摇了摇我，一个伟大的夜晚。一流的演讲。是啊，他说；一流的演讲。你最好喝一杯。

我将他带到了一个角落，他们拿出了点心。一张大桌子上放了一百个碟子，有烤肉、鸡、鸭、面条、糖醋调味、咸甜薄撑等，都是给派对男孩的。他们聚在一起，脖子上围着餐巾，那些深受挚爱的侄女们吃着，摆着，揉着。威利舅舅问我他的演讲好不好，这一陈述是否正确；你知道这些事，他说。他处在痛苦之中。我倒倾向于认为这是自寻的痛苦，想寻找下面所掩藏的一切。我对这个人谈不上了解。但是他没有经历形而上学的折磨。一切都是有机的。他作呕，放屁，给自己倒了更多的烈酒。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把它说出来，他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是种精神和身体健康。他每遇一个人就敬一次酒。我意识到，他醉得已经不可救药了，但他还是紧紧抓住别人的手，那样子令人难忘。你的母亲，他说，一直在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

片刻之间，我的历史之赌开始起效。阿纳尔多的世界和他一起下沉，但是人们记住了茉莉。在澳大利亚的一段时间里，她连工厂的食堂都不敢去，生怕说错话。其他的女人则拼命地讲着意大利语和希腊语，拈到什么说什么。钞票可是什么语言都讲。但是茉莉却无法鼓起勇气，

① 蓝尼·崔斯坦诺(1919—1978)，美国音乐家。

挺胸面对这狂躁的肚子，而是一连几天不吃午饭。她喜欢超市，到了那儿你就不用谈话了，我曾经见过她一副匆匆忙忙、偷偷摸摸的样子，向着出口，向着她安全的家走去。她绕开人行横道线。他们有可能把她撞倒。那些停下来的人使她感到愧疚。上了汽车后，她回冲着司机微笑，一副瘫痪的样子。她会坐下来，再清理一下她的思绪，她会用手揉着前额，那样子十分疯狂。来吧，爱，要么兑现，要么走人，他们大声叫着。我父亲说，在他死之前，就这就把她给否定了。让这成为一堂课吧。它在积聚。要不是我拦下那些汽车，她就会被送到疯人院。人人都有态度问题。对他来说这太过分了。茉莉喜欢走路。如果她不停地前进，她就不会给瞄中。这是一个没有被瞄中的赛跑。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理解，等她死了，一切都清晰了：她的综合征跟赛跑有关。她用这个词时不可能有其他意义。她走路很快。别人不注意她就跑，趁着最后的条款还没加进去，首先赶到目的地。

威利呢也有自己的理论。这倒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是因为她过分敏感，他说，他已经从胃的回合中恢复了过来，而是因为她是欧亚混血儿。没人让她感到轻松自如。她没有地方可以归属。我很高兴，他将我拽到身边，轻轻地说道，我看上去像中国人。但是……他看了一眼四周，看到我们安全离开……中国将会向我征税，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得找到新的躲避办法。不是逃避，你懂吗？这里面有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是否被活捉。你瞧，我正打算去死，如果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收入，我就要倒霉。跟在美国一样，美国是税收最糟糕的一个地方。一旦我完了，罗伯就会受到重罚。你听懂了吗？我没听明白。澳门1999年回归的时候，他们答应我（他迅速用手指了一下那个党员）他们会做好他的工作。私人帮忙。

威利舅舅在修补我的电动火车，这使我感觉像是回到了童年。许多年前，他就说过，关键是不要碰这根线，他用手指轻轻拨弄着头发，产生了瞬间放电。这是值得记忆的。最多也就是一次民事违法行为，他

说，与此同时，他让我离开那两个靠近我的人。你们是澳大利亚人。你们熟知内情。你要做的就是在伊俄卡斯特放在你面前的文件上签个字。

两个由边上慢慢靠拢的人是克里斯托尔和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子，我还以为是她的未婚夫呢。我的眼里只有她，我很高兴她走出了第一步。她穿着一件真丝透明硬纱服，上面印有汉字。书法？我满含羡慕地问道。不是，她说，是反殖民的涂鸦。这件材料是编织的，因此挂在她的脖子上，形成一道道皱折，给人感觉就好像是没穿内衣似的。不，内衣是不可能的，我想，这时她弯下身子(她略微高一点)，亲了我一下。她知道我很善于那些高雅升华举动……一首诗歌很有可能出现，这是一个很热的夜晚。她的眼睛在调着情，她的未婚夫站在后面，像一只被阉割过的雄鹿，先把她送出树林，于是她成为一个公开目标。我难以抑制的陶醉转化成了一个循规蹈矩的梦想。我大着胆子握紧她的手，直到她轻轻挣开，将她未婚夫推出来。来见见塞姆·克莱门斯，她伸出手掌说道。仔细看一下，他显得很老，而且笑起来过于露骨。啊，马克·两[①]，我说，得到的是一脸茫然的神情。此前还没人在他身上标记过这根线呢。他做生意。他也很可爱。我告诉他我没有偏见，但是克里斯托尔远比他精明多了；我能看出，跟所有行家一样，他在这个领域干得很出色，出色但是无趣。一个工商银行家，一个低能儿。摩门教徒[②]，克里斯托尔说道。我们秋天去犹他州。又是一个替死鬼，我在想。他倒值美国那点钱。嘿，你不是一夫多妻吧？哦，不，这次他准备好了。这只是为正统派的。嘿，我跳舞你在意吗？我问道。他耸了耸肩膀；微笑，放松。我想我还是进行吧。我抓住克里斯托尔，旋转着将她带到地板中间。她很吃惊，但是很快她回过神来，跟上了步子。她是一个非常优秀

① 作者在这里开了个双关玩笑。将其比作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的真名是塞姆·朗赫恩·克莱门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而笔名则源自其早年水手生涯，意思是“两个标记”(Mark Twain)，亦即水深两浔(1浔约1.8米)。

② 美国的宗教派别，历史上犹他州的盐湖城是其活动中心，曾经实行过一夫多妻制。

的舞者，而且她的穿着也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仿佛一层液体薄雾，一种水舞，连接着一阵精致的节奏。他们演奏着《魔幻星尘》，我们旋转着。我希望你开心。哦，她叹了口气。我相信我们会的。塞姆很不错。他的教会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的捐款会带来好运。但这并不是关键，我们听到了他折断眼镜的声音，不是他嫉妒的可怕迸发就是别人刺破了他的矿泉水。我听到了鹿角在松树下发出的咔嚓声。我父亲告诉我你是威利的指定继承人，她说，她的脸紧贴我的脸。那可能是一种夸张，我纠正她，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循规蹈矩的梦想正有意靠近。这就是她变心的原因。今晚你住这儿吗？是的，我得购买一些股票和债券。我真应该将它们全都兑现，我对她说了个谎，我们从人群中穿出，来到边上，这次我又把她从受伤但还在微笑的塞姆身边诱拐掉了。不，等等，她恳求道。等等。她的声音十分销魂，仿佛是高潮中的停顿。塞姆知道这一切。你应该跟他聊聊。但是如果出现金融危机怎么办？我问道，卸下了我母亲的消极因素。亚洲不会有金融危机，她说。那就等着瞧吧。塞姆说他们全都是老虎。但为什么又要提犹他州呢？就是为了变换一下，她说，进去，出来。她的胸前散开了一丝真丝，绕在了她的指甲上。这个涂鸦会把你展示出来，我说，我将丝头绕在我的手指上，趁着真丝还没散开将其递了回去。她碰了一下我的手，将丝折成褶子塞了回去，然后轻轻地拍拍胸前。

克拉维迪亚看到了深水，开始插手。轮到我了，她唱了起来，并将克里斯托尔推给她男朋友。她回来时喝了酒。我喝得太多了，房间在旋转，克拉维迪亚的围巾很快变成了一块魔毯。把我送回房间，我像是下命令似的说道。先穿过楼上的餐厅，然后向右转向第三道门。伊俄卡斯特正在跟一群人谈话……亚美利哥知道我多么爱钱，她正说着，就在她抬起眼睛时，她看到了我给克拉维迪亚搀着，她皱了皱眉头，但是一点也没有乱了阵脚……他从海外回来后，就将一千元钞票系在了我们的晾衣绳上。亚美利哥是容氏船务公司的一名船长。为了躲避我的同父异母

姐姐，他签约上了时间最长的油轮。

但是精明的克拉维迪亚并没有马上将我带到我的房间。我需要一个更清醒的头脑，她说。我不知道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她用轮椅将我推了出去。瞧，她说，最后再瞧一眼。摩天大厦突然出现在海港。威利舅舅的码头到底之后有一道链条钢丝门。她将门打开，然后让我跟着她。她的衣服在灯光中闪闪发光。我们站在一个木制平台上，边上是一个集装箱码头，我正准备说话，嘘！她赶紧将手指堵在我的嘴唇上。听。从海军部的庆祝会场传来一阵华尔兹音乐。是菲比赫①的曲子，她说，并且哼了一句。然后她挽着我，在一小块地板上跳起了舞，我感到这块地板在振动，并且正在驶离这片土地。

我压力重重，醉生梦死，不过我还是回来了，回到了黄金别墅的绿室(门刚给油漆成红色)。一切都在旋转，绿色盈盈。克拉维迪亚脱掉我的鞋子和夹克，还有的我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自己一直在笑。她说水好深，同时转动着一双眼睛。我生来就是这样，一切都发生在船上，没有了呼吸，但在短暂的窒息中却对阴间依然那么熟悉。我看了一下尘世中自命不凡的闹剧，然后纵身跃入阴间，但是一个医生一把抓住了我的脚，将我拽回人世。打那之后，循规蹈矩似乎就成了常规。如此说来，虽然克拉维迪亚十分迷人，但是我在寄宿学校也学会了一两手，我仰面朝天，双腿弯曲，有节奏地呼吸起来，一边祈祷，一边晃动，渐渐地变得强壮起来。没过多久，这位好心人就走了。为这事他们会一直声讨我，但是他……怎么说呢，对自己的机遇一直比较含糊。

快黎明了，或者说离黎明也不远了，在这些地区，没到黎明也跟到了黎明似的，光线早早渗透了进来，也许是穿过尘埃浓厚的空气渗透了进来，反射出沿海核工厂传来的辐射，这时，我的门好像自动打开，一

① 兹德涅克·菲比赫(1850—1900)，捷克作曲家。

个人影穿过地毯。然后我清楚地听到一双鞋子搁在了梳妆台上，一种不易察觉的重量压在了我的边上，很快，一绺长长的头发拂过我的眼睛和脸。我笑了起来，知道这种节制有度的梦想还没有抛弃我。她抛弃的是她的摩门教朋友。克里斯托尔先是重重地压在我身上，然后在阵阵浅睡中，将语言带到了我的冥界。然后，她十分自然地将细腰靠在我的手臂之间，轻轻地朗诵着中国艳诗，就这样，我们互诉衷肠。我们小心翼翼，又是击掌，又是捏拧，还玩着杂耍，做出各种可怕的不对称的动作，同时还哇哇地叫着。到了最后，我们吹着口哨，叹了口气，精疲力竭的军队就此缴械，线头解开，我们背靠顽强的早晨，浑身是汗，而货船则沿着雾气重重的隧道来回行驶。一个通宵陌生人，此刻转眼便现身。过了一会儿，她伸手拉上沉重的窗帘，遮住窗户，自己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并把我拽到身边，这一次她完全是自行跌下。我抓住她的脚踝。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她戴了一副 24 开的脚镯，标明了她的三合会身份。我的表姐辛迪·林冲着我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她说，这是回归时间。

离家出逃

入狱的最快途径就是卷入家庭之中。

我知道的很多。我打电话到巴黎，跟卡门讲了很多。她正起床，也可能是准备睡觉，她白天变成了黑夜，她说她头疼，脑子里闪着艳绿的光。电话线里传来的噼里啪啦声验证了她现在的情况。你是我留下的唯一，她十分绝望地说道，你就像一个家庭。也许你应该回家，我对她说。已经够倒霉的了。也许我们应该一起进行拍摄，我说。我一定给了她希望，因为她的声音柔和了很多。她说她正在拍摄她的堕落。我要给抹杀掉了……她几乎是冲着电话线在大声喊叫……我需要你看到这件事，肉体抹掉，只剩下了骨头。

我真是倒霉透顶：明知道帮不上忙，却还要承担这种责任，回应这种呼救，或回应辛迪·林穿衣离开时所提及的清晰而艰难的试验……我需要你；需要试试你……她很大胆，因为她手上有一盘录像带，里面拍的是我在澳门那间空阁楼的浴室里洗澡的场面。洗澡间里有监控，她喜欢在鸟眼似的镜头里重新放映我那矮小的身材。如果你需要帮忙，她说，过来看看我。罗伯叔叔有兴趣。说完之后，她鞋底咔嚓一下，消失了。

回来就死。我的脑子里反复重复着这句，仿佛要乘着风浪赶向巴黎，赶往空空的公寓和无情之爱。卡门说她准备一两个星期之后回上海。她把地址留给了我：华懋饭店。我明白了。这就像一个散板。一座

城市吸引着你，一段贝司线，你左手放下了，右手却不合拍。

回来就死。我听到了呼叫。

上下波动的喷射双体船喷出滚滚烟雾，我坐在那儿，等待着上午的啤酒，而他们则在做着“快乐法国”牌冰淇淋广告，我乘着间隙溜出座位，来到船尾，将威利舅舅的对开本丢在了一边。我放手的时候嘴里嘀咕了一句，他妈的，整个的红色文件夹滑落，悬挂在那，它上面一英尺处是正在起泡的黏液和正在冒泡的油腻腻的液体，再次成为他妈的傻瓜真爽，看着这一捆捆纸移动并消失，这是我父亲的遗产，是他的礼物，他的整个帝国残余，现已成为另一个人罪行的遗嘱修改附录。我回到屋里，感觉十分舒适，周围都是些赌徒，他们迫不及待地讨着香烟，他们那发黄的手指哆哆嗦嗦地翻弄着那些充满了暴力的新闻用纸和赢来的钱。我们经过海岬和岛屿，在平川之水上摇动，卡蒙斯指了指他的小帆船，将六节诗抛向风中，想平息这骤起的高烧。石山里没有水，乡村女孩子发放的那些鱼给腐烂的舌头带来的是更多的灾难。

啤酒。开。女招待将啤酒扔到我手上，我握着冰冷的啤酒罐，放在一只疼痛的眼睛上。看轮廓她像我的表姐辛迪·林。那天早上，辛迪将我带到了坟墓。那天是清明，是扫墓的日子。山边的墓地斜坡十分陡峭，一直延伸到水边。我看着她一屁股坐在圆石上，将香点燃，欲望和尊重同时在内心升起，然后我观看着大海，在大海不断变化的色彩中，我看着她非常非常柔和的嘴唇。跟往常一样，海滩边的阳伞下有五六个女人在忙着。她们在拣选骨头。弄干净，然后再根据大小进行挑选，将长的骨头敲碎。她们燃烧木头，将头骨烧焦，然后再用锤子将它们敲打进去。后来我才意识到，阳伞不是为了遮阳，而是为了掩盖挖掘。现在女招待卖起了高尔夫阳伞。这一次她没有出售阳伞，那些赌徒们都在剔着牙齿。对他们来说阳伞意味着霉运。快乐法国！录像发出大声尖叫，天空转成灰色，浓雾笼罩在堤防上，盐雾给窗户罩上了一层白霜；快乐

法国！银幕展开，给旅馆做着广告，中间穿插着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台风即将来临，喷射双体船夜晚暂停作业。后来，船身下，内港发出了嘎嘎声，水面再次沉寂起来，扇贝似的波浪冲向棕灰色石岩，上面褶皱般悬垂着各种塑料和腐物，冲向喷射双体船码头，快速通过澳门，最后冲向赌场。

风撕着旗帜。你想知道旗帜上是些什么，这时一个身着短茄克衫的小伙子走上前来，笑容满面，说他们正在给一个舞蹈节做广告；哦，是的，他们在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卡蒙斯庆典，先生，你想乘出租车到你的旅馆吗？只要十五澳元。你接受了，他将你引进一辆面包车，同时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背诵了一段《葡萄牙人之歌》，后来到第一个转弯处时，你又认真考虑了一下，给了他五十澳元，要求下车。他耸了耸肩。我喜欢走路，你说，然后又叫了一部出租车。澳门总是充斥着稀奇古怪的人：有学问的，没学问的，他们成天嗜睡、爱耍小聪明，构成了一种危险。是的，成天嗜睡、爱耍小聪明，诡计多端，然后他们将刀片放到你两肋之间，你在想。此外，这个地方沉迷药物，记忆缺失，但也十分可爱。由于与世隔绝，并为此感到骄傲，这儿的居民患上了一种嗜睡症，只有在狂欢节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来。后来，肉体上的压抑爆发，变成中葡之间的一场吵闹，进而演变成维纳斯和巴克斯之间的战斗，双方灰心丧气，然后在史诗中开放出鲜花，或在大教堂，马赛克广场和红亭边，沿着小酒吧和廉价公寓，打起群架，然后衰败。这是纯戏剧，可以突然之间涌现出天真而野蛮的欢快……对生活充满了盲信，阿纳尔多坐在医院的床上，两腿之间搁着玫瑰经，朗诵着诗文。一队教徒列队经过，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可怕的长者，手上握着一根长长的金头权杖，跟在后面的是一个胖胖的修女，脚上穿着凉鞋，手上撑了把伞，接下来是怯懦的中国儿童，年龄有大有小，他们身穿白色汗衫，配上天使之翼，唱着圣歌，迎风前行。他们挥舞着旗帜和圣徒遗物，风将他们轻柔的歌声吹走了。拐角之处是一个十分花哨的舞厅；货币兑换商，理发师，猪肉

贩子。

今晚，舞蹈大赛！灰色赌场高高耸立，随着黑色出租车缓慢地经过大桥，赌场变得模糊起来，这些桥墩和着风一起在歌唱。这股风吹到了大饭店前的湿台阶上，在这里可以谈个好价钱，因为昨天，就在饭店外面，警察局长遭到了枪杀，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撒下了沙子，将血遮住，门口还没卫兵，里面则有便衣，人人都带着多疑的眼神看着你。你在拉下的百叶窗后尽情享受。你喝空了小酒吧，双手在颤抖。看到风穿过百叶窗的板条，冲洗着小河。跳进去，去跳，去啊。由于赎罪不足，你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血和沙子懒懒地卷在一起，流进了下水道。这已经失去意义了，这点更重要，你现在已经彻底投入，变得冷酷起来；如果你从窗户跳出去，你肯定会获取知识，清晰地认识到，这个世界极其平静。你从窗口移开。

他去游泳，想忘记自己，在日渐暗淡的光线和阵阵大风之中，他从一个泳池游到另一个泳池，从泳池游到酒吧，然后再回来，再从泳池游到棕榈处，从棕榈那儿再游到花园，在游的过程中，他想到了拱桥下的辛迪·林，他仰面漂浮着，看着弯曲的树木，看到头上万家灯火。他感到又冷又抖，他拍着巴掌走了回去，用毛巾擦了一下身子，然后吩咐饭店将总汇三明治送到他的房间。走廊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身段和影子，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女士们大声笑着，试图抓住毛皮衣服和缎子，她们的裤子薄如细纱，几近透明，宛如湿气中的蝉翼。他听到了剑和木底鞋的格格声，抓住了一块飞扬的真丝，是旋转门口一位太太手上拿着的燕尾旗。他鞠了个躬，微笑着将这块真丝送到两位已经入座的美女前。混血儿。她们有的来自里斯本，目的就是为了出席这场舞蹈盛会。他爱她们；他爱她们全部。他穿梭来往于她们的芳香之中。他想走，在等着下雨。

从堡垒到墓地，从教堂到酒店。他想戴着毡帽和夹鼻眼镜走，听着风嚎叫着刮过空旷的街道，不仅迷失在陌生的环境之中，而且也使他迷

失，他怀疑他的所有命运，所有那些声音和发明都跟在同样不明的不确定路线上。他放开手指，于是他手上的纸滚动起来，飘过马路，他认为这是真正的完美。他回到房间，神气清新。他今晚会睡个好觉，他已下定最后的决心，排除了一切烦恼。他要了一点睡前饮料。

到了第二天早上，台风依然没来。街上大风横扫，在东望洋炮台，他们将台风提升到3号，表明每小时三十海里的台风即将到来，海港外已经看不到一艘船。第一次大的打击之后便会是一个错误的平静。中国人说，台风总是离不开太太。他早餐要了半瓶金酒，吃掉了小酒吧里的花生。如此营养之后，他乘着区间车来到市中心。到了这里，他沿着瓦斯科·达伽马花园边上的澳门东望洋街走着，看到了工厂女孩和算命先生；在一片灯光中，他们像鲜花一样排列，阿纳尔多和那些工厂女孩，他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在给她们小礼物。再向前几码，一个算命先生又停了下来，冲着阿纳尔多笑道：你不会再富有的，叔叔，闻听此言，他的父亲突然将算命先生抛向大树……我不听你……他抓住白胡子……别跟我说这个……他继续向邮局走去，站在水坑里，看着工人在门口升起旗帜，雨开始下了起来，他听着工人的谩骂，水冲向了下水道，他的思绪听上去也像流水一样，逃离了头颅和皮肤的外壳。他走了进去，从酒瓶里倒了一杯法国白兰地，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电话本里寻找起来。他需要记忆，然后才能彻底溜走。他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亲戚，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名字是靠得住的话。他到处被人复制。

外面，他听到了远处的鼓声。他像被催了眠似的，满心好奇，跌跌绊绊，一路前行。他沿着圣多明哥市场方向，头晕眼花，倚靠在柱子上，用一把折叠伞稳住自己，停下来瞥了一眼已经关门的书店，然后在玻璃里看到了一群年轻人在排练舞蹈，他们身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衬衫，头上裹着红色的丝带，那姿态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的身体弯成弓形，仿佛是一条条蛇，在他来回晃动的脑袋上蠕动。他继续前行。大街上灯火辉煌，十分热闹，但是在繁华的外表之下则掩藏着危险。辛迪·

林将此称之为回归时间。在拐弯的地方，他们交换着符号，取下陈旧的蓝白相间葡萄牙文匾额，换上黑色的中国大字。三街会馆。啊哈！历史的交叉路口……注定了要消失。

他甩不掉这些废墟吸收这些废墟牢记这些废墟潮湿的石头湿漉漉地压在他的夹克上此刻他已不再是浪荡子而只是又一个酒鬼他一次两次绊倒然后想最好还是停下，问一个坐在鱼店外雕花木箱上的老人这一切是什么……醉龙之舞……这就



是他所知道的一切老人冲着他笑着说道同时又打了个呵欠，从鼻孔里拽出一根鼻毛，鼓声越来越响，在化地玛圣母女校街，雨又下了起来，同时还伴随着米粒，跳舞的人将米罐顶在头上，将米扔下，然后又搂住彼此的腰，打起精神，像蛇一样波浪起伏，穿过狭窄的通道，他跟在来回晃动的脑袋和流动的尾巴后面，穿过鱼摊，就在这时，有人一把抓住了他，他也流动了起来，他们传递着一罐罐的米酒并将酒倒在他的头上，灌入他的嘴里，然后再洒向彼此，鼓声再次响动起来，现在变得疯狂了，过了一会儿，鼓声放缓，在黑夜中，气压中的水滴变得压抑起来。水滴垂直下垂过程中猛然弯了一下。龙盘绕了一下，转过了身。他站在角落里，还活着，但却失去了爱。过去，他父亲常常到关前街的卡洛斯·卡斯特罗馆来看他的堂妹，一个不幸还没有结婚的堂妹，她使他感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和重要地位，虽然他们坐在一起只是喝喝小声嘀咕的女仆给他们泡的茶，而她不停地谈论着奥逊·威尔斯[①]，她说他在拍摄《港澳轮渡》时曾经引诱过她，还有柯德·尤尔根斯[②]，这个人更糟，

① 奥逊·威尔斯(1915—1985)，美国作家，电影导演，演员，制片人。
② 柯德·尤尔根斯(1915—1982)，德国演员。

来回穿梭，没有国家，她说，她一边说，一边满脸担忧地拿出她自己的护照。阿纳尔多看上去有点像奥逊。他本来是可以试一试的，但是他太了解这个家庭了。他没什么好申明的，随着大雨降临，他想离开。此番过后，他可以永远得到净化。街道变直了。鼓声再次加快，随着鼓声而来的是饮酒越来越快，哨声吹起，他起先感到酒倒下时有点温热，过了一会感到胃在烧灼，脸在发烫，米一样的雨水更加猛烈地浇灌在他的脸上，龙之舞的成员一个一个踉跄起来，喝得烂醉，他感到他的两腿突然拖了起来，然后，他像被剥了皮似的，一头倒在了满是鱼鳞的木桌上，他们让他在那儿休息，冲着他笑，此刻，哨声鼓声都在敲击着他的脑袋，旗帜旋转着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句话又绕了回来。他一连七次忘了阻止他父亲的送葬行列。为了赎罪，棺材每牵引两米，他都要停一下。这是一种驱邪，这种长粒米是长寿米，就在大雨提高了海龙王的地位时，一根矛尖状的长枪十分危险地移到了他的眼睛上方，就像一根球杆和一张满脸胡须、一脸怒气的红颊紧紧靠近他的脸，哈欠连天，笑声不断；长枪平衡了一下，防止扎到人。你瞧，一个口音明显很重的女人冲着一群游客大声说道，渔村边有一个男人掉进了河里，这条河里住着一条巨蛇。村民们将他救上来，往他嘴里灌葡萄酒，让他活了过来，没想到他醉得很厉害，又潜回河里，将龙杀了。他们将龙拖上岸，发现这个家伙有雄鹿似的触角，兔子似的眼睛，水牛似的耳朵，蛇一样的脖子，还有鱼鳞，虎爪和鹰爪。克拉维迪亚·恩格尔捧着他的头。我在送葬行列中看到你，她说，于是将你拖了出来。这是一个严肃的节日，外国人不应该卷进来。如果你的舞蹈被人解释为嘲笑，那问题就严重了。她擦去他头上的米和酒。这些表演经常有三合会的人参加……她推了他一把，让他站稳，然后继续指引着他。你彻底忘了，她喘了口气，我们之间的约会。约会？是的，今早十点，和塔瓦雷斯牧师。谁？我还以为是在一起吃午饭呢。你失去了记忆，她说，这就好理解了。她推着他前行。此刻，他们就在邮局的后面，商谈着去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的步

骤，突然风雨来袭，撕破了克拉维迪亚的伞，他说他们俩用不着伞，尤其是在商谈要采取的步骤时，因为我们都不合时宜，然后他又将手指放到了嘴唇上。小心，他大声读着指示牌；步骤。一共有三步，他说。音乐，建筑和织物。瞧，把伞当手杖用，效果会更好。我们都在飞。他打了个滑，双手紧紧抓住栏杆。这个塔瓦雷斯，我们晚了多少？啊，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她说。他的领带拍打着他的后背。也许你应该像拴狗一样给拴在这上面。我可是彻底潦倒了。我是不是衣冠不整？我是说，不像牧师？还好，她说。不像你的初领圣体。不像，他想了一下，然后又加了一句：但这是最后的仪式。她搂着他，他们一起蹒跚前行。今夜，盛大舞会！独眼卡蒙斯也喜欢跳舞，他说。他们转过身来，沿着海景豪宅海擎天向西望洋山走去。这个世界看上去就像是个独眼。这是种什么舞？他问道。噢，是一种年年举办的比赛。这是一种澳门人的节日，起源于狂欢节。通常在街角都会有群舞，但是今年来看，即将到来的台风将他们都堵在了家里，除了中国人。除了我们，他说。我们就像是日落时的金枪鱼，抵御着阵阵潮流。澳门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节日。祝你健康！旗帜拍打着，撕破了。在远处水面上，冒出了细长的黑烟。他的前额刺痛，他捏住鼻子，深信有一只水蛭爬了进去，血不停地滴着，他依然能够看到别人手上握着的长矛，在人群中保持着平衡。一个无牙男人满脸微笑地走了过来。他想出售一只人眼，他张开手，露出一只蓝色的虹膜一只摇晃的蛋，但是克拉维迪亚这个出力报复的天使将他嘘走了。梅布尔斯。他在出售大理石弹子[①]，放他们进。澳大利亚俚语，他对着树低声哼道。那个人要死了。啊？克拉维迪亚无意中给他占了便宜。你怎么知道？也许是通过可怕的瘟疫；也许是他母亲在战时的肉里看到的脂肪血管让他变得恶心。他吐在了海堤上……过去他常在这海堤上来回推着玩具小汽车，一款超级跑车模型；威严而不失田园风

① 双关话，在英语里，梅布尔斯跟大理石(Marbles)是一个单词。

味，这从来就没有建成。在融和门下面的深水区域，有一百多条鲨鱼在进行厮杀。她推着他向前，到了现在，他的下肢已经麻痹，他想找一辆童车躺进去，但是却一辆也没找着。他们来到主教住所后面的神学院，他挺想在这儿看到孔雀，或一群洛特维勒牧犬，但是他看到这一切都是多余的。这个地方是个堡垒。在前面的一个小岩洞里，卡蒙斯弯着腰在写诗……拿起武器，列队行进中的汉子……他是葡萄牙的维吉尔。他在这儿遭遇过海难，躺在手稿箱上给漂到了岸上。克拉维迪亚用力拉了一下钟绳。没人过来。也许我们应该滚一个炮弹来把门轰开，他建议。好了，好了，她说，注意自己的行为。她又拉了一下，接下来他拉，他们轮流拉，一次比一次有劲。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小钟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音，好像什么人不小心把调羹掉了似的。他看到下面温柔之角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风暴海角，凶猛的海浪撅着嘴，将浪花飞溅在教堂的墙角石上。啊！路索斯的子孙[①]啊，这需要何等的傲慢才能设想出中国的海岸会扩大你的帝国，设想出这种探险、慷慨、精力和宗教热情一点也不会沉浸到你母亲永恒的静默之中！他大声怒吼，使劲拉着绳子，突然，绳子断了，他四肢摊开，摔在了草皮路缘上，他的胫骨撞到了低矮的石墙上，蹭破了一层皮。克拉维迪亚扶他坐了起来，按摩了一下他的前额，幸好他逃避了绞刑套索，没有丧钟为他敲起；他就跟他的叔叔达里奥一样，就连到现在，他都没有说出达里奥有三百一十五磅重，是的，花瓶男迷恋上了女学生，这些女学生想用活动百叶窗的绳索结束他的生命，但是没有成功，却将他径直丢进了下面的花房。唉，这就麻烦了。他抓住了她的手；我需要在别的地方生活，我亲爱的克拉维迪亚。坦率地跟你说吧，她叹了口气，男人真是个麻烦；但是这一次带你出来是为了让你的脑袋放松一下，是一种治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此的原

---

① 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儿子（一说是朋友）和传说中卢济塔尼亚国的始创者，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在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把葡萄牙人说成是路索斯的后代。相传此诗有一部分是诗人在澳门白鸽巢公园的石洞内完成的。

因。我有一帮人类学家，明天会在周围跟踪，所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她已经能够看到他们：一小群随意散漫、长着胡子的男人来到几乎荒废了的终点站，站在办公桌边，敲打着他们的脚趾，嗒嗒地敲击着他们的手提箱。就在她说话的时候，门咔嗒一声开了，他满以为这扇门会像古代的吊桥一样落在他的头上。在另一边，一个干瘪牧师，穿着黑色长袍，上面抹上了石灰……他们已经给你盖好寿衣了吗，我的神父？他的贝雷帽上沾着给刷白了的石头碎片，他一直在凿着这石头，想揭示其中的真相，一位业余艺术家雕刻的这张圣母脸，充满了沮丧，固定在这里面，有几百年了。你在墙后发现的东西，那些甲壳纲动物，盘旋着，侧着身，他说话时，玻璃背后那双龙虾似的眼睛闪闪发亮，充满了惊奇和恼怒，他带着他们拾级而上向神学院走去。对了，他说，你要喝茶吗，中国茶，苏格兰茶，还是蓝蛙茶？他的房间就像是图书馆的陈列室，而带轮子的小床可以同时当作梯子和小窝，每到夜晚，他就会设想，塔瓦雷斯神父就像普洛斯彼罗①一样，劈波斩浪，热情地寻找银鱼。墙上湿漉漉的，尽管潮湿，他还是感到寒冷和颤抖。胡子上沾满了茶水，不错，这里面变化多端。他心烦意乱，忍不住说道，这是第一次有声称自己是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后代的人来拜访他。多幸运啊！接下来他干脆痛快地扯起了话题。时间是关键，他说……我们等着他说下去……他善于说教，将手指放在唇边，想表现出一个有效的停顿……天主教依然位列澳门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但是等澳门1999年回归了中国，教会怎么办？它的未来如何？塔瓦雷斯伸长了手臂，他的茶溢了出来。船再次倾斜。你应该在里面加点尊尼威士忌，他说，不等回答，他将大半杯黑牌威士忌倒进了杯子。克拉维迪亚拒绝了，她用手遮住了她的杯子。教会最好的出路，他继续呻吟道，就是在利好的时候出售这一财产。为秘密计划而开支，出售或交换市中心的财产，这不会产生政治威胁，然

① 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

后我们就将钱投资在纽约和伦敦的股市里。他用沉重的十字架抽打着一只苍蝇。你知道，凭着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地方纵横。神父。塔瓦雷斯带着角质架眼镜，一双眼睛在镜片后眨着。沉寂。安东尼奥在计算着生与死。他的父亲出现在办公桌后，用账本搭建着塔，并冲他们甩了甩手帕，抖起点尘土。让我们复活。什么？现在酒鬼直立，借着风站稳。他仔细地翻阅着牧师的善本书，推着有脚轮的矮床，他注意到所谓的小床就是将干净浆硬的床单拉直，然后像军用帆布床一样折叠起来。

只有一个难题，塔瓦雷斯神父说道，他推着他往前，后来车轮嘎吱嘎吱地响，并且转离了书架，停了下来。此刻他和一个满脸白胡子的人面对面。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想卖，这就是历史纪念碑，一个民族博物馆，一个神圣的场所。只有它不受任何法律保护。

哦？另一个人一边询问一边发抖。这个地方没有加热，他看着塔瓦雷斯神父的凉鞋，看到了他粗糙的脚皮。圣人扼杀了所有的乐趣；芬芳的花船上没有华丽而开心的顶礼膜拜。

噢，不。肉仔的土坯房不受法律保护，这片土地被本地区最富有的人所购得。他的名字叫罗伯·林。你听说过他吗？是的，我敢肯定你听说过他。

他能听到克拉维迪亚鼻孔喘着粗气。看到他的舅舅们穿着法兰绒衣服，在下面的网球场上跳着华尔兹舞，不时触到球网。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当局相信这会给罗伯的机场赌场开路，他们还使主教深信，出售是聪明的。

扑克，扑克，牧师们在玩着游戏。这就是权力政治，我不想争论这事。你瞧，老先生继续说道，正如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人性，经济和社会抱负普遍化，因此我们也要让我们的心理学普遍化。跨越时空，这就是错的。任何一个帝国结构都实现了这个目标。不同的地方对待死

亡、自我和爱的态度也不一样……在不同的社会里，你依然可以到处看到人们在拒绝神经症，完全浸透在社区的现实之中。

他希望在他的杯子里能多加些威士忌。

这不仅仅是东西方的问题。葡萄牙人认为他们在使野蛮的东方变得人性化，但这完全是浪漫思想的泡沫。真实的意图是生意。所以，出现了诡计，出现了伟大的便利和妥协概念不足为奇，这是避免野蛮行为的一种途径。这不是哪个更文明，哪个不够文明的问题。这就是文明。

他的父亲卷起报纸，在空中画了一个弧。一堂俄语课。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拐弯抹角了吧。此刻你的脑袋应该很清楚了。你玩扑克吗？我有一些纸牌要交易。

一种交易？

克拉维迪亚告诉我，你在档案里寻找一些信。

一个作家。一篇短文发表在一个杂志上。他有可能是一个亲戚。

噢，那得等着瞧了。你知道档案也有假的；滥用记忆和所有那……

牧师在摸索着高卢牌香烟。

看看这。还有的在后面呢。要让林先生深信，不要去开发这片土地，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

克拉维迪亚咳嗽了起来。她解开围巾，然后拿出一块手帕。她的两眼布满了血丝。

这么说他是真的了？克拉维迪亚跟你讲起过他？

这个……塔瓦雷斯神父将香烟放回黑色法衣……我们将他翻译过来。他过去常给我们寄他所谓的图画诗。我们从没见过他；一个白痴似的学者，他们说。他点燃了两根香烟。

不，谢谢。

我不吸，神父赦免了自己。踩熄了一根香烟。是的，他可能取的是假名。顺便说一下，书法是中国临摹的做法，练习着不同的书体……主题有可能不是他的……而且变得日益狂躁。他言语重复，得了青春期痴

呆，欣快症和周期性毛病。我们得停止鼓励他。他发出了威胁。他说他的壁橱有各种骨架可供展览。他有可能疯了。我们有一箱东西一直就没打开过。印章，你知道。

塔瓦雷斯神父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他的话。然后他双手抱膝，叼着烟卷嘀咕道：你让罗伯改变主意，我们来好好处理一下。这是秘密，你知道。是的，你把罗伯给我们，我们就把疯子交给你。

塔瓦雷斯神父透过烟雾偷偷地斜眼看着他。

他们握手成交。不过他还没有想好他究竟怎么去看罗伯。神父急匆匆地走开去接电话。克拉维迪亚站了起来。

我们最好走吧，他说。

但是她只是站起来从书架上换了本书。她在想着什么，将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让他等一下。她拿出一张小屋的订单。

拿我的吧。这是卡门的票。

噢，塔瓦雷斯神父从另一个房间说道，我忍不住要偷听，不要错过一出歌剧。

你走吧。到了早上我会给你打电话，克拉维迪亚对他说。我今天还有研究要做。同时还需要睡一会儿觉。

塔瓦雷斯神父挥了挥手。

一出门他就开始跑了起来——他需要让身体强悍起来——担当起这个新的使命。暴风雨即将来临，温度变得太高，海擎天花园里原本一片宁静的熏衣草，此刻也散发出亵渎的味道。

狼和披肩

台风依然还没来。

他回到旅馆，给辛迪·林打了个电话，空置音一句接一句低声诉说着。他想到了侵人他体内的黑暗，一个可触摸到的黏质，只有用酒精才能发酵。但是现在丧钟已经开始敲起，黑暗再次开始报复。他窒息了。有时候，有一百棵树同时向他涌来，堵住了他的路，啊，是啊，我以为午夜的木头确实在移动；有时候，他得成天走路，生怕地球旋转出它的轨道。通过这一切，他时不时地瞥到欢乐，别人的幸福；但是他已深深扎根于绝望之中，无人可帮。这是因为他就这副脑袋，凹凸不平，一副异己样态，像牡牛，混杂而反常。在澳大利亚，人们往往是再三盯着看。有人拿起话筒，睡眼惺忪地回道，什么？是她。一副哀叹的语气让他心情大乱。他们没有提到黄金别墅，也没有暗示有可能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她可能找错了房间，也许道歉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她有心见他，建议一起到峰景酒店吃顿饭。但是他没有吃饭的心情，支支吾吾。我需要见见罗伯，他干净利索地说道。告诉他是我在继承。

她开着金色保时捷去接他，他已经做好再次被诱惑的准备。他一屁股坐在她边上的软皮座上。但是辛迪·林根本就没有流露出任何亲昵的神态。她卷起了自己的长发，看上去像一个狮子狗，她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还有这种方格子的衬衫，如此打扮使她看上去像邻家女或小家碧玉。要是她会笑就更好了。但是她很脆弱，开车过程中停停动动，将车

旋转到摩托车手也不敢尝试的地方。我只想让你知道，她说，经过长期沉默之后，罗伯叔叔已经不是一个十分健康的人。他患上了肺气肿，快死了，经不起长时间对话的折腾。我知道这点，他说。我不会占用他多少时间或呼吸。她带他转了一下，告诉他她恨他。快点，更快点，对，就这样。你醉得很厉害了，沉默了一会后，她说道，同时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她看上去十分生气，穿着运动鞋的脚使劲踩着车子的踏板，他注意到她的牛仔裤里面穿的是长袜，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手握她的左手，她没有拒绝，他将手握了一会儿，直到她使劲将手拉开，按着窗口按钮，摇下窗户，然后冲着踏板车发起誓来，突然，他想到爱情就像是一扇忽升忽降的窗户，他还没来得及冲着爱情的真实性发誓，整个生活就被延误了。

黎凡特人。结束了。我要走了，离婚前，他对鲁西说道，同时两眼看着他们海外旅行时一起购买的东西；各种小摆设，日本娃娃，金边笔记本，所有这些全都堆在床上，就像他奶奶最后的表演，在她去世之前，她将所有的东西都摊了出来，为的是想记住它们。再问一遍，是什么？她问道，这一次，他急不可耐地想真干一场；将狗送掉，追着汽车赶到机场，坚持不懈，一直到东南亚的某个海滩，到了那儿，黑色就可以消除了，他可以参加四十个鸡尾酒会，让女按摩师按摩一下，然后懒洋洋地坐到竹筏筐上，轻轻地滑进玻璃纸般的海里，周围是塑料袋装着的暖石和橡胶皮带。他不需要律师。他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沿着十二生肖连贯公路的海岸而行，就在经过高尔夫球场到达威斯汀度假酒店前，他们转向了一个私人车道，辛迪·林倚出窗外，挥手打开电门，他们来到了罗伯的豪宅，一幢斜顶房子，墙面嵌饰着一块块的大方石，还有三个高高的烟囱，十分醒目。一个男子穿着裁剪合适的衣服，站在一边，透过黑色玻璃仔细研究着这些，不过阳光已经没那么充足了。靠近石墙和电栅栏处还有两个卫兵，手上拿着手枪，同时牵着一对杜宾犬。辛迪·林从座位上挤出来，脱掉运动鞋，像单脚跳似的

换上一双红色高跟鞋。

伊曼纽尔将他们引进书房。伊曼纽尔是位男仆，黑得像豹似的。这对情侣尴尬地走了进来，弄脏了他的迪奥牌领带，她的细高跟喀哒喀哒地走在石板上，脚趾突出来，好像她是个身穿喷涂牛仔裤的女牛仔。整个大房间冰冷冰冷的，里面配备了真皮扶手椅和巨大的盆景，墙上装饰着熟悉的绘画，初看上去，十分灰暗，比原作还要混乱，后来他才明白，这些都是原作，他从前只能在书目里看到。房间正中显得凹陷，不经意看去，还以为是另一层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巨大的鱼池，光线是从底下照上去的，水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往上涌，沿着植物下的导管流向房间各个地方。他走进一间巨大的洗手间。罗伯坐在一辆扶手椅里，腿上盖了条毯子。他依然还保留着一头好发，中间分开，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摩着这头好发。他的脸充满了皱折，下颌松垂，他的肩膀弓起，一双眼睛满含怀疑地看着他。他满以为罗伯会嘶叫，这时辛迪·林走了过去，亲了一下老人，于是老人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幸福，衰老，他做着种种假设，除了一双眼睛已经没了神气，他在仔细研究着他，他感到一滴汗水从衬衫和肋骨之间冒了出来，而水沟还在丛林周围汩汩地流。

啊哈！是的，你是安东尼奥。浪子。

由于没有接到邀请，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站还是坐，于是他双手背后，向绘画走去。波洛克[①]在跟他说着些什么，在一个垃圾倾倒场，他看到苍蝇云集在腐烂的破衣服上，一张快要衰退的脸，一只淡绿色的手，指甲是紫色的，一天早上，他磕磕绊绊地走在车身零件上，外出给人治夜间痛，但在村里寻找橄榄油和沙丁鱼时转错了弯，在废墟中他感到心神不定，这是一幢历史建筑，他们正准备摧毁，这片土地正对着快速增长的混乱，他踢了一下脚底，他以为那是动物内脏，接下来土地化

① 杰克森·波洛克(1912—1956)，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

脓，侵蚀到股骨。这里湿气太重，无法保存，他说。

你这么看？你真的这么看？罗伯非常高兴。也许你知道点保存办法。

不，不。只是在艺术画廊里你看到的这些除湿器。

啊哈！说得对。老人弯腰站了起来。我不去画廊。但是这里的空气是干的。到处都有水，但是空气是干的。有一套特殊的空气控制系统。头上，你瞧？要不然我都没法呼吸了。

是啊。

你要茶吗？还没等到回答，他向伊曼纽尔挥了挥手。我听说你继承了，罗伯大声说道，不加思考，一会儿咳嗽，一会儿欢笑。

上帝啊，他因缺水快要死了，智慧也帮不了忙；他生活的轴心也没有转变，他慢慢进入一种混乱的观察期，很快就会被吸到罗伯的池塘里。他的父亲继承了主要部分。在他行受诫礼的时候，他得到了家庭业务，还有一本出入一流长山妓院的红券。继承？哦，也许是房地产方面的生意，他说了个谎。

没有运输？

还没有。对新手来说这太复杂了。此外，玩家太多。他正穿过宽叶灌木丛。这片丛林让人出汗。感到罗伯反正是把他当做傻瓜，因为他活得还不够真实，当他活得不够真实的时候，现实就会巩固各种奇怪的要求。把他的坟墓封闭起来。罗伯旋转着他的脑袋，好像是在锻炼，他能听到椎骨的噼啪声。他在脖子上紧紧地围了一条羊毛围巾，就好像是系了一根带子，他伸出下巴，我则强迫自己从令人不安的打扰中退回来，回归自我。

我是谁？我根本就不算什么商人，我只是会挥霍而已。罗伯也看出了这点。一只苍蝇从伊曼纽尔打开的门口飞了进来，落在他上了发胶的头发上。他变得烦躁起来。他妈的！他拍了一下自己的手臂。他的情绪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瞬息之间，他从他的毯子里抽出一只听头，我猜

想这里面一定是肉豆蔻，他将团团喷雾抹在头上。空调之风将其吹回到他的杯子里，我看到丙烯除虫菊酯斑浮在他的茶上，同时还漂浮着些油点，后来他坐重新坐到椅子上，按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钮，座椅立刻开始启动，发出吸尘器般的声音，而他狼一般的头左甩右甩，辛迪的红鞋子则喀哒喀哒地跟在后面。他沿着水道滑翔，手指轻轻一弹，掀起一个日式长柄勺。勺子满了之后再倒下来，每隔 30 秒就在枢轴上转动一下，然后再反弹回来，这只竹杯在房间里发出回声，像枪炮响声一样。砰！

你父亲什么也没跟你留下，他说。他是为了逃离上海才签署协议将一切转手给别人。这个协议是分阶段签署的。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但是战事困扰。战争，还有就是和你母亲结婚。你的祖父将他榨干了。

他没有将他的祖父视作操纵者。没有考虑过长袍；毡拖鞋；钢制工具。他也没有真的将维吉尔视作辛迪·林的外公，或许他也目睹了他的隐遁，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一看到客人就感到害怕，然后他找了个借口，漂浮在滑板侧板上，消失了。也许正是对这事的记忆才使他分裂为二，生下了一个浪子，永远也不会表现出孝心、正直、儒家谦逊、辛勤工作和言行端庄。他生来就不会继承。他的祖父或许一眼就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双重自我，梦想；混乱和没有价值的想象。有一次，他看到维吉尔偷偷地穿过马路，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洪堡毡帽。天很热，他快步向一个快要死去的男人走去。他什么也没有给他女儿留下。但是茉莉精打细算，慢慢积攒，最后给她的儿子留下了一部英汉词典，里面工整地放了一百元钱。

时间很快过去了，罗伯粗哑着嗓音说道。你的舅舅威利多年来一直在威胁我，在这个世上，他叫过我每一个名字。他通过报纸指控我，雇佣记者写一些垃圾报道，说我如何通过三合会来操控码头工人。你会相信这事吗？操纵一个犯罪团伙？我这方面的教训多得很。

他把茶倒进水槽。鲤鱼向上游来，逆流游上水面，鱼的嘴很宽，在抖动。

后来他说带坏了未成年人，罗伯继续说道。你的叔叔会不择手段。他给我寄来了一堆他从警察局档案里挖出来的失踪儿童名单。我告诉你，是我收留了这些顽童和孤儿，让他们接受教育，给他们工作。

辛迪·林坐在沙发边上，修剪着自己的指甲，对我们的谈话充耳不闻。

尽管如此，我获得了一个骑士身份；但对你舅舅来说，这都是些侮辱和指控。他没有看到我手握佩剑横在肩膀上，但是他一定嫉妒得要死。那天女王呼吸时露出一股的洋葱味，她也知道这点，不停地看着别处，并用礼仪佩剑重重地打了我一下。我想她肯定不喜欢我的样子。在外面的院子里，我将奖章抛向空中。奖章掉到沙砾上。我想她正在上面的老虎窗上看着；我看到公爵的光头在背景后一闪而过，不以为然。我不想让人们认为，对我来说，骑士身份意味着那么多的东西。好了，说说你吧。留在澳大利亚？这个主意应该不错。大多数人为了另一个世界而放弃前面的世界，然后继续向另一个世界前进，永远流亡，永远不满。

我的世界再次受到曲解；另一个思想与我自己的思想并列。有一次，我的内心感受到了一种驱动，想在一个偏远的世外桃源里书写一部理想的作品，在这里，有原始的土路，好奇的凝视，大片的阴暗、丑陋和厌烦，夹杂着患水肿病似的有轨电车，隆隆作响的旧水族馆，积满灰尘的桉树，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提供充满创造力的厌倦……充满空白序言的日子，超越一切空虚的空虚灵魂。这是德累斯顿，这是平壤，这是死亡，下午5点，可怕的宵禁开始时，它的营业时间赶上了拉各斯。就连那儿的作家都像是吸了毒品，超级快乐，遁世隐居，听天由命，要说移动也只是在各个肮脏的饭店之间漂流。

我有许多孤儿需要照顾，罗伯说，他们极需吃饭钱。

后面这句话罗伯是用标准的广东话说的。这是典型的三合会语言。这种古已有之的故弄玄虚意味着你得为完美付出代价……而他们也是没

有开口的他者。不理解会引发种种后果……车上绑了塞姆泰克斯炸药，偶然经过的过客割了一个人的脖子，垃圾场里堆着给割下来的手。它们发生了。这事发生了。无论是本人还是非本人而言。听语法是要付代价的。罗伯的耳朵很大，他注意到。

有人敲门。伊曼纽尔走了进来，手上抓着鸡腿。

罗伯感到一切都完了。母鸡的眼睛一眨一眨，充满了恐惧，翅膀拍打了一两下。后来伊曼纽尔走了。

这只鸡是今晚用的，罗伯说。我总是在杀它们之前检查一下它们。

我有一个同父异母兄弟……

哦，是的。天哪，这把我又带了回去。我半辈子都在看着阿纳尔多你的父亲，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看到他难过的流泪，因为他向你知道的那个残疾孩子做出了很多承诺，就在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站在边上，阿纳尔多对着那个孩子读着书，后来，我从街上就能看到，他的灯还亮着，知道他还在跟他的儿子念书，再后来，就是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回到孩子跟前，依然跟他读书，并且还在他的墓顶放了一只天使，继续对着他读书，后来，上海的这个墓地给飞机炸掉了。我想孩子是因为自己的死而指责他，没有满足人类的意愿。

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我对罗伯说。我想相信。我拼命地想相信我父亲的忠实朋友，消除我突然看出的邪恶倾向：那个可恶的声音，充满了灾难性的猜想，天启般的意愿。

这么说吧，他不是一个幻想家，罗伯继续道。他使起劲来冷酷无情，这就是你的父亲，一个只能靠渴求幻想，然后再将幻想变成现实而生活的人，他相信这个世界应该为高贵和华丽而付出代价，因为拥有这些品质的人也拥有口才和远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你瞧。他只有想象。而且他还有自我价值。将他的升降线看作希望和实现的理由。这种痛苦延续了一年。这是脑炎，已经侵犯到了头脑，我们整天听着他受难，漱口和绝望的声音，跟外面的风一样规则而无情，事实上，这就是一种快要

死亡的声音。奶妈十二分地疼爱他。她叫他奥伊，意思是爱，他死的时候，她伤心欲绝，一个难得一见的事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伤心欲绝。阿纳尔多一直就没有跨过这道坎，表面上也许没什么变化，但是孩子的死亡是他命运衰败的开始，也是他世代结仇的开始。世代结仇？你说。是啊，族间仇杀。茉莉的父亲，维吉尔·容恨死他了。他常说阿纳尔多杀了很多人：婴儿，妻子，情妇。维吉尔是一名外科医生；他是要拯救人的。但是到了最后，这只是手段不同而已。阿纳尔多相信达尔文的免疫论，适者生存；维吉尔则要保护弱者。你是唯一活下来的儿子。你妈生你的时候正在过境，驶向香港前往她父亲的医院……

我回忆起父亲读书和撕纸的声音，他将一张张纸摔向墙角，纸的皱折还原封不动，这表明他下定决心要进行教育，后来，在体育场里，还是这个声音，他呼唤我出拳痛击，这时拳击手们已经汗流浃背，承受着砰砰的打击，他的手指捏紧，放在裤子的皱痕上，握紧成拳。罗伯的屋外奇怪的静了下来，仿佛幽灵已经安息。一道暗淡的灯光穿过植物渗透进来，我已做好减肥的准备。电动摩托呼地一声穿过地板。罗伯不是梦想家，他将秘密缩小到一个空空的铁笼子里。在那里，你看到一切扭曲、夸大了的意愿和遗产。

我准备建造一个大赌场，罗伯突然说道，他使劲移了一下椅子，就连辛迪也吓了一跳。他挥手让我们过去，将我们召到凉亭那儿，他揿了一下按钮，凉亭变大了。一张屏幕上印制了小鸟，火烈鸟，瀑布，拼命回放。一座模范城市展现在眼前，不，是从蒸气中浮现出来，现在给定型到北极极冷中，一个半圆型的教堂，空想的共产村庄，一个由玻璃和钢建造的传染病医院从海上升起，穿过这道墙，人们可以看见机械的命运之轮游戏和青草覆盖的桌子，上面还有手工精巧制作的盆景，我发誓我也能在无望的亡命之徒身上读出滴滴远大希望。这是一个宾馆加赌场，规模庞大，配备直升机停机坪和蓝色船坞。这家赌场叫澳门，罗伯说，这是一个纸牌游戏，追溯到 1778 年。你知道，停顿了好长一段时

间后(我想他的眼睛里涌着泪水)，罗伯说道，阿纳尔多和我是最好的朋友，临了，他备受中伤。他们说了些残忍的话，例如，他不会让悲哀干涉他的跳舞。有人甚至在《天主教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蚂蚁和蚱蜢”的讽喻性布道，当然是匿名的。我们都受到了误导。他给别人提供了东西。现在你知道了吧?

我点了点头。《澳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没有说谎。但是它的骨干遗失了，我说。

骨干?

过了若干年，这个建筑就会被别的建筑超越。这些河道和小溪，当然，这里面有鳟鱼和鲑鱼，与此紧密相连的是你对持久力，繁殖力和复制的羡慕……他们象征着短暂和内在，但是对人类的记忆没有任何帮助。你需要种历史性的东西。

骨干?

说对了。土坯房应该保留着。

哈！荒谬的风水。塔瓦雷斯传给你的。那个地方收入持续亏损。周末游客平均五个。

海中骨。超越鱼的周期；你没听阿纳尔多说过吗？要有所得，留做纪念；愿灵安息，叔叔。在虔诚中获得救赎。一个针对记忆本身的永久纪念。我出一个主意。将它当做一个标志性建筑建立在环形公路上，赌场内的蝶蛹，机遇中的永恒。你在剑桥读过书，对吧，罗伯叔叔？记得托马斯·布朗[①]爵士吗？记得《瓮葬》吗？第一堂本科课程?

他知道罗伯不知道他在谈些什么，老人的眼睛中充满了疑虑。罗伯叔叔曾经做过学院门房的助手。

哦，是的，托马斯·布朗……

是的，那些纪念物。

---

① 托马斯·布朗(1605—1682)，英国医师和作家，《瓮葬》(1658)为其代表作之一。

罗伯不知道，布朗的悲歌表达的是相反的意思：如果你不去思考坟墓和纪念碑，你可以活得更久些，因为别人会在坟墓和纪念碑上扔石头，说坏话，更有甚者，抛下虚荣的鲜花，希望得到永恒，而这种希望完全是徒劳的。

但是罗伯在想：这家伙有点道理。我的一切不断遭到教会、报纸和旅游杂志的诋毁。我有可能被埋在那儿，就像拿破仑给埋在荣军院一样，只是这太委屈自己了，我喜欢在里面放些马鞭草，在下面放些桂冠。我本可以买下历史的。是的，它可以成为一块福地，因为我将死亡押在了上面。我不会永远无家可归。哈！一个绝妙的比喻，来自你即将离去的亲爱的罗伯。就让我们看看在未来，他们给嫉妒惹怒的情形吧。我已经无话可说。想想看：罗伯·林纪念馆。

辛迪，氧气！

一个老人为他的书造了它，罗伯叔叔。

他是一个犹太人，案卷保管人。每个逾越节，他都会靠借贷收集所有的图书，然后，正如塔瓦雷斯所说，在他死后的某一晴好天气，这个地方发生大火。档案总是要烧的。你的祖先。哈！非常有想象力。但是我得跟你说点事，既然你也给神父做事。你能得到什么保证，教会会牺牲自己在此事上的权力？放弃它的繁文缛节？把这地方改作俗用？

伊斯雷尔不是圣徒。不过，是的，这座房子将一直被视作教会财产，当然你也可以享受你的合法但却无理的要求。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得减肥。阁楼提供静站吗？

当然了。

那么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辛迪·林拿着他的面具和瓶子回去了，老人站了起来，叹了口气，咳嗽了一下。我搂着辛迪的腰，将她拉近。我可以爱；我可以成立家庭。罗伯奇怪地笑了笑，不过不是冲着我们。我问我是否可以看一下土坯房子。进去好好看一看，多点想法。我记得 17 世纪的华丽所留下的

一切：蜿蜒的柱子，一成不变的海里，它的入口就像一个水下岩洞。尤其是潮湿的石头和石灰散发出的味道。在随后几百年里，他们将正面涂成了粉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你累了，我对罗伯说道。我们应该离开了。

辛迪有钥匙。你去一下，看看那座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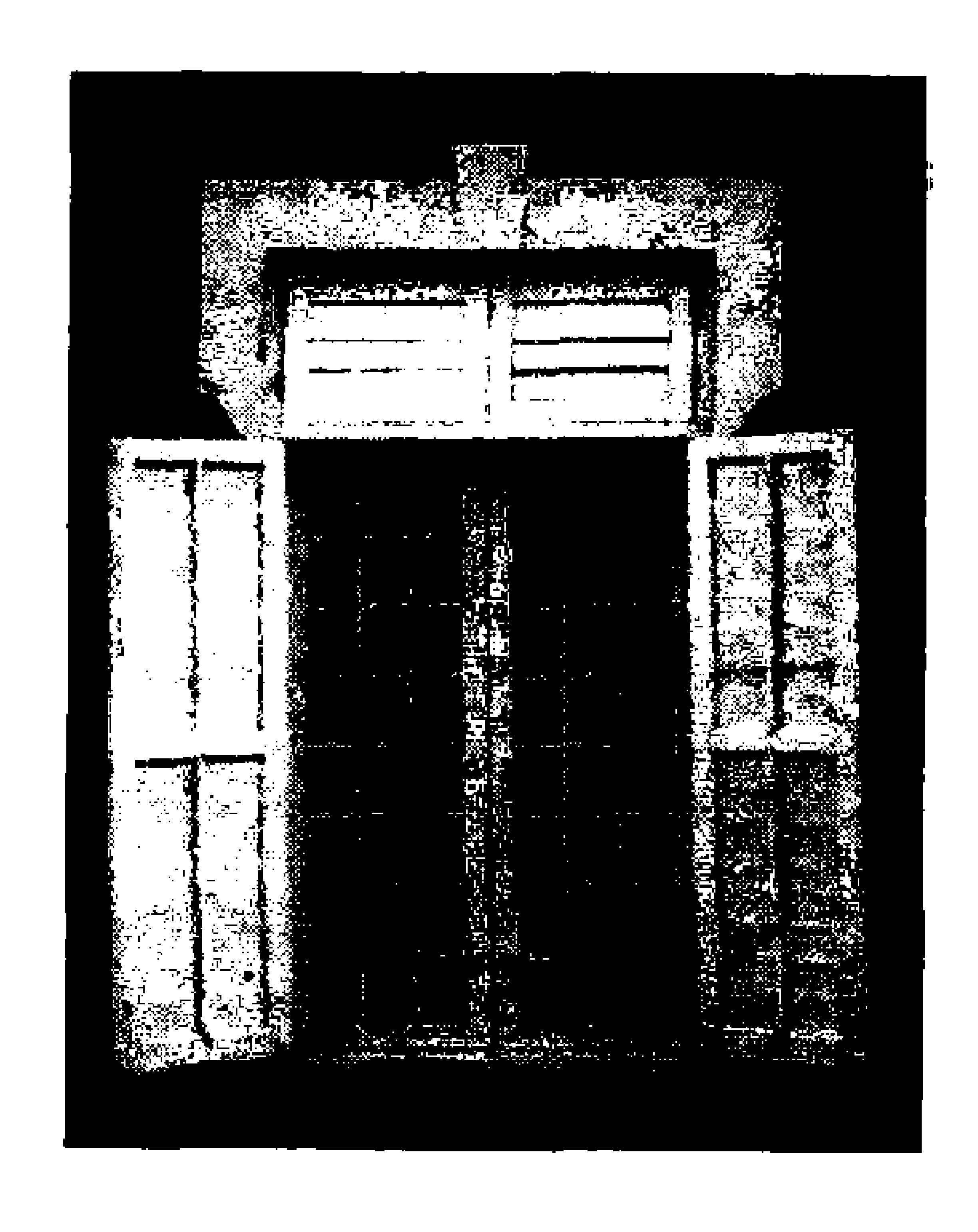
你挥了挥手，但是他已经转过了身子。你知道反语用错了，在拉长了的凶猛作用下，它又弹了回来，它的弹簧将你紧紧夹住。

伊曼纽尔！

台风

图翻，乌尔都语，意为“风暴”，塔法，阿拉伯语，意为“转身”，台风，百头怪物，从埃特纳火山下喷出火苗，然后再翻滚回去；中国的大风叫台风……他们都表现出了逆转的原则。

东西都给吹了回来。他张口结舌，经过烘焙，他一脸黝黑，他航行了近半个世界，被人交换，遭到银元、海水管、欲望、遗产和音乐的鞭打，自始至终，复仇女神一直在切割着他，令他瞬息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没有意义，也没有动机。树木在强烈的举动前弯下了腰。他内心感受到了恐惧，在任务面前颤抖着。他过去曾经去过那里，在迷惑之下也加入到了没有成功的抱负之中，接受了自我治疗的建议。治疗；十二步；一个稳定的工作。他看到自己不知不觉卷入到时代更迭之中，从贵族到仆人，然后死在雪地里，死前还紧紧抓住自己因服药而肿大的心。风变大了，高高的建筑摇晃起来，在中国沿海，潜水艇开始潜水。台风来了，接下来是台风的妻子。后者更加凶狠，而且还没来。



辛迪驱车驶向水边，水波粼粼，绿色一片，远方的风发出阵阵颤音，

大海瞬间浮现，犹如皇家花园，修剪得跟凡尔赛宫内的灌木丛一样井井有条。但是等他走近，他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大海，而是一片沼泽地，里面长满了红树，绵延数英里，通向了地平线，这种红树极其顽强，开拓了大海的地盘。过去，运茶帆船在雾湾里闲着，苦力们在碎石滩上玩着番摊[1]，等待装船指令，现在，盐碱滩和豆瓣菜遍布，一座满是淤泥的微型丛林展现在眼前。码头久已沉入水中，而通向码头的古老台阶也差不多消失在耐寒的灌木丛和发臭的泥土之中，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汉堡包装纸和塑料瓶。他们将车开到一个古老的沙滩，一个圆石铺路的海滨浴场，边上长满了高大的菩提树，路灯修长，犹如五颜六色的罗盘箱，土坯房横靠在边上，这个蓝绿洼地里还有两座其他建筑，平顶，每个入口上方都覆盖着一个装饰性桂冠挂帘，每个正面都展现出一个摇摇欲坠的拱廊，拱廊柱的上面是一个露台，正对着风。破败，恢复，再任其破败，鼎盛时期这里一定很迷人，伊斯雷尔去世一百年后，葡萄牙的商人阶层刚刚抵达，他们站在这个曼努埃尔式[2]的拱门下面，振作精神，准备接受海浪的吹刮，或穿着晚礼服，等待着来回晃动的舢板将他们摆渡到潮湿的歌剧院那儿，歌剧院上面，灯火通明，烟雾迷漫，观众思想不集中，充满了闲言碎语。冬天，他听着他们的破嗓子，他们患了风湿病，胸口感到疼痛，等待着下一个季节来访的医生，他听到了门房碰杯的声音和死亡沉闷的撞击声，每一段音乐里都蕴含着疾病，酒吧里空空如也，剩下的就是休息，乏味，冷颤颤的梗塞和和漏掉的结局。19世纪充满了瘟疫和疟疾。他非常想要一杯威士忌苏打，放松自己，进入记忆之中：他想起了霉臭，想起了吱吱作响的门，想起了辛迪·林推入黑暗时，油漆剥落，带来一股药的味道，是几百年的甲醛味道。再次单独面对黑暗后，他们有目的地在新娘的面纱下搜索着过道迷宫，面纱上

---

① 旧时中国一种用豆子等物进行的赌博。

② 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中期，葡萄牙因大力发展海权主义而在艺术和建筑上出现的建筑风格，取自当时执政的曼努埃尔一世。

蜘蛛网缠绕，积满灰尘，枝形吊灯颤巍巍的……忌讳有可能像蜘蛛一样掉下来，彼此互不相干。她找到了灯的开关，一个金色的胶卷从朴实的家具里渗了出来。斜移的椅子打了个呵欠，破旧的天鹅绒补缀给胎盘和死亡撤退弄脏了，谁知道从遥远的北方岛屿上带来的这些雕刻暴力是否阐明了历代资产阶级家庭对新鲜血液和新的冒险的渴望。每一个新的居住者都给伊斯雷儿的蜗居增添了分量和装饰，记忆必然也是如此。他在一个小的半岛上建造了这个房子，建筑材料里混杂了泥土、稻草、压紧了的牡蛎壳和老骨头，一种调和物，中国声称可以抵挡炮弹。每到夜晚，他一定会花点时间梦想着大海和日本人；梦想着轻轻的漂流木茶和在游泳的稻米；梦想着回到长崎，弓腰缩在木炭炉边；漫长的冬天和干鱼发出的木材烟尘；千代子的头发上香气熏人；这一定使他失常。每天夜晚她都会哭哭啼啼，温柔可怜，到了早上，他还是走了，摇着船帆出海，带着一声叹息悄悄消失，回到这个地方。他的幻想更加清晰：烈士的遗骨他收藏着，他的档案文件对比排列。言行一致总是会在两者之间制造隔阂。关键是在等待：时间会告诉一切。他的建筑矗立着，不过这已经被重建了一百次了。要想不死，中国说道，你就需要解构，然后重新建造你的房子。屋梁已经被对角拉长。漆成了蓝色，他们发汗的一头顶着旧铁，像滴蜡烛一样将锈滴进角落。走完另一个过道，靠近房子的尽头，是一个更小一点的房间。在这里，这堵著名的墙就这样给揭示了出来。碎成了鹅卵石和小贝壳。有一部分从油漆过了的石板上突出来。他将手放上去，取出一个颗粒状的标记。他听到辛迪·林在地下墓穴的另一个地方沙沙走动，大着胆子看了一下破碗橱移动轴木上的破镜子，看到了一张扭曲的嘴巴拼命地在吸气，鼻孔张开，接受着令人作呕，并且正在鼓起来的膨胀，他的船长帽斜戴着。他站稳脚步，抓住船舷上缘。他每日的陶醉可以扩大房子的清单。下面的玻璃舱口存放着一卷卷的人造革图书，赝品，他本以为这是中产阶级生活中的赝品；删减了的希望，缩短了的欲望；商品化了的高贵。他们在家具店里使用这些道

具。他使劲拧了一下把手，一副很小的水晶滴，像耳环一样颤动着，结果发现打不开。再拧，使劲拉，里面的一个长方形玻璃碎了。他割破了食指，但是这种痛苦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浮现。红皮书到头来是一捆捆杂志。中文作品，到处散落些英语，传记综述。他用割破的手指一页一页地翻着，弄得这些杂志锈迹斑斑，在这种符号海港里，犹如因雾受阻，翻上翻下，翻左翻右，有时候倒过来，当然，还没有标点符号。

我一向不喜欢背景你应该知道我回避照片讨厌太阳每天早上穿过片片云彩带来的是压抑你十分清楚黑暗揭示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然而更多的是重复这个老人复制布道的游戏等待结局但结局却从不出现我已经厌倦所有这一切继承和遗产的谈话什么也没有你看不到吗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肥料这些野花渴望在这些肥料中发芽只要有光线……

他寻找着头和尾，快速翻动着页码到处复制着一两个句子来拼凑出一些含义，也是他自己的感觉，一种似乎已经离开了的感觉，他变得非常饥饿，飞快地翻阅着，迫切希望得到重要的意义，他想到了风筝和他母亲捣作糨糊用的米饭。他听到了后面的运动声。辛迪的身材出现了，但是，正如她早上在他的床上一样，她淡入淡出。她递给他一只包裹。

叔叔告诉我将这给你。

这是一只棕色信封，那种上面系着根线你得夹在两小块纸板上才能解开的信封。

欢迎回家。

他抽出了信。

枕边书

看看这条披肩。虽然它色彩深红柔软光亮，如同最光滑的舌头一般，但是它传递的确实是朴实的真理。让我们称她为维罗妮卡[1]，或者手帕围在真理的大腿上，过去，我常常目瞪口呆如此凝视着。

你年轻时我曾匆匆看过你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你不一定杰出，但也比较接近了。我本以为你容易生病，年内就会死去。你不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孩子，成天作弄着猫，穿着破鞋在房顶上飞奔。你父亲要你务必每天锻炼，做到吃苦耐劳。他是一个私塾，穿着双排扣西装，用湿报纸敲打着你的耳朵，就像政委似的。但是他理应知道，这只会使你变得更加脆弱。这会使你走向革命。精神折磨。也许他想到了没有活下来的孩子。是的，我给了他外国的生活，让他生存在这个表意文字的丛林里，现在，你应该不难猜出我的用意……

就这样塔瓦雷斯神父一直摆弄着一只假手。神父什么也没交易。但是谁写下的这个？不是他的父亲。

他想从这些文字迷宫中逃脱，现在他的手背也给割破了，他的头脑也给割裂。从窗户那儿，他能看到一束奇怪而强烈的灯光缝合着金属湾，黑暗降临。天气越来越热。他抽出手帕，从小瓶子里轻轻洒出点香水，喝酒的欲望变得强烈起来。红树林里有许多形状，黑暗的形体隐含在支柱根中。他靠近一点盯着振动的窗格玻璃，拉紧了喉咙口的领结。

要是你觉着保留这种记忆是种多愁善感，那就错了，因为它排除了活组织的必要性。大多数人的脑子里都有个黑色轮廓在轻松地奔跑，我的呢则扎到了嘴里。时间短暂，我无法进一步详论。这些骨头的嘴本身就在说话。瞧瞧你的周围，从这些受到囚禁的烈士身上得到鼓舞。他们没有放弃没有叛变没有踩在化了体的血肉和神圣形象上。同样，对我来说，梅布尔斯代表着复活和牺牲。一个米纸烈士。既然你这么大老远地跑过来，那么你失望的同时不也是为了探求问题？只不过给卡斯特罗整个野心背后的救生圈和香槟酒塞给塞住了。货运征服生意支配乐观主义合作酒精死中求生还有他人混杂的海难之类的帝国事业？我压抑着这些感情。公布一个死亡已久的声音不是在用感情来谋杀理智。你父亲确实已将二者都熄灭了。

他穿着礼服走向一个孤独的小木屋，边上是个公墓，靠近上海汶林路[2]120号，路的两边古树林立，木板路上湿淋淋的，楼梯上则摆着米壳馅饼，墓地边上孤独的小木屋。他的口袋里放了瓶吗啡。我不知道他身带鸦片剂是如何穿过日本人的封锁的。奶妈是不好抚慰的，虽然他和罗伯说了，这是出于仁慈，况且这个剂量不会置人于死地，而只是减轻叫喊、疼痛、无情的警报和担心，生怕它最终说这比抛在空中，给刺刀叉上要好多了。他们以为这是同情，没有考虑过后果。

相信我，这是真的，除非在这种契约情形下，否则是不会说出来的。我的沉默已经被人收买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上帝走开了，瞬息之间，同时也是永恒。

你需要理解的就是宇宙的这种冷漠。它不善于表达感情。到了最

① 维罗妮卡（Veronica）：一说是拉丁文“真理”（vera）和希腊文“形象”（eikon）的组合。在基督教传说里，维罗妮卡是耶路撒冷的一个普通女孩，曾用自己的手帕给耶稣擦脸，耶稣给处死后，她的手帕上神奇地映出了耶稣的脸庞。

② 今宛平路。

后，你父亲和罗伯只好支付了奶妈从没见过的一笔钱，将她解雇了。她潸然泪下，每次想到这事，她都会潸然泪下。她想起了孩子腿瘸了——孩子的小手指舒展开来——直到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她流泪究竟是因为想起这一刻感到难过还是因为其他。因为她在一个无用的英国丈夫身上挥霍了一大笔钱，最后，她来到了香港，在中电集团做出纳，我在这家集团里拥有大量的股份。是茉莉你那天真的母亲和她交上了朋友……聋哑孩子的奶妈，3号，她向我签的字，哦，沉默的符号可以讲很多的故事。我带着使徒的热情，紧紧抓着他们的删节故事。

现在，对于那些近似维罗妮卡的人来说，这就是减轻震惊的全部真理。

阿纳尔多迎娶茉莉，沿着这片纯洁的海滨，将水搅混的时候，多拉·西德尔雇了一名黑人来管理中国女校的体育馆。维吉尔被迫退回自己的房间，他从窗户那儿听到了篮球和吱吱作响的橡胶鞋发出的没有节奏的拍打声。这把他逼疯了。他到天主教堂寻求庇护，并将自己的遗嘱钉在多拉的门上。他说这是为了抵消伏都教在他周围发出的丛林声。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欲望，在精神上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太监。古代的先人当然尊重这种切割。它恢复了青春，消除了脸上的皱纹，并且赋予无上的智慧。多拉不为所动。他皈依场面非常壮观，在第一次接受圣餐时就制作了报纸，并且向教区捐赠了数百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教廷爵士，为《天主教周刊》撰写严厉的影评。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是个神父。尽管这一切，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婚姻，沉闷而不乏亲密，现在这一切回荡着手鼓声、雄猫声和愚蠢的行为……他正在发狂。

啊，仁慈！啊，恐怖！他当然怀疑这事，而且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电力。出版。它有潜力做出这种错事，将光线映照到最黑暗的角落。头顶云层闭合，屋顶嘎嘎作响，他的喉咙里发出尖叫，他拒绝让步，他摸着自己的斑白头发，拔了一下，脑子里知道有一种使人战栗的沉着，熟

悉的迷宫及其看不见，听不见的内檐壁平摊在发黄了的纸上，隐在幻影般的比划和幽灵般的光线之中。一连几分钟过去了，没有风，没有噪音，就连耗子也没有在壁板里奔跑。红树林静静地拥有着自己的秘密，面对大海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柔软的像眼睑；他翻阅着破损的纸张。

这一直是我的报应。通过我的书法，我的机器人获得了生命——你叫他梅布尔斯——你想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我拥有惊人的真理。你应该读一读你父亲的保险手册：外国代理指南。阅读一下道德风险，实质风险，租车保险，拒保风险。读一下爆炸物和危险物注释。梅布尔斯不时地使人想起他的其他不端行为。

我已经帮了他一把，允许他驾船驶离上海，穿过国民党控制的运河。如果没有真正的外交援助，倒霉的阿纳尔多还有什么其他办法，逃离一个已经沦陷了的城市？回想当年，他乘着黑夜，小心驶过各个水路，水中味道奇臭，朴实的苦力就是在这里生活，死亡，摔倒。让他通行的交易是在高层达成的。所谓的自由通行并没存在。作为交易，他的游艇前面装上了武器。他知道他逃亡的意义。他把一切都卖给了我，后来，他又想给你——他的儿子收回一部分。所以，现在你有了我。你知道我是谁了。

但是并非如此。他并没有拥有全部，从各方面来看，这件事表面上做的似乎像个正人君子，但实际上却心胸狭窄，这跟他得到的信息并不对称。天气寒冷，但是他泰然自若，他应该知道这种冰灰色的动机是不会产生行动的，不，更加愚蠢的举动即将出现，这种事超出了一个故事，一首曲子和一种循环往复的残忍，它扼杀了你喜欢的爱情；这为逃亡记忆提供了一种非常迫切，不断出现，犹如幽闭恐惧症般的辩解理由。他一直哀叹，别人爱他的时候，他却没抓住。一个放荡者匆匆交出了自己的意愿，将钱挥霍在安全上，寅吃卯粮，然后寻找新方向，再以

后就显得不合时宜。不，他根本就没有拥有它。

现在你有了我，你的外公。我是维吉尔。现在，这一负面形象已经呈现在你面前——这个超越了怀疑阴影的阴影这个幽灵这个在掩饰和谎言面前得不到一丝希望的幽灵——我像一张照片一样回归自我——明确展现在你面前。一个杂种认识。你闻到了耗子味吗？

恭喜。恭喜我的供认。我们的同音词给粘在了一起，犹如鸵鸟的翅膀，下面带了根刺，刺激着我们奔向太阳，或者打扮得像孔雀一样，练习着高贵的孔雀舞，一双匀称的腿踏着双拍子。不过，我们在自己的问题中投入了太多的辉煌，他们其实就是些轻闲而寒酸的文书。

比如威利。他一个挥之不去的欲望就是让辛迪·林过上奢侈的生活，将她从罗伯假情假意的拥抱中解脱出来，回到他自己身边。但是我们知道，威利看到的只有竞争，于是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议论澳门的三合会——这场战斗他注定要输给你父亲的朋友。就这样，两个风流王国之间的强大争斗开始了。所有这一切都源自写作。

（后来，威利一定想过派他的傻瓜外甥文书先生，说书先生，作为诱饵，将辛迪引诱回来。让你随便使用他的房子。）

如此一来，你就有了我，亲爱的读者。你怀疑我智力不稳定，对吧？听到黑暗中的声音了吗？还以为你父亲的长子还活着？觉得自己被无情的他者替代了？孤独的夜晚，身处臭味和喧嚣之中，你设想着自己还可以活得更长些？

我再跟你说点事。在遥远的横滨，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谁呢？你父亲的日本情妇——一个在宽腰带里别着自动武器的日本女人——她生了一个男孩，他只好将剩下的东西从你这儿夺走。法律归法律——无论是否合法——到了现在，他管着住友银行横滨分行。你舅舅威利在这里有

很多业务。不用说还有别的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这样更好。你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作家，矢志不渝。无论何种财富都会将你毁掉。你还不感到荣幸吗？你还不明白，你的自然状态就是一无所有？从一个失意作家到另一个失意作家——我的同类——我比你看得要清楚多了。

想想看，这些继承人像九头蛇似的全都出现在他面前！再想想，他是尾声，是回想，是最后一口气……句号；呼气号！

我是维吉尔·容……容家——我想在此提醒一下——是体现了人类的默契。瞧微贱的逗号如何将各个成员无情地分开：容家，羽毛，笔，羽绒枕头，诗歌。我不喜欢这样截然分开。一个容家就是一个缪斯，我先姑且接受这种关联：长期以来，缪斯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多少年来，大家也不碰面，只顾复制，来鼓起逃亡的勇气。所有的欲望都给压住了。所有的身体都受到了压抑。彻底禁欲。我享受的是脚，而不是脸。我隐姓埋名俗务打工。于是你又有了我。一个整形外科医生的生活必然是整形，这种生活就是对形态进行切除和掩饰。你决不会跟他人说起这事，因为他们像飞蛾一样，偷偷地扑进灯里。他们不怕失败，也不怕手术刀滑过动脉和永恒。他们不懂一个人翅膀给剪了之后的痛苦——分开了的翅膀依附在一个外国灵魂身上，飞得很不和谐。话说回来，我先把问题澄清，然后再让历史之喙来刺我的肝脏。我来回放一下。看着海鸥轻轻地落在沙子上。战争年代，我们饥肠辘辘，这时看海鸥就好像是橘皮和白色的蛋白酥皮。

这是占领的第一年，供给给卡住，我们挨饿，只好慢慢地嚼着香蕉皮和咖啡皮，喝着问题液体，他们说这是牛奶，但这并非牛乳制品。虽然我们的身体还在，但是我们不能移动，不能在房间里飞翔。接下来是寒冷和发烧，他们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出我是个医生，这个战栗颤抖出汗的漫谈者，骨瘦如柴，胡须发白，一口破黑牙，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贪

图安逸的人呢。他们起先是揍我，后来意识到，再打下去会适得其反，于是给我好吃的，给我一罐又一罐的鸡汤。我回归自我，重新给关了起来。威利我想此刻已经逃到了美国，正懒洋洋地躺卧在生满苔藓、斜向豌豆绿似的大海的草坪上，或者穿着蓝色的运动夹克在打着高尔夫球，同时一只眼睛还盯着多得流油的利润——威利曾经被捕，被押上“里斯本丸号”囚船[①]，囚船后被盟军飞机发射的鱼雷击中沉没。他们将他带上岸，蒙住他的眼睛，折磨他，剥掉他的衣服，还将机油涂在他身上，或许正是这点才救了他一命。后来，敌酋突然奇怪转向，对将他变形更加感兴趣。至少这是东海林俊成将军命令的。是的让他成为亚洲人你这个中国欧洲欧亚混血儿子你这双瞎了的蓝眼睛和亚麻色的头发是对他种族的一个侮辱。让他成为我们在南京华北满洲里屠杀的几百万人中的一个影像。让他一无所有或什么都有。他们将他们抬进医院的太平间里长长的队伍依然还在发紫的床单道道伤痕的肢体有的还被死死的绑在担架上。起先空空的死亡气息没有味道，后来散发出一阵清新的猪肉味然后是缓慢的腐烂味这种腐烂味跑遍了房间。我没有选择。为了救我的儿子，我需要动手术，要不然就牺牲我的意愿。你在圣经里可以找到这种奇怪但却相关的幻想。或杀或皈依。强烈的诅咒。最高统帅感兴趣的是我的娴熟技艺，外加这种再创造的自我兴趣，慢慢地，柳叶刀在我的手上瞄准了自己的方向，恢复了自己业已遭人忘却的荣耀，控制，喷射，韧带和压破了的船船骨头。这一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护士只给了一个，她消除焦虑的办法就用棉签，加过热的工具和防腐剂，而少校的长筒靴上结着一个个粪块，非要侵入。后来，在最黑暗的时刻，一种可怕的幻觉迫使我往后看去，看到魔鬼就在后面，食指指着这该死的节日，这个将儿子毁容的古代礼仪。是的，你父亲就在那儿——从人群中挤过

① “里斯本丸号”是一艘日本客货轮，1920年5月31日下水，隶属日本横滨船坞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往日本与中国之间，运载战俘。

城门——一个新手，挤在我女儿两腿之间，现在，这一最后的入侵促使我想切除这双窥视的眼睛。啊，我多么恨他到处放荡啊！我到现在还憎恨放荡！但是现在我的愤怒已经没了，我回转到祭坛，如释重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眉毛上汗珠直冒因为我工作太投入了——单眼皮策略——瞎透了——扁平的颧骨和细小的泪腺真是绝妙组合，眼泪已经在我的眼中形成——太投入了，对他快速进出已经恨不起来，就好像已经达成协议，见证了遗嘱，并受到了刺激——太投入了，手中奇迹不断，因而无法测量出这一手术所产生的未来影响。我找了个借口，在思考一个令人感到可怕的想法：威利是乱伦的结果。还记得那个寒冷的早上，我的军阀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抓住了多拉·西德尔？我父亲压住了谣传。不过这是乡下传闻，就像一只虫子进入了内脏：我娶了一个白人女子，她的乱交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客家是高级交配。因此我也许永远也不知道威利是我的儿子还是我的兄弟。但是事实是：我的精湛技艺已经将他变得非此非彼。他的脸既不像西方人也不像东方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湮灭。医院的院子里有一个篝火，那天夜晚他们烧掉了其他尸体，生怕传染病爆发。篝火[①]，火烧骨头。就这样，你最终有了我。死亡消除了你的外表。没有必要再找什么托词。我从死后出版中得利。瞧，这就是你的遗产，你的继承物。就好像剑招，书法是不能更改的。白纸黑字，写下的就是写下的。

他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正确而清晰的梦。他把这些字又读了一遍，先是竖着读，接着又横着读。他就像一个系统研究犹太教神秘教义的研究员，想破解这个右行左行交互书写的书法，犹如耕梨在犁沟里左歪右歪……而水牛则在雨中左右转着，用角抵着他，逼他招供。这是否就是他双向思维的证据？所有这些动机，潜在的手段，逻辑错误，都跟家庭

① 双关话：英语中的“篝火”是 bonfire，谐音“骨头”（bone）。

讹诈无异。为了推翻继承法，为了败坏荣誉，父亲们彼此提醒，他们牺牲儿子的举动是正确的。他想跑，但是两条腿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幢土坯房子里，面对着黑黑的玻璃，艰难地挺过了这一信息所带来的冲击。他不知不觉地站了一会儿，他非常害怕内向爆炸，害怕汹涌的风再起，猛烈敲击他这个不确定生命的心灵之窗。过了一会儿，他回过神来，开始寻找辛迪的声音，他意识到，有些事本来就是错的。如果没有了她，就无从得到证明，因此，他不是先将信塞进卷了角的信封，把线绕回去，而是寻找她，但是这地方是空的，灯光一闪一闪，一片笼罩，将切分好的黑暗喷涌到发了霉的家具上。他需要她，但是她不见了。后来他想起她曾说过，她不会等的，但是会在他的旅馆里留个条子。她再三说道，罗伯叔叔要她尽早回去，不过她那天夜晚还要出去一趟。她是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这番话的。这么温暖。突然，他感到他也应该对她负责，他对她的举动感到嫉妒。不过，他的步子受到过专门设计，每个亲密行为都铭刻着冷设计。

他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锁上门，风越来越大，树叶和树枝落了一脚，他揉去眼里的灰尘。天黑的早了点，不过他似乎知道自己的路，他沿着鹅卵石，然后转上一个斜坡，偏离红树林。他感到十二分的口渴，开始浑身奇痒，他想像着风团一下子出现在胸口和屁股上，他一边走一边抓，好在天差不多黑了。他情绪低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他在潮湿而熟悉的胡同里移动着。一股浓烈的臭味。他转向另一个小路，向村里走去。吸一口气，让断断续续的小雨把他冲洗一下；他在人行道上推着玩具车，这是缓慢的记忆散步，将他的车推向潮湿的记忆和疯狂的灯光，1937 年的长轴距卡灵顿车，大灯，喇叭，弧型踏板；现在这辆车配上了生成马达轰响冒火花喷洒跟踪后面的天空。现在他看的是一辆真正的汽车，在靠近海堤的山底，车子转弯，细长的侧灯一下子转暗，向他冲来，他听到了一声怒吼，赶紧刹车，只听到咔嚓一声，传来了砂砾压碎的声音，他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最后一刻避

开，像推玩具一样将它向前推着，车子差点擦到，他能看到雨刷歪斜，独自抽打着，接下来，左前窗慢慢摇下，他走进沙子和流沙淤泥看到手在抖动伸出一根从烟盒里抽出的镍管嘿伙计尝尝这些这时他往后绊了一下，摔进一个很深的水坑里，看到三四只螃蟹一个个在挖地洞，传出阵阵吸吮的声音留下了无烟火药和废气的味道，后来汽车离开，缓慢地行驶在海滨浴场，轻轻打开灯光最后横扫一下，看看围篱，他的死胎和透明体最终再呼吸一次；掘出，含磷，解放。

他一身臭味坐在那儿，慢慢从沉寂的烂泥里挖出沉默的子弹。他没有在做梦。天空中的奇异的光带上了电，在他的太阳穴那儿搏动。雨改变了方向，一阵一阵横扫回来，变得更加寒冷。

他想到了令人反感的悖论；这个渗漏的坟墓救了它，就好像它在战争中救了他父亲一样。他依然能够看到枪手的汽车驶向大桥，在夜幕的掩护下，汽车晃动着车尾，消失在了远处，他冲着他们骂了起来，但是这种谩骂在他的语言里起不了任何作用。他只是感到庆幸活了下来。

他浑身湿乎乎的，陈旧的夹克变得沉重起来。他跌跌绊绊地走着。很快，一盏灯，接下来又是一盏灯，在一阵风和雨之中，村子一闪一闪，冒起了炊烟。他发现了一家饭店，葡萄牙饭店但却是中国人开的，以沙丁鱼出名，但是他对沙丁鱼不感兴趣，也许可以做开胃食品，他说，挥手将菜单拿走，拿三瓶最好的葡萄牙青酒来；这时一只狗跑了过来，嗅着他的膝盖，他伸手抚摩着狗的弓背，手上拿着一把湿漉漉的毛和钱，他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盯着他看然后跑回去辩论了一番，在剥去外皮之后，他们拿来一桶温水。于是他坐了下来。他面前是一大笔遗产，浸在狗屎里，他的巨大遗产大声喊叫，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那就是他既不能写也不能演，因为没有一样好的，他在想：他坐在那儿，努力使自己嘈杂的脑袋安静下来；下来！漠视时间的流逝；走开！要顺应自己的天性；够了！小狗耳朵塌下，在外面溜着，他想；他就坐在那儿。没用，这种祖传的声音，他又想；他就坐在那儿，身上涂

着屎。凶猛残暴，不动脑子，但眼神却很温柔的祭品。领班！再来一瓶酒，然后我们就走。我知道你们要关门了。关的真快，锯屑喷洒，围裙折叠，鱼的血给擦干了，而狗还在嗅着。你瞧，真理不在视觉而在嗅觉中。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靠在柜台上，想打电话，但却忘了他的生理问题，一道温暖的小便流到了他的袜子里，他在电话里叫一部出租车。他们挂了，借口这样晚了没有出租车了。他再打。一辆出租，叫一辆大一点的出租，我会给惊人的消费，他说，仿佛是想向这个礼堂里的其他家伙证明自己，因为他们都在勾结，在线，连接，他闪了一下皮夹，娴熟的手指摊开五十元的票子，爸爸传授之后多少年了，依然还是那么灵活。

他回到宾馆，一瓶酒从夹克下面鼓了出来，他冲柜台打了个手势，表明他参加战争了，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他还携带了一支机关手枪。尝试了几次之后终于找到了他的房间。有两个电话留言；一个是克拉维迪亚的，很难听懂，电话里的刮擦声不断，录音一会儿强一会儿弱，跟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差不多，他想。十级台风向西北挺进，会在清晨某个时间着陆。另一个留言是辛迪·林的，她说她希望他能顺利找回来，并问他是否愿意今晚和她见面，在峰景酒吧和她一起共进晚餐，就他们两人。他洗了个澡，然后给男仆打了个电话，晚礼服可以两个小时之后送到，先生一好，裁缝就会上来量身。他浸泡了一会。用手洗了洗伤口。要注意破伤风，牙关紧闭症，狂犬病。过了一会儿，一个秃着头，弓着腰的裁缝过来量身材，他手脚轻快，但一副狐疑。他把整个命运都压在这张票据上，说速度快的话小费也比较可观，然后便不知不觉地进入短暂的睡梦之中。他要见辛迪·林，要看看他能活下来是否对应着什么惊奇，关心或恶意，或者说仅仅是冷漠，而这种价值总是最为清晰，是检验意愿的试金石。换作他父亲，他早就动身了，他会检查饭店和客户，将一把点 45 式手枪放在钢琴盖的下面。我怀疑她早就准备好了。既然

她怀疑生意正在转移，她就决不会留下我一人。这是否表明她就是老板？确实，我能看出我们俩并肩散步，她的手塞在我的裤子口袋里，走上堡垒的时候，台风信号丁当敲了起来，这时她会拉着我，紧紧倚靠在火药店的古墙上，要不就后倾，坐在一座大炮上，在那儿……克拉维迪亚的电话又响了。他拿起电话，但没有说话，他躺在床上，听着她的声音，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赶紧追上最后一班摆渡，她说，这个地方要爆炸了。信息断断续续的，一串串鞭炮像雨一样冲击着他头上的百叶窗。他得见一下辛迪，哪怕是他的两条腿有一半给装在湿水泥里，他也要冷淡地再跟她来一次，体验她最温柔的一刻，在她高潮的时候再将她掐死。裁缝敲门使这个决定变得非常容易；礼服非常好。今晚的舞会……是这个时间吗？老人问道。他试了一下夹克，然后想给小费，但却遭到了谢绝。他又用中文说了一句：你瞧，我只是一名游客。老人拿了钱，然后又退了一半。先生还需要什么吗？房间女服务生？不，谢谢你。裁缝点了一下头，然后慢吞吞地退了下去，消失在玫瑰色的墙纸里。外面放着摇篮曲；一个裂缝，不合理的裂口，吸一口气写结束语。旗帜噼里啪啦地响着……舞蹈培训班！

发酵作用。过去就是这样。一种发酵，一种病态状况下的戏剧性发酵；一种疾病家族的繁衍。善本书就是这么揭示的。有些后代永远会受到感染。

他赶上最后一班过桥巴士。天空出奇地白，稀稀拉拉地飘着一缕缕云烟，在城市的一边，他看到大火噬虐。一上桥，巴士就开始转向，车子顶着侧面风，将方向又纠正回来，在浅滩口，海上龙卷风正在形成。水边的建筑迷宫蜷缩在密集的建筑结构中，霓虹闪烁，斑斑点点都是人。他发现他很平静：一种可怕的宁静；他很欣赏这种深思熟虑后猛然驶向现在的精神，透过薄雾笼罩的面包车窗，他能看到快帆船顺风而行，越过防浪堤，罗网般的绳梯在海水泡沫和大风中搜寻着，他知道他会摧毁事情的进程，他记得在过去，他常常制作大型帆船的塑料模型，而那些零部件在他粘粘的手指上就是拼不起来，生气之余，他将一切全部砸碎，充满了绝望，他父亲皱着眉，一脸的不信任：你还觉得你能干什么事吗？就这样，为了好受些，他彻底打碎了塑料生活。

他在西望洋山下了车，剩下的路就慢慢走着，边上是豪华的汽车，不声不响地滑到门廊，但到狭窄的小路转弯就难了。一个女人——泰国人或菲律宾人他想他们在严斥下微笑服务已经成为国家行为——将他送

到酒吧，这儿人群拥挤，就好像是在拥挤的巴士里，有些人为了保持平衡，将手放到墙上，她带来了他想要的东西，开始是桑格丽亚酒，里面加了含有维生素的水果，饭店自身开始摇晃了起来。血。理智的希腊人认为第四杯酒会让人发疯，因而禁止品尝，但这已是过往云烟。两壶他在想壶壶房间瞬时安静了下来他转过头去看到辛迪·林穿着旗袍从一群羡慕者中走了出来她的晚礼服就是一件旗袍性感十足成了她的第二皮肤一件透明的薄纱真丝迷彩里面还穿了件贴身背心黑色的比较短活力十足裤袜跟部毕现犹如阿拉伯式图饰又如微微发亮的神秘绿洲。她涂上口红将头发编织成一团连枷似的尾巴从一个男人走向另一个男人不断抛出飞吻飞了起来犹如猩红热发在他们的脸上。他从他找到的唯一一张椅子上站了起来而她突然冲他抛了个飞吻好像是注意到了他冲着他的酒轻轻尖叫了一下将小巧的手指放进酒罐测试了一下露出称许的表情。这时他直截了当地问她她的/他的/你的/我们的外公是否是一名作家因为维吉尔备受世人尊重而她挥动着涂了指甲油的指甲撩动着他的脸颊当然是了她说他业余爱好为报纸写评论尤其是为天主教报——你知道的那种——这就是为什么神父要完好地保存土坯房来存放他们著名皈依者的出版物。但是罗伯叔叔准备将它们全都扔出去这些发了霉的书本因为书不是纪念物你应该知道她说……这么说吧托马斯·布朗应该知道她撅着嘴。那你就太小气了。这么说他要保存那幢建筑？他问道。她耸了耸肩膀，表明她也是猜测，然后又喝了点酒，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她的眼睫毛闪出一丝鲁莽一种快速眨眼然后又说物业市场要崩溃了。既然你把威利舅舅的有价证券和幻影财产抛掉了，那么你应该知道。但是罗伯叔叔准备创造价值她又加了一句脸上没有表情说话不加标点缺乏声调如果不是她在那一刻握着他的手用指甲拨弄着他的手心，他真想给她一巴掌让她讲出话。你瞧……她微笑着……上海人真有眼光。别人都在跳舞，而维吉尔就深谋远虑，多种经营。你知道什么？他突然说道，罗伯关闭赌场内的骨之屋，那是十分愚蠢的想法。他应该放弃它。没人愿意来陵墓里赌博。会

遭霉运。他用另一只手擦了擦前额，通过他的手指，她的钻石耳环碰在他的颞叶上产生了瞬间刺痛催眠似的小金属片从柔光中爆出。她对他的评论充耳不闻她说我们打开了他的坟墓。在香港每隔七年就挖一次。由于土地匮乏他们将骨头收集好后放在摩天大楼的拱顶给别人腾出空间。你的墓地只是租赁空间……他抓住了这句话的意义，感到他们之间有种死亡的气息，她转身走开，用放大了的鼻孔在呼吸。她的话悬在了那儿，断掉了，此时她一脸笑容，但是他们还悬在那儿，脱离了躯体，她不肯再说下去。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于是他大胆猜测，沿着这个不幸的下午一路追去，追寻一个沉重而全面的影子。有一辆车他说……子弹射了出来。她微微竖起了眉毛。不过并没有怀疑。你想给我告诫，让我离开？我不明白。但是她摇了摇头，信心十足地表示这里没有花招。关键在什么地方？她问道，开始吸吮柠檬片。我发现威利舅舅不想让你来继承。按照继承顺序，你的同父异母姐姐伊俄卡斯特看上去注定要接管这个王国。可惜不是你我之间，不然我们不会失去的，哦，你这个可怜的东西，她擦了擦他的脸，搂住他的脖子，他能感到她的心靠在他的心上。你必须相信我，是另外一个派别想得到罗伯。那就是为什么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割卤仔路上的房产，让你脱身，要知道，像你一样成为移动的靶子是要付出代价的，多可怕啊。他们想开枪干掉我们俩。但是她继续下去是有用的，因为你现在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我们两个人中你受到了保护。一个肿瘤。它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呻吟。他能感到肿瘤在脑膜和头颅之间游移，有一个乐手从单簧管上吐出一滴彩色的唾沫，在这个唾沫上他看到了乐手对秩序，呼吸和停顿的需求，从而避免这种事故的涌现。辛迪·林的手在他的手上冒出了汗……她坚持对他的要求，而他只是他只是文字与音乐。他朝凹槽里看了一眼。你在他的棺材里发现的不仅仅是骨头吧。不错，她说。一艘瓷船……就是中国人至今还用作枕头的那种……里面塞满了信。书法。你从威利舅舅那儿偷的。是的，她又说了一遍。你想起了汽缸，恢复了镇静；一个浅蓝色的花

瓶，两头关闭，立在餐具柜下，不挡道，而且一点也不显眼，除了孩子。你外公的枕边书。你把轿车和卡车向它推去，然后将它当作环形交通枢纽，结果它扬起一层浅蓝色的尘土，有一天，在底座的裂缝里，你发现了一个毛茸茸的蜂巢，用牙签戳一下，冒出了几十个蠕动着的灰色蛹，是一个蟑螂窝。他们将自己的象形文字铭刻在贝壳和骨头上，辛迪一边说，一边撅起了嘴，屁股跟着音乐扭动着。商朝。这是他文章的题目吗？不是，你真傻。你没读过？只有靠字典。噢，她说。外公的书法很棒。是啊，现在归你了。

或者说，这些是罗伯的危险替代品，是剑桥人最后的微笑？

辛迪拉着他的胳膊肘，来回走动着，他能看出，大舞厅里挤满了跳摇摆舞的情侣。墙上潮湿，或者说在冒汗。他攒足力量休息了一下，既感到绝望，又下定决心，短暂的停顿里带着紧张，引得天空低垂。很快，灯光暗淡，一面一闪一闪的镜子烤在天花板上，一个仅给他留下清晰意识的伤口，一种清晰的疾病，将他回放到从前，他们喂他龙凤汤，草药熬骨头。她把双手掬成杯形，抱着他的腰，他居然会和这个变化莫测的堂姐出现在这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很难想像他的灵魂已经给造了型，透了视，摊开来供人计划——也许我们可以在巴黎买一个阁楼，她是在说——为他的未来，死亡和未来的死亡制定计划，言语不清，难道说是这可怕的喧闹扭曲了听力——火烧果园的事？他感到糊涂。现在他看到了碎片——辛迪，克里斯托尔，卡门，克拉维迪亚，这些碎片全都跑到巴黎，跑到天花板的灯光上去了，辛迪对这种疏忽感到心烦意乱，将辫子甩到他的肩膀上，冲着他的耳朵大声吼着，压过了音乐，她的呼吸有力，带着热气，他的思绪飞过一切界限，进入厚颜就会滋生恶棍的境地，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她是中国，灾难、历史和生活必需品已经使她变得紧张），现在，中国只需要发展，不需要那些弱小而没有用的偶像，所以，看着我，她说，我现在对你进行培训，让你甩掉他们，进行正确思维。他捧着她的脸，让她同意将这一切摧毁，包括藏

骸所和那些图书(是否就是因为如此，伊斯雷尔才祈求闪电？消除所有的记录?)，忘掉一切，这也是正确的途径，完成了这事之后，他让她带着他来到大舞厅的地板中间，这里，别人已经开始练习舞步，她让他站在那儿，成为支点，她就围着他转动，昂首阔步。一切都是序列和波动，为的是驱魔。有时候，那些姿势几乎是视而不见，就在这些姿势中，蛇和微笑麇集，藏而不露；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做出引诱动作，强行推进，紧紧地围着他打转，仿佛复活节那天，电墙随着灯光嗡嗡作响，滂沱大雨蜿蜒流过平台，水面上漂起了椅子和浮瓶，沉重倾斜的餐桌早早地就扬帆起航。越来越强；她对面而跳，舞步很漂亮，她身体挺直，跳着最难的步子，突刺步和弗戈列娜步，她的身体给包裹在金属制品和比利时毛呢里，包裹在金刚钻和薄纱中，她的辫子像斗牛士的短标枪一样，直飞向前，在探戈舞中，她的腿缠住他的腿，颤抖着，将他拉向跟前，她的呼吸犹如一团火，几乎可以开始审讯了，他抬起头来，看到的是一张张穿着礼服的男人的脸，他们的背带像花一样，钩在拇指上，他们的指缝里夹的则是白皮挂肩枪套，马格南左轮手枪，枪柄上镶着珍珠。他站在诽谤的田野里；到另一个大陆寻求庇护；瞥一眼他的峡谷里的一排排树，然后进入催眠状态，走向劈啪冒出的籽皮。现在，她不停地旋转，使他大为受伤，他无法呼吸，无法跳舞，甚至都无法骄傲地散一下步，更不用说轻轻地摸一下她柔软光滑的大腿波浪起伏的条纹。经过古老的享受，这对大腿已经变成了紫红色。竞赛者们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老板现在拿出了浑身解数，她穿着旗袍，修长而透明，一双美腿毕现，旗袍开衩，展现出疯狂的最短亮片，仿佛经过精心设计，要透过竹帘，佩着珠饰，带着嫉妒才可观看，她的撅嘴，她对触摸的鄙视，还有"别碰我"探戈，其宗旨就是引诱和杀戮，她伸展双腿，踢踏脚后跟，不停地旋转，挡住他的路，让他无法靠近闪闪发光的叶子，他想得到的并不是她，他挣扎着想避开火花和计谋，迈步，避让，仿佛他还是一名最小兄弟会里的男孩，一边学习，一边依靠在她的两条腿和闪

光灯之间，边跑边停，在致命的停顿前徘徊碰撞……观众开始笑了起来，犹如飘忽不定的雨点滴答，号手将他的嘴唇缩小成了果冻，就连钢琴师也回头扫视了一眼，他伸长了脖子，瞪大眼睛凝视着，双手捏紧，奏出了不和的声音，人们开始剥雪茄，音乐再次慢了下来，然后，随着几个音符随意乱抛，音乐突然停了下来……这时她抬起一只脚，这么优美，却这么无助，两条腿上闪着这么多的汗珠，于是，一个满脸大胡子的步兵跑来救她。他洒了点古龙香水，喝着伏特加酒，人镇静了下来，这时他带头任自己的手乱闯，面无笑容，引导她在军乐中前进。最后，女人总是喜欢坏蛋。他知道坏蛋将会从他们老板的这种羞辱中恢复，跟在他的后面，他用毛巾擦着脸，行走在凉爽的地砖上，跋涉在不同的黄铜冲水阀冲洗的水中，他已经在地板上看到了一摊摊的血，为了另一场比赛，他们还得在地板上撒上盐，铺上沙子，再撒上锯屑。他爬出洗手间的窗户，贴着潮湿而受风的外墙，抓住他熟悉的排水管夹子，慢慢滑下去；你先演练一下，使用一个展开了的金属插销，整个下落的压力就会给消解；他再次瞥了一眼另一个国家，在这里，夏末的天空就像是可怕的血映照在树叶上。他常常在深夜中给吵吵闹闹、到处嗅闻的负鼠吵醒，开始及时了解它们的平衡和测量技艺，评估它们的跳跃，知道它们志向随意，不会掉下来；现在他在平台一角看到一个影子，在灯光下，他审视着他的合法性，希望得到一串爆竹或炸药，将所有可怕的秘密都炸成深红色的灰烬和五彩纸屑。旅馆里点着泛光灯，他听到了一个遥远而洪亮的交响乐，一种混杂音乐，宏伟但却没有任何意义。他感到一片沉静……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听到……他们脱掉盔甲，安然上床，小富即安，不用理解世界。这些思想使人宁静。当然了，不用解释他就开始慢慢奔跑，向着特定的方向，虽然他的心脏不由自主地挤压着胸口，他跌跌撞撞，稳住了步子。也许是他的肺崩溃了，因为他听到了一系列似痰一样的爆炸声，仿佛瀑布从山上落下。他拼命想听到竖琴和扬琴的声音，透过黑暗，他想偷偷地看一眼长裙，看看大声呼吸的马和运着弓箭

的贵族。他稳步向大海走去，想想也许他还能在影子中游泳，他的呼吸帮助他找到了他能进入的各种门口，包括死亡，恐惧，甚至更厚一点的冰层，然后他才能谈放弃语言。然而，夜晚闷热潮湿。风来了。他还不知道这点，正在数着一棵棵树，这种计数一下子带来了冷漠；他对发生的一切都不关心。乞丐们蜷缩在阴湿发酸的洞里，他对人力车夫为什么喜欢冬天已经不再好奇，天空低垂，一道淡蓝色的光辉将一张发白的脸投射到人造毛上。这些幻觉不再发声，幻觉里也没有劝告。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天空开始闪光、燃烧，空气仿佛给高压锅煮过。他将手伸进口袋，拿出信封，解开带子，开始撕纸，然后将纸片抛向风中，抛向水里。这引发南中国海水波上涨，进而释放出点点泡沫，撞击着南湾大马路边的防波堤。他想放开语言。这是他父亲过去常常解读的办法。这避免了原路返回，消除了种种停下来反思的诱惑。他想他也躲掉了这些事，他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他在电话中听到了卡门的声音，话筒噼噼啪啪，夹着她的眼泪声，但是他不为所动，不过……不过电话里依然保留着她温柔而嘲笑的语调。他听到他的30英亩土地在那片黑土峡谷里得到了安置，破裂的栅栏给换掉了，靠山而建完成了一半的房子地基得到了加固；他听到他想从赤脚邻居手中购买的枣红马在嘶鸣，他的心一撕为二。他非常清楚他得采取什么手段才能终结这没完没了的小圆盘，他得到了所有祖先的鼓励，他列队站着，挥动着小手帕。他甩掉了精神忧郁症，看到它给勾在窗台上。这个破东西让他受了不少罪。这种风暴三角帆的损失开启了另一片肮脏的天空，使他的位置得到了重新调整。他旋转着，在一个不同的坡度上跳起了舞。一些修女从女儿墙上飞了出去，女学生们穿着水手服，聚集在圣坛边看着彼此的椭圆形呼吸在银色的坩埚里搅动着正在燃烧的花瓣。他漂浮着，经过一些雨水浇洗过的寺庙花园其木制屋檐和拍打标记传递出达观的价值体系，直接进入高跷表演者的脸上，他们抓紧时间，步履沉重地跨过驼峰式桥，在大火发生之前撤退。瞧那儿。什么？我外公。谁？那儿。维吉尔缩成了一条京巴

犬，穿着塔夫绸狗狗服在一个圆球顶上翻筋斗；说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还不如说他是一名裁缝。裁缝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组成部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会告诉我们，维吉尔就是各个部分缝合起来的一个人，现在，小狗像生了翅膀似的不停地活动，跷起腿来就尿，围着连锁闪电和火球爆炸形成的旋转烟火转来转去。幻想他永远也不能成为对手。于是他先游走，之后他外公成了一名惊人的人物，穿着灰绿色的纱丽，一副含磷牙齿照亮了黑暗。此外，他的舅舅乔治扭动着略微发黄的肋骨，像拉手风琴一样，固定好肋骨，抵御着大风，一个晃来晃去的洗衣板，边上是肥胖的达里奥叔叔，像气球一样膨胀，像灌了甲烷一样浮肿，从百货公司的长廊开始，炸成了一个火球，抗击着换班时出现的一车车无情赌徒，就在靠近幽灵建筑的开垦土地旁，他碰见了罗伯·林，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当时，他坐在一个静静的贡多拉小船里，撑篙的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兔唇男孩，他的桨哗哗地在水面上滑动，小船在泛着白色泡沫的波浪中加速前行。此刻他迎着风浪，徐徐行进，雨水打在了他的眼里，眼睛诞生，声音却没了，这一刻，他看到了他一生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在回力体育馆旁，他看到他的堂兄阿尔弗雷德在跟卡诺拉·容交换意见，他用一块白色的大手帕擦着他的大脸，然后两个人庄重地进入了体育馆，赤身裸体，手拉着手，走上台阶，来到正义法庭；体育馆内，鼓声开始，随后是阵阵吼叫，支持与反对正好持平；竞技场四周的墙上灯光闪烁，雾气弥漫，在这种充满雾气的灯光中，他能看到身着白袍的神父轻轻浮起，而从隔壁修道院的窗口可以看到，来自亚速尔群岛的主教们正将钢琴抛出窗外，轿夫们沿着散步场所跑上跑下，气喘吁吁，手上拿着一块块冰，因为有一半人口精神错乱，发着高烧，口渴难耐。他看到瘟疫还在扩散，黑色的云彩到处盘旋，有时会向挤在一起抢劫的人群撒下橙色火苗从珠宝店内吐出金块，而在广场，警司将神殿塞进他的头脑，冲着人群开火，喷射着自动火警和法国香槟酒。然后，在靠近直升机停机坪的码头上，威利舅舅再次下来，这

一次他穿着白色马甲，戴着帽子，一只螺旋推进器从他的脑子那儿旋转着，本来这事可以使他变得圣洁而宁静，可惜的是判断失误，飞机降落时偏离码头，跌入了水中，他满嘴嘶嘶，慢慢沉了下去，与此同时，他的木炭唇上露出困窘的笑容，他在汉堡包装纸内滑翔，水变成了乳白色。一个长了翅膀的小王子完全飞了起来，一边朗诵诗歌，一边抛撒树叶，海港里充满了花环。他东倒西歪，穿过各种奇异的过道，拱廊和其他建筑和场所，在穿行过程中，他将一个女孩按在闪光的石头和波雾中，透过她的裙子和外套，在她薄薄的内衣内乱摸，寻欢作乐，冒着公众看到的危险。我一直想要你在那儿，她冲他重复道，这儿人人都看得见。她叫什么名字？他听过比才歌剧的片段。卡门。他可以再次追求她。到上海跳舞去。没有影子和底片，没有修辞和鲜花，没有模糊的虚构。她的公共自我撞击着他的影子世界，他的困惑事业。他曾愚蠢地幻想去给她解毒，在雨林里度过头几周，在高山的蜡树下发出大声尖叫，他们可以达成某种妥协……他不再喝酒……而她则要投桃报李，在他的最后几年喂他冷芒果，他的脑子里全是岛屿。一群穿着拖鞋的人慢吞吞地经过：教授们已经到了。他们的旗帜在空中飘扬，专业扩音器在劈啪作响，喇叭脱口而出，宣告他们已经回到喧嚣混乱的活人世界。我们过了。那么再见，再见，永远再见。安吉尔医生。呼叫安吉尔医生；请到中央终端台来……对不起……请你……终端。他再也不会；他要忘记……这是唯一的办法……他突然给抛进了免税香槟酒中。一把手枪！他开心地喊道，同时高兴地将手指包在那个庞大的承诺中，而不是放到口袋里——他父亲的财产中有四支维纳斯牌绘图铅笔，用得只剩存根，现在，这些都滥用挥霍在海港淤泥和混水带来的灰色冲击物上。他用力把它们抛了出去；肮脏的花，引人注目的女人。他没有注意到，在他背后，就在松山顶上，他们立了一个十字架，中国书法里表示十，台风信号，表明最凶猛的暴风。现在，他唯一的行李不冷不热，没有吸引力，什么都没有，但又什么都在，他加入到一群战前揩油者行列中，人太

多，一路上慢吞吞的，穿着鞋罩的老人拿着小提琴，提着鼓箱，女人们拖拉着时尚箱子和毛皮衣服，男女孩子们牵着狮子狗，拖着自行车，跟在后面的是一群穿着睡衣的女仆，她们一边唱着诺亚方舟，一边将熟睡的孩子背在柔软光滑的后背上。他吩咐他的马车沿着海滨走。赶上那艘摆渡，扑嗒！他听到有人叫了起来。整个船装点的一如既往，犹如一艘流动妓院，上船前高兴地喘口气，然后一排运输大亨过来，他们在空中划了个圆，进入深入讨论，粗壮的手指间夹着粗粗的雪茄，犹如萤火虫，拖着银色围巾，这个只有在听歌剧的初夜才会围。水边建筑那儿传来了几阵枪声。大炮都堆在山上。但是他们控制着发动机，等待另一批太太，职员，买办和苦力，这些苦力拖着满是葡萄酒的手推车。慢慢……慢一点慢一点，锡克教首领告诫道，他们沿着跳板，胳膊肘和屁股搁成了杯状，在跳板的另一头，多拉·西德尔站在那儿，手臂茫然地伸着，就好像是一个巴西基督在拥抱着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教徒，手边的购物袋里溢出无数本弗朗茨·法侬[①]。他上了船，躲避了他的婶婶特雷莎，她的乳房涂满了脂粉，她的花瓣十分诱人，真能让他窒息，他看到他的母亲站在船尾，隐隐约约，一副担心的样子，感觉着左舷栏杆的振荡，犹如一群登船搜查的海盗，她用毛皮服围住肿起来的脖子，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普西芬尼[②]。现在围在周围的都是些舞女，她们都在兜售票子，有的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像旋风似的轻快旋转，还有的没有压力，悠然自得，她们无精打采地翘着腿，手指里夹着条子，晃来晃去。船下，苦力们蹲在巨大的风箱旁，他们已经在赌场里输掉了一切。他们长吁短叹，神情沮丧。他正走在甲板间，这时突然听到了有人在玩单簧管，起调旋律是乐曲的尾声，《重新再来》[③]，节奏失去了，再重新找回

① 弗朗茨·法侬(1925—1961)，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马提尼克岛，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对后殖民思想有较大影响。

② 普西芬尼，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之女，被冥王劫持娶作冥后，后被其母所救，每年在人间过六个月，然后在地狱过六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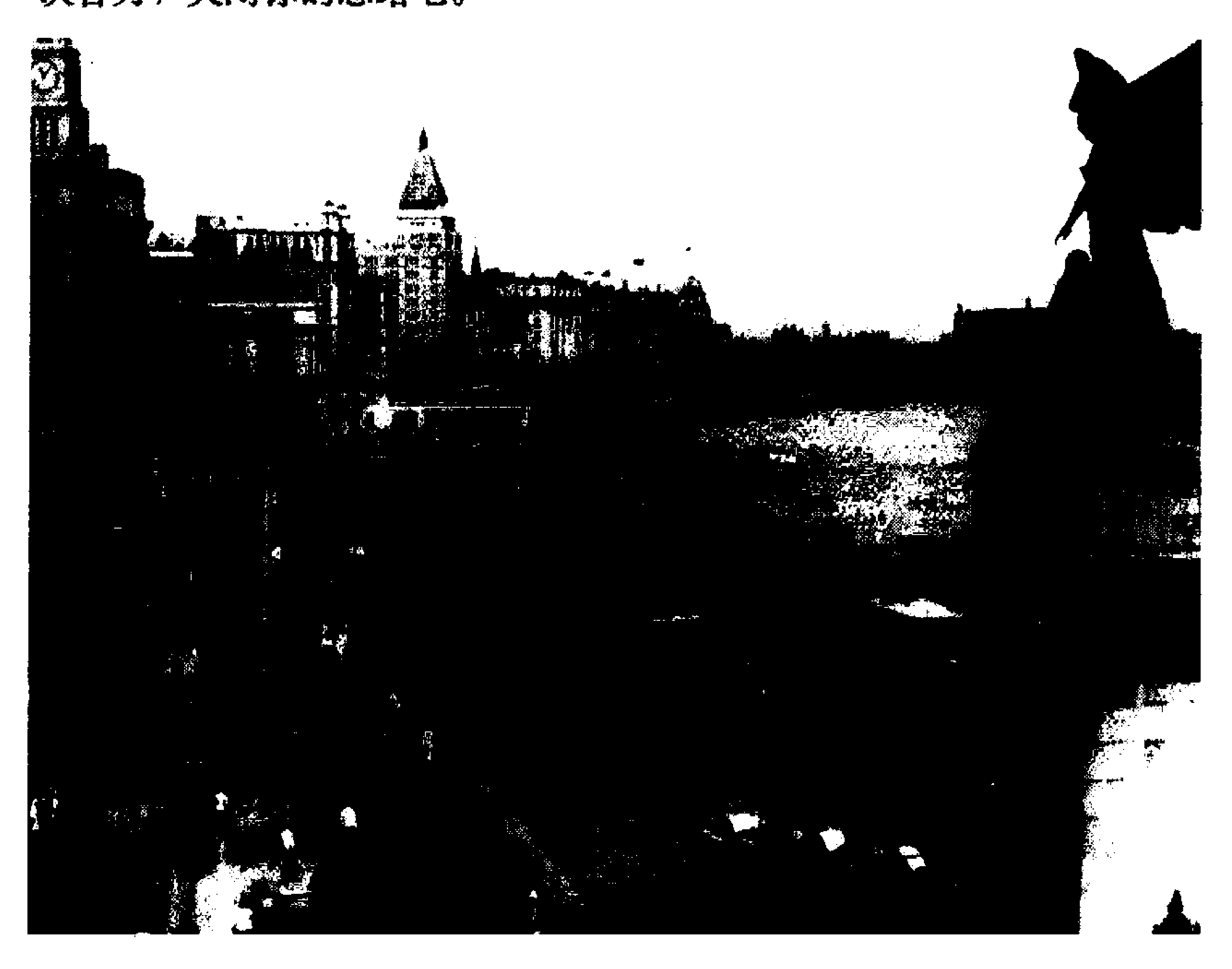
③ 一首爵士老歌。

来，犹如乌罗伯诺斯[1]，自己吞食自己的尾巴。打开舱盖，他们瞥见胡子拉碴的柴姆·利夫正和搬运工一起蹲在船尾，玩着单人纸牌，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根线，上面串着带孔硬币，再往前，祖父博尼法西奥两腿叉开站在船首，用线和铅锤在量深度。他想找一家酒吧，在瓶子里装点冰块，这时他看到他同父异母姐姐们围着救生艇奔跑，发出阵阵尖叫，她们手上拿着剪子，冲着查理·容的木偶剧咯咯直笑，由于晕船，他那精湛的表演已经失去了活力，而孩子们正围坐在圣诞树旁，打开未来的包裹，这时，何塞·马纳利塞从他的箱子里拿出熟了的芒果和光亮的番茄。乐队立刻演奏起来，庆祝出逃。上海汽船起航，在海浪中摇晃，溶化在黑黑的海上空气之中，她的甲板上挤满了一排排的幽灵，骨感幻影，穿着米色亚麻西装，黄色的灯光围着他们空旷的两边盘旋。他们开始跳起舞来，台风再次提高级别，波浪已经是一浪高过一浪，海面的泡沫正围着甲板的排水孔打转。漩涡已经形成。台风的太太来了。船尾上挂着硫磺灯，他站在甲板上，一副摇摇晃晃的样子，但他很好的保持住了平衡，和风暴保持一致，天空中，一团蒸馏火倒下，大滴大滴的软辐射照在他微微仰着的脸上，遮住了他的光线，让他继续前行，歌曲再也不用了。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平衡。他会重新建造房子；钓鱼；骑车；看望他想看望的18世纪的中国女人；这些都将会成为他眼前的奇迹；爱情和未来的完美。放松。船继续前进，进入到黑暗而咆哮的旋转风暴中，这一最后的传响邮轮，携带着来自死者的信件，奔流之下，启示逼近，损失跟着逼近。你父亲哪儿去了？阿纳尔多从来就没在那儿。你得独自旅行，他会说。虽然你不一定会知道这就是代价，但是等坐到书写用品(这是遗嘱附录，救生艇，还是遗产?)之前，你忙里偷闲，来回翻看着这些照片，这时，图像分解，融化在浮士德式的阴影之中……

---

① 乌罗伯诺斯，吞食自己尾巴的蛇。源自北欧神话，后引申为世间万物循环变换，万物之间犹如阴阳，可以相互转化。

你的椅子往回转动，甲板上碎片堆积：罐子、痰盂、外科医生的羊皮剪……你一定不知道这短暂的想象超越了几百年的遗忘——一个留给别人的秘密——你不会知道其中的价值，无论是好是坏，那时，你跑去跳上海舞，听到了船偏航，驶向潜艇泊位，驶向再也没有你的航线的地方，既没有文字，也没有遗嘱，随着船尾高耸，船首下沉，就让我们再次合力，关闭你的思绪吧。



鸣谢

本项目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及其艺术资助和顾问委员会的帮助。

感谢艾弗·印迪克的鼓励和建议。同时还感谢格洛里亚·戴维斯，玛丽亚·杰肖克，伊夫林·朱尔，格雷格和伊莎贝拉·李，朱丽·罗思，吉姆·沙曼和瑞·辛克，他们十分慷慨地提供了他们的研究和翻译。

这是一部虚构作品。所有人物全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不得与任何人等同，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逝的。

译后记

王光林

记得2001年9月，我在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教授家做客，席间他跟我聊起，在英语世界，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创作相当多，说上海是英语小说的宠儿，此话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他原本答应给我提供一个以上海为背景的英语小说清单，我也很希望能够对此做更多的了解，但后来费教授说清单不知搁哪，找不着了。我回国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004年，当我读到卡斯特罗的小说《上海舞》时，我又想到了费教授的话。

《上海舞》发表于2003年，是澳大利亚作家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的第七部小说。说起卡斯特罗，他跟中国还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父亲是葡萄牙人，从祖上开始就来上海创业，母亲是中英混血儿，外公是广东人。1950年，他母亲怀着他乘船从澳门前往香港，结果遇到风浪，卡斯特罗就出生在澳门到香港的船上。后来他一直说他一出生就有无根之感。出生后，他母亲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高博文，他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卡斯特罗从小在香港长大，会说广东话、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迄今为止，他一共创作了《候鸟》(*Birds of Passage*，1983)，《波莫罗伊》(*Pomeroy*，1990)，《追踪中国》(*After*

China，1992)，《双狼》(*Double Wolf*，1991)，《随波逐流》(*Drift*，1994)，《斯特普》(*Stepper*，1998)，《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花园书》(*The Garden Book*)，《洗浴赋格》(*The Bath Fugues*，2009)等九部小说和《寻找艾斯特利塔》(*Looking for Estrellita*，1999)等文学评论集。

阅读卡斯特罗的小说，读者会有一种印象，就是作者喜欢将理论包含在叙述之中，刻意地对传统的文化身份提出挑战。评论界有人将他的创作视为高度现代主义创作，因为他的作品延续了现代派创作的特点。卡斯特罗自己也曾坦言，澳大利亚作家中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就是帕特里克·怀特——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现代派作家，其他则是欧美现代派作家，如普鲁斯特、卡夫卡、贝克特、昆德拉、纳博科夫等。这些作家跟卡斯特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之中许多都是流亡作家，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无根作家。卡斯特罗之所以觉得与这些作家心心相印，或者说与现代派距离更近，原因在于作者经历了现代派艺术家所经历过的异化感和毁灭感。他现在生活的时代既是现代派前辈基础上的延续，又带有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烙印。他讲述的是现代派的故事，提出的却是后现代的问题——文化身份的思考。在他的论文集《寻找艾斯特莉塔》一书中，卡斯特罗不断表现出他对德里达、哈贝马斯、巴赫金、保罗·德曼等现代、后现代理论家的关注，这些关注的焦点说到底就是：作为一个无根无基、到处漂泊的人对自身文化身份、对作家的创作使命与作家创作个性的关注。卡斯特罗出生在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船上，可以说生下来就缺乏根基。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使他感到无法适应，即使在他成功的时候，他也无法释怀。笔者曾经写信给他，对他入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表示祝贺并希望能够走得更远。卡斯特罗回信说他并不指望这个大奖，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大奖，因为自己始终是个边缘人。

在《上海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景象，那就是作者

对画面的兴趣。除了封面的照片使人联想到其家庭历史，小说里面穿插了很多旧上海的地图、照片、月历，等等。这些珍贵的照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我再现，相反，它是为了消除自我，打破权威而刻意安排的。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叙述者非线性结构的绕进绕出，仿佛被他自己所发现的祖先的故事给搞糊涂了，读者根本搞不清到底是谁在讲故事。小说里来来往往的生命和声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应着卡斯特罗自身对自传的看法。在这方面，卡斯特罗流露出了他对解构主义大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尤其是保罗·德曼的论文《作为破相的自传》(*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的兴趣。在论文里，德曼对作为一种体裁来看待的自传流露出了鄙视。他认为，与悲剧或史诗或抒情诗相比，自传看上去总是名声不好，或给人一种自我表现或自我放纵的感觉。研究自传必然带来一些问题，如历史和分类问题。他认为，无论你写什么，你都会在作品里打下你的个性和经历的烙印，你无法控制。所有的创作都是自传。总而言之，在德曼的眼里，自传不是一种体裁，而是一种阅读方式，它出现在所有的文本中。自传的人物就是一种拟人法(Prosopopia)，一种虚构的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声音，它把虚幻人物、缺席者、已故者表现为正在说话或行动。正是这种观点引导着卡斯特罗的创作思维，也正因为如此，卡斯特罗流露出对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作品《女勇士》的称赞，因为这部作品将各种事实、虚构、神话、记忆编织在一起，突破了许多传统界限。他认为“体裁的交织缓解了真与伪二分法中精神分裂症似的压力”。从第一部小说《候鸟》到最近的新作，卡斯特罗的小说总会给人自传的感觉。在他看来，“自传的成分指引着方向，因为这是最直接的逾越形式……。”

在《上海舞》中，死者复苏，属于一般的自传形式，结构则是混杂的，既有通婚，又有乱伦，打破传统体裁的固定性，由此建立起家族族谱。主人公心理好奇，想挖掘家族的起源，但到文本末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想知道他所发现的一切。他在文中进一步质疑了小说中所追

求的作者责任和义务。“一纸签名有多大约束力？一个作者有多少原创？一个笔画就能让人死亡吗？如果真与自我联系在一起，那么真正的作者的真正死亡就与至关重要的文学有关吗？”在卡斯特罗的小说里，叙述者混迹在同父异母的姐妹和表姐表妹之间，使人想起了现代派作家，尤其是乔伊斯和贝克特，他们成了卡斯特罗的楷模，而他们也是主流之外的少数族裔。

《上海舞》以上海为背景，封面是一个小型乐队的老照片，乐队的鼓上隐约可见“路西塔尼亚”几个字（古罗马的一个省名，相当于现今葡萄牙的大部和西班牙西部的一部分），作者并没有标明这些人是谁。随着小说的进展，家族中的各个成员开始跟照片中的人吻合起来，而站在鼓后面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叙述者的父亲。小说设计了家族的族谱，但是卡斯特罗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过，那个族谱也是假的，不能当真。

叙述者的名字叫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四十年后，决定经由出生之地香港回到中国。他把一切都抛到后面，包括他的婚姻。他讲述着他的家族故事，在上海来回跳着。一代又一代，秘密、鸦片、小妾、无言的母亲、狂妄不羁的父亲、精明的姐姐、说谎者、传教士、赌徒、天地会成员、情人、裂唇的侏儒、英雄般的孤儿，所有这些都给冲洗到卡斯特罗小说奇妙的岸上。

安东尼奥的父亲阿纳尔多在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生活之后，死在了悉尼。他一生结过三次婚，有无数的风流韵事，还有许多的谎言。他不喜欢读书，自认一生当中只读过一本书，那就是大仲马的《铁面人》，而且读完后他就将小说扔了。安东尼奥的母亲茉莉（阿纳尔多的第三任太太）是一个神情郁闷的人。阿纳尔多说他从没看过她跳舞，但是后来又记起他孩提时曾从钥匙孔里看见她跟一个想象中的人跳舞。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学校里曾是垒球冠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日本集中营里接芒果的高超技艺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使得她在驻地获得了更多的给养。

《上海舞》呈现出多元主题。首先它表现的是记忆和忘却，人们如何忘却过去，但是过去对于现今的存在却至关重要。跳舞是人们忘却过去的一种方式，但是记忆一直在那儿，因此他们不用思考就记住了舞步。小说的主题还包括迷失方向，失去稳定性等。随着小说的叙述，这种方向迷失和稳定性的丧失持续了几个世纪：读者给带到17世纪的巴西，见到了伊斯雷尔·德·卡斯特罗，然后是威利舅舅的豪宅；接下来就是多拉·西德尔，他的奶奶，来自英国利物浦，1910年来到中国进行传教；再下去就是阿纳尔多，在上海的大街上穿梭跳舞。

1997年他在接受《澳大利亚书评》采访的时候说道，“体裁会把你囚禁在某些框架里，除非你跳出来，对它们加以戏仿，否则你的写作不会有什么进展”。1992年，在接受《澳大利亚书评》采访的时候他还说过，他对如何畅销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写作本身。他写作不是为了治疗，也不是为了后代，甚至也不是为了读者。驱使他写作的动因就是故事与文学的牵连。因此，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看到了他这种努力，理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没有淡化小说的文学功能，而且还强化了卡斯特罗作为边缘作家的主体话语意识。许多小说家都在探讨异化(疏远)，描述细小的精神或身体挫折，但是没有哪个小说家像卡斯特罗那样能够将心理洞见与同样具有想像力的叙述技巧结合在一起。

此书的翻译断断续续，我本想一鼓作气把小说译完，但诸事缠身，一直拖延，2009年又生了一场大病，害得家人和同事十分紧张，提心吊胆，当时我自己心情也十分低落，吃不准是否能将小说翻完。后来邹囡囡女士主动请缨，帮我翻译一部分，想让我好好调养，早点康复，因此，从“战事又起”到“奥兹国”部分由邹囡囡女士翻译，最后由我校对。在翻译中，我们跟着作者在不断奔波，空间上，我们时而到上海，时而到澳大利亚，时而又到香港和澳门，在时间上，我们一会回到17世纪，一会儿又来到20世纪，语言上，作者也表现出了他对多种语言的精通(polyglot)，他时而用法语，时而用西班牙语，时而又用葡萄牙

语、德语等，体现了语言学上的语符转换(code-switching)，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单一的文化身份，再现出多元文化的杂糅。幸好有现代科技帮忙，碰到各种难懂的地方，我们就google一下，倒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人名、地名方面，我们主要参考了《英语姓名翻译手册》，《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外国地名译名手册》，《西班牙语人名译名手册》等工具书。法语方面江国滨君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